民國叢書

第四編

·64·



歷史哲學教程　翦伯贊著

歷史哲學　朱謙之著

歷史哲學概論　胡秋原著

歷史哲學論叢　常乃悳著

民國叢書

第四編

64

歷史·地理類

上海書店

顧頡剛編著

古史辨

第一册

古史辨



漢武梁石室畫像一

第一冊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出版



漢武梁石室畫像九

Soyez profondément, farouchement véridiques. N'hésitez jamais à exprimer ce que vous sentez, même quand vous vous trouvez en opposition avec les idées reçues. Peut-être ne serez-vous pas compris tout d'abord. Mais votre isolement sera de courte durée. Des amis viendront bientôt à vous : car ce qui est profondément vrai pour un homme l'est pour tous.

(Testament de l'Art de Rodin.)

要深澈猛烈的眞實．你自己想得到的話，永遠不要躊躇着不說，即使你覺得違抗了世人公認的思想的時候．起初別人亦許不能了解你，但是你的孤寂決不會長久．你的同志不久就會前來找你，因爲一個人的眞理就是大家的眞理．

(譯自羅丹美術的序文)

自序

兩年前，我在努力週報附刊的讀書雜志裏發表辨論古史的文字時，樸社同人就囑我編輯成書，由社中出版。我當時答應了，但老沒有動手。所以然之故，只因裡面有一篇主要的辨論文字沒有做完，不能得到一個結束；我總想把它做完了纔付印。可是我的生活實在太忙了，要想定心研究幾個較大的題目，做成一篇篇幅較長的文字，絕不易找到時間，這是使我永遠悵恨着的。

去年夏間，上海某書肆中把我們辨論古史的文字編成了古史討論集出版了。社中同人都來埋怨我，說，「為什麼你要一再遷延，以致給別人家搶了去。」我對於這事，當然對社中抱歉，並且看上海印本錯字很多，印刷很粗劣，也不爽快，就答應道，「我立刻編印就是了！」哪知一經着手編纂，材料又苦于太多了，只得分冊出版。現在第一冊業已印刷就緒，我很快樂，我幾年來的工作得到一度的整理了。

這第一冊分做三編。上編是在讀書雜志中作辨論以前與適之玄同兩先生往返討論的信札，是全沒有發表過的。這些信札只就手頭保存的寫錄，當然遺失的還有許多。在這一編裏，可以知道雜志中文字的由來和我對于懷疑古史一件事所以有明瞭的意識的緣故。中編所錄全是在讀書雜志中發表的。其中許多問題雖都沒有討論出結果來，但是我們將來繼續研究的骨幹卻已在這幾篇文字中建立起來了。下編除首二篇外全是讀書雜志停刊以後的通信及論文，有一部分是沒有發表過的。在這一編裏，可以見

出我現在對于研究古史所走的路途的趨向。

第二冊的稿子約略輯成，也分作三編。上編是討論古代史實及傳說的。中編是說明經書眞相及批評注解得失的。下編是辨僞者的傳記和評論。這些文字都是數年來在各種刊物上零碎發表的，其中待討論修正的地方很多。只要第一冊出版後有銷場，社中同人容許我繼續出版，我就可寫定付印。以後我的環境如果不至迫逼我廢學，我的胸中所積蓄而且渴望解決的問題正多，自當陸續研究，作文發表，第三冊以下也儘有出版的希望。但不知道我的爲生活而奮鬥的能力能打出一個境界，完成這個志願與否。

現在輯成的兩冊，範圍並不限于古史。所以仍用古史署名之故，只因我的研究的目的總在古史一方面，一切的研究都是要歸結于古史的。（例如辨論詩經與歌謠的文字雖與古史無直接關係，但此文既爲辨明詩經之性質，而詩經中有古史材料，詩經的考定即可輔助古史的考定，故仍收入。）沒有枝葉固然可以把本幹看得淸楚，但有了枝葉也更可以把本幹的地位襯託出來，所以我不想把枝葉删芟了。

這幾年中，常有人問我，「你們討論古史的結果怎樣？」我屢次老實答道，「現在沒有結果。因爲這是一個大問題，它的事實在二三千年以前，又經了二三千年來的亂說和僞造，哪裏是一次的辨論所能弄淸楚的！我們現在的討論只是一個研究的開頭呢，說不定我們一生的討論也只是一個研究的開頭咧！」

也有人對我說，「你爲什麼不把幾年來的討論的文字重做一番系統的整理，作成一篇齊整的論文呢？

」這話固然是好意，但我決不敢答應。我現在在研究上所走的路途的短，成績的少，是大家看得見的，實在沒有把這種一目可盡的東西再做一番系統的整理的必要。況且我所提出的論題全沒有討論出結果來，也無從加以斷定。我並不是沒有把我的研究構成一個系統的野心；如果我的境遇真能允許我作繼續不斷的研究，我到老年時一定要把自己的創見和考定的他人之說建立一個清楚的系統。但現在還談不到此，還只能見到一點寫一點，做零碎的發表和瀏雜的編集。

我非常地感謝適之玄同兩先生，他們給我各方面的啓發和鼓勵，使我敢于把違背舊說的種種意見發表出來，引起許多同志的討論。這個討論無論如何沒有結果，總算已向學術界提了出來，成爲學術界上的公同的問題了。我又非常他感謝劉楚賢（掞藜）胡堇人，柳翼謀（詒徵）諸先生，他們肯盡情地駁詰我，逼得我愈進愈深，不停歇于浮淺的想像之下就算是滿足了。我永遠要求得到的幸運，就是常有人出來把我痛駁，使得我無論哪個小地方都會親自走到，使得我常感到自己的學力不足而勉力尋求智識。我在生活上雖是祈禱着安定，但在學問上則深知道這是沒有止境的，如果得到了止境，即是自己的墮落，所以願意終身在徬徨覓路之中，不希望有一天高興地呼喊道『真理已給我找到了，從此沒有事了！』

我自在讀書雜志中發表了推翻相傳的古史系統的文字之後，一時獎譽我的人稱我『燭照千載之前，發前人之所未發』；反對我的人便罵我『想入非非，任情臆造』；對我懷疑的人也就笑我捋撦古人只不過

爲的趨時成名。也有愛我的前輩䏜摯地勸告道，「你是一個很謹厚的人，何苦跟隨了胡適之錢玄同們做這種不值得做的事情！」我聽了這種種的議論，禁不住在腹中暗好笑。我自己知道，我是一個平常的人，決不會比二千年來的人特別聰明，把他們看不清楚的疑竇由我一起看出。我也知道，我是一個很膽小的人，苟非確有所見，也決不敢猖狂地冒了大不韙，自己提出一種主張來疑經蔑古。至于成名之心，我固然不能說沒有，但總可以說是很淡薄的；我也決不願無故凌辱古聖先賢來造成自己的名譽。適之玄同兩先生固是我最佩服的師，但我正因爲沒有崇拜偶像的成見，所以能眞實地佩服他們；若把他們當作偶像一般而去崇拜，跟了他們的脚步而作應聲蟲，那麼，我用了同樣的方式去讀古書時，我也是古人的奴隸了，我還哪裏能做推翻古代偶像的事業呢。老實說，我所以有這種主張之故，原是由于我的時勢，我的個性，我的境遇的湊合而來。我的大膽的破壞，在報紙上的發表固然是近數年的事，但伏流是與生命俱來的，想像與假設的構造是一點一滴地積起來的。我若能把這個問題研究得好，也只算得沒有辜負了我的個性和環境，沒有什麼了不得。若是弄得不好，不消說得是我的罪戾，或是社會給與我的損害了。因爲我對于自己的地位有了這種的瞭解，所以我對于自己的見解（給一般人詫爲新奇的）常以爲是極平常的，勢所必然的，我只順着自然的引導，自己無力于其間。譽我和毀我的話都是廢話而已。但譽我和毀我的人，我也不嫌怪，因爲他們只見到我的主張的斷面，而不能深知道我的個性和環境，也是當然如此。

我讀別人做的書籍時，最喜歡看他們帶有傳記性的序跋，因爲看了可以瞭解這一部書和這一種主張

的由來，從此可以判定它們在歷史上占有的地位。現在我自己有了主張了，有了出版的書籍了，我當然也願意這樣做，好使讀者瞭解我，不致驚詫我的主張的斷面。

因為這樣，所以現在就借了這一冊的自序，約略做成一部分的自傳。我很慚愧，我的學問還沒有成熟，就貿貿然來做這種自傳性的序文，實在免不了狂妄之罪。但社會上已經等不到我的學問的成熟而逼迫我發表學術上的主張了，已經等不到我的主張的討論出結果來而逼迫我出書了，我為求得讀者對于我的出版物的瞭解，還顧忌着什麼呢。

我是一八九三年生的。當我出生的時候，我的家中已經久不聽見小孩子的聲息了，我是我的祖父母的長孫，受到他們極濃摯的慈愛。我家是一個很老的讀書人家，他們酷望我從讀書上求上進。在提抱中的我，我的祖父就教令識字。聽說我坐在「連枱交椅」（未能步行的小孩所坐）裏已經識得許多字了，老媽子抱上街去，我儘指着招牌認字，店舖中人詫異道，「這怕是前世帶來的字吧！」因為如此，所以我瞭解書義甚早，六七歲時已能讀些唱本小說和簡明的古書。但也因為如此，弄得我遊戲的事情太少，手足很不靈敏，言語非常鈍拙，一切的技能我都不會。這種的狀態，從前固然可以加上「弱不好弄」的美名，但在現在看來，只是遏抑性靈，逼作畸形的發展而已。

在這種沈悶和呆滯的空氣之中有一件事足以打破這寂寥而直到近數年來總從回憶中認識的，就是

民間的故事傳說的接近。我的本生祖父和嗣祖母都是極能講故事的：祖父所講大都屬於滑稽一方面，如「諸福寶（蘇州的徐文長）」之類；祖母所講則大都屬於神話一方面，如「老虎外婆」之類。除了我的祖父母之外，我家的幾個老僕和老女僕也都擅長這種講話，我坐在門檻上聽他們講「山海經」的趣味，到現在還是一種很可眷戀的溫煦。我雖因言語的鈍拙，從未複述過，到後來幾乎完全忘記了，但那種風趣卻永遠保存着，有人提起時總覺得是很親切的。祖父帶我上街，或和我掃墓，看見了一塊匾額，一個牌樓，一座橋梁，必把它的歷史講給我聽，回家後再按着看見的次序寫成一個單子。因此，我的意識中發生了歷史的意味，我得到了最低的歷史的認識：知道凡是眼前所見的東西都是慢慢兒地積起來的，不是在古代已盡有，也不是到了現在剛有。這是使我畢生受用的。

當我讀論語的時候，孟子已買在旁邊；我隨手翻着。我在論語中雖已知道了許多古人的名字，但這是很零碎的，不容易連接。自從看了孟子，便從他敍述道統的說話中分出了他們的先後。我初得到這一個歷史的系統，高興極了，很想替它做一個清楚的敍述。以前曾在祖父的講話中知道有盤古氏拿了斧頭開天闢地的故事，有老嫗和犬生出人類的故事；到這時就把這些故事和書本上的堯舜禹的記載聯串了起來了。我記得那時先着一家起了幾個早晨，在朝暾初照的窗下寫成一篇古史，起自開闢，訖于滕文公篇的「孔子沒，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不可」的一段事。孟子敍述道統到孔子爲止，我作歷史也到孔子沒後爲止，這是很分明的承受了孟子的歷史觀了。這篇古史約有五頁，那時

還沒有練習過小楷，襯了紅格紙寫得蠅頭般的細字，寫好了放在母親的鏡匣裏。從我所讀的書和母親的病狀推求，那時我是七歲（依舊法算應是八歲）可惜後來母親死了，這篇東西就失去了。

就是這一年的冬天，我讀完了孟子。我的父親命我讀左傳，取其文理在五經中最易解，要我先打好了根柢然後再讀深的。我讀着非常感受興趣，髣髴已置身于春秋時的社會中了。從此魯隱公和鄭莊公一班人的影子長在我的腦海裏活躍。但我的祖父不以爲然，他說，「經書是要從難的讀起的；詩經和禮記中生字最多，若不把這兩部書先讀，將來大了就要記不清了。」所以在一九〇一年的春天，命我改從一位老先生讀詩經。左傳只讀了一冊，就擱下了。

我讀國風時，雖是減少了歷史的趣味，但句子的輕妙，態度的溫柔，這種美感也深深地打入了心坎。後來讀到小雅時，堆砌和嚴重的字句多了，文學的情感減少了，便很有些兒怕唸。讀到大雅和頌時，句子更難唸了，意義愈不能懂得了。我想不出我爲什麼要讀它，讀書的興味實在一點也沒有了。這位老先生對付學生本來已很嚴厲，因爲我的祖父是他的朋友，所以對我尤爲嚴厲。我越怕讀，他越要逼着我讀。我唸不出時，他把戒尺在桌上亂碰，背不出時，戒尺便在我的頭上亂打。在這種的威嚇和迫壓之下，長使我戰慄恐怖，結果竟把我逼成了口吃，害得我的一生永不能在言語中自由發表思想。我耐不住了，大着膽子向先生請求道，「我讀左傳時很能明白書義，讓我改讀了左傳罷！」先生聽了，鼻子裏嗤的一聲，做出很傲慢的臉子回答我道，「小孩子哪裏懂得左傳！」好容易把一部詩經捱完，總算他們順了我的請求，沒讀禮記而接

讀左傳。這位老先生要試一試我以前類于鉤口的請求，令我講解華督殺孔父的一段。我一句句地講了。他很詫異，對我的祖父說道，「這個小孩子記性雖不好，悟性卻好。」我雖承蒙他獎讚，但已做了他的教育法的犧牲了！

我的生性是非常桀驁不馴的。雖是受了很嚴厲的家庭教育和私塾教育的壓抑，把我的外貌變得十分柔和卑下，但終不能摧折我的內心的分毫。所以我的行事專喜自作主張，不聽人家的指揮。翻出幼時所讀的四書經文和注文上就有許多批抹。例如告子上篇天爵章末有「終亦必亡而已矣」句，仁之勝不仁章末又有「亦終必亡而已矣」句，我便剔去了中間欲貴章首的「○」號，批道「不應有○，下文有「終亦必亡而已矣」之語，可見兩段相連。」又如離婁下篇逢蒙學射章「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我疑心「羿」與「宜」因同音而致誤，就批道，「宜當作羿。」這一類的批抹，在現在看來確是極度的武斷，但我幼年讀書就不肯盲從前人之說，也覺得是不該妄自菲薄的。

約在十一歲時，我初讀綱鑑易知錄，對於歷史的系統更能明白認識。那時，我便自立義法，加上許多圈點和批評。我最厭惡綱目的地方，就是它的勢利。例如張良和荊軻一樣的謀刺秦始皇，也一樣的沒有成功，但張良書爲「韓人張良」，荊軻便書爲「盜。」推它的原因，只因荊軻的主人燕太子丹是斬首的，而張良的主人劉邦乃是做成皇帝的。我對於這種不公平的記載非常痛恨，要用我自己的意見把它改了。可惜我讀的一部易知錄是石印小字本，上邊寫不多字，只得寫上小紙，夾在書裏。前年理書時檢得一紙條，是

那時的筆蹟寫道：

書「秋，秦王稷薨，太子柱立。」至明年冬，又書「秦王薨，子楚立。」下目書曰，「孝文王卽位，三日而薨。」夫秋立而至明冬薨，亦十七八月矣，何目書「三日而薨」耶？此其史官之訛也。

現在知道這個批評錯了，因爲孝文王的卽位在他的除喪之後，和上一年秋的「立」是不衝突的。只是我敢於寫出疑問，也算值得紀念。

兒時的佚事，現在還記得幾樁。有一次，我看見一個飯碗，上面畫着許多小孩，有的放紙鳶，有的舞龍燈，有的點爆竹，題爲「百子圖。」我知道文王是有一百個兒子的，以爲這一幅圖一定是畫的文王的家庭了，就想把文王的兒子考上一考、可是很失望，從習見的書中只得到武王，周公，管叔，蔡叔，康叔數人；左傳上較多些，但也只有「文昭」十六國。我在那時很奇怪：爲什麼這樣一個大名人的兒子竟如此的難考？後來知道文王百子之說是從詩經的「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來的，而「百斯男」的話正與「千秋萬歲，」「千倉萬箱」相類，只是一種諛頌之詞，並非實事；心始釋然。

又有一次，不知在什麼地方見到孔子有師七人的話，替他一考居然如數得到。但現在想得起的只有老聃，師襄，萇弘，郯子，項橐五人，尙有二人反而查不出了。又因謚法的解釋不同，想做一種謚法考，把左傳上的謚法鈔集起來比較看看。結果，使我知道「靈，」「幽厲」諸謚未必是惡謚，孟子所說「孝子順孫百世不能改」的話並不十分可據。有一回偶然在漢書上看到漢高祖爲赤帝子，斬白帝子，心想赤帝白帝不是和黃

帝一樣的嗎，爲什麼黃帝爲人而赤帝白帝爲神？ 又在某書上看見三皇五帝的名號和易知錄上所載的不一致，考查之後始知三皇五帝的次序原來有好幾種不同的說法。 那時見到的書甚少，這種考據之業現在竟想不起是怎樣地做成的。

我們顧家是吳中的著姓，自漢以下的世系大都可以稽考。 但我們一支的家譜只始於明代成化中，又標上唯亭的地名。 我的十一世伯祖大來公（其蘊）序道：

人各有所自，必自其所自而後即安。 苟忽其所自而妄萌一焜燿之思，指前之一二顯人曰，『吾所自者某某也，』則世之人亦因其所自而自之矣。 然反之心究有所不安。 以己之不安而知祖先之必不安，且念子孫之亦未必安也，何可以焜燿之思累先後之不安乎！…… 此尼備從姪（嗣曾）之近譜所以不宗鹿城（崑山）而宗維亭也。 維亭距鹿城不數十里，有農家者流繁衍於上二十一都之鄉，地名顧港，此吾支之所自。 鄉之先達已蒙稱述，信爲文康公（顧鼎臣）之支矣。 而尼備以宗其所疑不若宗其所信，宗其所信而苟有一毫之可疑無庸宗也，所以寧維亭而不敢曰鹿城，重原本也。

這種信信疑疑的態度在現在看來固是非常正當，但幼年的我哪裏能懂得呢。 我只覺得他們的胸襟太窄隘了：我們和崑山一支既經是一族，爲什麼定要分成兩族？ 偶然見到一部別宗的譜牒，以西漢封顧余侯的定爲始祖；又列一世系表，起於禹，啓，少康，中經無餘，勾踐，訖於東海王搖和他的兒子顧余侯期視，約有三十餘代。 （這個表不知道從哪裏鈔來的，現在遍查各種古書竟查不到。） 我快樂極了，心想我家的譜牒可以

自禹託身寫成一個淸楚整齊的系統來了！ 又想禹不是祖黃帝的嗎，黃帝又不是少典氏之子嗎，那麽豈不是又可以推算自己是少典氏的幾百幾十世孫了！ 我眞高興，對着我的同學誇口道，『我要刻三方圖章：一是「勾踐後人」，一是「大禹子孫」，一是「少典雲礽」。』 這位同學也贊嘆道，『你家眞是一個古遠的世家！』 於是我援筆在譜上批道：

甚哉譜必以大宗言也！ 不以之言，則昧於得姓傳遞之跡而徒見十數世而已。 吾族之譜始自允齋公，遂謂允齋公爲始祖。 夫公非始得顧姓者，而曰始祖，亦太陋矣！

一個人的思想眞是會得變遷的：想不到從前喜歡誇大的我現在竟變得這般嚴謹，要把甘心認爲祖先的禹回復到他的神話中的地位，要把尼備公創立家譜的法子來重修國史了！

在私塾中最可紀念的，是有兩年沒有正式的教師。 起先，我的父親在城北姚家教館，我隨着讀書。 去了不久，我父考取了京師大學堂，到北京去，館事請人代着。 可是代館的總不得長久，代者又請代，前後換了七八人，有幾個月簡直連接着沒有先生。 只因姚家待我很厚，他們的小主人和我的交情也很摯，所以我家並不逼我換學塾。 這兩年中，爲了功課的鬆，由得我要怎樣做就怎樣做。 我要讀書，便自己到書舖裏選着買；買了來便自己選着讀。 我看了報紙，便自己發揮議論。 有什麽地方開會，我便前去聽講。 要游戲，要胡鬧，要閒談遣日，當然也隨我的便。 這兩年中的進境眞像飛一般的快，我過去的三十年中吸收智識從沒有

這樣順利的：我看無論哪種書都可以懂得一點了，天地之大我也識得一個約略了。這時候，正是國內革新運動勃發的時候，要開學校，要放足，要造鐵路，要抵制美國華工禁約，要請求政府公布憲法開國會，梁任公先生的言論披靡了一世。我受了這個潮流的激盪，也是自己感到救國的責任，常常慷慨激昂地議論時事。中國魂中的呵旁觀者文和中國之武士道的長序一類文字是我的最愛好的讀物，和學塾中的屈原卜居，李華弔古戰場文，胡銓請斬王倫秦檜封事等篇讀得同樣的淋漓痛快。在這種熱情的包裹之中，只覺得殺身救人是志士的唯一的目的，爲政濟世是學者的唯一的責任。塾師出了經義史論的題目，我往往借此發揮時論，受他們的申斥；但做時務策論時，他們便不由得不來賞讚我了。

一九〇六年，地方上開辦第一班高等小學，考題是徵兵論，我竟考取了第一。我剛進去時，眞是踏到了一個新世界。我在私塾中雖是一個新人物，自己已看了些科學方面的教科書，但沒有實物的參證，所謂科學也正與經義策論相同。到了新式學校中，固然設備還是貧乏得很，總算有了些儀器和標本了，能做些實驗和採集的工夫了。我在學校裏最歡喜做的事情是『修學旅行』，因爲史地教員對於經過的名勝和古蹟有詳細的說明，理科教員又能伴我們採集動植物作標本；回來之後，國文教員要我們作遊記，圖畫教員要我們作記憶畫：使我感到這種趣味的活動，各科材料的聯絡，我所受的教育的親切。但除了這一件事之外，我的桀驁不馴的本性又忍不住要發展了，我漸漸地對於教員不信任了。我覺得這些教員對於所教的功課並沒有心得，他們只會隨順了教科書的字句而敷衍。教科書的字句我既已看得懂，又何勞他們費力解

釋！況且教科書上錯誤的地方，他們也不能加以修正。例如地理教科書中說教主出於半島，舉孔佛耶爲證，理由是半島的海岸線長，吸收文明容易；地理教員也順着說。我聽得時就很疑惑，以爲道教的張道陵就很明白不是從半島上起來的，孔佛耶的出在半島不過是偶然的巧合。海岸線的吸收文明應當在海上交通便利之後，在古時則未必便可增進新知（至少在中國是這般）。即如孔子時，江淮河濟的交通勝於海洋，江淮河濟的吸收文明也應當過於海洋；孔子所以能夠特出，或者就靠在河濟的交通上，和半島及海岸線有何關係。但地理教員就咬定了這句話，大張其半島出教主論了。這種的教員滿眼皆是，他們都只會食人家的唾餘，毫沒有自己的眞知灼見，都只想編輯了一種講義作終身的衣食，毫不希望研究的進展，使得我一想到時就很鄙薄。

在小學時曾經生了兩個月的病，病中以石印本二十二子和漢魏叢書自遣，使我對於古書得到一個浮淺的印象。又在報紙上見到國粹學報的目錄，裏面有許多新奇可喜的文題；要去買時可惜蘇州的書肆裏沒有。直到進了中學堂，始託人到上海去買了一個全分。翻讀之下，頗驚駭劉申叔章太炎諸先生的博洽；但是他們的專門色彩太濃重了，有許多地方是看不懂的。在這個報裏，除了種族革命的意義以外，它給與我一個清楚的提示，就是：過去的中國學術界裏是有這許多紛歧的派別的。

十六歲那一年，我在中學二年級，我的祖父對我說，「五經是總該讀全的。你因進了新法學堂只讀得詩經，左傳和半部禮記。我現在自己來教你罷。」於是我每晚從學校裏歸來，便向祖父受課。他先教我

尚書，再教我周易。周易我不感到什麽趣味。尚書的文句雖古奧，但我已經有了理解力，能够勉强讀懂，對於春秋以前的社會狀況得到了一點粗疏的認識，非常高興。祖父教我時，是今古文一起讀的。我本不知道今古文是怎樣一個重大的訟案，也就隨着讀。後來感到古文很平順，它的文字自成一派，不免引起了些微的懷疑。偶然翻覽先正事略，從閻若璩的傳狀裏知道他已把古文尚書辨得很明白，是魏晉間人僞造的。一時就想讀他所做的尚書古文疏證，但覓不到。爲安慰自己的渴望計，卽從各家書說中輯出駁辨僞古文的議論若干條，尋繹他們的說法。哪知一經尋繹之後，不但魏晉間的古文成問題，就是漢代的古文也成了問題了。那年上海開江蘇學校成績展覽會，我和許多同學前往參觀，就獨到國學保存會的藏書樓上看了兩種書：一是龔自珍的泰誓答問，一是胡秉虔的尚書敍錄。

我既約略知道了這一些問題，我的勇往的興致又要逼迫我佚出前人的論辨之外了。我感到今文尚書中堯典皋陶謨諸篇的平易的程度並不比僞古文差了多少，我又感到漢人尚書注的不通，都想由我辨去。十七歲時，江蘇存古學校招生，我知道裏面很有幾位博學的敎員，也報名應考。出的題目是堯典上的現在已記不起了，只記得我的文字中把鄭玄的注痛駁了一回。發榜不取，領落卷出來，籤條上面批着「斥鄭說謬」四個大字。我得到了這回敎訓，方始知道學術界上的權威是惹不得的。

要是我能彀從此繼續用功，到現在也許可以做成一個專門的經學家了。但我的祖父逝世之後，經學方面既少了一個誘導的人，文學方面的吸引力又很大，我不自覺的對於經書漸漸地疏遠了下去。

我的祖父一生歡喜金石和小學，終日的工作只是鈎模古銘，椎拓古器，或替人家書寫篆隸的屏聯。我父和我叔則喜治文學和史學。所以我幼時看見的書籍接近的作品，都是多方面的，使我在學問上也有多方面的認識。可是我對於語言文字之學是不近情的，我的祖父的工作雖給我瞧見了許多，總沒有引起我的模倣的熱忱。我自己最感興味的是文學，其次是經學（直到後來纔知道我所愛好的經學也即是史學），我購買書籍就向那兩方面進行。買書這一件事，在我十一二歲時已成了習慣；但那時只買新書，自從進了中學，交到了幾個愛收舊書的朋友，就把這個興致轉向舊書方面去了。每天一下課，立刻向書肆裏跑。這時的蘇州還保留着一個文化中心的殘狀，觀前街一帶新舊書肆約有二十餘家，舊書的價錢很便宜。我雖是一個學生，只能向祖母和父親乞得幾個錢，但也有力量常日和他們往來。我去了，不是翻着他們架上的書，便是向掌櫃們討教版本的知識。所見的書籍既多，自然引誘我去研究目錄學。四庫總目，彙刻書目，書目答問一類書那時都翻得熟極了。到現在，雖已荒廢了十餘年，但隨便拿起一冊書來何時何地刻的還可以估得一個約略。

我對於學問上的野心的收不住，自幼就是這般。十二歲時曾作成一冊自述，題為恨不能第一篇是「恨不能戰死沙場，馬革裹屍，」第二篇是「恨不能遊盡天下名山大川，」其三便是「恨不能讀盡天下圖書。」到這時，天天遊逛書肆，就恨不能把什麼學問都裝進了我的肚子。我的癡心妄想，以為要盡通各種學問，只須把各種書籍都買了來，放在架上，隨心翻覽，久而久之自然會得明白通曉。我的父親戒我買書不必

像買雜一般的求益我的祖母笑我買書好像賭貓拖死雞一般的不揀擇，但我的心中堅強的執拗，總以為寧可不精，不可不博。只為翻書太多了，所以各種書很少從第一字看到末一字的。這樣的讀書，為老輩所最忌，他們以為這是短壽促命的徵象。我也很想改過來，但是求實效的意志終抵抗不過欣賞的趣味。我曾對友人說，「我是讀不好書的了！拿到一部書想讀下去時，不由得不牽引到第二部上去，以至於第三部，第四部。讀第二第三部書時，又要牽引到別的書上去了。試想這第一部書怎樣可以讀得完？」這種情形，在當時確是很惆悵的，但在現在看來也可以說由此得到了一點益處。因為這是讀書時尋題目，從題目上更去尋材料，而不是讀死書。不過那時既只隨着欣賞的趣味而活動，並沒有研究的自覺心，就是見到了可以研究的題目，也沒有實作研究的忍耐心，所以不曾留下什麼成績。

中學校時代，實在是我的情感最放縱的時代，書籍的嗜好在我的生活中雖占着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並不能制伏我的他方面的生活。我愛好山水，愛好文學，愛好政治活動。

游覽的嗜好似乎在我很幼的時候已經發端，記得那時看掃墓是一件趣味最豐富的樂事。我家的墳墓不在一處，有的地方要三天纔來回，我坐在船裏，只覺得望見的東西都新鮮得可愛。有時候走近一坐山，要拉了老媽子一同上去，哪知山基還遠着，久久走不到，船已將開了。自從進了中學，旅行的地方遠了一點，有時出府境，有時出省境，我高興極了，無論到什麼地方總要盡了我的腳力走。別人厭倦思歸了，我還是精神奮發，痛罵他們阻住了我的興致。每星期日，幾乎必約了同學到郊外遠足去，蘇州城外的山徑都給我們

踏遍了。我在那時，愛好自然，爲自然的美所吸引的一種情趣，在現在的回憶中更覺得可以珍重。

葉聖陶先生（紹鈞）是我的總角朋友，從私塾到小學和中學都是同學。他是一個富於文藝天才的人，詩詞篆刻無一不能；沒有一件藝術用過苦功，但沒有一種作品不饒於天趣。我在中學裏頗受到他的同化，想致力於文學，請他教我作詩填詞。我們的同志三四人又立了一個詩社，推他做盟主。我起先做不好，只以爲自己的工夫淺。後來永遠不得進步，無論我的情感像火一般的旺烈，像浪一般的激湧，但是表現出來的作品終是軟弱無力的。有時也偶然得到幾句佳句，但要全篇的力量足以相副就很困難。有許多形式，我已學像了，但自省到底沒有「煙士披里純」——文藝品的魂靈。懷了創作的迷夢約有十年，經過了多少次的失敗，方始認識了自己的才性，恍然知道我的思想是很質直的，描寫力是極薄弱的，輕蒨美妙的篇章和嶔奇豪壯的作品本來都沒有我的分兒，從此不再妄想「吃天鵝肉」了。

我在中學校時，正是立憲請願未得清廷允可，國民思想漸漸傾向到革命的時候，使得我也成了這個傾向下的羣衆的一個。看着徐錫麟，熊成基，溫生才等人的慷慨犧牲生命，真覺得可歌可泣。辛亥革命後，意氣更高張，以爲天下無難事，最美善的境界只要有人去提倡就立刻會得實現。種族的革命算得了什麼！要達到無政府，無家庭，無金錢的境界時方纔盡了我們革命的任務呢。因爲我醉心於這種最高的理想，所以那時有人發起社會黨，我就加入了。在這一年半之中，我是一個最熱心的黨員，往往爲了辦理公務到深夜不眠。很有許多親戚長者勸我，說「這班人都是流氓，你何苦與他們爲伍呢！這不是你的事啊！」這種

勢利的見解我是早已不承認了，我正以爲流氓和紳士不過是惡制度之下分出來的兩種階級，我正嫌惡紳士們做種種革新運動的阻礙，要把這個階級剗除了纔快意。但入黨多時之後，我瞧着一班同黨漸漸的不像樣了。他們沒有主義，開會演說時固然悲壯得很，但會散之後就把這些熱情丟入無何有之鄉了。他們說的話，永遠是幾句照例話，誰也不想把口頭的主義作事實的研究。他們閒空時只會圍聚了長桌子坐着談天，講笑話，對於事業的進行毫沒有計畫。再不然，便是賭錢，喝酒，逛窰子。我是一個極熱烈的人，同時也是一個極不懂世事的人，對於他們屢屢有所規誡，有所希望，但是他們幾乎沒有一個能承受的。我對於事業雖有極澈底的目標，但我自己知道我的學識是很淺薄的，遠夠不上把主義發揮；然而在同黨中間，他們已經把我看作博學的文豪，凡有發表的文字都要拉我動筆了。在這到處不如意的境界之中，使我得到了一個極清楚的覺悟，知道這班人是只能給人家用作嘍囉小卒的，要他們抱着主義當生命般看待，計畫了事業的步驟而進行是不可能的。我先前眞把他們看得太高了！我自己知道，我既不願做別人的嘍囉小卒，也不會用了別人做我的嘍囉小卒，那麽我永在黨中混日子也沒有什麽益處，所爲我就脫黨了。可喜這一年半中亂擲的光陰，竟換得了對於人世和自己才性的認識。從此以後，我再不敢輕易加入哪個黨會。這並不是我對於政治和社會的改造的希望歇絕了，我知道這種改造的職責是應當由政治家，教育家和社會運動家去擔負的，我是一個沒有這方面的發動的才力的人。我沒有這方面的才力也不覺得有什麽可恥，因爲我本有我自己能做的工作，一個人原不必件件事情都會幹的。

在熱心黨會的時候，早把書籍的嗜好拋棄了。這時又把黨會拋棄之後，精神上不免感到空虛。民國二年，我考進了北京大學的豫科。我在南方常聽得北京戲劇的美妙，酷好文藝的聖陶又常向我稱道戲劇的功用。我們偶然湊得了幾天旅費，到上海去看了幾次戲，回來後便要作上幾個月的咬嚼。這時我覺有這般福分得居戲劇淵海的北京，如何忍得住不大看而特看。於是我變成了一個「戲迷」了！別人看戲必有所主，我固然也有幾個極愛看的伶人，但戒不掉的好博的毛病，無論哪一種腔調，哪一個班子，都要去聽上幾次。全北京的伶人大約都給我見到了。每天上課，到第二堂退堂時，知道東安門外廣告版上各戲園的戲報已經貼出，便在休息的十分鐘內從譯學館（豫科所在）跑去一瞧，選定了下午應看的戲。學校中的功課下午本來較少，就是有課我也不去請假。在這戲迷的生活中二年有餘，我個人的荒唐和學校課業的成績的惡劣自不消說；萬想不到我竟會在這荒唐的生活中得到一注學問上的收穫（這注收穫直到了近數年方因辨論古史而明白承受。）上面說的，我曾在祖父母和婢僕的口中飽聽故事，但這原是十歲以前的事情。十歲以後我讀書多了，對於這種傳說便看作悠謬無稽之談，和它斷絕了關係。我雖曾恨過紳士，但自己的沾染紳士氣確是不能抵賴的事實。我鄙薄說書場的卑俗，不屑去。我鄙薄小說書的淫俚，不屑讀。在十五歲的時候，有一種賽會喚做現聖會，從鄉間出發到省城，這會要二十年一舉，非常的繁華，蘇州人傾城出觀，學校中也無形的停了課，但我以為這是無聊的迷信，不屑隨着同學們去湊熱鬧。到人家賀喜，

席間有妓女侍坐唱曲，我又厭惡她們聲調的淫蕩，唱到我一桌時，往往把她謝去。從現在回想從前，眞覺得那時的面目太板方了，板方得沒有人的氣味了。因爲如此，我對於社會的情形隔膜得很；就是故事方面也只記得書本上的典故而忘却了民間流行的傳說。自從到了北京，成了戲迷，於是只得抑住了讀書人的高傲去和民衆思想接近，戲劇中的許多基本故事也須隨時留意了。但一經留意之後，自然地生出許多問題來。現在隨便擧出數條於下（久不看戲，所記恐有錯誤，請讀者指正）：

(1)薛仁貴和薛平貴的姓名和事蹟都極相像。仁貴見於史，平貴不見，而其遇合更爲奇詭，直從叫化子做到皇帝。可見平貴的故事是從仁貴的故事中分化出來的，因爲仁貴的故事還不淋漓盡致，所以造出一個平貴來，替他彌補了。

(2)戲劇的本事取於小說，但很有許多是和小說不相應的。例如黃鶴樓是『三國』戲，但不見於三國演義，打漁殺家是『水滸』戲（蕭恩卽是阮小五），但不見於水滸傳；盜魂鈴是『西游』戲，但不見於西游記。可見戲劇除小說之外必另有取材的地方，或者戲劇與小說同是直接取材於民間的傳說而各不相謀。

(3)宇宙瘋又名一口劍，什麽緣故，大家不知道。有人說，趙高的女兒裝瘋時說要上天，要入地，宇宙卽天地之謂。但戲中凡是遇到裝瘋時總要說這兩句，未必此戲獨據了此句命題。後來看見梆子班中演的全本，方知戲名應是宇宙鋒，宇宙鋒就是一口劍的名字。戲中情節，是趙高之女嫁與鄺

洪之子；鄺洪嫉惡如讎，不爲趙高所容；趙高就與李斯同謀害他，派刺客到鄺家盜取了他們世傳的寶劍，投入秦皇宮中，鄺家既破，趙高之女遂大歸（尙有下半本未見。） 這齣戲不知道根據的是什麼小說，也許並沒有小說。 皮黃班中不演全本，只截取了裝瘋的一段，於是戲名的解釋就變成了猜謎了。

(4)小上墳中的劉祿敬夫婦在劇本裏原是很貞潔的，情節亦與雪杯圓相同，應當由老生與青衣串演。 不知何故，改用小丑與花旦演了，作盡了淫蕩的態度，但唱的依舊是貞潔的字句。 唱的字句給演的態度遮掩了，聽客對于戲中人的觀念也就變成了小丑與花旦的調情了。

(5)草橋關與上天台同是姚剛擊死國丈的事，又同是皮黃班中的戲。 但草橋關是光武命斬姚期父子，馬武鬪信強迫光武赦免的；上天台是姚期請罪時，光武自動的赦免，並沒有馬武救援之事。

(6)楊家將小說中只有八妹，並無八郎。 但戲劇中的雁門關則係八郎之事，八郎亦是遼國駙馬，尙二公主。 其他表述楊門功績的戲詞也都以「四八郎」並稱。 看來八郎是從四郎分化的。

(7)轅門斬子一劇，在皮黃班中，一掛斬殺劍，佘太君即出帳；一斬馬蹄，八賢王亦即出帳。 在梆子班中，則掛劍後佘太君跪在帳前，六郎出面陪禮，及將斬馬蹄，八賢王與之爭辨，六郎獻印求免官，始無精打彩而出。 在這種地方可見編戲者看描寫人物的個性比保存故事的原狀爲重要。 因爲各就想像中描寫，所以各班的戲本不必一律。

(8)司馬懿在逍遙津中是老生，因為他的一方面的人，曹操是淨，華歆是小丑；且他在三人中比較是好人。但到了空城計中，與老生諸葛亮對陣時，他便是淨了。曹操在別的戲中都是淨，但在謀刺董卓的獻劍中卻是生。可見戲中人的面目不但表示其個性，亦且表示其地位。

這種事情，簡單說來，只是「亂」和「妄」。在我的中學校時代，一定不屑齒及，不願一顧的。但在這時正是心愛着戲劇，不忍把它拒絕，翻要替它深思。深思的結果，忽然認識了故事的格局，知道故事是會得變遷的，從史書到小說已不知改動了多少（例如諸葛亮不斬馬謖而小說中有揮淚斬謖的事，楊繼業絕食而死而小說中有撞死李陵碑的事）從小說到戲劇又不知改動了多少，甲種戲與乙種戲同樣寫一件故事也不知道有多少點的不同。一件故事的本來面目如何，或者當時有沒有這件事實，我們已不能知道了；我們只能知道在後人想像中的這件故事是如此的紛歧的。推原編戲的人所以要把古人的事實遷就于他們的想像的緣故，只因作者要求情感上的滿足，使得這件故事可以和自己的情感所豫期的步驟和結果相符合。作者的豫期，常常在始則欲其危險，至終則欲其美滿；所以實在的事情雖並沒有這樣的危險而終使人有「不如意事什八九」的感歎，但這件事成為故事的時候就會從無可挽回的危險中得到天外飛來的幸運了。危險和幸運是由得人想像的，所以故事的節目會得各各不同。這是一樁；其餘無意的訛變，形式的限制，點綴的過分，來歷的異統，都是可以詳細研究的。我看了兩年多的戲，惟一的成績便是認識了這些故事的性質和格局，知道雖是無稽之談原也有它的無稽的法則。當時很想搜集材料，做一部戲劇本事錄，把各齣戲

的根據加以考證，並評騭其異同之點；可惜沒有成書。這不得不希望于將來了。

在北京大學的同學中，毛子水先生（準）是我最敬愛的。他是一個嚴正的學者，處處依了秩序而讀書；又服膺太炎先生的學說，受了他的指導而讀書。我每次到他齋舍裏去，他的書桌上總只放着一種書，這一種書或是毛詩和儀禮的注疏，或是數學和物理的課本。我是向來只知道翻書的，桌子上什麼書都亂放。「汗漫掇拾，茫無所歸，」這八個字是我的最確當的評語。那時看見了這種嚴正的態度，心中不住地說着慚愧。我很想學他；適在讀莊子，就用紅圈的戳子打着斷句，想勉力把這部書圈完。可是我再不能按着篇次讀下，高興圈那一篇或那一頁時便圈到那篇那頁。經過了多少天的努力，總算把莊子的白文圈完了。這是我做有始有終的工作的第一次，實在是子水在無形中給我的恩惠。白文圈完之後，又想把郭象注和陸德明音義繼續點讀。但這個工作太繁重了，僅僅點得逍遙遊的半篇已經不勝任了。

民國二年的冬天，太炎先生在化石橋共和黨本部開國學會講學，子水邀我同往報名聽講。我領受了他的好意，與他同冒了雪夜的寒風而去。講學次序，星期一至三講文科的小學，星期四講文科的文學，星期五講史科，星期六講玄科。我從蒙學到大學，一向是把教師瞧不上眼的，所以上了一二百個教師的課，總沒有一個能彀完全攝住我的心神。到這時聽了太炎先生的演講，覺得他的話既是淵博，又有系統，又有宗旨和批評，我從來沒有碰見過這樣的教師，我佩服極了。子水對我說，「他這種話只是給初學的人說的，是最

淺近的一個門徑呢，」這便使我更醉心了。我自願實心實意地做他的學徒，從他的言論中認識學問的偉大。

那時袁世凱存心做皇帝，很獎勵復古思想，孔教的聲勢浩大得很。有一夜，我們到會時看見壁上粘着一張通告，上面寫道：

余主講國學會，踵門來學之士亦云不少。本會本以開通智識，昌大國性爲宗，與宗教絕對不能相混。其已入孔教會而復願入本會者，須先脫離孔教會，庶免薰蕕雜糅之病。章炳麟白。

我初見這個通告，一時摸不着頭路，心想太炎先生既講國學，孔教原是國學中的一部分，他爲什麼竟要這樣的深惡痛絕？停了一刻，他演講了：先說宗教和學問的地位的衝突，又說現在提倡孔教的人是別有用心的；又舉了王闓運，廖平，康有爲等今文家所發的種種怪誕不經之說，他們如何解「耶穌」爲父親復生，如何解「墨者鉅子」即十字架，如何解「君子之道斯爲美」爲俄羅斯一變至美利堅；他們的思想如何起原于董仲舒，如何想通經致用，又如何妄造了孔子的奇蹟，硬捧他做教主。我聽了這些話眞氣極了，想不到今文家竟是這類的妄人！我以前在書本裏雖已曉得經學上有今古文之爭，但總以爲這是過去的事情，哪裏知道這個問題依然活躍于當世的學術界上！我眞不明白，爲什麼到了現在科學昌明的時代，還有這一班無聊的今文家敢出來興妖作怪？古文家主張六經皆史，把孔子當作哲學家和史學家看待，我深信這是極合理的。我願意隨從太炎先生之風，用了看史書的眼光去認識六經，用了看哲人和學者的眼光去認識孔子。

很不幸的，國學會開講還沒有滿一個月，太炎先生就給袁政府逮捕下獄。我失掉了這一個良師，自然十分痛惜；但從此以後，我在學問上已經認清了幾條大路，知道我要走哪一條路時是應當怎樣走去了。我以前對於讀書固極愛好，但這種興味只是被動的，我只懂得陶醉在裏邊，想不到書籍裏的東西可以由我的意志驅遣着，把我的意志做它們的主宰。現在忽然有了這樣一個覺悟，知道只要我認清了路頭，自有我自己的建設，書籍是可備參考而不必作準繩的，我頓覺得舊時陶醉的東西都變成了我的腕下的材料。於是我有了煩惱了：對於這許多材料如何去處置呢？處置之後作什麼用呢？處置這些材料的大目的是什麼呢？這些問題時時盲目地侵襲我的心，我一時作不出解答來，很感着煩悶。不知是哪一天，這些模糊的觀念忽然變成了幾個淸楚的題目：「(1)何者爲學？(2)何以當有學？(3)何以有今日之學？(4)今日之學當如何？」我有了這四個問題，每在暇閒中加以思索，並且搜輯他人的答案而施以批評。大約民國三年至六年，這四載中的閒工夫都耗費在這上面了。當我初下「學」的界說的時候，以爲它是指導人生的。「學了沒有用，那麼費了氣力去學爲的是什麼！」普通人都這樣想，我也這樣想。但經過了長期的考慮，始感到學的範圍原比人生的範圍大得多，如果我們要求眞知，我們便不能不離開了人生的約束而前進。所以在應用上雖是該作有用與無用的區別，但在學問上則只當問眞不眞，不當問用不用。學問固然可以應用，但應用只是學問的自然的結果，而不是着手做學問時的目的。從此以後，我敢於大膽作無用的研究，不爲一班人的勢利觀念所籠罩了。這一個覺悟，眞是我的生命中最可紀念的；我將來如能在學問上有所建樹，這一個覺悟決是

成功的根源。追尋最有力的啓發，就在太炎先生攻擊今文家的「通經致用」上。

我當時願意在經學上做一個古文家，只因聽了太炎先生的話，以爲古文家是合理的，今文家則全是些妄人。但我改不掉的博覽的習性總想尋找今文家的著述看它如何壞法。果然新學僞經考買到了。翻覽一過，知道它的論辨的基礎完全建立於歷史的證據上，要是古文的來歷確有可疑之點，那麼康長素先生把這些疑點列舉出來也是應有之事。因此，使我對於今文家平心了不少。後來又從不忍雜誌上讀到孔子改制考，第一篇論上古事茫昧無稽，說孔子時夏殷的文獻已苦於不足，何況三皇五帝的史事，此說卽極愜心饜理。下面彙集諸子託古改制的事實，很淸楚地把戰國時的學風敍述出來，更是一部絕好的學術史。雖則他所說的孔子作六經的話我永不能信服，但六經中參雜了許多儒家的託古改制的思想是不容否認的。我對於長素先生這般的銳敏的觀察力，不禁表示十分的敬意。我始知道古文家的詆毀今文家大都不過爲了黨見，這種事情原是經師做的而不是學者做的。我覺得在我沒有能力去判斷他們的是非之前，好最對於任何一方面也不要幫助。於是我把今古文的問題暫時擱起了。

又過了數年，我對於太炎先生的愛敬之心更低落了。他薄致用而重求是，這個主義我始終信守，但他自己卻不勝正統觀念的壓迫而屢屢動搖了這個基本信念。他在經學上是一個純粹的古文家，所以有許多在現在已經站不住的漢代古文家之說，也還要替他們彌縫。他在歷史上寧可相信世本的居篇作篇，卻鄙薄彝器錢物諸譜爲瑣屑短書；更一筆抹殺殷虛甲骨文字，說全是劉鶚假造的。他說漢唐的衣服車駕的

制度都無可考了，不知道這些東西在圖畫與明器中還保存得不少。在文學上，他雖是標明「修辭立誠」，但一定要把魏晉文作為文體的正宗。在小學上，他雖是看言語重於文字，但聲音卻要把唐韻為主。在這許多地方都可證明他的信古之情比較求是的信念強烈得多，所以他看家派重於真理，看書本重於實物。他只是一個從經師改裝的學者！

我的幼年，最沒有恆心。十餘歲時即想記日記，但每次寫不到五六天就丟了。筆記亦然，總沒有一冊筆記簿是寫完的。自從看戲成了癖好，作論劇記，居然有始有終地寫了好幾冊。後來讀書方面的興致漸漸超過了看戲的興致了，又在論劇記外立讀書記。讀書記的第一冊上有這樣一段小敘：

> 余讀書最惡附會；更惡胸無所見，作吠聲之犬。而古今書籍犯此非鮮，每怫然有所非議。苟自見於同儕，或將詬我為狂。……吾今有宏願在：他日讀書通博，必舉一切附會影響之談悉揭破之，使無遁形，庶幾為學術之豸。……

這是民國三年的下半年。這一年的國文教師是馬幼漁先生（裕藻），文字學教師是沈兼士先生，他們都是太炎先生的弟子，使我在聽了太炎先生的演講之後更得到一回切實的指導。因此，我自己規定了八種書，依了次序，按日圈點誦讀。這一年，是我有生以來正式用功的第一年。可是做得太勇了，常常弄到上午二時就寢，以至不易入眠，豫伏了後來失眠症的根基。我的讀書總歡喜把自己的主張批抹在書上，雖是極

佩服的人像太炎先生，也禁不住我的抨擊。（別人讀國故論衡時，每以為文學總略是最好的一篇，我却以為其中除了「經傳論業」一段考證以外幾乎完全是廢話，既不能自堅其說，卽攻擊別人的地方也反覆自陷。例如蕭統文選本為自成一家之選文，不必要求完備，其序中亦只說選文體例，不是立文學界說，而太炎先生斥其不以文筆區分而登無韻之文，又說他遺落漢晉樂府為失韻文之本。曾國藩的經史百家雜鈔要完備各方面的體制了，他從經史中尋出各類篇章的根原，可謂得文之本矣，但又斥他「經典成文布在方策，不虞潰散，鈔將何為！」）這等讀書時的感想，逢到書端上寫不下，便寫入筆記簿裏。寫的時候也只大膽順着意見，不管這意見是怎樣的淺薄。到現在翻開看時，不由得不一陣陣地流汗，因為裏邊幾乎滿幅是空話，有些竟是荒謬話；又很多是攻擊他人的話，全沒有自己學問上的建設。但一冊一冊地翻下去時，空虛的漸漸變成質實了，散亂的也漸漸理出系統來了，又漸漸傾向到專門的建設的方面了，這便使我把慚愧之情輕減了多少。因此使我知道，學問是必須一天一天地實做的，空虛和荒謬乃是避免不了的一個階級；惟其肯在空虛和荒謬之後作繼續不斷的努力，方有充實的希望。又使我知道，我現在所承認為滿意的，只要我肯努力下去，過了十年再看也還是一樣的羞慚流汗。所以我對於我的筆記簿始終看作千金的敝帚。

以前我弄目錄學時，很不滿意前人目錄書的分類，例如四庫全書總目為要整齊書籍的量，把篇帙無多的墨家和縱橫家一起併入了雜家。我的意思，很想先分時代，再分部類，因為書籍的部類是依着各時代的風尚走的。換句話說，我就是想用了學術史的分類來定書籍的分類。大概的分法，是周秦為一時代，兩漢

爲一時代，六朝又爲一時代……；再從周秦的時代中分爲經（如詩書）傳（如易傳）記（如禮記）緯（如乾鑿度）別經（如儀禮）別傳（如子夏易傳）別記（如孔子家語）別緯（如乾坤鑿度）等。又分別白文於注釋之外，使得白文與注釋可以各從其時，不相牽累，例如詩經就可不必因爲有了毛傳而稱爲毛詩。這些見解固然到現在已經遷變了許多（各時代的中心雖各有顯著的差異，至于各時代的兩端乃是互相銜接的，必不能劃分清楚）但中國的學問是向來只有一尊觀念而沒有分科觀念的，用歷史上的趨勢來分似乎比較定了一種劃一的門類而使古今觀點不同的書籍悉受同一的軌範的可以好一點。

民國四年，我病了，休學回家。用時代分目錄的計畫到這時很想把它實現，就先從材料最豐富的清代做起。書目答問的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是一個很好的底子，又補加了若干家，依學術的派別分作者，在作者的名下列著述，按著述的版本見存佚，並集錄作者的自序及他人的批評，名爲清代著述考（即本冊上編第一篇中所說的清籍考。）弄了幾個月，粗粗地成了二十冊。同時在著述考外列表五種：(1)年表，(2)師友表，(3)籍貫表，(4)出處表，(5)著述分類表，用來說明清代學者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但編成的只有籍貫表一種。從這種種的輯錄裏，使我對於清代的學術得有深入的領會。我愛好他們的治學方法的精密，愛好他們的搜尋證據的勤苦，愛好他們的實事求是而不想致用的精神。以前我曾經聽得幾個今文家的說話，以爲清代的經學是『支離，瑣屑，餖飣』的，是『束髮就傳，皓首難窮』的，到這時明白知道學問必須在繁亂中求得的簡單纔是眞實的綱領；若沒有許多繁亂的材料作基本，所定的簡單的綱領便終是靠不住的東西。

今文家要從簡單中尋見學問的眞相，徒然成其淺陋而已。

那幾年中讀書很感受沒有學術史的痛苦，因此在我的野心中又發了一個弘願：要編纂國學志，把著述考列爲志的一種。當時定的計畫，國學志共分七種：(1)仿太平御覽例，分類鈔錄材料爲學覽；(2)仿經世文編例，分類鈔錄成篇的文字爲學術文鈔；(3)仿宋元學案例，編錄學者傳狀，節鈔其主要的著述爲學人傳；(4)仿經義考例，詳列書籍的作者，存佚，序跋，評論，爲著述考；(5)仿羣書治要例，將各書中關於學術的話按書鈔出，爲羣書學錄；(6)仿北溪字義例，將學術名詞詳釋其原義及變遷之義，爲學術名詞解詁；(7)集合各史的紀傳年表，以及各種學者年譜，爲學術年表。這個計畫，在現在看來，依舊是很該有的工作，但已知道這是學術團體中的工作，應當有許多人分工做的，不是我一個人可以擔當的責任了。可是那時銳氣高張，哪裏有這等耐性去等待不知何年的他人去做：既已見到，便即動手。學覽的長編，每天立一題目，釘成一冊，有得即鈔。學術文鈔也雇人鈔寫了百餘篇。著述考則清代方面較有成稿；目錄書目和僞書疑書目也集得了許多材料。其餘諸種，至今還沒有着手。

那時的筆記中寫有幾段學覽的序意，鈔錄於此，以見我當日治學的態度：

此書擬名學覽。凡名覽者，如呂覽，皇覽，御覽，皆從集衆書以爲一書，非自成者也。其義則在博學明辨，故不以家派限。章先生曰，「史之於美惡，若鏡之照形，不因美而顯，因惡而隱。」吾輯此書，比於學術之史，故是非兼收，爭論並列。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故有

害求是，正可爲求是之資，況是與非有難以遽斷者乎！ 古來諸學，大都崇經而黜子，崇儒學而黜百家，以至今古文有爭，漢宋學有爭，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欲爲調人，終于朋黨。 蓋不明統系而爭，則爭之者無有底，解之者無可藉。 使其明之，則經者古史耳，儒者九流之一家耳，今古文者立學官異耳，漢宋學者立觀點異耳，各有其心思，各有其面目，不必己學而外無他學也，不必尊則如天帝而黜則如罪囚也。 韓愈之原道，蘇軾之荀卿論，一人倡之，千萬人和之，雖絕無根據，反若極有力之學說，不可磨滅之鐵案。 聖哲復生，亦不敢昌言駁斥。 蓋事理之害，莫甚於習非勝是矣。 章先生曰：「古之學者觀世文質而已矣；今之學者必有規榘繩墨，模形惟肖，審諦如帝，用彌天地而不求是，則絕之。」 予謂雖絕之於心，必存之於書；絕之爲是非也，存之爲所以是非也。 故雖韓蘇之謬說，亦在寫錄。

有友人過我，見案頭文廟典禮之書，叱嗟曰：「烏用此！ 是與人生無關係者，而前代學者斤斤然奉之以爲大寶，不可解甚也！」 予謂不然。 前代學者之誤在執舊說爲演繹之資，以新爲不可知，以舊爲不可易，稱述聖賢而徒得其影響，依附前人而不能有所抉擇，所以起人厭惡。 苟其不有主奴之見，長立於第三者之地位，則雖在矢溺，亦資妙觀；況典禮之制爲宗法所存，可考見社會心象者乎！ 予前稱爲學，始觀終化，觀者任物自形，而我知之，爲內籀之法；化者我有所主，而以擇物，爲外籀之法。 本此以治學，雖委巷小說極鄙猥者亦不能絕去之矣。

舊時士夫之學，動稱經史詞章。 此其所謂統系乃經籍之統系，非科學之統系也。 惟其不明於

科學之統系，故鄙視比較會合之事，以爲淺人之見，各守其家學之壁壘而不肯察事物之會通。夫學術者與天下共之，不可以一國一家自私。凡以國與家標識其學者，止可謂之學史，不可謂之學。執學史而以爲學，則其心志囚拘於古書，古書不變，學亦不進矣。爲家學者未嘗不曰家學所以求一貫，爲學而不一貫，是滋其紛亂也。然一貫者當於事實求之，不當於一家之言求之。今以家學相高，有化而無觀，徒令後生擇學莫知所從，以爲師之所言卽理之所在，至於學違理而不敢背師。是故，學術之不明，經籍之不理，皆家學爲之也。今既有科學之成法矣，則此後之學術應直接取材於事物，豈猶有家學爲之障乎　敢告爲家學者：學所以辨於然否也，既知其非理而仍堅守其家說，則狂妄之流耳，若家說爲當理，則雖捨其家派而仍必爲不可奪之公言，又何必自縛而不肯觀其通也。

是書之輯，意在止無謂之爭，捨主奴之見，屏家學之習，使前人之所謂學皆成爲學史，自今以後不復以學史之問題爲及身之問題，而一歸於科學。此則余之志也。

這幾段文字的意思，我至今還覺得大體不錯。因爲我有了這一種見解，所以我常常自以爲我的觀物是很平恕的。

我在那時，雖是要做這種大而無當的整理國學的工作，但我的中心思想卻不在此，我只想研究哲學。我所以有這種要求，發端乃在辛亥革命。那時的社會變動得太劇烈了，使我摸不着一個人生的頭路。革

命的潮流既退，又長日處於袁世凱的暴虐和遺老們的復古的空氣之中，數年前蘊積的快感和熱望到此只膽了悲哀的回憶，我的精神時時刺促不寧，得不到安慰，只想在哲學中求解決。但我是一個熱烈的人，不會向消極方面走而至於信佛求寂滅的，我總想以心理學和社會學為基礎而解決人生問題。加以年歲漸長，見事稍多，感到世界上事物的繁雜離奇，酷想明瞭它們的關係，得到一個簡單的綱領，把所見的東西理出一個頭緒來：這只有研究哲學是可以辦到的。因此，我進大學本科時就選定了哲學系。

我的野心眞太高了，要整理國學就想用我一個人的力量去整理淸楚，要認識宇宙和人生就想憑了一時的勇氣去尋得最高的原理。現在想來，我眞成了『誇大狂』了。但在那時何曾有這種覺悟，只覺得我必須把宇宙和人生一起弄明白，把前人未解決的問題由我的手中一起解決，方纔可以解除我的饑渴。我挾了吸香河嶽的豪氣而向前奔馳，血管也幾乎迸裂了。曾於筆記中記道，『明知夸父道渴而死，然猶有一杖鄧林之力，非蜩螗鸒鳩所知已。』又云，『學海雖無涯，苟大其體如龍伯，亦一釣貫六鰲耳。』這樣鹵莽地奔馳了許久，我認識了宇宙的神祕了，知道最高的原理原是藏在上帝的櫃子裏，永不會公布給人類瞧的。人之所以為人本只要發展他的內心的情感，理智不過是要求達到情感的需求時的一種幫助，並沒有獨立的地位。不幸人類沒有求知的力量而有求知的欲望，要勉強做不能做的事情，於是離了情感而言理智。但是這僅是一種安想而已，僅是聊以自慰而已，實際上何曾眞能探得宇宙的神祕。用盡了人類的理智，固然足以知道許多事物的眞相，可是知道的只有很淺近的一點，決不是全宇宙。神學家和哲學家傲然對科

學家說，「你們的眼光是囿於象內的，哪能及得到我們「與造物者遊」的洞見理極呢！」話雖說得痛快，但試問他們的識解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不是全由於他們的幻想嗎？幻想的與造物者遊，還不及科學家的憑了實證，以窮年累月之力知道些微的真事物。所以我們不做學問則已，如其要做學問，便應當從最小的地方做起。研究的工作彷彿是堆土，只要高度愈加增先要使得底層的容積愈擴大。固然堆得無論怎樣高總不會有摘星摘斗的一天，但是我們要天天去加高一點卻是做得到的。想到這裏，我的野心又平息了許多。我知道最高的原理是不必白費氣力去探求的了，只有一粒一粒地播種，一簣一簣地畚土，把自已看作一個農夫或土工而勤績將事，纔是我的本分的事業。

我有了這一個覺悟，知道過去的哲學的基礎是建設於玄想上的，其中雖有許多精美的言論，但實際上只是解頤之語而已，終不成以此為論定。科學的哲學，現在正在發端，也無從豫測它的結果。我們要有真實的哲學，只有先從科學做起，大家擇取了一小部分的學問而努力；等到各科平均發展之後，自然會有人出來從事於會通的工作而建設新的哲學的。所以我們在現在時候，再不當宣傳玄想的哲學，以致阻礙了純正科學的發展。

那時大學中宋代理學的空氣極重。我對於它向來不感興味，這時略略得了一些心理倫理的常識之後再去看它，更覺得觸處都是謬誤。例如他們既說性善情惡，又說性未發情已發，那麼照着他們的話講，善只在未發，等到發出來時就成了惡了，天下哪裏有見諸行事的善呢！又如他們既說喜怒哀樂之情要在已

發後求其中，但是又說動而未形曰幾，幾是適善適惡的分點，已形則有善惡，有善惡就有過不及，不是中，那麽，照着他們的話講，所謂中者又只能在未發中去求了，天下又哪裏有得其中的喜怒哀樂之情呢！稱他們的心，求至於聖人的一境，必有性而無情，有未發而無已發，養其幾而不見其形。如此，非不作一事，如白雲觀橋洞中趺坐的老道士，未見其可。但若覺如槁木死灰，他們便又可以用了「虛冥流入仙釋」的話相詆了。他們要把必不可能之事歸之於聖人，見得聖人的可望而不可卽；更用迷離惝恍的字句來搖亂學者的眼光，使得他們捉摸不着可走的道路，只以爲高妙的境界必不是庸愚之質所可企及；這眞是騙人的伎倆了！我對於這種昏亂的思想，可以不神祕而竟神祕的滑頭話，因課業的必修而憎恨到了極點，一心想打破它。

卽在這個時候，蔡子民先生任了北京大學校長，努力破除學校中的陳腐空氣。陳獨秀先生辦的新青年雜誌以思想革命爲主旨，也漸漸地得到國民的注意。又有黃遠庸先生在東方雜誌上發表國人之公毒一文，指斥中國思想界學術界的病根非常痛切。我的一向隱藏着的傲慢的見解屢屢得到了不期而遇的同調，使我膽壯了不少。以前我雖敢作批評，但不勝傳統思想的壓迫，心想前人的話或者沒有我所見的簡單，或者我的觀察也確有誤謬。卽如以前考存古學校時，給試官批了「斥鄭說謬」四字，我雖在讀書時依舊只見到鄭玄的謬處，但總想以淸代學者治學的精密，而對於他還是如此恭敬，或者他自有可以佩服之點，不過這一點尚不曾給我發見罷了。到這時，大家提倡思想革新，我始有打破舊思想的明瞭的意識，知道淸代學者正因束縛於信古尊聞的舊思想之下，所以他們的學問雖比鄭玄好了千百倍，但終究不敢打破他的

偶像，以致為他的偶像所牽絆而妨礙了自己的求真的工作。於是我更敢作大膽的批評了。

哲學系中講中國哲學史一課的，第一年是陳伯弢先生（漢章）。他是一個極博洽的學者，供給我們無數材料，使得我們的眼光日益開拓，知道研究一種學問應該參考的書是多至不可計的。他從伏羲講起，講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洪範」。我雖是早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暗示，知道這些材料大都是靠不住的，但到底愛敬他的淵博，不忍有所非議。第二年，改請胡適之先生來教。「他是一個美國新回來的留學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學裏來講中國的東西？」許多同學都這樣懷疑，我也未能免俗。他來了，他不管以前的課業，重編講義，闢頭一章是「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用詩經作時代的說明，丟開唐虞夏商，徑從周宣王以後講起。這一改把我們一班人充滿着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許多同學都不以為然；只因班中沒有激烈分子，還沒有鬧風潮。我聽了幾堂，聽出一個道理來了，對同學說，「他雖沒有伯弢先生讀書多，但在裁斷上是足以自立的。」那時傅孟真先生（斯年）正和我同住在一間屋內，他是最敢放言高論的，從他的言論中常常增加我批評的勇氣，我對他說，「胡先生講得的確不差，他有眼光，有膽量，有斷制，確是一個有能力的歷史家。他的議論處處合於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說而不知道怎樣說纔好的。你雖不是哲學系，何妨去聽一聽呢？」他去旁聽了，也是滿意。從此以後，我們對於適之先生非常信服；我的上古史靠不住的觀念在讀了改制考之後又經過這樣地一溫。但如何可以推翻靠不住的上古史，這個問題在當時絕沒有想到。

很不幸的，就是這一年（民國六年）先妻吳夫人得了肺病；我的心緒不好，也成了極度的神經衰弱，徹夜不眠。明年，我休學回家；不久她就死了。以前我對於學問何等的猛進，但到了這時候，既困於疾病，復傷於悲哀，讀書和尋思的工作一時完全停止，坐候着一天一天的晝夜的推移，就是不願意頹廢也只得頹廢了。恰巧那時北京大學中搜集歌謠，由劉半農先生（復）主持其事，每天在北大日刊上發表一二首。日刊天天寄來，我看看很感受趣味，心想這種東西是我幼時很多聽得的，但哪裏想得到可以形諸筆墨呢。因想，我現在既不能讀書，何妨弄弄這些玩意兒，聊以遣日。想得高興，就從家中的小孩的口中搜集起，漸漸推到別人。很奇怪的，搜集的結果使我知道歌謠也和小說戲劇中的故事一樣，會得隨時隨地變化。同是一首歌，兩個人唱着便有不同。就是一個人唱的歌，也許有把一首分成大同小異的兩首的。有的歌，因爲形式的改變以至連意義也隨着改變了。試舉一例：

（一）

忽然想起縐眉頭，自歎青春枉少年。

「想前世拆散雙飛鳥，斷頭香點在佛門前。

今世夫妻成何比，細絲白髮垂綿綿。

怨爹娘得了花銀子；可恨大娘兒似虎。

日間弗有真心話，夜間寂寞到五更天。
推開紗窗只看得淒涼月；擰轉頭來只看得一盞孤燈陪我眠。
今日大娘到了娘家去，結髮偷情此刻間。」
急忙移步進房門，只見老相公蓋了紅綾被，花花被褥香微微。
還叫三聲「老相公！你心中記着奴情意？」
抬起頭來點三點，「吾終記着你情意。」
拔金釵，掠鬢邊，三寸弓鞋脫床邊。
「吾是紫藤花盤纏你枯樹上，秋海棠斜插任你老人頭。
花開花落年年有；陳老之人嘸不吾再少年！」

（二）

佳人姐妮鎖眉尖，自歎青春枉少年。
「想起前生修不得；斷頭香點在佛門前，
故此姻緣來作配，派奴奴正身作偏配。
上不怨天來下不怨地，只怨爹娘貪了錢。
可恨大娘多利害，不許寃家一刻見。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夢裏偷情此刻間。」

抬轉身，到牀檐：只聽丈夫昏昏能背脊呼呼向裏眠。

三寸金蓮登拉踏板上頭。

抬轉身，到窗前：手托香腮眼看天。

抬頭只見清涼月，夜來只怕靜房間。

好比那木犀花種在冷坑邊；好比那紫藤花盤纏在枯樹中；

獅子拋球無着落，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這二首都是小老婆怨命的歌，都是從一個地方採集來的；又都以縐眉起，而自歎青春，而推想前生，而埋怨爹娘，而咒詛大娘，而伺得偷情的機會，末尾也都以紫藤花盤纏枯樹作比喻：可見是從一首歌詞分化的。但中間主要的一段便不同了：上首是老相公承受了她的情意而她登牀；下首是丈夫酣睡未醒而她孤身獨立，看月自悲。究竟這首歌的原詞是得戀呢，還是失戀呢，我們哪裏能知道。我們只能從許多類似的字句裏知道這兩歌是一歌的分化，我們只能從兩歌的不同的境界裏知道這是分化的改變意義。

我為要搜集歌謠，並明瞭它的意義，自然地把範圍擴張得很大：方言；諺語，謎語，唱本，風俗，宗教各種材料都着手搜集起來。我對於民衆的東西，除了戲劇之外，向來沒有注意過，總以為是極簡單的；到了這時，覺愈弄愈覺得裡面有複雜的情狀，非經過長期的研究不易知道得清楚了。這種的搜集和研究，差不多全是開

創的事業，無論哪條路都是新路，使我在寂寞獨征之中更激起拓地萬里的雄心。

那數年中，適之先生發表的論文很多，在這些論文中他時常給我以研究歷史的方法，我都能深摯地瞭解而承受；並使我發生一種自覺心，知道最合我的性情的學問乃是史學。 九年秋間，亞東圖書館新式標點本水滸出版，上面有適之先生的長序，我眞想不到一部小說中的著作和版本的問題會得這樣的複雜，它所本的故事的來歷和演變又有這許多的層次的。 若不經他的考證，這件故事的變遷狀況只在若有若無之間，我們便將因它的糢糊而猜想其簡單，哪能知道得如此清楚。 自從有了這個暗示，我更回想起以前做戲迷時所受的敎訓，覺得用了這樣的方法可以討究的故事眞不知道有多少。 例如「蝴蝶夢」它的來歷是莊子上的「莊子妻死，鼓盆而歌；」這原是他的曠達，何以後來竟變成了莊子詐死，化了楚王孫去引誘他的妻子的心，以至田氏演出劈棺的惡劇來呢？ 又如「桑園會，」列女傳上原說秋胡久宦初歸，路上不認識他的妻，獻金求合，其妻羞其行，投水而死，何以到了戲劇中就變成了秋胡明知採桑婦是自己的妻，卻有意要試她的心而加以調戲，後來他屈膝求恕，她就一笑而團圓呢？ 這些故事的轉變，都有它的層次，絕不是一朝一夕之故。 若能像適之先生考水滸故事一般，把這些層次尋究了出來，更加以有條不紊的貫穿，看它們是怎樣地變化的，豈不是一件最有趣味的工作。 同時又想起本年春間適之先生在建設上發表的辨論井田的文字，方法正和水滸的考證一樣，可見研究古史也儘可以應用研究故事的方法。 因此，又使我想起以前看戲時所受的敎訓 薛平貴的歷盡了窮困和陷害的艱難，從乞丐而將官，而外國駙馬，以至做到皇帝，不是和

舜的歷盡了頑父嚚母傲弟的艱難，從匹夫而登庸，而尙帝女，以至受了禪讓而做皇帝一樣嗎？匡人圍孔子，子路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這不是諸葛亮「空城計」的先型嗎？這些事情，我們用了史實的眼光去看，實是無一處不謬；但若用了故事的眼光看時，便無一處不合了。又如戲中人的好壞是最容易知道的，因爲只要看他們的臉子和鼻子就行；然實際上要把自己的親戚朋友分出好壞來便極困難，因爲一個人決不會全好或全壞；只有從古書中分別好人壞人卻和看戲一樣的容易，因爲它是處處從好壞上着眼描寫的。它把世界上的人物統分成幾種格式，因此只看見人的格式而看不見人的個性。古書雖沒有開生淨丑的臉相，但自有生淨丑的類別。戲園中楹聯上寫的「堯舜生，湯武淨，五霸七雄丑末耳，」確是得到了古人言談中的方式。我們只要用了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便可以明白堯舜們和桀紂們所以成了兩極端的品性，做出兩極端的行爲的緣故，也就可以領略他們所受的頌譽和詆毀的積累的層次。只因我觸了這一個機，所以驟然得到一種新的眼光，對於古史有了特殊的瞭解。但是那時正在畢業之後，初到母校圖書館服務，很想整理書目，對於此事只是一個空浮的想像而已。

就在這時候，適之先生以積勞得病，病中翻覽舊籍屢次寫信給我，討論書中的問題。十一月中，他來信詢問姚際恆的著述。姚際恆這人我在十年前讀古今僞書考時就知道，那時並因他辨孝經爲僞書說得極

痛快而立了一冊讀孝經日鈔去搜尋它的僞證。後來草清代著述攷時，找不到他的傳狀，他的著述除了一冊很簡單的僞書攷之外也見不到別的所以不曾列入。這時適之先生詢問及他，我就在圖書館中翻檢了幾部書，前後寫了兩封回信。他看了很高興，囑我標點僞書攷。這一來是順從我的興趣，二來也是知道我的生計不寬裕，希望我標點書籍出版，得到一點酬報。僞書疑書目本是我已經着手的工作，這件事我當然願意。標點的事是很容易的，薄薄的一本書費了一二天工夫已可完工。但我覺得這樣做去未免太草率了，總該替它加上注解纔是。這書篇帙既少，加上注解也算不得困難，大約有了二十天工夫也可蕆事了。不料一經着手，便發生了許多問題，有的是查不到，有的雖是查到了，然而根上還有根，不容易追出一個究竟來。到了這時候，一本薄極的書就牽引到無數書上，不但我自己的書不夠用，連北京大學圖書館的書也不夠用了，我就天天上京師圖書館去。做了一二個月，注解依然沒有做成，但古今來造僞和辨僞的人物事蹟倒弄得很清楚了，知道在現代以前，學術界上已經斷斷續續地起了多少次攻擊僞書的運動，只因從前人的信古的觀念太强，不是置之不理，便是用了强力去壓服它，因此若無其事而已。現在我們既知道辨僞的必要，正可接收了他們的遺產，就他們的脚步所終止的地方再走下去。因爲這樣，我便想把前人的辨僞的成績算一個總賬。我不願意單單注釋僞書攷了，我發起編輯辨僞叢刊。

從僞書引渡到僞史，原很順利。有許多僞史是用僞書作基礎的，如帝王世紀，通鑑外紀，路史，繹史所錄，有許多僞書是用僞史作基礎的，如僞古文尙書，古三墳書，今本竹書紀年等。中國的歷史，普通都知道有五

千年（依了緯書所說已有二百二十七萬六千年了，）但把僞史和依據了僞書而成立的僞史除去，實在只有二千餘年只算得打了一個「對折！」想到這裏，不由得不激起了我的推翻僞史的壯志。起先僅想推翻僞書中的僞史，到這時連真書中的僞史也要推翻了。自從讀了孔子改制考的第一篇之後，經過了五六年的醞釀，到這時始有推翻古史的明瞭的意識和清楚的計畫。計畫如何？是分了三項事情着手做去。第一，要一件一件地去考僞史中的事實是從哪裏起來的，又是怎樣地變遷的。第二，要一件一件地去考僞史中的事實，這人怎樣說，那人又怎樣說，把他們的話條列出來，比較看着，同審官司一樣，使得他們的謊話無可逃遁。第三，造僞的人雖彼此說得不同，但終有他們共同遵守的方式，正如戲中的故事雖各各不同，但戲的規律卻是一致的，我們也可以尋出他們的造僞的義例來。我爲要做這三項工作，所以立了三冊筆記簿，標題僞史源，僞史對鞫，僞史例，總題爲僞史攷，下手搜集材料。

我的推翻古史的動機固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無稽的啓發，到這時而更傾心于長素先生的卓識，但我對於今文家的態度總不能佩服。我覺得他們拿辨僞做手段，把改制做目的，是爲運用政策而非研究學問。他們的政策是：第一步先推翻了上古，然後第二步說孔子託古作六經以改制，更進而爲第三步把自己的改制引援孔子爲先例。因爲他們的目的只在運用政策作自己的方便，所以雖是極鄙陋的讖緯也要假借了做自己的武器而不肯丟去。因爲他們把政策與學問混而爲一，所以在學問上也就肯輕易地屈抑自己的理性於怪妄之說的下面。例如夏穗卿先生（曾佑）在中國歷史教科書的正文中

說，「孔子母徵在，游于大澤之陂，夢黑帝使請己，己往，夢交，語曰，「汝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空桑之中，故曰玄聖，」注中說明道「案此文學者毋以為怪，因古人謂受天命之神聖人必為上帝之所生，孔子雖不有天下，然實受天命，比于文王，故亦以王者之瑞歸之；雖其事之信否不煩言而喻，然古義實如此，改之則六經之說不可通矣；凡解經者必兼緯，非緯則無以明經，此漢學所以勝于宋學也。」他明知道「其事之信否不煩言而喻，」但為要順從漢人之說解釋六經，便不得不依了緯書中的怪誕之說，這眞是自欺欺人了！

這班自欺欺人的人，說來也可憐。他們並不是不要明白古代的事實，只為漢學是如此說的，所以寧取其不信者。他們並不是沒有常識，只為漢學是如此說的，所以雖是應怪而終於不敢怪。究竟漢學為什麼有這樣大的權力，可以改變古代的事實而屈抑今人的理性？這個答案當然沒有第二句話：是為有了幾個沒出息的人甘心屈抑了自己的理性而做漢人的奴隸，更想從做奴隸中得到些利益的緣故。我們慚愧沒有這種受欺的度量，但我們也很欣快沒有這種奴隸的根性；我們正有我們自己的工作，在我們的手段與目的是一致的！

那時我排列過幾個表。一個是依了從前人的方法編排史目，看書上說的什麼時代就放在什麼時代，例如置三五歷年記，春秋命歷序于太古，置堯典，舜典，皋陶謨于唐虞，置逸周書，穆天子傳于西周。一個是依了我們現在的眼光編排史目，看它們在什麼時代起來的就放在什麼時代，例如置虞夏書于東周，置易傳，竹書紀年，胠篋篇于戰國秦漢間，置命歷序，五帝德于漢，置帝王世紀，偽古文尚書于晉，置路史，三墳于南宋。這

兩個表實在是平平無奇，但比較看時便立刻顯出衝突的劇烈和漸次增高的可驚了。這使我明白，以前人看古史是平面的，無論在哪個時候發生的故事，他們總一例的看待，所以會得愈積愈多；現在我們看古史是垂線的，起初一條線，後來分成幾條，更後又分成若干條，高低錯落，累累如貫珠垂旒，只要細心看去就分得出清楚的層次。因為我見到了這一層，所以我對于古史的來源有了較清楚的認識。

那時又起了一個問題：上古史既茫昧無徵，這些相傳的四千或五千的年數是從什麼地方出來的呢？光復時，不是大街小巷中都張貼着『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的告示嗎，這個歷歷可數的年歲是依據的什麼書？我很想考出它的來歷，可惜這方面的工作至今沒有做完，不能把結果發表。就鈔出來的看，例如夏代的年數，最長的是路史，凡四百九十年；最短的是今本竹書紀年，只有三百六十五年多（內有未詳的數年；）最普通的是古今紀要，為四百三十九年。其餘四百七十一年，四百四十一年，四百三十二年的都有。各個編纂古史的人的閉着眼睛的杜造，到此完全證實。

崔述的東壁遺書整理古代史實，刊落百家謬妄，這是我以前讀先正事略時知道的，但這部書卻沒有見過。十年一月中，適之先生買到了，送給我看。我讀了大痛快。尤其使我驚詫的，是他在提要中引的『打碎沙鍋紋到底』一句諺語。『你又要「打碎烏盆問到底」了！』這是我的祖母常常用來禁止我發言的一句話；想不到這種『過細而問多』的毛病，我竟與崔先生同樣地犯着。我弄了幾時辨偽的工作，很有許多是自以為創獲的，但他的書裏已經辨證得明明白白了，我真想不到有這樣一部規模弘大而議論精銳的

辨僞的大著作已先我而存在！ 我高興極了，立志把它標點印行。 可是我們對於崔述，見了他的偉大，同時也見到他的缺陷。 他信仰經書和孔孟的氣味都嫌太重，糅雜了許多先入爲主的成見。 這也難怪他，他生長在理學的家庭裏，他的著書的目的在于驅除妨礙聖道的東西，辨僞也只是他的手段。 但我們現在要比他進一步，推翻他的目的，作澈底的整理，是不很難的；所難的只在許多制度名物及細碎的事蹟的研究上。在這上面，他已經給與我們許多精詳的考證了，我們對於他應該是怎樣地感謝呢！

即在十年初春，我的祖母驟然病了偏中，飲食扶掖一切需人。 我是她的最愛的孫兒，使我不忍遠離，但北京的學問環境也使我割捨不得；這一年中南北道途往返了六七回，每回都攜帶了許多書，生活不安定極了。 但除了繼續點讀辨僞的書籍之外，也做了兩件專門的工作：其一，是討論紅樓夢的本子問題和搜集曹雪芹的家庭事實；其二，是輯錄詩辨妄連帶研究詩經和搜集鄭樵的事實。 紅樓夢問題是適之先生引起的。十年三月中，北京國立學校爲了索薪罷課，他即在此時草成紅樓夢考證，我最先得讀。 紅樓夢這部書雖是近代的作品，只因讀者不明悉曹家的事實，兼以書中描寫得太侈麗了，常有過分的揣測，彷彿這書眞是敍述帝王家的祕聞似的。 但也因各說各的，考索出來的本事終至互相牴牾。 適之先生第一個從曹家的事實上斷定這書是作者的自述，使人把祕奇的觀念變成了平凡；又從版本上考定這書是未完之作而經後人補綴的，使人把向來看作一貫的東西忽地打成了兩橛。 我讀完之後，又深切地領受研究歷史的方法。 他感

到搜集的史實的不足，囑我補充一點。那時正在無期的罷課之中，我便天天上京師圖書館，從各種志書及清初人詩文集裏尋覓曹家的故實。果然，從我的設計之下檢得了許多材料。把這許多材料聯貫起來，曹家的情形更清楚了。我的同學俞平伯先生正在京閒着，他也感染了這個風氣，精心研讀紅樓夢。我歸家後，他們不斷的來信討論，我也相與應和，或者彼此駁辨。這件事弄了半年多，成就了適之先生的紅樓夢考證改定稿和平伯的紅樓夢辨。我從他們和我往來的信札裏，深感到研究學問的樂趣。我從曹家的故實和紅樓夢的本子裏，又深感到史實與傳說的變遷情狀的複雜。詩辨妄本是豫備放在辨偽叢刊裏的，最早從周孚非詩辨妄裏見到他所引的碎語，就驚訝鄭樵立論的勇敢；後來又從圖書集成內搜到一卷，但兩種書中的話衝突的很多，集成中的幾篇有許多議論竟成了「詩護妄」，使我很疑惑。後來纔知道集成中標為詩辨妄的原即六經奧論裏的詩經一部分，奧論這書就是靠不住的。再用各書中記述的鄭樵事實與宋史鄭樵傳合看，宋史中的話便幾乎沒有一句可信。這種向不會發生問題的事情經過一番審查之後，竟隨處發生了問題（紅樓夢的本子和隨園詩話所記曹雪芹事也是如此，）這不得不使我駭詫了。想我幼年時，看着書中的話，雖也常常引起懷疑，但總以為這是經過前代學者論定的，當不致有大錯，常說考證之業到清儒而極，他們已經考證清楚了，我們正可坐享其成，從此前進探求事理之極則，不必再走他們的老路了。後來懷疑了古書古史，也只以為惟有古書古史是充滿靠不住的成分的。哪知這年做了幾個小題目的研究，竟發見近代的史籍，近人的傳記也莫不是和古書古史一樣的糊塗；再看清代人的考證時，纔知道他們

只是做了一個考證的開頭！從此以後，我對於無論哪種高文典冊，一例地看它們的基礎建築在沙灘上，裏面的漏洞和朽柱不知道有多少，只要我們何時去研究它就可以在何時發生問題，把它攻倒。學海無涯，到這時更望洋興歎了！

因為輯集詩辨妄，所以翻讀宋以後人的經解很多，對於漢儒的壞處也見到了不少。接着又點讀漢儒的詩說和詩經的本文。到了這個時候再讀漢儒的詩說，自然觸處感到他們的誤謬，我更敢作大膽的批抹了。到了這個時候再讀詩經的本文，我也敢用了數年來在歌謠中得到的見解作比較的研究了。我真大膽，我要把漢學和宋學一起推翻，赤裸裸地看出它的真相來。這半年中所得的新見解甚多，今試舉分化的兩例，作為上面徵引的小老婆怨命之歌的印證。邶風中的谷風，是向來說為『夫婦失道』的；小雅中的谷風，是向來說為『朋友道絕』的。其實，這兩首在起興上都是說『習習谷風』，在寫情上都是說在窮苦的時候如何相依（小雅『將恐將懼，惟予與女』，邶風『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安樂的時候如何見棄（小雅『將安將樂，女轉棄予』，邶風『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末了又都以人我的命運終于類同作慨歎的自慰（小雅『無草不死，無木不萎』，邶風『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遣詞命意十分相同，當亦由于一首的分化。邶風的谷風既為棄婦之詞，小雅的一篇就不會寫的是朋友（小雅詩中有『寘予于懷』之語，更不是朋友的行徑）。至於所以一在邶風，一在小雅之故，乃是由於聲調的不同而分列，正如玉堂春的歌曲，京腔中既有，秦腔中也有，大鼓書中也有。詩經既是集合各種樂調的歌詞而成，它有這種現象絕不足奇。又

如小雅的白駒和周頌的有客，都是說客人騎了一匹白馬來（小雅「皎皎白駒，食我場苗，」周頌「有客有客，亦白其馬，」）主人替他繫上，留他住下（小雅「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周頌「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他不肯住，逃走了（小雅「勉爾遁思，」「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周頌「薄言追之，」）主人去追他，喚他道「您回來，我們有給您的好處呢！」（小雅「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周頌「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這明明都是留客的詩，或是宴客而表示好意的詩。小雅說「爾公爾侯，」周頌說「既有淫威，」當是周天子款待諸侯的詩。此等詩或是由于一首的分化，或是由于習用留客的照例話，都未可知。其所以一在小雅，一在周頌，亦因聲調不同之故。但說詩的人總給詩篇的地位綁死了：他們認定小雅的後半部為刺詩，所以說白駒是刺宣王的不能用賢；他們認定周頌為宗廟中所用的詩，而宗廟中的客人只有勝國的諸侯，所以說有客是微子來見祖廟。這真是閉着眼睛的胡說！但這些東西若沒有歌謠和樂曲作比較時，便很不易看出它們的實際來，很容易給善作曲解的儒者瞞過了。

玄同先生，我雖在新青年上久讀他的文字，又同處在一校，可是沒有認識；自與適之先生計畫辨偽叢刊之後，始因他的表示贊同而相見面。在九年冬間，我初作辨偽工作的時候，原是專注目于偽史和偽書上；玄同先生卻屢屢說起經書的本身和注解中有許多應辨的地方，使我感到經部方面也有可以擴充的境界。但我雖讀過幾部經書，也略略知道些經學的歷史，並且痛恨經師的曲解已歷多年，只因從來沒有把經書專

心研究過一種，所以對于他所說的話終有些隔膜。到這時，在詩經上用了半年多，灼然知道從前人所作的經解眞是昏亂割裂到了萬分，在現在時候決不能再讓這班經學上的偶像占據着地位和威權，因此，我立志要澄清謬妄的經說。數年來對于詩經的注解方面作了幾篇批評，對于詩經的眞相方面也提出了幾個原則。現在都編集在本書第二冊裏。

我本來專在母校圖書館任編目之職；十年春間，校中設立研究所國學門，幼漁兼士二先生招我兼任助教；秋間又兼任大學豫科國文講師。在學問興趣極濃厚的時候，我怎能再爲他人分去時間。勉强上了幾堂，改了幾本卷子，頭便像刀劈一樣的痛。我耐不住了，只得辭職。惟有研究所卻是很有興味的：四壁排滿了書架，看書比圖書館還要方便些；校中舊存的古物和新集的歌謠也都彙集到一處來了。我這也弄弄，那也翻翻，不覺夜色已深，在黑暗的巨廈中往往扶牆摸壁而出。人家說我辦公認眞，哪知我只是爲了自己！在這翻弄之中，最得到益處的是羅叔蘊先生（振玉）和王靜安先生（國維）的著述。叔蘊先生在日本編印的圖譜，靜安先生在廣倉學窘發表的篇章，爲了價錢的昂貴，傳布的寡少，我都沒有見過。到這時，研究所中備齊了他們的著述的全分，我始見到商代的甲骨文字和他們的考釋，我始見到這二十年中新發見的北邙明器，敦煌佚籍，新疆木簡的圖象，我始知道他們對於古史已在實物上作過種種的研究。我的眼界從此又得一廣，更明白自己知識的淺陋。我知道要建設眞實的古史，只有從實物上着手的一條路是大路，我的現在的研究僅僅在破壞僞古史的系統上面致力罷了。我很願意向這一方面做些工作，使得破壞之後

得有新建設，同時也可以用了建設的材料做破壞的工具。我讀了他們的書，固然不滿意於他們的不能大膽辨僞，以致與史中雜有僞史（例如靜安先生殷周制度論據了帝繫姓的話而說「堯舜之禪天下以舜禹之功，然舜禹皆顓頊後，本可以有天下；湯武之代夏商固以其功與德，然湯武皆帝嚳後，亦本可以有天下，」全本于秦漢間的僞史，）但我原諒他們比我們長了二三十年，受這一點傳統學說的包圍是不應苛責的；至于他們的求眞的精神，客觀的態度，豐富的材料，博洽的論辨，這是以前的史學家所夢想不到的，他們正爲我們開出一條研究的大路，我們只應對於他們表示尊敬和感謝。只恨我的學問的根柢打得太差了，考古學的素養也太缺乏了，我怎能把他們的研究的結果都親切地承受了呢！從此以後，我的心頭永遠頓着一筆債，覺得在考古學方面必須好好讀幾部書。但境遇的困阨，使得我只有摩挲了這些圖籍而惆悵而已！

我的祖母的病態漸漸地沉重，我再不能留在北京了，便於十一年春間乞假歸家，作久居之計。生計方面，由適之先生的介紹，爲商務印書館編纂中學本國史教科書，豫支些酬金。我的根性是不能爲他人作事的，所以就是編纂教科書也要使得它成爲一家著述。我想了許多法子，要把這部教科書做成一部活的歷史，使得讀書的人確能認識全部歷史的整個的活動，得到眞實的歷史觀念和研究興味。上古史方面怎樣辦呢？三皇五帝的系統，當然是推翻的了。考古學上的中國上古史，現在剛纔動頭，遠不能得到一個簡單的結論。思索了好久，以爲只有把詩書和論語中的上古史傳說整理出來，草成一篇最早的上古史的傳說

爲宜。我便把這三部書中的古史觀念比較看着，忽然發見了一個大疑竇，——堯舜禹的地位的問題！堯典和皋陶謨我是向來不信的，但我總以爲是春秋時的東西；哪知和論語中的古史觀念一比較之下，竟覺得還在論語之後。我就將這三部書中說到禹的語句鈔錄出來，尋繹古代對於禹的觀念，知道可以分作四層：最早的是商頌長發的「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把他看作一個開天闢地的神；其次是魯頌閟宮的「后稷……奄有下土，纘禹之緒」，把他看作一個最早的人王；其次是論語上的「禹稷躬稼」和「禹……盡力乎溝洫」，把他看作一個耕稼的人王；最後乃爲堯典的「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把後生的人和纘緒的人都改成了他的同寅。堯舜的事蹟也是照了這個次序：詩經和尚書（除首數篇）中全沒有說到堯舜，似乎不曾知道有他們似的；論語中有他們了，但還沒有淸楚的事實；到堯典中，他們的德行政事纔燦然大備了。因爲得到了這一個指示，所以在我的意想中覺得禹是西周時就有的，堯舜是到春秋末年纔起來的。越是起得後，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農之後，堯舜又成了晚輩，更不必說禹了。我就建立了一個假設：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統恰是一個反背。

我立了這個假設而尚未作文的時候，我的祖母去世了。心中既極悲痛，辦理喪事又甚煩忙，遂發了失眠的舊病，把半年的光陰白白地丟掉。編輯教科書的限期已迫，成稿却沒有多少，不得已去函辭職。承館中史地部主任朱經農先生的盛情，邀我到館任職，許由同事人幫助編纂。年底到滬後，和舊友王伯祥先生（鍾麒）同居；他也是喜歡歷史的，談論間常常說到古史，頗有商搉之樂。館課每日六小時，在滬雜務亦少，

又獲得些餘閒。我便溫了幾遍尚書，把裏面關於古史的話摘出比較，由此知道西周人的古史觀念實在只是神道觀念，這種神道觀念和後出的堯典等篇的人治觀念是迥不相同的。又知道那時所說的「帝」都指上帝，呂刑中的「皇帝」即是「上帝」的互文；堯典等篇以「帝」爲活人的階位之稱，是一個最顯明的漏洞。又如「苗」，尚書中說到他們的共有七處，可以分作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呂刑，它說蚩尤作亂之後，這個壞品性傳染給平民，弄得苗民成了殘忍的民族，動不動就要殺人；被殺的人到上帝前控告，上帝哀憐他們的冤枉，就降下他的威靈，把苗民絕滅了。在這一時期之中，苗的結果是何等的不幸。第二時期是堯典的「竄三苗于三危」和「分北三苗」，皋陶謨的「何遷乎有苗」和「苗頑弗即工」，禹貢的「三危既宅，三苗丕敘」。說舜時三苗頑強不服，舜把他們搬到三危，分開住着，他們也就很安定了。在這時期中，他們雖失掉了居住的自由，還無妨于生活，這個刑罰就輕鬆多多。第三時期是僞古文的大禹謨，說有苗昏迷不恭，以致民怨天怒，舜命禹往征，打了一個月還不服；益勸禹修德感之，禹聽了他就班師回去；舜于是大布德教，兩階上舞着干羽，過了七十天，有苗就自來降服了。在這個時期中，舜和苗兩方面都是極美滿的，沒有一些兒火辣氣了。這種變遷，很可以看出古人的政治觀念：在做呂刑的時候，他們決想不到有這樣精微的德化；在做大禹謨的時候，他們也忘卻了那個威靈顯赫的上帝了。這種政治觀念的變遷，就是政治現象從神權移到人治的進步。拿了這個變遷的例來看古史的結構的層次，便可以得到一個親切的理解。我們何以感到一班聖君賢相竟會好到這般地步？只爲現在承認的古史在它凝結的時候恰是德化觀念最有力

的當兒。我們若把這凝結的一層打破時，下面的樣子就決不是如此的了。

十二年二月中，玄同先生給我一封長信，論經部的辨僞。我和他已經一年不相通問了，忽然接讀這一封痛快淋漓的長信，很使我精神上得着一種興奮。我就抽出一個星期日的整天工夫，寫了一通覆書，除講詩經的工作之外，又把一年來所積的古史見解寫出了一個大概。想不到這一個概要就成了後來種種討論的骨幹！四月中，適之先生到上海來，他編輯的讀書雜志需要稿件，囑我趕作一文。我想我答玄同先生的信已經寄了兩個月，還沒有得到回音，不知道他對於我的意見究竟作何批評，很想借此逼上一逼，就把討論古史的一段文字鈔出寄去。這文在雜志第九期中發表之後，果然第十期上就有他的很長的回答他讚同我的對於古史的意見，更把六經的眞相和孔子與六經的關係說了許多從來未有的話。

十二年春夏間是我的身體最壞的時候。因爲我久居北方，受不住上海的潮溼的空氣，生了一身溼瘡，痛癢交作，瘡血沾濡。兼以服務的地方即在工廠裏面，鄰近也都是工廠，這充滿着煙煤的空氣使得我精神疲倦，食量減少，又患咳嗽，幾乎成了肺病。假使我沒有學問上的安慰，我眞要頹廢了。於是我請了長假回家，養了四個多月的病。在這四個多月之中，我對於我的生活眞是見情到了萬分。庭中的綠苔，園中的小榭，花壇上的雜花，都成了有情的伴侶。妻女們的相親相依，使我觸處感到家庭的溫存的樂趣。向來厭惡爲閉塞的蘇州，這時也變作了清靜安逸的福地了。我在家讀書，輕易不出門；別人知道我有病，也不來勉強我作什麼事。我安閒地讀了好些書，寫了好些筆記。本來我對於學問雖是深嗜篤好，但因所好太多，看書

太紛亂，精神容易旁逸斜出，所以筆記上什麼東西都有得記錄。到了這時候，我的筆記幾乎成了「古史清一色」了。這個問題，自從與玄同先生信中把數年來的龐雜的見解總聚了一下，成立了一個系統，我就再從這個系統上生出若干題目，依了這些題目着手搜集材料。向時所要求而未得實現的「由博返約」「執簡御繁」的境界到這時竟實現了，有了一種新的眼光再去看書時就滿目是新材料了：我眞是想不盡的喜樂，把身上的疾苦一起丟向九霄雲外去了！

自從讀書雜志上發表了我和玄同先生兩篇文字之後，劉楚賢胡堇人二先生就來書痛駁。我很高興地收受；我覺得這是給與我修正自己思想和增進自己學問的一個好機會，只當作好意的商摧而不當以盛氣相勝的。因爲在家養病，所以容我徐徐草答。可惜文字未完，四個月的生計負担已壓迫我回復館職了，一篇答覆的長文只作成了一半。

我是一個生性倔强的人，只能做自己願意做的事情而不能聽從任何人的指揮的。商務印書館中固然待我並不苛刻，但我總覺得一天的主要的時間爲館務犧牲掉了未免可惜。我不是教育家，便不應編教科書；館中未嘗許我作專門的研究，又如何教我作無本的著述：精神上既有這般苦痛，所以在這年的冬間又辭了出來，回復北京大學研究所的職務。在研究所中，雖是還不能讓我稱心適意地把所有的時間給我自己支配，但比較了他種職務，我可以自己支配的時間實在是多一點了。過去的二年裏頭，我的惟一的大工作是標點東壁遺書。因爲它牽涉的古書太多，古書的解詁有許多地方是極難捉摸的，所以費去了我的很

多的時間

我自民國六年先妻得疾，中經先妻的喪，自身的續娶，祖母的病，祖母的歿，自身的職業的變更，居住地的遷移，到十三年接眷到京，這七年中的生活完全脫去了軌道。精神的安定既不可求，影響到身體上就起了種種病症。他種病症雖痛苦，尙是一時的，只有失眠症無法治愈，深夜的煎熬竟成了家常便飯！因此面目黧瘠，二十餘歲時見者即疑爲四十歲人。我一意的奮鬬，一意的忍耐，到這時剛纔勉強回復到軌道上。我所以一定要到北京的緣故，只因北京的學問空氣較爲濃厚，舊書和古物薈萃於此，要研究中國歷史上的問題這確是最適宜的居住地；並且各方面的專家惟有在北京還能找到，要質疑請益也是方便。我自己有書二萬冊，以前分散在京蘇兩處；後來到了上海，又分做三處。無論住什麼地方，爲了一個問題要去參考時，往往是覓一個空。自己有書而不能用，這是何等的煩悶！加以數年中每上行程，書籍總占了行李的大部分，不知道整理了多少次，費去了多少精神，花去了多少運費。這把我磨折得苦極了！自從十二年冬間到京，下了決心一起搬走。又以寓舍未定，遷移了幾回；每搬動一回便作上十數天的整理，弄得口苦舌乾，筋骨疼痛。我眞勞倦了，急要得到一個安心立命的境界，從事于按日程功的專門的工作。妻女既北來，寓中事有人主持，不再紛心雜務，精神上亦得有安慰，這兩年中失眠漸漸地成爲例外，夜中也稍稍可以工作了。只是熟人日衆，人事日繁，大家以爲我是能做些文章的，紛紛以作文見囑。固然有許多是隨我自己選擇題目的，儘不妨把胸中積着的問題借來作些研究，但現燒熱賣的東西終究掙不得較高的價値，而且此去彼來，勸迫限期，

連很小的問題也不能從容預備，更哪裏說得到大問題的討論。因為這樣，所以前年養病時遺下的半篇文債至今還沒有動手清償。這種牽掣的生活，我想到時就怨恨。

二年以來，我對於古史研究的進行可以分了三方面作敍述。

其一，是考古學方面。十二年秋間，我到北京來，地質調查所的陳列室已經開放；我進去參觀，始見石器時代的遺物，使我知道古代的玉器和銅器原是由石器時代的東西演化而成的，圭和璋就是石刀的變相，璧和瑗就是石環的變相，銅鼎和銅鬲也就是陶鼎和陶鬲的變相。那時河南仰韶村新石器時代的遺物發見不久，燦然陳列，更使我對於周代以前的中國文化作了許多冥想。

就在這年八月，河南新鄭縣發見大批古物，江蘇教育廳委託我和陳萬里先生前往調查。我們在開封見到出土古物的全分。器物的豐富，雕鏤的精工，使我看了十分驚詫，心想掘到一個古墓就有這許多，若能再發見若干，從器物的銘文裏漏出古代的事蹟，從器物的圖畫裏漏出古人的想像，在古史的研究上真不知道可以獲得多少的裨益。我們又順道游洛陽，到魏故城（通稱金墉城）中，隨便用脚踢着，就可以拾得古代的瓦當。心想自周代建了東都以後，累代宅京于此，如果能作大規模的發掘，當可分出清楚的層次，發見整批的古物。去年，萬里游敦煌歸來，說起陝西甘肅一帶有許多整個埋在地下的古城，正待我們去發掘，使我更為神往。

近數年來，國立學校經費愈窘，研究所中考古學會在十分困難裏勉強進行，時有創獲，孟津出土的車飾數百種尤爲鉅觀。我雖沒有餘力加入研究，但嚮往之情是極熱烈的，倘使在五六年前見了，我一定要沈溺在裏邊了。現在既深感研究學問的困難，又甚悲人生壽命的短促，知道自己在研究古史上原有專門的一小部分工作—辨僞史—可做，不該把範圍屢屢放寬，以致一無所成。至于許多實物，自當有人作全力的研究，我只希望從他們的研究的結果裏得到些常識而已。在研究古代實物的人，我也希望他們肯涉獵到辨僞方面。例如章演羣先生（鴻釗）所著的石雅，不愧爲近年的一部大著作，但裏邊對于僞書僞史不加別擇，實是一個大缺點。他據了拾遺記的『神農采峻鍜之銅以爲器，』史記的『黃帝採首山銅鑄鼎，』說中國在神農黃帝時已入銅器時代；又據了禹貢的『厥貢璆鐵銀鏤，』山海經的『禹曰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說三代之初已知用鐵。這種見解，很能妨礙眞確的史實的領受。若能知道神農黃帝不過是想像中的人物，禹貢和山海經都是戰國時的著作，那麼在實證上就可以剔出許多僞妄的證據，不使它迷亂了眞確的史實的地位了。

其二，是辨證僞古史方面。這二年中，除了承受崔述的辨證以外，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少。就發表的說，曾經考了商王紂和宋王偃的故事，略見積毀之下的惡人模樣和詆毀惡人的方式；又用了白話翻譯了幾篇尙書，使人把商周間的聖君賢相的眞面目瞧一下，知道後世儒者想像中的古聖賢原不是那一回事。沒有發表的，就筆記上歸併起來，有以下許多題目：

春秋戰國時的神祇和宗教活動（如郊祀，祈望，封禪等。）

古代的智識階級（如巫，史，士大夫）的實況。

秦漢以後的智識階級的古史（承認的古代傳說）和非智識階級的古史（民間自由發展的傳說。）

春秋戰國間的人才（如聖賢，游俠，說客，儒生等）和因了這班人才而生出來的古史。

春秋戰國秦漢間的中心問題（如王霸，帝王，五行，德化等）和因了這種中心問題而生出來的古史。

春秋戰國秦漢間的制度（如尊號，官名，正朔，服色，宗法，階級等）和因了這種制度而生出來的古史。

春秋時各民族的祖先的傳說和戰國以後歸併為一系的記載。

春秋戰國秦漢人想像中的太古（如開闢，洪水及各種神話。）

戰國秦漢時開拓的疆土和想像的地域（如崑崙，弱水及山海經所記。）

戰國秦漢人造偽的供狀。

漢代人為了『整齊故事』而造出的古史。

春秋戰國時的書籍（著作，典藏，傳布，格式等。）

漢初的經書和經師。

尚書各篇的著作時代和著作背景。

孔子何以成為聖人和何以不成為神人。

古史中人物的張揚的等次。

古史與故事的比較。

以上許多題目，有的是已經聚集了許多材料，有的還不過剛立起幾條假設。如果讓我從容地做去，想來中均每個題目經過半年的研究總可以得到一些結果。我對於這項研究有一個清楚的自覺，就是：我們要辨明僞古史必須先認識眞古史。我的目的既在辨論東周秦漢間發生的僞史，所以對於東周秦漢間的時勢，思想，制度，史蹟等等急要研究出一個眞相來。前年作的研究古史的計畫要在這六年中細讀左傳，史記，兩漢書等，就爲了這個原因。但是很可悲的，荏苒兩載，左傳還沒有好好地點讀過一頁，雖則爲了作文的參考每星期總要翻上幾回。這種不切實的讀書，我一想着便心痛！我很知道，以前開首發表主張的時候儘不妨大刀闊斧作粗疏的裁斷；但一層一層地逼進去時便不得不作細針密縷的工作，寫一個字也應該想幾遍了。爲我自己的學問計，爲對於學問界作眞實的供獻計，最好暫時只讀書，不作文；等到將來讀出了結果之後，再「水到渠成」般寫出來。但這個境界哪裏許我踏到呢，社會上正要把我使用得筋疲力盡咧！

前年作的計畫，大致的意思，是一方面增進常識，一方面從事研究。在研究上，要先弄明白了古代的史實，然後再考各種書籍的時代和地域，考明之後便在裏面抽出那時那地的傳說中的古史，加以系統的整理；更研究了考古學去審定實物，研究了民俗學去認識傳說中的古史的意義。這確是一條最切實的道路，必須把這條道路按步就班地走完了之後，始可把我的研究古史的責任脫卸。但我一來感於境遇的不如意，

覺得以有涯之生長日飄蕩於牽掣的生活中，希望作嚴守秩序的研究終是做不到的事情，二來又是感於學問領域的廣漠和個人力量的渺小，知道要由我一個人把一種學問作全部的整理是無望的，所以不由得不把當時的野心一步一步地收縮了下來。去年春間答李玄伯先生時，說自己願意擔任的工作有兩項：一是用故事的眼光解釋古史的構成的原因，二是把古今的神話與傳說作為系統的敘述。這自然是在研究所中多接近民俗學方面的材料之故，但我收縮範圍的苦心亦已可見。在以上所列的題目中，如神祇，神話，巫史，宗教活動，非智識階級的古史，故事與古史的比較等題，都是進行這方面的研究的。所苦的，研究學問不能孤立，如果得不到研究他種學問的人的幫助，自己着手的一部分必然研究不好。在現在這般的民窮兵亂的國家之中，許多有希望的人都逼向淺薄浮囂中討生活，研究學問的事又如何提倡得起來。我雖在這困苦的境界中竭盡掙扎之力，也不過發出數聲孤寂的呻吟，留幾滴眼淚在昏黃大漠中而已！所以我即使把研究的範圍損之又損，損到只研究一個問題，也怕未必能達到我的願望。何況我的心中原有無數問題，總想把一種學問研究得好好的，那麼，恐怕我的一生只有在憤悱悵惘之中度盡了！

這二年中，繼續搜得的材料頗發見我前半文中的謬誤，但也頗增加我前半文中的證據。試舉禹為社神的一例。我前因尚書呂刑說禹「主名山川」，疑禹是穆王時的山川之神。又因小雅甫田與大雅雲漢皆言祀社，大小雅為宣王前後時詩，疑社祀是西周後期起來的。魯語說「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禹績正與之同，疑禹是社神。綜合以上三說，下一假設云：「西周中期，禹為山川之神；後來有了社祭，又為社神。

」這句話在去年發見了錯誤了。召誥云：

> 越翌日乙卯，周公朝至於洛，則達觀於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越翌日戊午，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如果我不能發見召誥在時代上的疑竇，則社祀起於西周後期之說當然由我自己推翻。至禹為社神之說，當時因古書中常以「禹稷」連稱，疑與「社稷」的連稱有關係；又周語把共工氏放在伯禹的上面，和魯語把烈山氏放在周棄的上面正同，那麼魯語說后土是共工氏之子，后土當即是禹。劉楚賢先生看了，斥為「少見多怪而臆測的牽強附會。」(本書頁一八五。)但近來收得的幾條新證據則頗足以助成我的主張：

> 今世之祭井，竈，門，戶，箕，帚，臼，杵者，非以其神為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故炎帝於火而死為竈，禹勞天下而死為社，后稷作稼穡而死為稷，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為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淮南子氾論訓。)

> 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史記封禪書。)

> 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遂於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漢書郊祀志引王莽奏文。)

> 漢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其後又立官社，配以夏禹。(三輔黃圖卷五。)

上面所舉前二條明白說禹為社，後二條又說禹配食官社，可見漢代人確以禹為社神。讀者不要以為這些

話全是後起之說，須知越是配享越見得是先前的正祀。左傳上不說嗎

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后土爲社。……周弃……爲稷。（昭二十九年。）

可是到了後來就不然了：

後魏天興二年，置太社太稷；……勾龍配社，周棄配稷。（通典卷四十五。）

仲春仲秋上戊，祀太社太稷，配以后土勾龍氏，后稷氏，以祈報。（大清會典卷五十三。）

太社太稷姓甚名誰，沒有人能回答；但以前正任社稷的勾龍和周棄卻退而爲配享了，這是很顯著的。所以如此之故，只因舊說舊祀到沒有權威的時候自然大家忘懷了，一個新朝起來，就隨順了民衆的新偶像而建立國家的新祀典；可是舊說舊祀在書本上還瞧得見，於是只得屈抑已倒的偶像作爲配享。這種『新鬼大而故鬼小』的現象，實亦適用古史系統的成例，是積薪般層累起來的。禹既在漢配社，當然是漢以前的正社神（說不定即是勾龍。）惟其他是社神，所以土地所在就是他的權力所在：南山梁山是他所甸，豐水是他所注，洪水是他所湮，宋國人說下土是他所敷，秦國人說宅居所在是他的蹟，魯國人說后稷奄有下土是纘他的緒，齊國人說成湯咸有九州是處在他的堵，王朝人說方行天下至於海表都是陟他的迹。

劉先生在文中說，『縱或祀禹爲社，亦是後人尊功報德之舉，加之之名，豈爲神職？』近日馮芝生先生（友蘭）在大人物之分析一文中也說，『大人物到了最大的時候，一般人把許多與他本無直接關係的事也歸附於他，於是此大人物即成一個神秘，成爲一串事物的象徵。如大禹之於治水，釋迦之於佛教等皆是。

有人疑釋迦之果否有其人；顧頡剛先生疑大禹之果否有其人。我以爲此等人誠已變爲一串事物的象徵，但未可因此卽謂其人之不存在。近來中山亦漸成中國革命之象徵，但中山之人之存在固吾人之所知也。（現代評論三卷六十七期。）

類於這樣的批評，我聽見得很多，大致都以爲禹的歷史上的地位不當因其神化而便推翻。我覺得他們對於我的態度頗有誤解，現在趁此簡略地一辨。禹之是否實有其人，我們已無從知道。就現存的最早的材料看，禹確是一個富於神性的人物，他的故事也因各地的崇奉而傳佈得很遠。至於我們現在所以知道他是一個歷史上的人物，乃是由於他的神話性的故事經過了一番歷史的安排以後的種種記載而來。我們只要把詩書和彝器銘辭的話放在一邊，把戰國諸子和史書的話放在另一邊，比較看着，自可明白這些歷史性質的故事乃是後起的。所以我說禹由神變人，是順着傳說的次序說的，劉諸先生說禹由人變神，乃是先承認了後起的傳說而更把它解釋以前的傳說的。再有一層，在實際上無論禹是人是神，但在那時人的心目中則他確是一個神性的人物。例如現在民間大都祀關帝和竈神，我們固然知道竈神是純粹的神，關帝是由人變神的，但在這一班奉祀的人的心目中原沒有這個分別。他們只覺得神是全知全能而又具有人格的（玉皇也姓着張呢！）神如要下凡做人也隨着他的意念。因爲神人不分，所以神人可以互變。我們知道關羽，華陀，包拯，張三丰，卜將軍是由人變神的。我們又知道文昌本是北斗旁的星，但到後來變成了晉將蜀人張惡子了；湘君湘夫人本是湘水的神，但後來也變成了堯的二女了。可見從神變人和從人變神是同樣的通行，我們不能取了人的一方面就丟了神的一方面；我們只能就當時

人的心目中的觀念斷說他的地位而已。禹儘可以是一個歷史上的人物，但從春秋上溯到西周，就所見的材料而論，他確是一個神性的人物。更古的材料，我們大家見不到；如何可以斷說他的究竟。至於春秋以下的材料，我早已說過，他確是人了。

這數年中，又有人批評我，說我所做的文字不過像從前人的翻案文章一樣；翻來覆去總是這幾句書。這個責備自然是該有的：我的學力既不充足，發表的文字也不曾把見到的理由完全寫出，而且沒有得到實物上的幫助，要拿出證據確只有書上的幾句。但我所以敢於這樣做，自有我的堅定的立足點——在客觀上真實認識的古史，——並不是僅僅要做翻案文章，這是我敢作誠信的自白的。我的惟一的宗旨，是要依據了各時代的時勢來解釋各時代的傳說中的古史。上邊寫的題目，如疆域，信仰，學派，人才，時代的中心問題……等，都是解決那時候的古史觀念的最好的工具。舉一個例罷。譬如伯夷，他的人究竟如何，是否孤竹君的兒子，我們已無從知道。但我們知道春秋時人是歡喜講修養的，人格的陶冶以君子為標的，所以論語中講到他，便說不念舊惡，不肯降志辱身。我們又知道戰國時的君相是專講養士的，士人都是汲汲皇皇地尋求主人而為之用，所以孟子上說他聽得文王有了勢力，就興起道，「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我們又知道自秦皇一統之後，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忠君的觀念大盛，所以史記上也就說他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了。漢以後，向來流動的故事因書籍的普及而凝固了，他的人格總沒有因時勢的遷流而改變。（上面舉的尚書上的苗，也是這樣的一例。）所以我們對於那時的古史應當和現

在的故事同等看待，因爲這些東西都是在口耳之間流傳的。 我們在這上，不但可以理出那時人的古史觀念，並且可以用了那時人的古史觀念去看出它的背景——那時的社會制度和思想潮流。 這樣的研究有兩種用處：一是推翻僞史；二是幫助明瞭眞史。 至於我在上面所說的僞史源，僞史例，僞史對鞫三種書如果都能著成，大家自會明白認識我的主張，不致笑爲翻案文章了。

總之，我在辨證僞古史上有很清楚的自覺心，有極堅强的自信力，我的眼底有許多可走的道路，我的心中常懸着許多待解的問題，我深信這一方面如能容我發展，我自能壓人之心而不但勝人之口。 至於現在這一點已發表的東西本來不算什麽。 畫家作畫自有見不得人的「粉本」。 「良工不示人以朴」也是一句可以玩味的古話。 我現在在學力未充足時發表這種新創的主張，有許多錯誤淺薄的地方乃是當然的，只要讀者用了粉本的眼光看而不用名畫的眼光看，用了朴的眼光看而不用精品的眼光看，就可以見出這本書的實際。 至於將來能否使它成爲名畫或精品，這是全賴於我自己的努力和社會上給與我的幫助，現在是不能豫斷的。

其三，是民俗學方面。 以前我愛聽戲，又曾搜集過歌謠，又曾從戲劇和歌謠中得到研究古史的方法，這都已在上面說過了。 但我原來單想用了民俗學的材料去印證古史，並不希望即向這一方面着手研究。 事有出於意料之外的，十年冬間，我輯集鄭樵的詩說，在通志樂略中讀到他論琴操的一段話：

琴操所言者何嘗有是事！ 琴之始也有聲無辭，但善音之人欲寫其幽懷隱思而無所憑依，故取古之

人悲愛不遇之事而以命操：或有其事而非其人，或有其事而非其人，或得古人之影響從而滋蔓之。君子之所取者但取其聲而已。……　又如稗官之流，其理只在唇舌間，而其事亦有記載。虞舜之父，杞梁之妻，於經傳所言者不過數十言耳，彼則演成萬千言。……

杞梁之妻即孟姜女，孟姜女有送寒衣和哭長城的故事，這是我一向聽得的，但沒有想到從經傳的數十言中會得演成了稗官的萬千言。我讀了這一段，使我對於她的故事起了一回注意。過了一年多，點讀姚際恆的詩經通論，在鄭風有女同車篇下見到他的一段注釋：

> 序……謂「孟姜」為文姜。文姜淫亂殺夫幾亡魯國，何以贊其「德音不忘」乎！……詩人之辭有相同者，如采唐曰「美孟姜矣，」豈亦文姜乎！是必當時齊國有長女美而賢，故詩人多以「孟姜」稱之耳。

這幾句話又給與我一個暗示，就在簡端批道，「今又有哭長城之孟姜。」經了這一回的提醒，使我知道在未有杞梁之妻的故事時，孟姜一名早已成為美女的通名了。我驚訝其歷年的久遠，引動了蒐輯這件故事的好奇心。事情眞奇怪，我一動了這個念頭，許多材料便歷落地奔赴到我的眼前來。我把這些材料略略整理，很自然地排出了一個變遷的線索。十三年冬間，研究所中歌謠研究會出版的歌謠週刊要出歌謠和故事的研究文字的專號，囑我撰文，我就選定了孟姜女故事的轉變一題，費了三天工夫寫成一萬二千字，一期的週刊撐滿了，但故事還只敘述到南宋的初葉。我正因事務的忙，尤未得續做下去時，許多同志投寄來

的唱本，寶卷，小說，傳說，戲劇，歌謠，詩文，……已接疊而至，使我目迷耳亂，感到世界的大，就是一件故事也不是我一個人的力量所能窮其涯際的，於是我把作成一篇完整文字的勇氣打消了。我願意先把一個一個的小問題作上研究，等到這許多小問題都研究完了時再整理出一篇大論文來。（以下本將二年來搜集到的孟姜女故事分時分地開一篇總賬，爲研究古史方法舉一旁證的例，但材料太多了，竭力節縮，終有三萬餘言。文成，自己覺得彷彿犯了腹蠱之疾，把前後文隔斷了；只因費了兩星期的工夫所整理，不忍删棄。後來陳通伯先生（源）看了，力勸我删去，我聽了他的勸告，便把這一部分獨立爲一文。）

研究孟姜女故事的結果，使我親切知道一件故事雖是微小，但一樣地隨順了文化中心而遷流，承受了各地的時勢和風俗而改變，憑藉了民衆的情感和想像而發展。又使我親切知道，它變成的各種不同的面目，有的是單純地隨着說者的意念的，有的是隨着說者的解釋故事節目的要求的。更就這件故事的意義上看去，又使我明瞭它的背景和替它立出主張的各種社會。

上面一段話，沒有舉出證據，說得太空洞了。現在我試把這件故事比擬傳說中的古史。江浙人說孟姜女生在葫蘆冬瓜或南瓜中，這不像伊尹的生於空桑中嗎？廣西唱本說范杞郎是火德星轉世，死後歸復仙班，這不像傳說的『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嗎？廈門唱本說孟姜女升天後把秦始皇罵得兩脚浮浮，落在東海裏做春牛，這不像『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嗎？廈門唱本說范杞郎死後化爲鳳凰，這也不像女娃溺死而化爲精衞（帝女雀）嗎？廣西唱本說孟姜女尋夫經過餓虎，毒

蛇，雨雪諸村，這也不像山海經上有食人的窫窳的少咸之山，有攫人的孰湖的崦嵫之山，冬夏有雪的申首之山嗎？（用楚辭中的招魂和大招看更像。） 讀者不要疑惑我專就神話方面說，以為古史中原沒有神話的意味，神話乃是小說不經之言；須知現在沒有神話意味的古史卻是從神話的古史中篩濾出來的。 我們試退讓一百步，把流行於民衆間的孟姜女故事的唱本小說等拋開，只就士人的箸述中看這件故事的情狀：

杞梁之妻……就其夫之尸於城下而哭之。 內誠感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隕涕。 十日而城為之崩。（漢劉向列女傳。）

良已死，幷築城中。 仲姿既知，悲咽而往，向城號哭，其城當面一時崩倒。 死人白骨交橫，莫知孰是。 仲姿乃刺指血以滴白骨，云「若是杞良骨者，血可流入！」…… 果至良骸，血徑流入。（唐人琱玉集引同賢記。）

姜女……歸三日而范郎赴長城之役；其後齎寒衣至城所，詢問范郎，已埋版築中矣。 女乃遶城哭，城隅為隳。 隳所，范郎見像，女即其處求骸，……遂負之歸。…… 夫長白其事，主將命追之。 女至宜君山同官界，所登山，渴甚，痛哭，地湧甘泉，今其地名曰哭泉。 時女倦甚，不能奔，而追將及，忽山峯轉移，若無徑然，追者乃返。（明馬理姜女詩序。）

以上數則，神話的意味何等豐富。 但試看清劉開的廣列女傳：

杞植之妻孟姜。 植婚三日即被調至長城，久役而死。 姜往哭之，城為之崩。 遂負骨歸葬而死。

這不但把民間的種種有趣味的傳說刪去了，就是劉向馬理一班士大夫承認的一小部分神話性的故事也刪去了，賸下來的只有一個無關痛癢的輪廓除了『崩城』——這件故事的中心——之外確是毫沒有神話的意味了。　更進一步，就是崩城的神話也何嘗不可作為非神話的解釋，有如王充所云『或時城適自崩，杞梁妻適哭下』（論衡感虛篇）呢。　所以若把廣列女傳敘述的看作孟姜的眞事實，把唱本小說，戲本……中所說的看作怪誕不經之談，固然是去僞存眞的一團好意，但在實際上卻本末倒置了。　我們若能瞭解這一個意思，就可歷歷看出傳說中的古史的眞相，而不至再為學者們編定的古史所迷誤。

我很想俟孟姜女故事考明之後，再着手考舜的故事。　這一件故事是戰國時的最大的故事（戰國以前以禹的故事為最大，可惜材料很少，無從詳考，）許多古史上的故事都以它為中心而聯結起來了。　後世儒者把其中的神話部分刪去，把人事部分保存，就成了極盛的唐虞之治。　這件故事又是古代最有趣味的故事。　宋芸子先生（育仁）在虞初小說序例上說：

> 帝舜之賢，則行為大孝，德為聖人，帝舜之才，則自耕稼陶漁，所在成都成邑。　其初遭遇之阨，則不得於親，至於捐階掩井；其後遭遇之隆，則先得于君，至于登庸在位。　妃匹之愛，則二妃皆帝女，風雲之會，則五臣皆聖賢。　成治水之大功；狩蒼梧而仙去。　實古今中外環球五洲空前絕後所絕無僅有，說部家所窮思極想而萬難虛構者，乃於帝之實事得之！

他雖不知道帝舜的故事所以能成為『古今中外環球五洲空前絕後所絕無僅有』的故事原由于『說部

家所窮思極想」的「虛構，」但他對於它發生驚怖之情確是不錯。這件故事如果能研究明白，一方面必可對於故事的性質更得許多瞭解，一方面也可以對於僞古史作一個大體的整理。本書第二冊中的虞初小說回目考釋一篇，就是想把它作一回鳥瞰的。

民俗學方面除了故事以外，這二年中着手的工作又有三事：神道，社會和歌謠。我在研究古史的計畫中，把民俗學的研究放在最後，希望先辨明了外表，然後再去探求內部的意義。現在我的環境是適於研究民俗學的，我只得先從此入手了。

研究神道的興趣是給東嶽廟引起的。我游了蘇州和北京兩處的東嶽廟，見到許多不同的神名，知道各地方的神道雖同屬於道教之下，但並沒有統一。從這種不統一的神道上可以窺見各地方的民衆的信仰。更看道教裏受進的佛教的影響，以至佛教自身所受的影響，也可以明白宗教的激盪的勢力。例如東嶽，本來是齊國的上帝（漢書郊祀志云，「八神，或云太公以來作之齊，」又云，「天主祀天齊，」）只因齊國的文化發達，聲望甚高，沒有被別國的上帝壓倒；漢以後，他的勢力依舊存在，掌管生殺之權。只佛教侵入，它自有一個東嶽——閻羅王。因爲中國人並不抵抗佛教，所以東嶽大帝與閻羅王可以並存，死人受着二重的管束。凑假而道教的東嶽廟中也雕塑十殿閻羅，把他們壓做了嶽帝的屬吏。但閻羅王也不是印度所固有，乃是受的埃及的影響。閻羅王大約卽是尼羅河（Nile）之神烏悉立斯（Osiris）。看「閻羅」與「尼羅」的聲音相合，甚爲可信。埃及人承認一個人死了之後，須受尼羅河神的裁判，隨着生前行事的

善惡判定賞罰，壞人就罰變爲畜類，愈壞的便變得愈低下；等到罰盡之後再變做人。這些原則到了中國閻羅王法典玉歷鈔傳裏還沒有變。我們如果能搜集許多材料作研究，一定可以得着許多想不到的創見。（一部道藏，用實用的眼光看固然十之八九都是荒謬話，但若拿它作研究時，便是一個無盡的寶藏；我們如果要知道我們民族的信仰與思想，這種書比了儒學正統的十三經重要得多。）

我對於這方面研究的步驟，擬先從楚辭，國語（包左傳）山海經，漢書郊祀志等書入手，認識道教未起時的各地的神道。更把佛教的神和道教的神作比較，將受了佛教影響而成立的道教的神道認識了。再把各地的神道互相比較，認識在不統一的道教之下的各種地方性的神道。這種事情，不說出時似乎沒有問題，但一加思考之後它們變遷的情形便很顯著。例如碧霞元君爲北方的女神，她的勢力由于泰山的分化；天妃爲南方的女神，她的勢力由於海神的結合：這是含有地方性的。道教中本來只應崇奉玉帝（卽詩書中的上帝）爲最高無上的主宰，但因佛教中有三世佛，所以又摹擬了它而建立三淸天尊，他們的地位與玉帝不相上下：這是承受佛教的影響的。古代的神有生有死，有嗜欲，有攻伐（看山海經等書可知），和希臘的神話差不多。那時的女神幾乎全爲愛情顚倒，所以楚辭九歌對於湘夫人等所致之辭多是相思惆悵之言，高唐神女兩賦又說巫山神女薦枕席，洛神賦寫宓妃又極綢繆繾綣之致。固然這些都是文人的託言，但至少在當時民衆的意想之中是許得如此的。（試問現在誰會對於碧霞元君作薦枕之想？）自從佛教流入，看神道成了超絕的人格，一切的嗜欲都染不到，生死更說不上，愛情變成了猥褻，於是女神和男神就

同具了嚴正的性格，風流豔冶之事全付與狐精花怪們了！（看聊齋志異等書可知。）這是道教未成立時的神道，和後世的神道的不同的樣子。我深信這一方面的研究如可有些結果，必能使古史的考證得到許多的便利！只是這一方面研究必須親到各地搜集材料，不能單靠書籍；像我這樣的拮据，調查考察的事業又從何說起？二年來，我到過的廟宇只有東嶽廟，白雲觀，財神廟，碧霞元君廟等處。

社會的研究，是論禹爲社神引起的。社會（祀社神之集會）的舊儀現在差不多已經停止；但實際上，鄉村祭神的結會，迎神送祟的賽會，朝頂進香的香會，都是社會的變相。我見到了這一層，所以很想領略現在的社會的風味，希望在裏邊得到一些古代的社祀的暗示。北京城西北八十里的妙峯山是一個北方的有名的香主，每年陰歷四月初一至十五爲進香之期。去年會期中，我就和研究所風俗調查會同人前往調查了三天，對於香會的情形知道了一個大概。他們都是就一種職業或一處居住的地方聯絡結會，除了祀神之外更布施一切用具食物，如茶，鹽，麪，粥，饅頭，路燈，拜墊，撣帚，茶瓢，膏藥等；或盡了自己的技能去娛樂神靈，幫助香客，如五虎棍，自行車，杠子，秧歌，音樂，舞獅，戲劇，修路，補碗，縫綻等。到了那裏，一切有人招呼，勞駕進了另一個世界，崎嶇的山嶺便化成了理想的樂國了。這些香會的經費，在鄉下的是按畝抽捐，同皇糧一般的繳納；在城裏的是就本業捐輸，或向人募化。這些會名，我只就刊有會啓（進香時的招貼）的鈔，已鈔到了九十餘個，其餘沒有會啓的恐還不止四五百呢。他們的香會的組織是極有秩序的，先設立了會所，議定了會規，排好了守晚，起程，上山，朝頂，迴香的日期，又分配了引善，催糧，請駕，錢糧，司庫，哨子，車把，廚房，茶房等都管，

所以人數雖多而不致擠亂。進香的人誠心極了，有的是一步一拜的，有的是提着臂爐的，聽說還有跳澗的（他們以為只要誠心便可由神靈護送回家，成其心願，其實只有活活地跌死。）到了這種地方，迷眼的是香煙，震耳的是鼓樂，身受的是款待，只覺得神秘，壯健，親善的可愛，卻忘記了他們所崇奉的乃是一種淺薄的宗教。這使我對於春秋時的「祈望，」戰國後的「封禪」得到一種瞭解。我很願意把各地方的社會的儀式和目的弄明白了，把春秋以來的社祀的歷史也弄清楚了，使得二者可以銜接起來。

社是土地之神。從天子到庶民立有各等的社。但看春秋戰國間人的稱述，社神的權力甚大；大水大旱不用說，日食亦用牲於社，決獄和處罰亦在社，祈求年穀和年壽也都在社，軍旅中又有軍社，似乎社是宗廟以外的一個總廟。後來總務與土地分開了：總務方面有道觀和佛寺，它們也可以做祈雨祈年的法事；土地方面有社壇，城隍廟和土地堂。社壇所祭沒有指實的神人。城隍神有省，府，縣之別，有指實姓名的，也有不指實的。土地神或一村落一個，或一城市多少個，指實與否也與城隍神同。這些神人就很可以研究一下。例如我在清代是江蘇省蘇州府元和縣人，江蘇省城隍和蘇州府城隍我都不知道是誰，聽說是三年一任，由龍虎山天師府札委的。元和縣城隍我知道是張老爺，不知其名，聽說是永遠不換的；看他的封號是「敕封顯應王北極驅邪司，」又號「武安君。」我家在蘇州的東城，依道士所定的地名喚作道義鄉；這一鄉的土地是任大明王，說是梁朝的任昉，也是永遠不換的。任昉既非蘇州人，又未做過蘇州的官（他做過義與太守，義與即今江蘇宜興，）不知道為什麼會得做蘇州東城的土地神。蘇州城中約有三十餘個土地神，道士

們也記不淸楚，因爲東城的道士觀只做東城的生意，西城的又專做西城，並無完全知道的必要。據我所知，尙有鳳凰鄉的春申君，大雲鄉的安齊王，永定鄉的茅亭司等。這些神是如何成立的，是否由於天師的委派，還是由於民衆的擁戴，實在很有研究的價值。倘使由於天師的委派，這不過是道士們的弄鬼，只要尋到了他們的簿冊便可完事。若出于民衆們的擁戴，那麽，這裏邊自有複雜的因緣，不是可以急遽瞭解的了。依我的推想，似乎後說合理，因爲聽說山東湖北等省的土地神統統是韓愈，與江蘇的辦法不同，如果由天師委派，這制度料想不致如此參差。或者江蘇的文化發達，民衆要求奉祀的神複雜了，所以一城中就有許多名人做土地神。我很願意把城隍神和土地神的人物歷史弄明白，上接春秋以來有功而祀的人物，並看出民衆的信仰的旨趣。

歌謠方面，因歌謠週刊的撰稿的要求，研究詩經的比較的需要，以及搜集孟姜女故事的聯帶關係，曾發表了多少篇文字。七八年前筆受的蘇州歌謠，也先寫定了一百首，加上了注釋，編成吳歌甲集一種。只因校中經費支絀，至今尙未出版。我很感謝玄同先生和魏建功先生，他們爲了這一本歌謠集，用精密的方法整理出蘇州方音的聲韻的部類，在方音的研究上開了一個新紀元。

老實說，我對於歌謠的本身并沒有多大的興趣，我的研究歌謠是有所爲而爲的：我想借此窺見民歌和兒歌的眞相，知道歷史上所謂童謠的性質究竟是怎樣的，詩經上所載的詩篇是否有一部分確爲民間流行的徒歌。關于下一問題，我已于論詩經所錄全爲樂歌一文中作一個約略的解答，就歌詞的複沓方面的舖

張，樂曲的採集，民歌的保存上說明詩經所錄悉爲樂曲；又從典禮所用與非典禮所用的歌曲上證明程大昌和顧炎武依據了儀禮所載的樂章而定諸國詩爲徒歌的謬誤。關于上一問題，我們可以知道歷史上所謂應驗的童謠一半是有意的造作，一半是無意的誤會。所謂有意的造作，如宋明帝疑忌王景文和張永，自造謠言道，「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宋書王景文傳）唐董昌稱帝越州時，山陰老人獻謠道，「欲識聖人姓，千里草青青；欲知天子名，日從日上生。」（新唐書董昌傳）從這種種僞造的童謠上可以反映出許多不曾破露的號稱應驗的童謠。左傳所記，如「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等童謠，無論史官所記不可靠，就使所記確有其事，這童謠的來歷也還可疑。所謂無意的誤會，如王莽末天水童謠云，「出吳門，望緹群，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民！」（續漢書五行志）吳天紀中童謠云，「阿童復阿童，銜刀游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晉書五行志）晉太康初童謠云，「惻惻力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晉書五行志）這些歌詞都是很單純的民歌或是無意義的兒歌。但給深信童謠爲有關休咎的人聽得了，便解釋「蹇人」是隗囂，「欲上天」是欲爲天子；「大馬小馬」是司馬氏，「高山」是蘇峻，「石」是蘇碩，蘇峻逼成帝，死後其弟碩被殺；甚至因王濬小字阿童，晉武帝特加爲龍驤將軍，以符「水中龍」的讖語。這都是庸人的自欺。若要附會，哪裏不可附會；正如求籤測字，無論何人得到一籤或一字，詳籤測字的人總可以從他的身分遭際上解釋得相像。我很想就用了這個方法，將現在流行的兒歌和民歌解釋各時各種的不同的事實，打破這種歷史上的迷信。

因為我在歌謠方面發表的文字較多，所以知道我研究歌謠的人也最多，常有人稱我為歌謠專家。這種不期之譽我很不願承受。我的搜集歌謠的動機是由于養病的消遣，其後作了些研究是為了讀詩經的比較；至於我搜集蘇州歌謠而編刊出來，乃是正要供給歌謠專家以研究的材料，並不是公布我的研究歌謠的結果。數年以來，北京大學的歌謠研究會收到了各地的歌謠，諺語，謎語等二萬餘首，眞是一個民衆文藝的寶庫；可是我諸事亂忙，也沒有翻覽過多少。我自己知道，我的研究文學的興味遠不及我的研究歷史的興味來得濃厚；我也不能在文學上有所主張，使得歌謠在文學的領土裏占得它應有的地位：我只想把歌謠作我的歷史的研究的輔助。這個態度，希望大家能彀瞭解，不要敦促我做非分的工作。

我這幾年中的工作範圍和將來的進行計畫，大致如此。

從以上所寫的看來，我的時勢，個性，境遇，都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了。

先從時勢說。清代的學風和以前各時代不同的地方，就是以前必要把學問歸結於政治的應用；而清代學者則敢于脫離應用的束縛；以前總好規定崇奉的一尊，而清代學者為要回復古代的各種家派，無意中把一尊的束縛也解除了。清末的古文家依然照了舊日的途徑而進行；今文家便因時勢的激盪而獨標新義，提出了孔子託古改制的問題做自己的託古改制的護符。這兩派衝突時，各各盡力揭破對方的弱點，使得觀戰的人消歇了信從家派的迷夢。同時，西洋的科學傳了進來，中國學者受到它的影響，對於治學的方

法有了根本的覺悟，要把中國古今的學術整理清楚，認識它們的歷史的價値。整理國故的呼聲倡始於太炎先生，而上軌道的進行則發軔于適之先生的具體的計畫。我生當其頃，親炙他們的言論；又從學校的科學教育中略略認識科學的面目，又因性喜博覽而對於古今學術有些知曉，所以能夠自覺地承受。古史古書之僞，自唐以後書籍流通，學者聞見廣博，早已致疑；如唐之劉知幾，柳宗元，宋之司馬光，歐陽修，鄭樵，朱熹，葉適，明之宋濂，梅鷟，胡應麟，清之顧炎武，胡渭，毛奇齡，姚際恆，閻若璩，萬斯大，萬斯同，袁枚，崔述等人都是。不過那些時代的學術社會處於積威的迷信之下，不能容受懷疑的批評，以致許多精心的創見不甚能提起社會的注意，就是注意了也只有反射着厭惡之情。到了現在，理性不受宗教的約束，批評之風大盛，昔時信守的藩籬都很不費力地撤除了，許多學問思想上的偶像都不攻而自倒了。加以古物出土愈多，時常透露一點古代文化的眞相，反映出書籍中所寫的幻相，更使人對於古書增高不信任的意念。長素先生受了西洋歷史家考定的上古史的影響，知道中國古史的不可信，就揭出了戰國諸子和新代經師的作僞的原因，使人讀了不但不信任古史，而且要看出僞史的背景，就從僞史上去研究，實在比較以前的辨僞者深進了一層。適之先生帶了西洋的史學方法回來，把傳說中的古代制度和小說中的故事舉了幾個演變的例，使人讀了不但要去辨僞，要去研究僞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尋出它的漸漸演變的線索，就從演變的線索上去研究，這比了長素先生的方法又深進了一層了。我生當其頃，歷歷受到這三層敎訓，加上無意中得到的故事的暗示，再來看古史時便觸處見出它的經歷的痕跡。我固然說不上有什麼學問，但我敢說我有了新方法了。在這

新方法支配之下的材料，陡然呈露了一種新樣子，使得我又欣快，又驚詑，終至放大了膽子而叫喊出來，成就了兩年前的古史討論。這個討論何嘗是我的力量呢，原是在現在的時勢中所應有的產物。

再從個性上看。我是一個桀驁不馴的人，不肯隨便聽信他人的話，受他人的管束。我又是一個歷史興味極濃重的人，歡喜把一件事情考證得明明白白，看出它的來踪和去跡。我又是一個好奇心極發達的人，會得隨處生出了問題而要求解答，在不曾得到解答的時候只覺得胸中煩悶的不可耐。因為有了這幾項基本的性質，所以我敢於懷疑古書古史而把它作深入的研究，敢于推倒數千年的偶像而不稍吝惜，敢於在向來不發生問題的地方發生出問題而不喪氣于他人的攻擊。倘使我早生了若干年，處於不許批評又沒有研究方法的學術社會中，或者竟要成了一個公認的妄人，如以前人對於劉知幾鄭樵們的看法。但現在是不必過慮的了！

更從境遇上看。要是我不生在科舉未廢的時候，我的幼年就不會讀經書。要是我的祖父不給我隨處講故事，也許我的歷史興味不會這樣的深厚。要是我不進新式學校，我也未必會承受這一點淺近的科學觀念。要是我在幼年沒有書籍的嗜好，蘇州又沒有許多書舖供我閒遊，我也不會對於古今的學術知道一點大概，儲藏着許多考證的材料。要是我到北京後不看兩年戲，我也不會對於民間的傳說得到一個大體的領略。要是我不愛好文學哲學和政治運動，在這種方面碰到多少次的失敗，我也不會認識自己的才性，把我的精力集中於考證的學問上。要是不遇見子水和太炎先生，我就是好學，也不會發生自覺的治學

的意志。要是不遇見孟眞和適之先生，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積着的許多打破傳統學說的見解也不敢大膽宣布。要是北京大學中不徵集歌謠，我也不會因寫錄歌謠而聯帶得到許多的風俗材料而加以注意。要是我沒有親見太炎先生對於今文家的痛恨，激動我尋求今文學著述的好奇心，我也不會搜讀孔子改制考，引起我對於古史的不信任的觀念。要是我不親從適之先生受學，瞭解他的研究的方法，我也不會認識自己最近情的學問乃是史學。要是適之玄同兩先生不提起我的編集辨僞材料的興趣，獎勵我的大膽的假設，我對於研究古史的進行也不會這般的快速。要是我發表了第一篇文字之後沒有劉楚賢先生等把我痛駁，我也不會定了周密的計畫而豫備作畢生的研究。要是我不到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服務，沒有歌謠週刊等刊物替我作徵求的機關，我要接近民衆的材料也不會這樣的容易。總括一句，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學來，或是子民先生等不爲學術界開風氣，我的腦髓中雖已播下了辨論古史的種子，但這冊書是決不會有的。

我能承受我的時勢，我敢隨順我的個性，我肯不錯過我的境遇：由這三者的湊合，所以我會得建立這一種主張。

我自己知道，我是一個初進學問界的人。初進學問界的人固然免不了淺陋，但也自有他的驕傲。第一，他能在別人不注意的地方注意，在別人不審量的地方審量。好像一個旅行的人，剛到一處地方，滿目是

新境界，就容易隨處激起興味，生出問題來。至於那地的土著，他們對於一切的東西都接觸慣了，彷彿見聞所及盡是天造地設的一般，什麽也引不起他的思索力了。第二，他敢於用直覺作判斷而不受傳統學說的命令。他因爲對於所見的東西感到興味，所以要隨處討一個了斷；不像學術湛深的人，他知道了種種難處，不敢爲了立一異議，害得自己成了衆矢之的。初生之犢爲什麽不畏虎？正因它初生，還沒有養成畏虎的觀念之故。這固然是不量力，但這一點童稚的勇氣終究是可愛的。我眞快樂：我成了一個旅行的人，一頭初生之犢，有我的新鮮的見解和天眞的膽量。我希望自己時時磨鍊，使得這一點銳猛的精神可以永永保留下去。如果將來我有了豐富的學問之後，還有許多新問題在我的胸中鼓盪，還有獨立的勇氣做我的判斷力的後盾，那麽我總是一個眞有成功的人了！

我的心目中沒有一個偶像，由得我用了活潑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斷，這是使我極高興的。我固然有許多佩服的人，但我所以佩服他們，原爲他們有許多長處，我的理性指導我去效法；並不是願把我的靈魂送給他們，隨他們去擺佈。對今人如此，對古人亦然。惟其沒有偶像，所以也不會用了勢利的眼光去看不占勢力的人物。我在學問上不肯加入任何一家派，不肯用了習慣上的毀譽去壓抑許多說良心話的分子，就是爲此。固然有人說，一個人的思想總是偏的，不偏于甲派便偏于乙派，但我覺得要保持客觀的態度，用平等的眼光去觀察種種不同的派別，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卽使不能完全不偏，總可以勉力使它少偏一點。也有人說，爲學不能不投入家派，正如不能不施用假設，有了假設纔有入手的路，所以家派是終該選定的，儘不

妨恢將來深入之後而棄去。 這種話在以前是可以說的，因爲那時各種學問都不發達，學問的基礎既不建築於事實上，研究學問又苦於沒有好方法，除了投入家派之外得不到一點引路的微光，爲尋求一個下手處計，也有選擇家派的需要。 例如你要非薄詩毛氏學，便當從齊魯韓三家或其中的一家研鑽下去；等到自己的學問足以自樹了，再脫離家派而獨立。 但到了現在，學問潮流已經很明白地詔示我們，應該跳出這個圈子了。 我們自有古文字學，古文法學，古器物學，古歷史學等等直接去整理詩經，毛傳固要不得，就是三家詩也是毛傳的「一丘之貉，」又何嘗要得！ 至於我們爲要瞭解各家派在歷史上的地位，不免要對於家派有所詮釋，但這是研究，不是服從。 我很怕別人看了我表章鄭樵崔述諸人的文字，就說我做了他們的信徒而來反對毛公鄭玄，所以現在在此附帶聲明一句：我對於鄭樵崔述諸人決無私愛；倘若他們的荒謬有類於毛公鄭玄，我的攻擊他們也要和對於毛公鄭玄一樣。 希望讀者諸君看了我的文字也作這等的批判，千萬不要說「承你考辨得很精細，我有所遵循了」這一類話！

老子說「自知者明，」希臘的哲學家多勸人知道自己：在這一方面，我「當仁不讓，」自認爲無愧的。 我既不把別人看作神祕，也同樣的不把自己看作神祕。 我知道我是一個有二重人格的人：在一切世務上，只顯得我的平庸，疲乏，急躁，慌張，優柔寡斷，可以說是完全無用的；但到了研究學問的時候，我的人格便非常强固，有興趣，有宗旨，有鑒別力，有自信力，有鎭定力，有虛心和忍耐：所以我爲發展我的特長計，願意把我的全生命傾注於學問生活之內，不再旁及它種事務。 我知道固有的是非之心的可貴，所以不受習慣的束縛，不

怕社會的威嚇，只憑了搜集到的證據而說話。我知道自己的憑藉，故不願沒卻他人的功績；也知道自己的缺點，故不願徇着一時的意氣。我知道學問是一點一滴地積起來的，一步不走便一步不到，決沒有頓悟的奇蹟，所以肯用我的全力在細磨的工夫上，毫不存徼倖取巧之心。我知道學問是只應問然否而不應問善惡的，所以我要竭力破除功利的成見，用平等的眼光去觀察一切的好東西和壞東西。我知道我所發表的主張大部分是沒有證實的臆測，所以只要以後發見的證據足以變更我的臆測時，我便肯把先前的主張加以修改或推翻，決不勉強迴護。因爲我有了以上種種的自覺，所以我以爲我現在固然學力淺薄，不足以解決多少問題，但我的研究的方法和態度是不錯的，我的假設雖大膽而絕不是輕舉妄動，只要能從此深入，自可馴致於解決之途。

說了上面一段話，或者讀者諸君要疑我是一個傲睨萬狀的人，自滿到極度的。其實我的心中只壓着沉重的痛苦和悲哀。我的個性固然適於研究學問，我的環境固然已經指給我一個研究的新方向，但個性和環境原只是學問的憑藉而不卽是學問的實質。譬如造屋，個性是基礎，環境是梁柱，實質是磚石。雖則有了基礎和梁柱可說具備了屋子的規模，但尤要緊的是砌成牆壁的磚石。倘使四壁洞然，這空架子要它幹麼，翻不如穴居巢處的可以得到簡陋的實用了！我對於實質的要求渴熱已極，可是數年以來只有得到失望。每一回失望之後，心中便留着刀刺一般的痛苦；日子愈久創傷也愈深。我自己知道，我沒有辜負我的個性，只是我的環境太不幫助我了。它只替我開了一個頭，給了我一點鮮味，從此便任我流浪了，飢餓了！

我的學問生活，近年和以前不同的地方，是以前常有把範圍放得極大的要求，現在則畢竟把它收縮，希望集中我的全副精神到幾個問題上面去。但痛苦卽由這方面起來了！其一，許多學問沒有平均發展時，一種學問也要因爲得不到幫助而不能研究好。在現今這般民不聊生的中國，誰能安心從事研究；就是能安心研究也苦於研究的設備的不完全，終於廢然而返。我就是萬分的努力，想在一種學問上創造出一個基礎來，但可以由他種學問幫助的地方也須仍歸自己動手。正如到蠻荒墾殖的人，他的「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的勞力不必說，就是通常的農人可以隨便使用的一切東西他也都得不到。要喝水只得自己掘井；要穿衣只得自己織布；要睡覺只得自己蓋屋。比了住在都市中的人，要什麼有什麼的，固然苦得天高地遠，就是比了掘井蓋屋的土木匠，織布製衣的織工縫工，他們因機械的進步而能得到各種便利的，也是可望而不可卽。所以我的研究，我自己料到是要事倍功半的。我只得廢棄可以不必廢棄的時間到他種研究上，這也做一點，那也做一點，終至造成一個又亂又淺的局面，遠離和理想中的期望相符合。其二，從前人對於學問，眼光太短，道路太窄，只以爲信守高文典冊便是惟一的學問方法。現在知道學問的基礎是要建築於事實上的了，治學的方法是不要信守而要研究的了，驟然把眼光放開，只覺得新材料的繁多亂目，向來不成爲問題的一時都起了問題了。好像久囚於高牆狹弄中的犯人，到處撞頭碰鼻，心境本是很靜謐的，忽然一旦牆垣倒塌，枷鎖也解除，站起一望，只見萬戶千門的游覽不盡，奇花異獸的賞玩無窮，飜要不知道自己的生活該怎樣辦纔好，新境界的喜悅與手足無措的煩悶一時俱來到了。我是一個極富於好奇心的人，一方面

固是要振作意志，勉力把範圍縮小，作深入的研究，一方面又禁不住新材料的眩惑，總想去瞧它一瞧。等到一瞧之後，問題就來了；正在試作這個問題的研究時，別種問題又接二連三的引起來了。不去瞧則實爲難煞，一去瞧又苦無辦法。這眞是使我最感痛苦的一件事。要是研究學問的人多了，我感得到的問題別人也感得到，大家分工去做，我的本分以外的問題就可由他人去解決，我只要把他人研究的結果用來安慰我自己的好奇心就夠了。但在現在這樣的生活之下，又哪裏可以盼望這種境界的實現呢！

上條所述的不能分工治學的煩悶，原是現在中國許多有志學問的人所公同受到的。至於在生活上，我所受的痛苦也特多，約略可作下列的敍述。

我生平最可悲的事情是時間的浪費和社會上對於我的不瞭解的責望。但這應加上一個說明我隨順了自己的興味而費去的時間幷不在浪費之內，因爲這是多少得到益處的。例如買書，看戲，聽鼓詞等等嗜好，當時固然完全爲的是欣賞，但到了現在，在研究上都受用了。就是賭博，喝酒，逛窰子，坐茶館等等，我也都犯過，但這只使我知道大家認爲嗜好的不過是這麽一回事；使我知道這些事情是不足以激起我的興味的，從此再不會受它們的引誘，時間的破費也不是徒然。一個人自幼年到成長原只在徬徨覓路之中：走的路通，就可永遠走下去；走的路不通，也可以不再費力去走。惟其當時肯耗廢覓路的功夫，纔能在日後得到該走的大道。所以只要自己有興味去嘗試，總與自己有益。我在這些事上耗廢的時間，是決不怨的。只有十餘年來在新式學校中過的上課生涯，使得我一想着就要叫屈。學校教員的智識大都是不確實的，他

們自己對於學問也沒有什麼樂趣，使我看着他們十分的不信任，幾乎沒有在課業中得到什麼。中小學時代，我尚未發生愛惜時間的觀念，隨班上課，只是坐待鐘點的完畢。在這熬耐鐘點的時候，逢着放任的教員我就看課外的書，逢着嚴厲的教員我就端坐冥思，上天下地般瞎想。這樣的生活過了多少年，造成了我的神經衰弱的病症，除了極專心讀書作文之外，隨時隨地會得生出許多雜念，精神上永遠沒有安靜。進了大學之後，因爲愛好學問，不由得不愛惜時間。但是教員仍不容我，我恨極了！看我民國初年的筆記，滿幅是這等的牢騷話。我以爲我們所以要有學問，原要順遂自己的情性，審察外界的事物；現在所學的只有一些模糊影響之談，內既非情，外亦非物，爲的只是教員的薪金和學生的文憑，大家假借利用，捱延過多少歲月。他們各有所爲而捱延，卻害苦了眞正願意自己尋求學問的我，把我最主要的光陰在無聊的課堂上消磨掉了！固然我也在學校教育中得到些粗疏的科學觀念，但要得到這一點粗疏的觀念只消自己看幾本科學書，做上幾次實驗也就夠了，何必化去十餘年的大功夫呢！他們在那裏殺青年眞可恨，青年們甘心給他們殺也可鄙！

自從出了學生界，免去了無聊的上課，我總以爲可以由我自己支配時間了，哪知道又不然。現在中國的做事的人不知道爲什麼會得這樣少，在社會上跳動的老是這幾個人；這幾個人似乎是萬能的，樣樣事情都須他們經手。我因爲屢屢受了他人的邀約而發表些文字，姓名爲世所知，所以一般人也以爲我是有意活動的，結合什麼團體，每承招致。我嘗把和我發生關繫的團體（不管是實際的或名義的）寫出一看，竟

有了二十餘個分起類來，有歷史，古物，文學，圖書館，教育，哲學，政治，社會，商業，編輯十種。這眞使我驚駭極了！我一個人如何有這麼多的技能，又如何有這麼强的精力！在社會上活動固然有出鋒頭的樂趣，但我哪裏愛出這種的鋒頭呢。要是我永久這樣的做下去，我的將來的能力至多不過像現在一樣罷了，我的一生也就完了！再想我在社會上是到處退避的，尙有這許多牽掣，那麼，這些自告奮勇的人，他們名下的團體又要有多少？社會上多的是團體，有了團體的名目再從事於分頭拉人。無論拉進的人必不能實心實意地做，就是願意做切實的工作的也要不勝別方面的拉攏，做了一點就停止了。這樣做去，是永久活動而永久得不到結果的。

我感到生命的迫促，人智的短淺，自己在學問上已竭力節縮慾望，更何能爲他人奪去時間，所以要極力擺脫這種漩渦，開會常不到，會費常不繳，祈求別人的見捨。可是時代的襲擊到底避免不盡，我的肩膀上永遠担負着許多不情願的工作。我只得取一點巧，凡是和我有關的事情總使它和自己願意研究的學問發生些聯絡，例如文學方面的要求，我就借此作些民衆藝術的文字應付過去；政治方面的要求，我又作了些歷史的文字應付了。這樣幹去頗有些成效。這二年中，我所以和民俗學特別接近，發表的東西也最多之故，正因我把它與研究所的職務發生關係。研究所中有風俗調查會和歌謠研究會，我便借此自隱了。這當然是很不該的，但我深知道研究與事務的不相容，終不願爲了生計的壓迫而把自己的願望隨人犧牲。只是這樣做去，雖不致完全埋沒了自己，而所做的工作總是「雜零狗碎」的，得到的成績決不是我的意想中

的成功。我心中有許多範圍較廣的問題，要研究出一個結果來，須放下幾個月或幾年的整功夫的，它們老在我的胸膈間亂撞，彷彿發出一種呼聲道「你把我們悶閉了好久了，爲什麼還不放我們出來呢？」我眞是難過極了。所以我常對人說，「你們可憐了我吧！你們再不要教我做事情吧！我就是沒有一絲一毫的職務我自己的事情已經是忙不過來的了！」

我記得幼時常見人圈點一部書（如史記，漢書文選等）圈完了一遍之後買一部新的再圈下去。我很瞧不起這班人的迂拘和遲緩，以爲讀書只要翻翻就是了，照這樣的讀法，一生能彀讀得幾部。那時我的胸中既沒有宗旨也沒有問題，所以看書雖多，時間依然是寬裕的；因時間的寬裕而把學問看得更輕易。現在有了宗旨，許多問題都引起來了，無論看哪種薄薄的書，只覺得裏面有許多是可供舊有問題的研究材料的，有許多是可以發生新問題的。因爲都是有用的材料，都不忍棄去，鈔出既沒有空閒，不鈔出又似乎負上了一筆債，所以我到現在，眞不敢隨便翻動哪一本書，除了我要把它自首至尾讀一遍的。我始迴憶先輩的讀書方法，很想揀出幾部必須精熟的基本書籍，一字一字地讀去細細咀嚼，消化成自己的血肉。可恨現在的時勢只許人發議論而不許人讀書，所謂讀書也只是浮光掠影地翻覽，像我幼年的行徑一般，我懷了正式讀書的願望久久無法使它實現。豈但是讀書呢！我的袖珍筆記冊積了一抽屜了，裏面有許多是見聞所及的鈔撮，有許多是偶然會悟的見解，很有謄入紅格本筆記簿的價值。但是鉛筆的影子已經漸漸地澌滅了，急寫的字體也有許多認不清了，卻還沒有動手鈔寫。我眞悲傷，難道我的過去的努力竟不由得我留下一

些殘影來嗎？

這幾年，社會上知道我有志研究歷史的很多，對於這方面的期求也特別重，許多人屬望我編成一部中國通史。我雖沒有研究普通史的志願，只因沒有普通史，無論什麼歷史問題的研究都不易得到一種憑藉，爲自己研究的便利計，也願意從我的手中整理出一個大概來。我的心中一向有一個歷史問題，渴想借此得一解決，即把這個問題作爲編纂通史的骨幹。這個問題是：中國民族是否確爲衰老，抑尚在少壯？這是很難解決的。中國民族的衰老，似乎早已成爲公認的事實。戰國時，我國的文化固然爲了許多民族的新結合而非常壯健，但到了漢以後便因君主的專制和儒教的壟斷，把它弄得死氣沈沈了。國民的身體大都是很柔弱的；智識的淺陋，感情的淡薄，志氣的卑怯，那一處不足以證明民族的衰老。假使沒有五胡，契丹，女真，蒙古的侵入，使得漢族人得到一點新血液，恐怕漢族也不能苟延到今日了。現在世界各强國劇烈地壓迫我們，他們的文化比我們高，他們再不會像以前的鄰族一般給我們同化；經濟侵略又日益加甚，逼得我們人民的生計困苦到了極端；又因他們的經濟侵略誘起我們許多無謂的內爭，人民死於鋒鏑之下的不計其數：眼看一二百年之中我們便將因窮困和殘殺而滅種了！在這一方面着眼，我們民族眞是衰老已甚，滅亡之期迫在目前，我們只有悲觀，只有坐而待亡。但若換了一種樂觀的眼光看去，原還有許多生路可尋。滿蒙回藏諸族現在還在度漁獵畜牧的生活，可以看作上古時代的人民。就是號稱文明最早的漢族所居的十八省中，苗猺獞㺜等未開化的種族依然很多，明清兩代「改土歸流」至今未盡。這許多的種族還說不

到壯盛，更哪裏說得上衰老。　就是漢族，它的文化雖是衰老，但託了專制時代『禮不下庶人』的福，教育沒有普及，這衰老的文化並沒有和民衆發生多大的關係。　所以我們若單就漢族中的智識階級看他們的思想與生活確免不了衰老的批評，但合了全中國的民族而觀，還只可說幼稚。　現在國勢如此貧弱，實在僅是病的狀態而不是老的狀態。　只要教育家的手腕高超，正可利用了病的狀態來喚起國民的健康的要求。　生計固然困苦，但未經開發的富源正多，要增加生產，享用數千年來遺棄的地利，並不是件難事。　內爭固然繼續不已，但或反足以激動人民參預政治的自覺心，使得他們因切身的利害而起作內部的團結。　（例如四川的民團因軍閥的殘暴而發生，現已力足抵制軍閥。　河南山東的紅槍會也是由於自衛的要求而起，可惜智識太低，以至流於義和團一類的行徑，這是須教育家補救的。）　體質固然衰弱，但教育方法和生育觀念的改變也足以漸漸造成強壯的青年，或者過了幾代之後可以一改舊觀。　因此，在這一方面着眼，只要各民族能彀得到相當的教育，能彀發生自覺的努力，中國的前途終究是有望的。　這真是關係我們的生死存亡的一個最重大的歷史問題。　這個問題究竟如何，非費多年的功夫去研究決不能淸楚知道。　我生丁離亂之際，感觸所及，自然和他人一樣地有志救國；但是我既沒有政治的興趣，又沒有社會活動的才能，我不能和他人合作，我很想就用了這個問題的研究做我的唯一的救國事業，盡我國民一份子的責任。　我在研究別種問題時，都不願與實用發生關係；惟有這一個問題，卻希望供給政治家，教育家，社會改造家的參攷，而獲得一點效果。　至於研究的方法，我很想先就史書，府縣志和家譜中尋取記載的材料，再作各地的旅行，搜集

風俗民情的實際的材料。可是我的生活如不能使我作安定的研究，這個計畫是無從進行的；社會上固然期望；但各地期望而不給我以實現的境遇，也是寫不出結果來的。(前年承沈尹默先生的好意，囑為孔德學校編纂歷史講義，我即想向着這一方面走去；只因諸務忙迫，到今沒有編了多少，很使我悵恨不安。)

我的第二種痛苦是常識的不充足和方法的不熟練。我幼年在翻書中過日子，以為書多自然學富，心中很自滿。二十後讀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在橫通篇中見到以下一節議論：

> 老賈善於販書，舊家富於藏書，好事勇於刻書，皆博雅名流所與把臂入林者也。……然其人不過琴工碑匠，藝術之得接於文雅者耳；所接名流既多，習聞清言名論，而胸無智珠，則道聽塗說，根底之淺陋亦不難窺。周學士長發以此輩人謂之「橫通」，其言奇而確也。……學者陋於見聞，接橫通之議論，已如疾雷之破山，遂使魚目混珠，清濁無別，而其人亦囂然自命，不知其通之出於橫也。……

讀了這一段，自想我的學問正是橫通之流，不覺得汗流浹背。從此想好好地讀書，但我這時只把目錄平議一類書算作我的學問的標的。過了幾年，又使我羞愧了。民國五年的筆記中有一則道：

> 自章實齋以來，學者好言校讎，以為為學始於目錄，故家派流變區以別矣。然目錄者，為學之途徑，非其嚮往之地也。今得其途徑而止，遂謂綱目條最之事足以盡學，而忘其原本，此則猶誦食譜而廢庖廚矣。太炎先生與人書云，「往見鄉先生譚仲修，有子已冠，未通文義，遽以文史校讎二種教之。其後抵掌說莊子天下篇，劉歆諸子略；然不知其義云何。」按，此即任目錄而廢學之弊也。予初誦實

齋通義，即努力求目錄書；得其一句，以為知味。自受業於伯弢先生，頗願為根本之學，以執簡御繁，不因陋就簡。乃校課逼迫，不得專攻；所可致力，仍襲前軌。思之輒汗顏不止。

到這時，我纔真想讀原本書而不再滿足於目錄平議所載的綱要了。但我的心中還沒有生出問題，以為整理國故只要專讀故書好了，若與世界學問打通研究，恐有「古今中外派」的附會的危險。直到近數年，胸中有了無數問題，並且有了研究問題的工作，方始知道學問是沒有界限的，實物和書籍，新學和故書，外國著作和中國撰述，在研究上是不能不打通的。無論研究的問題怎樣微細，總須到渾茫的學海裏去撈摸；而不是浮沈於斷港絕潢之中所可窮其究竟。於是我需要的基本的知識和應用的方法乃大感不足！

我自小學到大學，為了對於教員的不信任，大都沒有用過功。猶記在中學時初學幾何，我不懂得它的用處，問同學，問教員，都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我以為這不過是算學上的一套把戲而已，並沒有實際的需要，就不去注意。到了現在，除了書首的幾條定義還有些影子之外，其餘完全模糊了。他種科學也都這樣，翻開來時有些面善，要去應用時便覺得隔膜。我很想得到二三年工夫，把以前所受的課業統統溫理一遍，因為這些都是不可減少的常識，要在現在時代研究學問是不應不熟習的。外國文我雖讀過四種，只因都不曾出力去讀，也沒有一種讀好。近數年來，我用了極度的勉力，從沒有空閒中硬抽出些時間來自修，結果卻總是「一曝十寒」，沒有多大的效驗。我也想得到二三年工夫，把它讀好兩種。所以我惟一的想望，便是如何可以獲得五六年的閒暇，讓我打好一個學問的根底，然後再作研究，再在文壇上說話。我相信社會

上如要用我，也是讓我在現在時候多讀書比較多做書爲更有益。如果我能夠打好了這個根底，我的研究和主張纔可達到學問界的水平線上，我的學問纔可成爲有本的源泉。像現在這樣，固然也可以發表些研究的成績，但這是唐花窖中烘開來的花，提早的開放只換得頃刻的萎謝罷了。

我雖有這樣的渴望，可是我很明白，這僅僅是我的「單相思」，社會上是不能容許我的。他們只有勸逼我出貨，並不希望我進貨。更質直地說，他們並不是有愛於我，乃是有利於我。他們覺得我到了大學畢業，已經教養得很足夠了，可以供他們的驅使了。一頭騾子，到它成長的時候，就可由畜養它的主人把它駕到大車上，拖煤，拖米，拖磚石，不管有多少重量，只是死命地堆積上去。堆積得太多到拖不動了，也惟有儘力鞭扑；至於它的毛盡見皮，皮開見血，這是使用它的人不瞧見的。直到用盡了它的氣力而倒斃時，纔算完了它的任務。啊！現在的我眞成了一頭拖大車的騾子了嗎？就是不要說得這樣的慘酷，只說社會上推重我，切望我做出些成績來，也好有一比。好比我要從西比利亞鐵道到歐洲去，在海參崴起程時，長途萬里，滿懷的高興，只覺得層雲積雪的壯觀，巴黎倫敦的繁華，都將直奔我的眼底來了。車到赤塔，忽然有許多人蜂擁上車，亂嚷亂挽道，「你的目的地已達到了，請下車罷！」我正要分辨我的行程發軔不久時，已經七手八脚地拖我下去了。我向他們陳述旅行的目的和打斷興趣的煩悶，大家笑道，「你已經出了國了，路走得很遠了，很勞頓了，還是將就些罷！」在這時，試問我的心要悲苦到怎樣？

年來稱我爲「學者」的很多。我對於這個稱謂決不辭讓，因爲它可以用來稱有學的人，也可以用來

稱初學的人初學是我的現在，有學是我的希望中的將來，他們用了這個名詞來稱我，確是我的知己（縱然在現今看學者與名流政客等字樣同爲含有貶意的時候。）但他們稱贊我的學問已經成就，這便使我起了芒刺在背的不安，身被文繡而牽入太廟的觳觫。我知道，若把我與漢代經師相較，我的學問確已比了他們高出了若干倍。可是小學的及格不即是大學的及格，我們正要把一時代的人物還給一時代，猶之應把某等學校的學生還給某等學校，不該攤平了看。漢代的劉向鄭玄一流人，現在看來固甚淺陋，而在當時的極淺陋的學術社會中確可以算做成就了。至於在二十世紀的學問界上，則自有二十世紀的成就的水平線，決不是像我這樣的人所能濫竽充數。惟其我要努力達到水平線上，所以我希望打好我的智識的根底而從事於正式的研究。若在現在時候即說我已經成就，固然是一番獎勵的好意，但阻止我的發展，其結果將與使用我拖大車的相同，所以這個好意我是不願領受的。

我常說我們要用科學方法去整理國故，人家也就稱許我用了科學方法而整理國故。倘使問我科學方法究竟怎樣，恐怕我所實知的遠不及我所標榜的。我屢次問自己，「你所得到的科學方法到底有多少條基本信條？」靜中溫尋舊事，就現出二十年來所積下的幾個不可磨滅的印象。十二三歲時，我曾買了幾部動物植物的表解，覺得它們分別種類的清楚，舉出特徵和形象的細密，都是很可愛的。進了小學，讀博物理化混合編纂的理科教科書，轉嫌它的淩亂。時有友人肄業中學，在他那邊見到中學的鑛物學講義，分別鑛物的硬度十分明白，我雖想不出硬度的數目字是如何算出來的，但頗愛它排列材料的齊整，就借來鈔

錄了。進了中學，在化學堂上，知道要辨別一種東西的原質，須用它種原質去試驗它的反應，然後從各種不同的反應上去判定它。後來進了大學，讀名學教科書，知道惟有用歸納的方法可以增進新知；又知道科學的基礎完全建設於假設上，只要從假設去尋求證據，更從證據去修改假設，日益演進，自可日益近真。後來聽了適之先生的課，知道研究歷史的方法在於尋求一件事情的前後左右的關係，不把它看作突然出現的。老實說，我的腦筋中印象最深的科學方法不過如此而已。我先把世界上的事物看成許多散亂的材料，再用了這些零碎的科學方法實施于各種散亂的材料上，就歡喜分析，分類，比較，試驗，尋求因果，更敢於作歸納，立假設，搜集證成假設的證據而發表新主張。如果傲慢地說，這些新主張也可以算得受過科學的洗禮了。但是我常常自己疑惑：科學方法是這般簡單的嗎？只消有幾個零碎的印象就不妨到處應用的嗎？在這種種疑問之下，我總沒有作肯定的回答的自信力。因此，我很想得到些閒暇，把現代科學家所用的方法，弘綱細則，根本地審量一下，更將這審量的結果把自己的思想和作品加以嚴格的批判，使得我真能用了科學方法去作研究而不僅僅是標榜一句空話。

我在幼時，讀了孔孟書和新民叢報一類文字，很期望自己作一個政治家，後來又因興趣的擴張和變遷而想治文學和哲學。哪裏知道到了近數年，會得發見我的性情竟與科學最近！我最是自己奇怪的，是我的愛好真理的熱心和對於工作的不厭不倦的興味。中國的學問雖說積了二三千年沒有斷，可是紛亂萬狀，要得到確實的認識非常困難。我今日從事研究整理，好似到了造紙廠中做揀理破布敗紙的工作，又多，

又臭，又髒，又亂，又因揀理的傢伙不完備，到處勞着一雙手。但是我決不厭惡，也決不灰心，我只照準了我的理想的計畫而進行。所吃虧的只是自己的技能不充足，才力受限制，常感到眼高手低的痛苦。如果我的技能能殼修習得好，使得它可以和我的才力相應合，我自信我的成就是決不會淺薄的。

我的第三件痛苦是生計的艱窘。我沒有金錢的癖好，薪金的數目本來不放在我的心上。我到北京來任事，也明知在欠薪局面之下，生計是不安的；只爲要滿足我的學問的嗜好，所以寧可投入淡泊的生活。但近年以來，中央政府的財政已陷絕境，政費屢屢數月不發，就是發出也是「一成二二成三」這般敷衍，連淡泊的生活也維持不下了。以前學生時代，我向祖母和父親乞得些錢鈔，常常到書肆裏翻弄；哪知道現在自己有了職業，反而失去了這個福分。在研究上，有許多應備的參考書，但沒有法子可以得到。例如二十四史，是研究歷史的人何等切要的工具，以前我不能買全部，尚可搜羅些零種，現在連零種也不許問津了。有許多急需的書，熬到不可熬時，也只有託人去買，因爲免得見了他種可愛的書而不能買時，害苦了我的心。有許多地方在研究上是應該去的，但也沒有旅行的能力。不必說遼遠的長安，敦煌，于闐諸處，就是我研究孟姜女故事，山海關和徐水縣兩處都是近畿的這件故事的中心，並且是京奉京漢兩線經過的，大約有了四五十元也儘夠作調查費了，可憐想了一年半，還只是一個空想！

爲了生計的不安定，要什麼沒有什麼，一方面又受家人的譴謫，逼得極好學的我也不能安心治學。有時到了十分困苦之境，不免想作了文稿出賣，因爲我年來得了些虛名，稿子確也賣得出去，在這一方面未始

不可救一點急。但一動筆時，又使我懊喪了。我覺得學問原是我的嗜好，我應當尊重它，不該把它壓做了我的生計的奴僕，以至有不忠實的傾向而生內疚。然而學問的忠實談何容易，哪能限定了一天寫幾千字，把生計靠在上面。與其對於學問負疚，還不如熬着困苦：這是我的意志的最後的決定。所以我雖困窮到了極端，賣稿的事情卻始終沒有做過幾回。賣稿且如此，要我去講敷衍應酬，鑽營職務，當然益發沒有這種的興會了。來日大難，或者要『索我于枯魚之肆』吧？

我記得我的幼年，因頑強而爲長者所斥責，他們常說，『你現在的脾氣這等不好，將來大了，看你如何可以吃人家的飯！』到二十歲左右時，我初見到社會上種種杌隉不安的現象，初知道個人的適存於社會的艱難，又讀了些老莊的書，知道天眞與人事的不相容，就很肯屈抑自己，對人裝像一個鄉愿。向來說我固執的親族長者一時也稱譽道，『頡剛很隨俗了！』哪知道現在又抑不住我的本性了，只覺得必須從我的才性上建設的事業纔是我的眞實的事業，我只應當受自己的支配於事業的工作上，若遷就了別人就是自己的墮落。無論怎樣受生計的逼迫，只是不能溶解我的堅硬的癖性。看來我的長者斥責我的話是要應驗的了！

我的第四件痛苦是生活的枯燥。我在社會裏面，自己知道是一個很枯燥的人，既不能和人敷衍，也不能和人爭鬥。又感到人事的複雜，自己知識的渺小，覺得對於任何事件都不配作批評，因此我處處不敢發表自己的主張。要我呼斥一個僕人，和強迫我信從一個古人一樣的困難。到了交際場中，又因與日常的

生活不同，感到四圍空氣的緊張，自己既局促着轅下之駒，又怕他人因了我的局促而有殺風景之感。看着許多人在我的面前活動，只覺得他們的漂亮，伶俐，劈脫，強健，豪爽的可羨，更感到自己的乾枯，寂寞，沈鬱，拘謹的可厭，像一枚猢猻子的可厭。我自己知道，我的處世的才能是愈弄愈薄弱了。這種在舊教育之下和長日的書房生活之中壓迫而成的習慣，恐怕已是改不掉的；並且這種習慣和我的學問事業不生關係，也沒有立志痛改的必要。我所悲感的，是我的內心生活也漸漸地有乾涸的傾向了。

許多人看了我的外表，以為我是一個沒有嗜慾的人，每每戲以「道學家」相呼。但我自己認識自己，我是一個多慾的人，而且是一個敢於縱慾的人。我對於自然之美和人為之美沒有一種不愛好。我的工作跟着我的興味走，我的興味又跟着我所受的美感走。我所以特別愛好學問，只因學問中有真實的美感，可以生出我的豐富的興味之故。反過來說，我的不信任教師和古代的偶像，也就因為他們的本身不能給我以美感，從真理的愛好上不覺地激發了我的攻擊的勇氣。但一株樹木的榮茂，須有蔓延廣遠的根荄。以前我對於山水，書畫，文辭，音樂，戲劇，屋宇的裝飾等等的嗜好，就是許多條根荄，滋養着我的學問生活的本幹的。我對於民俗的理解力固然甚淺，但在向來沒有人理會之中能夠闢出這一條新路，實在就是無意中培發出來的一點成績。我說這句話，並不是說凡是我所欣賞的都要在裏邊得到實效，我很知道挾了受用的心思而作的欣賞決不能成為真的欣賞。我的意思，不過要借此說明不求實效的結果自能醞釀出一些成績來，這些成績便不是在實效的目標之下所能得到的而已。所以我們若要有偉大精美的創造，必須任着

作者隨了自己的嗜慾和興會而發展，愈不求實效愈可得着料想不到的實效。

但是我很可憐，從前的嗜慾現在一件一件地衰落了。去年一年中，我沒有到過一個新地方音樂場和戲園子總共不過去了四五次，又是受着友人的邀約的。家裏挂的書畫，以前一星期總要換一次，現在挂了兩年還沒有更動，成了照例文章，把欣賞美術的意味完全失去了。從前喜歡隨便翻書，每于無意中得到會心之樂，近來不是爲了研究的參攷竟不觸手了。要說好，也是好，因爲我的精力集中到學問上，在學問上又集中到那幾科，以至那幾個問題。但我敢說嗜好的衰落決不是我的幸福。再用樹來比喻。我們要使得一株樹木增高，自然削去旁逸斜出的枝條是唯一的辦法；但稍加芟削則可，若統統斬去，把它削成了電桿一般細長的東西，無論在事實上不會生存，就使生存了也是何等可怕的一件東西呵！我自己知道，我並不是一個沒有情趣的人，我年紀雖過了三十，但還保存得青年的豪興，向日徘徊留戀的美感也沒有喪失分毫。只是事情忙了，胸中的問題既驅迫我走遙遠的程途，社會上又把許多負担壓積到我的肩上。以前沒有目的的人生忽地指出目的來了，以前優游自得的身子又猛被社會拉去作苦工了；愈走愈難，愈担愈重，我除了我的職務之外再不能分出餘力到我所愛好的東西上去了。於是我的生趣日趨於枯燥，遂成爲不可避免的事實！

我現在忙得眞苦！我也知道，我的事務的種類並不比別人多，只是做成一件事情要求愜心的不容易。別人半天可以做完的事情，我往往遷延到五六天。要草寫一篇文字，總得作多少日子的醞釀。朋友們探

復的不答，來信的不覆，以至過了一年半載而作罷，成了很平常的事。 我的大女兒住在校裏，屢屢寫信歸來，說，「請爹爹給我一封信罷！」我雖是心中很不忍，但到底沒有依她的請求。 二女兒寫好一張字帖，要我加上幾圈，我連忙搖手道「送給你的母親去罷！」 我的忙甚至使我對於子女的疼愛之心也丟了，這真太可憐了： 記得以前與友人下五子棋，十局中輸了九局。 他道，「我看準了你的短處了！你不肯下一個閒空的棋子，所以常常走入死路，不能作靈活的運用。」 我自想我的現在的生活頗有些像我的下棋了，因為一些時間不肯輕易讓它空過，過於務實，以至生活的趣味、盡失。 文化原是在閒暇中養成的，像我這種追不及待的生活只配作一個機械性的工匠，如何可以在學林藝海之中嘯吟容與，認識宇宙的偉大呢。 精神方面既因此而受損害，使得我的思想漸窒實，眼光漸鈍短，身體方面也是同樣的傷壞。 我現在除了讀書作文頗能鎮定之外，無論做什麼事情，髣髴背後有人追趕着，越做越要快，以至心跳心悸。 照這樣下去，或者草書可以不用練習而自然名家，長途競走也可以考上第一。 假使我能夠準了鐘點作事，此心原可安定得多；無如別人沒有定時作事的觀念，遂害得我不能畫出作事的定時。 我正在從事工作時，忽然人事來了，別人看得時間是很輕的，他們把我的時間隨便浪費了。 我只要一起了愛惜光陰之念，立刻心宕。 回到工作時，就刺促不寧了。 因為這樣，所以幾乎沒有一天的日子不短，沒有一天的工作不欠，沒有一天的心情不悲傷。 但這有什麼法子可以得到別人的原諒呢？ 沒有法子，只得把應該游息的時間也改隸到工作之下。 從此以後，我就終年沒有空閒了。 有時在室內蹲伏了數天，走到街上，只覺得太陽亮得耀眼，空氣的清新彷彿到了山

頂。 這類境界，在做專門研究的時候固然是逃不了的，但永久處於這種生活之下終不是個辦法。 我很想得到一種秩序的生活，一天總是工作幾小時，游息幾小時，不多也不少，像小孩子的食物一樣的調勻，使得我可以作順適的成長。 但在現在的社會之下，這個希望能超過了空想嗎！

以上幾種痛苦，時時侵襲我的心，掣住我的肘，我眞是十分的怨望。 我要忠實於自己的生命，則爲社會所不容，若要改作委蛇的生存，又爲內心所不許：這眞是無可奈何的了！ 我自己覺得，我有這一點粗略的科學觀念，有這一點堅定的志願和不畏難的勇氣，我的眼下有許多新問題，我的胸中沒有一個偶像，在現在輕忽學問的中國社會上，我已是一個很難得的人，我所負的責任是很重的。 社會上固然給我以種種的挫折，但是我竟不能用了我的熱情打出一個學問的地位來嗎！ 我將用盡我的力量於掙扎奮鬥之中，爲後來人開出一條大道！ 就是用盡了我的力量而到底打不出一條小徑，也要終其身於呼號之中，希望激起後來人的同情而有奮鬥的繼續者！

我的作文本來就有「下筆不能自休」的毛病，近數年尤甚。 我讀別人做的文字雖也覺得含蓄的有味，但自己作文總須說盡了纔痛快。 這篇序文的起草，適在北方軍事緊張之際，北京長日處於恐怖的空氣之中：上午看飛機投彈，晚上則飽聽砲聲。 我的寓所在北海與景山之間，高聳的峯和塔平時頗喜其風景的秀美，到這時竟成了飛機投彈的目標。 當彈丸落到北海的時候，池中碧水激涌得像白塔一般的高，我家的

窗檻也像地震一般的振動了。每天飛機來到時，大家只覺得死神在自己的頭上盤旋不去。家人驚恐之餘，連水缸蓋和門戶的開闔的聲浪也變成了彈聲礮聲的幻覺。等到礮聲停止之後，市上更加寂靜了，普通舖戶都是『清理賬目，』飯店酒館又是『修理爐灶，』闊氣一點的舖子則是『鐵門有電，』比了陰曆元旦的歇業還要整齊。北京大學的薪金，這兩個多月之中只領到一個月的一成五厘，而且不知道再領幾成時要在哪一月了。友朋相見，大家只有皺眉嗟歎，或者竟要淚隨聲下。在這又危險又困窮的境界裏，和我有關係的活動一時都停止了；就是印刷所中也因交通斷絕，紙張缺乏，不來向我催稿子。我樂得其所，終日埋頭在書房裏，一天一天的從容不迫地做下去，心中想到什麼就寫什麼，實足寫了兩個月，成了這篇長文——我有生以來的最長最暢的文。胸中鬱勃之氣借此一吐，很使我高興。我妻在旁邊笑道，『你這篇文字不成爲序文了！一篇古史辨的序，如何海闊天空說得這樣的遠？』但我的意思原要借了這篇序文說明我的研究古史的方法和我所以有這種主張的原因，一件事實是不會孤立的，要明瞭各方面的關係不得不牽涉到無數事實上去；至於體裁上像不像序，這是不成問題的，因爲我原不想作文學的文章（其實就是文學的文章，也何嘗不可隨了作者的意念而改變體裁）。

這冊書於去年九月中付印，本來在一二個月內可以出版，只爲臨時增加了些篇幅，延至本年二月中方將本文印完。又因等待這篇序文，再延了兩個月，假使沒有樸社同人的寬容，是決不會聽我如此紆徐的。我敬對於社中同人致謝！

末了，我再向讀者諸君嘮叨幾句話。第一，這書的性質是討論的而不是論定的，裏面儘多錯誤的議論（例如古今偽書考跋中說清代無疑儀禮者，又如與玄同先生信中說今文家詐依了章學誠易教的話，孔子若制禮便爲僭竊王章。）現在爲保存討論的真相計，不加改正。希望出版之後，大家切切實實地給以批判，不要輕易見信。第二，古史的研究現在剛纔開頭，要得到一個總結論不知在何年。我個人的工作，不過在辨證偽古史方面有些主張，並不是把古史作全盤的整理，更不是已把古史討論出結果來。希望大家對於我，能彀知道我的學問的實際，不要作過度的責望。第三，我這本書和這篇序文中提出了多少待解決的問題。像我這般事忙學淺的人，不知道什麼時候纔可把這些問題得到一個約略的解決，說不定到我的生命終止時還有許多現在提出的問題不曾着手。讀者諸君中如有和我表同情，感到這些問題確有研究的價值的，請便自己動手做去。總結一句話，我不願意在一種學問草創的時候收得許多盲從的信徒，我只願意因了這書的出版而得到許多忠實於自己的思想，敢用自力去進展的諍友。

顧頡剛。

十五年一月十二日始草，四月二十日草畢。

古史辨第一冊目錄

卷頭語

自序

目錄

中編（起民國十二年二月，訖十三年二月）

古史辨第一冊上編

一 詢姚際恒著述書

頡剛.

你的清籍考內沒有姚際恒。此人亦是一個狠大胆的人。我想尋求他的九經通論不知此書有何版本？你若知道請你告我

適。

二 答書

適之先生

姚立方的遺書，這兩星期隨處留心，總得不到什麼，惟有浙江通志的經籍門裏有一條卻狠重要：

「九經通論一百七十卷仁和姚際恆立方撰：存眞類一百三十五卷，別僞類二十八卷」（按兩類相加只一百六十三卷，未知孰誤）

浙志別條都把鈔輯的原書名引上，惟有這條沒有，可見各家書目都未經著錄。說浙志引他的傳文罷，然儒林文苑傳裏卻沒有。最奇怪的，既引了九經通論，復從經義攷裏輯下古文尚書別僞例，放在尚書類中，既爲重複，且「別僞類」和「別僞例」的名詞也參差，連「仁和」「錢塘」的籍貫也不一致。可見編輯浙志的人也沒有看見他的書，不過恰巧徵引到罷了。從所載的卷數上看，存眞類既有這許多，想竟是把經文統統注釋一過的。（按僞書攷記通論卷數，有易傳通論六卷，古文尚書通論十卷，周禮通論十卷。）

安徽通志也翻過了，別的都沒有，只有金石僞書攷一種。這卻未之前聞，而且名詞看來很不順，疑心「金石」兩字是由「今古」傳訛的。如果如此，修安徽志的人也全沒有見到他的書籍。

好古堂書畫記已從讀畫齋叢書裏看得了。書前有二段識語，錄如下：

「玩物喪志」一語，出僞古文尚書旅獒篇。其云「玩人喪德，玩物喪志，」物對人言，蓋指犬馬之類也。自後人誤以書畫古器目爲玩物，而或者遂執此語以相禁戒。不知伏羲畫卦，書之始也，帝舜十二章，畫之始也：二者正吾儒所宜究心。故古之小學，即是學書而繪事亦見於聖言，在所不廢。至若從古流傳玉銅諸器，多詩，書，禮諸經所載，必藉此得以考古人制器尚象之意，尤不可爲學問以外事也。此與才人文士風流鑒賞者又迥別。若夫富貴貪婪，目不知書而亦事此，此直好貨耳，更不足論焉。

好古始於虞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則知十二章非創自虞廷。嗣是莫盛於周。中庸稱「

武王周公陳其宗器，則文王以上歷世有寶藏重器可知。至於成王，不惟以赤刀，弘璧，天球，河圖爲寶，卽古人之鼓，戈，弓，矢之屬亦盡羅爲珍異，更可見矣。

康熙己卯記。以前散去者甚多，不錄；以後散去者亦在焉。

由上面的一篇序，可見姚君對於經傳非全持懷疑態度的，故堯典、中庸並皆信爲實錄。他所辨的僞，只是著作人的僞，不是著作內容的僞——徵事的確實與否。

姚君的家世雖是無從知道，但看他書畫記成了兩卷，宋元明名蹟無數，可見是個富家。再揣測下去，因爲是個富家，所以可以不出來應試，不與人交遊。因爲不應試，所以他的籍貫大家都不甚曉得清楚。因爲不與人交遊——記得閻潛邱年譜裏有『閉戶十餘年』之語；現在流傳下來的僞書攷及書畫記也都沒有別人的序跋，——所以他的名氣不廣。再可以看見他的原籍雖是新安，卻終身住在杭州，所以經義攷及浙江通志竟直以他爲杭州人。

浙江採進遺書錄也查過，他的著述一本都沒有，所以四庫全書裏也不見。假使那時把九經通論採進，卽不著錄，也要有個存目。

他在書畫記的序裏，雖是說了『制器尙象』等語，但是他的書裏卻全是『風流鑒賞』的話。他家裏臧的書畫眞多，要去臚列起來，又是一個文華殿。

寫完了上幾紙，更想起兩件事.

(一)他的古今僞書攷，刻在知不足齋叢書裏。知不足齋的鮑廷博，是徽州人而常在浙江的，與他的行踪差不多，所以得了他的書。

(二)刻他書畫記的顧菉厓，是和鮑廷博交好的。讀畫齋叢書裏有許多書，都是從鮑氏那裏取來的。這本書雖未說明，大概也是鮑氏所藏。

姚君之文質朴至極；看他書畫記及僞書攷兩序可知；由此可以推定他的性情。

學生顧頡剛。九，十一，二十三。

上兩星期，適之先生有信來，詢及姚際恆著述。我當時匆匆回了一信，舉四庫雜家類存目中庸言錄提要，及經義攷中古文尚書別僞例二條相答。我說四庫提要裏說他『生於國朝初，多從諸耆宿游，故往往剽其緒論。其說經也，如闢圖書之僞則本之黃宗羲，闢古文尚書之僞則本之閻若璩，闢周禮之僞則本之萬斯同，論小學之爲書數則本之毛奇齡，而持論彌加恣肆。至祖歐陽修趙汝楳之說，以周易十翼爲僞書，則尤橫矣』；既可見清初的學風，復可見姚君是個辨僞書的集大成者。又說在各處的書目裏從沒有見他的九經通論，這一部書恐怕已經佚去。

隔了幾天，我到適之先生處，先生說四庫提要實在冤枉了他，因拿張穆做的閻潛邱年譜給我看，乃知閻若璩到杭州去看他，並引他的說話到尚書古文疏證裏去，並不是姚去剽襲閻。其他諸經，想也一

例。

適之先生又說同治間雲南方玉潤做的詩經原始（鴻濛室叢書之一）裏引他的詩經通論很多，可見這書沒有佚，想託琉璃廠書肆去找。

二十三夜又記。

三　囑點讀僞書攷書

頡剛兄：

謝謝你的信。

你為姚際恆費了那麼多的精力，使我不安。但我知道你對於這種事的興趣是最濃厚的，故也不阻止你。

他的書畫記，我也在讀畫齋叢書裏見過了。當時我也覺得他收藏的書畫之多，眞可使人駭異！

你在浙江通志鈔出的一條確是非常重要，因為我們因此可以知道九經通論是多大一部書。我已叫北京的隆福寺和琉璃廠兩處的書店『大索』此書了。看他們的手段如何。他們能替我找到一部八不知有刻本的文木山房集，也許能尋着此書。

我對於此二書（九經通論與庸言錄）並不絕望。因為四庫館的諸臣能知姚氏所攻擊的諸書，大概乾隆時此書還在；又方玉潤的詩經原始每章詳引姚氏的詩經通論，是此書至同治時猶存。你看是嗎？

知不足齋叢書，我新買了一部。我想先把古今僞書攷抽出，點讀一遍，做一個序，先行付印。將來我想做一部古今僞書續攷，單獨付印。這也是掃除舊汚的一個辦法。

若你能任點讀的事，就更妙了。不必急急，每天點兩三頁便夠了。

你若點讀僞書攷，再加上一點補綴，——如尚書及周禮等，——我定可担任尋出版者。此書版權即歸你，我可以保他必銷售也是你工讀的一個好法子，並且於後學有益。請你想想。

或者我們可以計畫一個小小的『國故叢書』。用新式標點翻刻舊書，如經傳釋詞，古書疑義舉例，國故論衡等等。你很可以做這件事。我可以略幫忙。

適。

九，十一，二十四日

四　答書

適之先生：

點讀僞書攷，這件事很易。大概至慢也不過二十天。不過先生說再加上一點補綴，我看可以不必。因爲一則失了他原來的面目，二則也補不盡；補，如果只補幾段，反覺得挂一漏萬。我想先生要做僞書攷，不必做他的續攷，簡直可以拿他所攷的重攷一攷。

『僞書』的名目，我覺得不能賅括一切，所以我今年上半年擬的書目表稱做『僞書疑書目』，因爲有

許多書只是存疑並非作僞。

我在民國三年的春天借鈔了一本僞書攷，鈔完了做了一篇跋。今鈔錄奉上，請指正。

學生顧頡剛 九，十一，二十四。

附古今僞書攷跋

右古今僞書攷一卷。宣統己酉歲，始見於孫伯南先生架上。去年在京中刻意求之不能得，遂借自孫先生手錄焉。是書始刊於知不足齋叢書；先生所藏爲光緒十八年秋浙江書局單行本。浙局是刻，板本甚劣，譌謬爲繁。今就其可正者正之，他日得善本，當重校。

書無序跋，並不記年。姚君行事，他書亦難徵考。覘其引據書說及錢牧齋顧甯人而止，則是清康雍間人。蓋山谷含章之士，不求令聞於世俗者，可決也。

尋索所箸，於易傳條曰，『予別有易傳通論六卷』；於古文尚書條曰，『予別有通論十卷』；於大戴禮條曰，『予前作古文尚書通論，其中辨大戴禮非本書，乃後人之僞』；於周禮條曰，『予別有通論十卷』；於孝經條曰，『予著通論止九經，其別僞類不及孝經』；於眞書雜僞類曰，『經則禮記，儀禮有之，並詳本書』：知通論之作至爲博洽，抉擇必甚精。因有通論，故此考中易書禮皆不著言辭。然通論無傳本，可求檢各家目錄亦不載，其已佚乎？

夫古文尚書之僞，梅君而後，百詩，松崖，懋堂，艮庭辨說明矣。周禮郎見攻於晚近。而易傳，儀禮則終清一代蓋無疑者。使姚君通論而在，必有以廣吾異聞。今但從此考得鱗爪，名之不沒亦僅賴此，其傳其不傳豈姚君之意乎！

是書一卷，頗類隨手劄記，非有意箸述之林，故文筆疏散。其論辨多采前人成說，自漢志，隋書而下，唐之柳子厚，宋之晁子止，陳直齋，明之宋景濂，胡元瑞，並多攝取，而以晁陳爲最多。或微折衷，不盡證實，弗能謂博識無遺也。

其缺而未舉者，在『經』，有書序，周易舉正，乾元序制記，論語筆解，六經奧論諸書。在『史』，有聖賢羣輔錄，五孝傳，卓異記諸書。在『子』，有孟子外書，鄧析子，燕丹子，靈棋經，道德指歸論，老子河上公注，莊子郭注，羣書治要，家山圖書，搜神記，述異記諸書。至於醫藥術數之籍，不可勝計。若『眞書雜僞』，則有朱子通鑑綱目；『兩箸併名』，則有高誘戰國策注；在姚氏成書後，則有日本刻古文孝經孔傳，今文孝經鄭氏注。如此諸類，並可補論，勿求備於此書已。

若其編次，余竊有議。以忠經入經，以天祿閣外史入史，得毋但觀其名歟？於文中子，既從擇璺錄證王通之有其人，又曰『通耶？郊畤耶？逸耶？吾不得而知之』，則是『未足定其箸書之人』也。於詩序，既從後漢書證爲衞宏所作，又曰『非僞書而實亦同於僞書也』；於杜律虞注，既從楊用修言謂爲張伯成作，後人嫁名于伯生，又曰『伯生集有杜詩纂例序一篇，想以此訛爲伯生耶』：則二書者，是『本非僞

書而後人妄託其人之名」也。於乾鑿度曰「宋人掇拾類書而成」；於竹書紀年曰「予於紀年以爲後人增改」；於李衞公問對明非阮逸僞書而曰「今世傳者當時神宗時所定而彼所定實采通典」：則三書者是「眞書雜以僞」也。今輒與僞書同列，不亦過歟？於商子采周說曰「其精確切要處史記列傳包括已盡，凡史記所不載往往爲書者所附會」；於賈誼新書采陳說曰「多錄漢書語其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也」：其言相同，而商子爲僞，新書爲眞，則不足以服人矣。於脈訣曰「稱晉王叔和撰，晁氏謂後人依託」；於金匱玉函經曰「此非仲景撰，乃後人依託者」：其書亦同而脈訣爲僞，玉函爲眞，則又不足以服人矣。孫子一書反覆無證驗則宜與鬻子，鬼谷並在僞書，而獨入之「未定其人」，豈爲當乎！陰符經卽爲寇謙之作，而七賢注塗抹已遍，蓋爲僞託自傳其書，卽有其注，豈猶得列於眞書耶！於文子但曰「不全僞」，而其所以不全僞者不言焉；於列子，但曰「意戰國時本有其書」，而其所以本有其書者不言焉：而文子列子遂非僞書矣。若晏子春秋與管子同裁，素問本草與山海經並軌，而眞僞輒大別，何隨情抑揚之甚也！——此皆分類舛駁之可議者也。

若其論辨，謂列子云「『西方聖人』，直指佛氏，屬明帝後人所附益」，則詩書「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將何以解焉？謂管子云「『春秋所以紀成敗』，當未見春秋也」，則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春秋，司馬侯薦羊舌肸曰「習於春秋」，又將何以解焉？——此皆論辨舛駁之可議者也。

蓋嘗論之，其病有二。一以文辭之工拙定眞僞，故文列爲眞而鶡冠，公孫龍爲僞。則以後世箸

識之成法隱括古籍，故黃帝素問，神農本草，晏子春秋胥入僞書。姚君抑亦未深思乎？昔人筆記，謂君抨擊孝經，殆過激。予謂此考最精之言莫孝經條若。他條皆依附人說，發明者鮮矣。

論僞書者予最服膺胥爲。竊取其言，分爲七類，非可以僞書包也：——

一曰『師說。』——聖人制作，守於官司；及周末文勝，軼爲百家。口耳之學不能無差，則著於竹帛以授之其人，所以求傳習之廣焉。是以羲農黃帝之書雜出於戰國，連類於漢魏。其後有卓越之人，爲衆宗仰，法度猶傳，筆札未錄，則知之者亦述之而仍其人。此正古人著公之旨，不必以誠僞規度者也。如素問，本草，山海經，周髀算經，易傳，三禮，難經，星經，雖有僞附，又不能定其著書之人，然終不當與虛造者等視。今四庫所著錄，諸家書目所臚列，醫藥術數之書獨多依託，良由此等學說不憑書籍以傳耳。

二曰『後記。』——管子述死後事，韓非載李斯駁議：蓋古人書無私箸，大出後學綴輯，雖有不倫，無乖傳信。故管子，晏子，不可謂之爲書，猶春秋公羊傳成於高孫壽，尚書大傳錄於張生歐陽生也。論其體例，與上類頗同；惟上在記學，學則雖遠無弗賅，縱法言多疏，師承非可悉求，亦以意聯貫爲之；此在記事，事則年代不能逾，言行不能虛構：所以異也。

三曰『挾持。』——或蹈偶視之名，或襲散見之語。是故，因倚相而有三墳；因老傳而有關尹；賈生𩦎賦，遂作鶡冠；列子夸言，因成穆傳：其附託巧而心日拙矣。章曰，『劉炫之連山，梅賾之古文尚書，

應詔入獻，將以求祿利也。 夫墳典既亡，而作偽者之搜輯補苴未必無什一之存。 如古文之搜輯逸書，散於記傳者幾無遺漏。 六朝古書不甚散亡，採輯之功必易為力。 計不出此，藉以作偽，豈不惜哉！」 是故薛據作偽，則亦王肅也；江聲作偽，則亦梅賾也。 然而一存補逸之功，一有亂古之罪者，操術不可不慎也。——此偽託古昔者也。

四曰『假重。』——名賢之作，為世寶貴；苟有一籍之傳，奚止十縑之價。 故小學推晦庵，政經題西山，杜解歸子瞻，潛虛屬君實。——此偽託近世者也。

凡茲二類，胥實齋所謂奸利。 『欺於朝則得祿位，欺於市足恣壟斷：』心術之蔽，有如是哉！

五曰『好事。』——蓋體同於擬作，心在乎炫奇。 弄數十之愚人，戲千年之古子。 脫略不羈，風流自賞。 明豐坊姚士粦，遺儻其人乎！ 又或心懷憤激，輒欲誣陷嫁禍，僧孺行紀，聖俞碧雲騢作焉。

六曰『攘奪。』——前此數類皆自作之而以偽人，此則竊人之言以為己有，於諸書中品最下矣。 章曰，『竊人之美，等於竊財之盜，老氏言之，斷斷如也。 譚峭竊化書於齊邱，郭象竊莊子於向秀，作者有知，不能不恫心於竊之者。 蓋穿窬胠篋之智必有竄易更張，以就其掩著而失其本旨也。 不知言公之旨而欲自利以為功，大道廢而心術不可問矣！』 予謂晉代古籍大明，所不著者必已弗傳，而采輯諸書逸文，則有玉函五百餘種，抱經，平津，問經，別下，心齋，魯山百餘種，粲然畢陳，欲偽古者已無從措手，挾持好事之途庶幾可絕。 獨攘奪則劇於前古，往往萬目昭昭，而攫金者咸攘臂於市。 舉國化之，

恬不爲怪。其能寬易更張，蓋猶絕少。廉恥道喪，遂令王儉阮逸宜負美譏，悲哉！

七曰『誤會』——本非僞書，後人迷不能辨，遂沿傳爲僞作。舉凡姚君所謂有後人妄託其人之名者，有兩人共此一書名，今傳者不知爲何人作者，有未足定其著書之人者，皆是也。

予素謂目錄雖分體類，亦宜判別時期。今觀於僞書，輒意出於漢魏間者當與唐宋而下異其等差，則比次而觀，亦可以識學風之所趨矣。

予又謂孝經本僞書，使入之禮記，明標秦漢儒者所作，則不可謂僞。中庸非僞書，自程氏以爲子思憂道學失傳而作，則與詩序亦同。又列子雜采道緯，同於亢桑之僞；易林誤題焦贛，同於爾雅之誣。姚君所列，亦爲不倫。

予於學問，猶盲瞽不能識別。他日讀書稍多，頗爲是攷補正。用記於此，視爲息壤。

民國三年三月一日，頡剛寫竟跋。

適之先生評：

『西方美人』與『西方聖人』大不同，不可並論。

所分七類，似尚太寬。我主張寧可疑而過，不可信而過。

實齋『公言』之說雖有一部分真理，然不可全信。

五　告擬作僞書攷跋文書

適之先生：

我這幾天標點僞書攷又沒有進行；但有一件快樂的事情，便是胡應麟的筆叢已由蘇州友人買到寄來了。裏邊四部正譌一種，今送覽。

我的意思，可以拿諸子辨，四部正譌，古今僞書攷三種合印成一冊，喚做辨僞三種。這三種合起來不過五六萬字，可使人對於僞書得到更深的印象。

我想做的一篇跋，裏邊想做五個表：——

(1)表僞書所託的時代；

(2)表造僞書的時代；

(3)表宣揚僞書的人；

(4)表辨僞書的人；

(5)表根據了僞書而造成的歷史事實。

但又是範圍太大了，不是倉猝能彀做到的事。或者這回先做個略長，詳的放任將來自己的目錄上。

我想第五表很重要。中國號稱有四千年（有的說五千年）的歷史，大家從綱鑑上得來的知識，一閉

目就有一個完備的三皇五帝的統系，三皇五帝又各有各的事實，這裏邊眞不知藏垢納汚到怎樣！若能仔細的同他考一考，教他們渙然消釋這個觀念，從四千年的歷史跌到二千年的歷史，這眞是一大改造呢！

要這樣的一做，我們的範圍須得軼出他們三種之外了。

諸子辨裏固是也有信僞書的地方——如尉繚子等——但創意辨僞的也很多。在元代有此，比清代可加幾倍的尊敬。四部正譌雖未標題，但次序排得很準，亦爲有統系的作品。

我標點古今僞書攷所以慢，學校方面固是事情多，但我爲附注詳細起見，想對於他徵引的書都去註明了卷帙版本，對於他徵引的人都去注明了生卒，地域。但竟有找不到的，即如周氏涉筆一種，竟不能考得周氏是誰，涉筆是還有傳本與否。

周氏這個人不見引於晁陳的書目，而獨見於馬端臨的經籍略，想來是宋末或元初的人。他懷疑的精神很高，因疑六韜而並疑及太公的無其人，這可以想見他的勇敢了。我想這書如世間竟沒流傳，以後當在通攷上輯錄下來。

清代人辨證古史眞僞的，我知道有二大種而都沒有看過：一是崔述的東壁遺書，一是林春溥的竹柏山房叢書。先生那裏有麼？如果考證精確，也可列在國故叢書裏頭。

學生顧頡剛。九，十二，十五。

六　告擬作偽書攷長序書

頡剛：

偽書考不妨慢慢地點讀。你那樣校注法是極好的。

你主張把諸子辨，四部正譌，古今偽書攷合刊一冊，叫做辨偽三種。這是極好的。此書不妨慢慢地整理。或臨時加入別的新發見的辨偽著作，亦未可知。

你的跋一定很有價值。但我怕你所提出的五項都不適於作「表」我看不如都作敘述議論體何如？

第五項尤其重要，——「根據了偽書而造成的歷史事實」。此一項當佔全跋之大半。（這是我的估量。）

我想做一篇長序，(1)略敘章實齋言公篇的流弊旁人如此說，倘可恕。實齋是講「史學」的人，故不可不辨。(2)申說我自己「甯可疑而過，不可信而過」之旨。(3)略述「訂疑學」之歷史，——起王充，以至於今(4)論「訂疑學」不可不施行於道藏及釋藏。此序之成否，須看我的病體如何。

崔述的東壁遺書，我沒有。林春溥的竹柏山房叢書，我有全部。你要看，可以拿去看。此兩書中，只有關於考證古史的部分可以抽出。崔氏書有日本人那珂通世的新式圈點校印本，可惜此時不易得了。我已托人尋去。

七 答書

適之先生：

林春溥的竹柏山房叢書，我想看的。這封信送到時，能交給來人帶還麼？我已寫信到家裏去寄一部繹史，一部通鑑外紀來，手頭又有一部路史，合起來考證古史的出處大概也夠了。先生疑夏商書的話，請便中也寫一點給我做材料。

先生長序的四項，專任「訂疑學」上說；讓我專就僞書的出處流衍上說。我希望點完了諸子辨等三種書之後，出空一個月工夫專做這個跋。不知道能殼如願與否。

學生顧頡剛。九，十二，二十一。

適，九，十二，十八。

八 告續得姚際恒著述書

頡剛：

國故叢書事，昨日馬夷初先生來看我，他談及此事，我詳細告訴他，他也很贊成。他允任老子與莊子二書。

夷初先生說杭大宗續禮記輯說（浙江書局刻）中引有姚際恆的話甚多。便中當一查。

昨晚翻開四庫提要，見庸言錄一條下說姚際恆字善夫，徽州人。「善夫」的字，與別書所記姚氏之字皆不同。大概作提要的諸臣已不曉得此人的底細了。

適。九，十二，廿三

九 論竹柏山房叢書及莊子內篇書

適之先生：

竹柏山房叢書收到。此書信三墳，信僞古文尙書，信洞冥記，三元經等書，頗使我失望。我沒看見這書時，揣測他一定是辨僞的，因爲他生於嘉道間，應當如此。那裏曉得還同馬驌繹史一樣！可見憑時代來揣測也有不行的地方。

但這書雖不能給我「辨僞」的資料，卻可以給我「僞史」的資料，反正是有用的。

夷初先生加入國故叢書的組合，擔任老子，莊子二書。他拿這二書敎了幾年，收得的板本一定很多，在校勘上一定可以出色。我覺得莊子內篇也有靠不住的地方，如「北冥有魚」與「窮髮之北有冥海者」一段詞意重複。齊物論的「王倪曰，至人神矣」一段與逍遙遊的「藐姑射之山」一段亦重複。逍遙遊的「惠子謂莊子曰」的兩段，陳義旣淺，且執大笑小，與上面的宗旨也不類。大宗師裏「眞人之息以踵」及

「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一節，說明明白白是神仙家的說話，莊子不當有此。「帝之懸解」養生主和大宗師的話很相同。又內篇裏外篇不易看，而逍遙遊和養生主都甚易看。這都是可疑的。希望玄初先生也在辨僞上做一點功夫。

學生顧頡剛。九，十二，廿六。

一〇 答書

頡剛：

信收到了。竹柏山房叢書使人失望是自然的。林君雖生在嘉道間，但他讀的乾嘉學者著作甚少。我們只要看他的闕卷偶得，便可知道他讀的是些什麼書。莊子內篇每篇的前一大段是真的，每篇的後面數小段大概是後人加上去的。我久持此說，你看如何？

玄同。九，十二，廿六。

一一 論輯集辨僞文字書

頡剛：

我們選辨僞的文字，似不能不有一個截止的時期。不獨朱熹集裏也有許多辨僞文字，蘇軾也有，歐陽修也有，究竟錄不錄呢？

我想斷自宋濂，下迄姚際恆。宋濂以前，如柳宗元，朱熹之流，可在序或跋裏論『訂疑學小史』時帶敍到他們，似乎很夠了。你以爲何如？王世貞似可收入；（請估量他的價值我不曾見他的文集。）

今日翻楊升庵集及外集。我初以爲他總是一個疑古者，不料材料竟絕少。

適。九，十二，廿九。

一二　告得東壁遺書書

頡剛：

近日得崔述的東壁遺書，（還不是全書，乃是畿輔叢書本只有十四種，但考信錄已全，）覺得他的考信錄有全部翻刻的價值，故我決計將此書單行，作爲國故叢書的一種。

此書我一二日內可看完。今先送上提要一冊。此爲全書最精采之部分，你看了便知他的書正合你的『僞史考』之用。但他太信經，仍不徹底。我們還須進一步著力。

適。十，一，廿四。

一三　論偽史及辨偽叢刊書

適之先生：

昨函接讀。

考信錄這部書，我想看了好久了，到琉璃廠問了兩回書，易得而價不能出，所以至今還沒有看見。先生說這書有全部翻刻的價值，我想有暇時到先生處看看，如我的力量能夠標點的，等我辨偽三種做完了之後便接下去。等這部書做完了，再標點孔子改制考。

我在年假裏弄了幾天的「偽史考」，覺得很有些新意。看這些偽史和時代的關係，如「封禪」「符命」之類，倒也很可玩。如王莽一代，我們不必像康崔的處處吹求——我近來看看康崔的書大部分是黨爭——只要拿漢書王莽傳來看，便可見當時因於時勢關係，出了不少的偽史。如少皞的一個人，就是到王莽時才成立的，其原因是因為想頂替了他的後代去封國奉祀。王莽雖享國不久，然而那時造的偽史已成了有力的古史。到了東漢，無論什麼有學問的人所做的書，如白虎通，風俗通義，等，竟堂皇冠冕的徵引上去了。

又如黃帝，看封禪書便可知道是秦國所奉的「上帝」之一；到戰國時竟變成了「人帝」。做世本的又拿古帝王的世系一個個牽引上去，於是黃帝就成了中國人公共的祖先。至於各代的帝王大家發生親族上的關係，這不一定是古代的貴族政治，恐怕卻是六朝時人的門第觀念呢。

錢玄同先生主張把辨偽文字一起集出，這固是很好，但一時恐不易輯錄得周密。我的意見，不妨喚做辨偽叢刊現在標點的三種喚做叢刊第一集。以後續得續刊，凡滿十萬字時，就成一個單行本。

玄同先生主張從王充起，我想最好分別一下。論衡固是辨偽文字，但他所辨的偽乃是事偽，不是書偽。事偽的範圍很大、材料也多。如方孝孺的讀周禮，他雖不是辨書偽，然是辨事偽，我們也應該采取他了。因此，我主張把辨偽叢刊分做甲乙種，甲種辨偽事，乙種辨偽書，各出各的集。先生以為何如？

我這幾天因檢理貴重書籍，夜間又鈔錄諸子辨——宋集已在本校書庫檢到，——所以梁任公先生的哲學史講義還沒有看完。

我覺得梁先生對孔子固是說得極美滿，但選材上還沒有斟酌妥帖。他拿孔子以前的東西——如易——和孔子以後的東西——如禮運——都推到孔子身上，完全算做他的哲學。

我以為中庸，禮運等篇都是受了道家影響的儒家所作。先生以為何如？

我覺得史記老子列傳同各書裏引的老子的話，都沒有真實的。老子這個人只當依了黃震的話，說他是周代憤世的隱者。他和孔子的關係，完全是後來人偽造的，正與六朝時假造老子化胡經一樣。史記上的老子列傳只能看做列仙傳裏的東西。老子的事實，現在一點都不能知道了。因看梁先生定的年表上有「孔子五十一歲適周見老子」的話，所以想起了這一些話。

我又想起，若是我將來能彀做孔子的史，我決計拿時代來同他分析開來：凡是那一時代裝點上去的，便

嘆做那一時代的孔子。例如戰國的孔子，便可根據了易傳，禮記等去做；漢代的孔子便可根據了公羊傳，春秋繁露，史記，緯書等去做。至於孔子的本身，拆開了各代的裝點，看還有什麼。如果沒有什麼，就不必同他本身做史。

學生顧頡剛。十，一，二十五。

一四 自述古史觀書

頡剛

來信使我很高興。考信錄在清代要算一大奇書，你肯任標點，那是極好的了。我想此書太多，不必重鈔，可即用畿輔叢書本點讀。我當再買一部供此用，因我此部已被我批點過了。

考信錄甚多使人失望處，你看了便知。但古今來沒有第二個人能比他的大胆和辣手的了。以後，你的「僞史考」即可繼此而起，把他的判斷再細細判斷一回。

大概我的古史觀是：

現在先把古史縮短二三千年，從詩三百篇做起。

將來等到金石學考古學發達上了科學軌道以後，然後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長東周以前的古史。

至於東周以下的史料亦須嚴密評判，『寧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

送上考信錄二三四五冊。

適。十，一，二十八。

一五　論辨偽叢刊分編分集書

玄同先生：

昨天在適之先生處見到先生的信，說辨偽書從王充起（剛意可以從七略起，）至崔適止，總集攏來，這件事我很贊成。我以為現在着手的幾種可以稱做辨偽叢刊第一集；將來再集到十萬字的左右時，做二集，三集。如先生標點的偽經考，便可獨居一集。這樣辦法先生以為如何？

我有一個疑問：我們的辨偽還是專在『偽書』上呢，還是并及于『偽事』呢？像論衡裏雖有書虛等篇，而他所疑的乃是不當有此事實，並不是說這本書是偽；所以采及論衡便是辨及『偽事』。這樣做法，範圍放得大些。我們或者拿辨『偽事』的算做辨偽叢刊的『甲編』，辨『偽書』的算做『乙編』；論衡這部書，就可算做甲編的第一集。先生以為何如？

頡剛敬白。十，一，二十一。

一六　論近人辨偽見解書

頡剛先生：

廿一日賜示敬悉。

近來我忽想蒐集古今關于辨偽書的著作，把它們點校印行。我覺得前代學者眞是可憐，他們的最大多數都是日讀偽書，孳孳矻矻，死而不寤的，這偽書不知坑了多少聰明人！近人則更有可笑者：曾見有人一面引閻百詩惠定宇之說，說孔安國底書傳是偽書，而一面又把偽孔書序大引特引；又有人謂大禹謨等雖偽，而其中頗多善言，必不可廢。殊不知考辨眞偽，目的本在于得到某人思想或某事始末之眞相，與善惡是非全無關係。即以孔二先生而論：假使禮運是偽書，春秋繁露非孔學之眞，則『大同』之義，『三世』之說，縱極精美，却不可認爲眞孔學；假使墨子非儒篇或莊子盜跖篇等不但非偽書，而且所記是實錄，則我們雖甚愛孔二先生，也不能替他遮掩剝人家衣裳的拆梢行徑和向土匪磕頭禮拜的醜態。

先生所問『我們的辨偽，還是專在「偽書」上呢，還是幷及于「偽事」呢？』我以爲二者宜兼及之；而且辨『偽事』比辨『偽書』尤爲重要。崔東壁，康長素，崔觶甫師諸人考訂『偽書』之識見不爲不精，只因被『偽事』所蔽，儘有他們據以駁『偽書』之材料比『偽書』還要荒唐難信的。試舉三例：

(1)康長素孔子改制考中攻擊劉歆所說孔子作六經之旨，而自己乃引『緯書』來說孔子作六經之旨。

(2)夏穗卿中國歷史教科書第二冊中明明說秦漢儒生糅合方士之言爲非孔學之眞，而反以桓譚，張衡之闢圖讖爲非。

(3)崔觶甫師春秋復始斥左氏穀梁二傳後出，其事實不足信，顯反尊信比左穀更後出之何休之說（何休公羊解詁中肊測之史事，崔師皆信之）。

所以我認爲辨『僞事』比辨『僞書』爲尤重要。日前與馬幼漁先生談及，謂論衡之書虛，藝增，史通之疑古，惑經等等是最高等之『古籍校讀』（幼漁擬編古籍校讀法講義，故云然）。前乎此者如孟子之疑武成（但孟子所逃可疑之理由則決不能成立，他用自己所定『仁者無敵』之義來評判古史，以合于此者爲可信，否則不可信，眞是笑話）韓非子顯學篇所論，皆是。竊謂若將此等『疑古』底材料蒐羅齊備，擇要擇善而點校印行，實在『有功藝林不淺』。先生以爲然否？

先生所云可分爲辨僞叢刊『甲編』及『乙編』之說，我狠贊成。

弟玄同。

一九二一，一，二七。

一七　論辨僞工作書

玄同先生：

昨接來書，極快。

我的性情還是近于史學；因爲想做史學，所以極要蒐集史料，審定史料。爲蒐集史料，所以要做「目錄學」；爲審定史料，所以要「辨僞」。這「辨僞」的一個意思，竟與先生宗旨不謀而同，快極。我想，我能做的辨僞事情不過兩種：（一）考書籍的源流，（二）考史事的眞僞。但最緊要的事乃是「考書裏的文法；」這件事如果能夠弄清楚了，那末「書的眞僞」和「作僞的時代」便不難隨看隨剖別了。像我這樣，對於這件事便不能做；只能說盤庚，大誥因爲佶屈聱牙，所以是眞；列子氣息明媚近人，所以是僞。這種「文氣」「文格」似是而非之談，不說則覺得實有這個意思，說則又是「言之無物。」這樣的辨僞是不確實的。先生對于音韵文字之學這般有研究，若是從文法上去考究，眞不知道可以發見多少僞迹！先生以爲如何？（如胡先生的「爾汝」「吾我」之論，拿來看眞古書覺得實是這般，看僞古書便觸處牴牾。）

我們辨僞，比從前人有一個好處：從前人必要拿自己放在一個家派裏才敢說話，我們則可以把自己的意思盡量發出，別人的長處擇善而從，不受家派的節制。譬如僞經考史記探源等書，黨爭是目的，辨僞是手段；我們則只有辨僞一個目的，並沒有假借利用之心，所以成績一定比他們好。先生說康有爲一輩人考訂僞書的識見不爲不精，然而反信了讖緯，尤其荒唐難信。我想，讖緯之爲僞造，康夏等亦未嘗不「心知其意，」但有了一個「今文學家」的成見橫梗胸中，不能不硬擺架子罷了。這種的辨僞，根本先錯了。

辨「僞事」的，各家文集及筆記裏常有得看見。我們若是每月各人看三四部書，隨時摘出，我想一年總可出幾本。

我想把諸子辨，四部正譌，古今僞書考三種標點完，算做辨僞叢刊乙編第一集。此後接續標點考信錄，算做辨僞叢刊甲編的一集。

頡剛敬上。十，二，二十九。

一八　轉致玄同先生論崔述書

頡剛兄：

玄同先生信五頁，論崔述書，附上，請看了還我。我現正在物色陳刻全本。日本刻本，我明天去託人訪求。

適

玄同先生與適之先生書

你說崔東壁是二千年來的一個了不得的疑古大家，我也是這樣的意思。我以為推倒漢人迂謬不通的經說，是宋儒；推倒秦漢以來傳記中靠不住的事實，是崔述；推倒劉歆以來僞造的古文經，是康有爲。但是宋儒推倒漢儒，自己取而代之，卻仍是『以暴易暴』，『猶吾大夫崔子』。崔述推倒傳記雜說，卻又信尚書，左傳之事實爲實錄。康有爲推倒古文經，卻又尊信今文經——甚而至於尊信緯書。這都未免知二五而

不知一十了！（或者覺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這繼起而幹他們之蠱的，我以爲足下頗具此資格。若足下放上幾年『仿泰西新法獨出心裁的新國故黨』，我敢預言必大有造於國故界也。想足下具有同情。

道光二年陳履和刻的東壁遺書，才是全璧。日本史學會鉛印本（四巨冊），就是翻陳本加上句讀和引號，做上索引。此部最佳但此時恐買不到。……

一九　論僞史例書

適之先生：

考信錄已讀兩冊，大快。他雖但疑史傳雜說而仍信經，令人不滿意，但經到底少，史傳雜說則很多，他把難的地方已經做過一番功夫，教我們知道各種傳說的所由始了，由此加功，正是不難。

我覺得在僞史裏很可歸納出許多例來。譬方如『年壽』，大家隨口亂道這人的事蹟，結果合不攏起來，於是只有說他們『長壽』。所以老子會活到二百餘歲，墨子會至周末猶存，子夏會活到一百零六歲以上（用梁任公先生哲學史講義語）。又譬如『數目』，要硬斷定他，於是屢屢成爲『整數』，或者成爲『乘數』。成整數的如『一百』（黃帝及堯的享國），『三千』（孔子弟子，平原春申等家的食客，詩書未刪時之數）。成乘數的如『七十二』（孔子弟子中通六藝者），如『八十一』（蚩尤的兄弟）等。這種例很多，若留

心搜輯，可得一大批。再有出於「想像」的，如想到古代是「游牧」的生活，所以擬出一個「庖犧」；想到從游牧進爲「耕稼」，所以擬出一個「神農」；想到更進而有「文物」，於是有「軒轅」。又如想到一定有人正「時」，於是想出四個「羲和」歸之於堯的經天；想到一定有人正「地」，於是造出一部禹貢，歸之於舜的經野。

至於在造僞的原因上看，有的是要「裝架子」，如漢高算做唐堯的子孫，如北魏算做昌意的子孫，如北周算做炎帝的子孫。有的是方士騙皇帝，求利祿，如封禪書所載。有的是爲搶做皇帝而造的符命。有的是學者的隨情抑揚。有的是學者的好奇妄造。

這種的例，都可隨時摘出來，等將來的總集，做成「僞史攷」裏的一部分。

學生顧頡剛。十，一，三十一。

二〇．論今古文經學及辨僞叢書書

頡剛先生：

一月杪間先生給我的信，我當時一偷懶，所以直到如今才寫回信。

先生說因爲要研究歷史，於是要蒐集史料；因爲要蒐集史料，審定史料，於是要「辨僞」。我以爲這個意思是極對的。我并且以爲不但歷史，一切「國故」，要研究它們，總以辨僞爲第一步。前代學者

如司馬遷，如王充，如劉知幾，如顧炎武，如崔述諸人，都有辨僞的眼光，所以都有特到的見識。可是前代學者的辨僞，都是自己做開山始祖，所以致力甚勤而所獲甚少。咱們現在席前人之成業，更用新眼光來辨僞，便可事半功倍。可恨我記性既差，識力又闕，先生所說從文字上考出僞迹，此事現在僕病未能。適之先生對於此事最有特識，蓋其天資學力均非常人所及，我不敢仰望其肩背。雖然，我也不甘自暴自棄，我自問尙有一點長處，則兩年來對於考古方面是丹非素出主入奴之見幸而尙能免除，故異日或有一得之愚，亦未可知。

我對于『經』，從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七，頗宗今文家言。我專宗今文，是從看了新學僞經考和史記探源而起；這兩部書，我都是在一九一一才看到的。一九〇九細繹劉申受與龔定庵二人之書，始『背師』（章太炎師專宗古文，痛詆今文）而宗今文家言，但那時惟對於春秋一經排斥左氏而已，此外如書之馬，詩之毛，雖皆古文，却不在排斥之列，而魯恭王得壁經一事，並不疑其爲子虛烏有，故那時雖宗今文，尙未絕對排斥古文。自一九一一讀了康崔二氏之書，乃始專宗今文。康氏之僞經考，本因變法而作；崔師則是一個純粹守家法之經學老儒，篤信今文過于天帝。他們一個是利用孔子，一個是抱殘守缺，他們辨僞的動機和咱們是絕對不同的。但他們考證底結果，我却認爲精當者居多，此意至今未變。我前幾年對於今文家言是篤信的；自從一九一七以來，思想改變，打破『家法』觀念，覺得『今文家言』什九都不足信，但古文之爲劉歆僞作，則至今仍依康崔之說，我總覺得他們關于這一點的考證是極精當的。我現在以爲古文是假造的（

左傳所記事實自然不是劉歆造的，它底本身是一部與春秋毫無關係的歷史）。今文是口說流行，失其眞相的，兩者都難憑信，不過比較起來還是今文較可信些。咱們若欲知孔學之眞相，僅可于論語，孟子，荀子，史記諸書求之而已。

（這是四年前的見解。現在我覺得求眞孔學只可專據論語。至於孟子，荀子，史記中所述的孔學，乃是孟軻，荀況，司馬遷之學，已不得遽目爲孔學。至於解「經」，則古文與今文皆無是處。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四日玄同。）

日前適之說，先生開過一張「辨僞叢書」底書目給他；我要向他借看，但他一時尋不着了。先生可以另抄一份給我嗎？

我以爲「辨僞叢書」之中，考信錄，僞經考等專書以外，可將各家文集或筆記裏關于辨僞底著作「裁篇別出」，編成一種「辨僞叢著」，也作爲「辨僞叢書」中之一種。例如——

論衡之儒增，藝增，書虛，正說；

史通之疑古，惑經；

朱晦庵之詩序辨說；

章太炎師之徵信論

等等，都可合爲一編。因爲如論衡之中，確有辨僞之著作，但其書本非爲辨僞而作，它是一部哲學底專著；若將全書列爲「辨僞叢書」之一種，不但太占篇幅，抑且名實不符也。先生以爲然否？

弟玄同。一九二一，三，二三。

二一　答編錄辨僞叢刊書

玄同先生：

前星期接來書，讀悉。

承詢『辨僞叢書』的目錄，另紙錄出奉覽。 我讀書不多，此目所列，有許多是只在書目上看來的，幷不知道他的內容如何，所以必有錯誤。 所謂辨僞，大約有三方面：一是僞理，二是僞事，三是僞書。 其中『僞理』一部分本沒有一定標準，或竟是出主入奴的成見，我們可以不必管他。 我上次信中，曾舉論衡的全書爲『辨僞叢刊甲編』之一，實是當時的粗忽；承先生糾正，感極。 論衡大都是辨『僞理』，這種是非要請哲學科學家來判斷的，這範圍太大；若是把他拉攏在內，則荀子的非相，墨子的非命，一切均須拉進，不勝其繁。 先生把這方面撤去，專就『僞事』『僞書』方面著手，此意極佩。

我前函主張把『辨僞叢刊』分爲兩編，甲編辨『僞事』，乙編辨『僞書』；如今想來，也有不對的地方。 考信錄是辨『僞事』的，內中也帶辨『僞書』；僞經考是辨『僞書』的，內中也帶辨『僞事』。 所以我現在主張把兩編打通了，不設什麼界限。 先生以爲善否？

先生說，在專書以外，可將各家文集或筆記裏關於辨僞的著作裁篇別出，前者喚做『辨僞叢書』，後者

喚做「辨僞叢著」。這個界限，我以爲也不必分。譬如我現在標點的諸子辨，四部正譌，古今僞書攷三種，前二種是删節的，後一種是全載的，出版時釘在一冊，那「叢書」「叢著」的名目便不能定了。所以我主張像學海堂經解那樣辦法，全載的全載，删節的删節，都轄在一個名目之下。

先生對於古今文的批評，讀之佩甚。

頡剛敬白。十，四，二。

☆　☆　☆　☆

擬「辨僞叢刊」條例：

（一）十萬字外，二十萬字內，爲一期；二集爲一冊。

（二）大部書或分數集，小種則幾種併成一集。

（三）凡不是辨僞或辨僞而不甚重要者，儘删削。

（四）如係數種彙刊之集，則略略斷代，又略略比類。

（五）即一書止錄一條，仍題書籍原名，不與他書合幅。

擬目錄：

韓非子　史記　漢書藝文志　論衡　史通　柳宗元集　歐陽修集　習學記言

黃氏日鈔，詩序辨說　孝經刊誤　朱熹文集，語錄　鄭樵詩辨妄（可從非詩辨妄中輯）
王柏書疑，詩疑　高氏子略　周氏涉筆（可從文獻通考輯）　考古質疑　崇文總目
晁氏讀書志　直齋書錄解題　東觀餘論　諸子辨　遜志齋集　王世貞集　四部正譌　尚書考異　古今僞書考　易學象數論　易圖明辨　顧炎武集　黃宗羲集
王夫之集　萬斯大周官辨非　萬斯同羣書疑辨　姚際恆九經通論　尚書古文疏證
古文尚書考　孫志祖家語疏證　范家相家語證僞　考信錄　史記志疑　杭世駿質疑
四庫提要　新學僞經考　孔子改制考　史記探源　袁枚集　顧棟高集　王國維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今本竹書紀年疏證　俞樾集　章炳麟集

這個目錄，寫得極凌雜。錯的地方請先生改正，少開的書請先生告我。

剛又白。

二三　自述整理中國歷史意見書

伯祥兄：

我日來在家裏做辨僞叢刊的事情。這是國故叢書的一部分。本來適之先生囑我標點古今僞書考，

但我的性情太喜歡完備，覺得隨便一標點不但對不起原作者，並對不住自己，所以我想把他引用的話都把原書校讎一番引的人名和書籍都注明他的生卒里籍，及版本卷數之類。這件事卻不易做，因爲中國很少參考書像辭典一類東西，史志又不完備，檢查上極感困難。但因爲找原本書，卻發見許多辨僞的文字。起初只發見幾種後來再把這幾種所引的書尋到根上去，輾轉攀引，所得愈多了。現在已覓得三四十種辨僞書，我意可以順了年代次序出版，好讓讀者興起進化的歷史觀念。但這件事又有困難，因爲依時編集後，恐怕將來更有發見，插不進去；而且要把同時的書籍翻看一遍，也非容易。好在既名叢刊，不妨隨得隨編。適之先生也這樣勸我。所苦的，各書在在連帶，一書漏選則他書的注釋也不能滿意。大約這在初版時是決不能十分愜心的。

這辨僞叢刊分做兩類：一是辨僞事，二是辨僞書。每一冊裏只集一類，以後出版完時再編一個總索引。我們的意思，要把中國的史重新整理一下，現在先把從前人的懷疑文字聚集，排比，做我們的先導。辨僞事的固是直接整理歷史，辨僞書的也是間接整理。因爲僞書上的事實自是全僞，只要把書的僞跡考定，便使根據了僞書而成立的歷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點。照我們現在的觀察，東周以上只好說無史。現在所謂很燦爛的古史，所謂很有榮譽的四千年的歷史，自三皇以至夏商，整整齊齊的統系和年歲，精密的考來，都是僞書的結晶。我極願意在辨僞叢刊的第一集上做一篇很長的序，將他的大致說一說。只要我的身子支持得下，諒可如志。

辨偽叢刊只是集前人的文字，將來我自己想做三種書：(1)偽史源，(2)偽史例，(3)偽史對鞫。所謂源者，其始不過一人倡之，要在這時辨來自是很易；不幸十人和之，輾轉應用，不知其所自始，甚至愈放愈胖，說來更像，遂至信為眞史。現在要考那一個人是第一個說的，那許多人是學舌的，看他漸漸的遞變之跡。所謂例者，做偽史的總有一色的心理，記一事必寫到怎樣的程度，遂至言過其實，不可遮掩。現在要拿這般的心理歸納起來，教人曉得偽史總是歡喜向那方面走的，也可處處防範。所謂對鞫者，大家說假話，不能無牴牾，我們要把他們牴牾的話集錄下來，比較看着，教他們不能作遁辭。這三種書自是終身之業，現在只是收集材料。

我們這樣做，必可使中國歷史界起一大革命。我自知於哲學文學都是不近情的，我也不想做社會改造運動家，我只願一生讀書，做一個科學的史學者。所恨我的環境尚不能儘我用功，我的身體又是不能任受過分的勤勞，我將來能否達到我的願望尚不可知，我只能向着這一方面盡力進行罷了。

我這一個歡喜記錄的天性，無論何時都抑不下去。去年擬了幾張表，送與圖書委員會，只因需費較鉅(須七八十元)，校中經費窘迫，擱了幾月，風潮起後，更無法了。但我既已打了這個樣，便是學校不刻，終必自己去刻。我等到這種表格刻就後，想把二十二史讀一遍，一方面既可隨時記錄，立一個規模，一方面又可使我對於中國史事立一個確實的骨幹。我所記錄的，不僅是表，也想同時記錄史料，預備重編國史。我從前只想做學術史，現在則想並做社會史，因為學術是社會的一部分，不知當時的社會狀況亦無從作學術史，況且單作學術史也太乾燥無味。

以上是我對於整理中國歷史的見解；括以一言，則審定舊史書（辨偽）與記錄新史料。我自知道是一大事，必非我一人一生所能就緒，但我以爲正不妨讓後人接續下去，不必在我的手裏完工。況且有史學的嗜好的，像你及紹虞等，總可以幫助我做去。將來我們有機會時，最好集合在一塊。

弟頡剛。十，六，九。

二二　論通考對於辨偽之功績書

適之先生：

昨寄還黃氏日抄一冊，想先此收到。

辨偽叢刊事現在固是做得不少，但沒有善本校正，終不宜付刊。我想秋間入京後修補完全，再請先生交付商務印書館印刷。

那時我可交上兩集：一集是柳宗元集至周氏涉筆，一集即照原定計畫，從諸子辨至偽書考。周氏涉筆已從通考裏輯出了。李燾的話也輯出（偽書考曾從通考上轉鈔李燾的話三條，一稱爲李仁一稱爲李仁父，一稱爲李巽巖，名號如此模糊，甚是疑誤後人），惜不能知道他的原書名目。

胡氏的正譌，姚氏的偽書考，都是依傍了通考做的。凡是他們引的書，十分之八都出在通考上。諸子辨雖不明說，亦有暗下勦襲者（如淮南子一條，即襲周氏涉筆）。通考雖不標明辨偽，但他聚了許多宋人

的評論，每一部古書必有一二人說他是僞的，使人逐條看了自然生出一個『僞書』的觀念。這也是他的無意中的功勞。

先生的黃氏日抄，大約是翻刻宋本的，裏邊錯字很多，並有脫文，（如古三墳書一條即未畢。）我曾向書坊裏看過數部，也和先生的一樣。浙江圖書館有元代刻本，當往校勘。

學生顧頡剛。十，六，廿八。

二四　論辨僞叢刊體例書

頡剛：

信二封，黃氏日抄一本，都收到了。

辨僞叢刊事，你的辦法我很贊成。但我近來想，此書爲發生最大效力計，可否以僞書爲綱而以各家的辨僞議論爲目？例如：

書經：

孟子說：——

吳才老說：

朱熹說：

吳澄說：

梅鷟說：

閻若璩說：

惠棟說

姚際恆說：

龔自珍說：

康有爲說：……

或參用兩法：(1)有些書，如你所輯校的兩集，用原書的次序，依年代排列。(2)有些大書，有些發生大問題的書，——如書經，周禮之類，——則用我此次提出的法子，每一部僞書爲一集，如『尚書的公案』；或竟加入一兩種更大的問題，如『今古文的公案』之類。

你以爲何如？

姚際恆的禮記通論，已由錢玄同先生動手從續禮記集說裏輯出。

適。十，七，一。

二四　答書

適之先生：

先生主張把辨偽叢刊以偽書爲綱，而以各家的辨偽議論爲目，我極贊成這個法子。現在雖不能輯得完全，將來續得也可另做補編。我本想依了原書排次，而在書後附上一個索引，按了偽書名目分列各家評論。但現在想這究竟不甚便利，所以決從了先生的提議。惟如考信錄等還以仍存原書式樣爲妥。

學生顧頡剛。十，七，十。

二六　論編纂經部辨偽文字書

頡剛先生：

先生所纂偽書辨證集說底「諸子」部分，如有寫定本，可否借我一讀？

我想關於「羣經」部分辨偽之文，也應該用「集說」的辦法；雖文章太多，然可以節要編錄。後人用前人成說者，若全襲前人，毫無增加，即不必錄；若稍有增加，則選錄增加之一部分。例如康氏偽經考辨「逸禮」的全襲邵位西，則單錄邵說可也。他辨春秋，以左傳之「五十凡」等爲劉歆所附益，乃全襲劉申受左氏春秋考證，則但錄劉說已足，而說左傳本是國語之一部分，不但不名春秋左氏傳，就是左氏春秋這個名目也是本來沒有的，此乃康氏所發明，應該選錄，列劉說之後。又前人但隱約其詞，且無明確之證據，而後人辨駁精當，突過前人的，則略載前說而詳錄後說：例如辨毛詩之偽，以康氏爲最明快，應全錄其說，康氏以前亦有

疑毛序之文，則略載較精采者已足。如此編纂，似亦不難。先生以為何如？

我以為『經』之辨偽與『子』有同等之重要——或且過之。因為『子』為前人所不看重，故治『子』者尚多取懷疑之態度；而『經』則自來為學者所尊崇，無論講什麼總要徵引它，信仰它，（直到現在還有人根據周禮來講周史的！）故『偽經辨證集說』之編纂尤不容緩也。先生以為然否？

弟玄同。一九二一，十一，五。

二七 論孔子刪述六經說及戰國著作偽書書

玄同先生：

承問我的偽書辨證集說的『諸子』部分，我只有慚恨。我固是鈔出了許多，但一到學校裏辦事，連校對的工夫都沒有，何況於排次！……這書俟寫定後，自當立刻請求教正。現在材料已輯得不少，倘有一個月的閒工夫，必然可以就緒。

辨諸子的文字，我已錄的是柳宗元集，郡齋讀書志，高氏子略，直齋書錄解題，黃氏日鈔，周氏涉筆，宋濂集，方孝孺集，王世貞集，四部正譌，古今偽書考等。葉水心的習學記言，正倩人到京師圖書館鈔錄。此外，我想把四庫提要也摘錄一點

先生所說集錄經部辨偽之文的意思，讀之佩甚。我想此書集成後，便可進一步去推翻『孔子刪述六

經』這句話了。六經自是周代通行的幾部書，論語上見不到一句刪述的話。到孟子，才說他作春秋；到史記，才說他贊易，序書，刪詩；到尚書緯才說他刪書；到清代的今文家，才說他作易經，作儀禮。總之，他們看着不全的指爲孔子所刪，看着全的指爲孔子所作。其實看劉知幾的惑經，春秋倘使眞是孔子作的，豈非太不能使『亂臣賊子懼』了嗎? 看萬斯同的疑今文尚書及詩三百篇書詩若果是孔子刪的，孔子眞是獎厲暴君，提倡淫亂了。看章學誠的易教，儀禮倘果是孔子作的，孔子也未免僭竊王章了。『六經皆周公之舊典』一句話，已經給『今文家』推翻；『六經皆孔子之作品』一個觀念，現在也可駁倒了。

日來又有一個意思。從前常以爲戰國橫議，趁口亂道古事，造成了許多『僞事』；現在想想，戰國時不但隨便編造『僞事』，而且已在著作『僞書』了。試看舜在孔子時只是一個沒有事蹟的古帝，門弟子問孝的這般多，孔子絕沒有說到舜身上，可見舜在那時還沒有孝的名望。孔子之後，有人做了一部堯典，說了『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一句話，在做書的人原是要表出堯舉舜的緣故，但舜從此成了一個孝子。到孟子時，大家更造了他許多孝蹟，『焚廩揜階』是他，『號泣旻天』是他，『五十而慕』是他，『不告而娶』是他，『夔夔齊慄』是他；甚而至於代他解決『瞽瞍殺人』的一個問題，可見他那時已做了『惟一的孝的模範人物』了。於是那時就有摹做了尚書語氣來給他做僞史的，所以萬章上的一段酷類尚書，不是孟子時的語法。先儒不知，定爲『逸書』。其實尚書上的堯典已是僞造，孟子上的引文更是因了堯典去踵事增華所做，可見那時自有一班專門造僞書的。更看漢書藝文志上許多託古的書，漢朝人做的固有許多，但戰

國時僞造的必已不少了。

我的舊學的工夫極淺，即有所見，從不敢告人。此信隨便說了一些，正因先生誘掖之勤，所以放大了膽。務請先生正其誤謬。

頡剛敬上。十，十一，五。

二八 論堯舜伯夷書

玄同先生：

偶然想起前天的信意有未盡，更作此函。

論語上說堯是「蕩蕩乎民無能名，」說舜是「無爲而治，」這都是沒有事蹟而加美之辭。恐怕堯舜在孔子時原不過是「若存若亡」的兩個古帝。孔子就他們的沒有事蹟流傳上去說他們好，於是只可說「無能名」和「無爲」。這正如鄉里富人死了，一生實在沒有什麼可記，但不得不請人作傳，於是只可說「韜光養晦」「優遊自得」的一類話。

論語上稱伯夷叔齊凡四次：一云，「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一云，「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一云，「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一則排在「逸民」類中，云，「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味這四語的意義，伯夷叔齊頗似只是隱士；所謂「餓於首陽，」猶云「食貧於首陽，」這句話正是對着闊綽的齊景公立說，自可證明。

但後來造僞史的人看得『餓』字太着實了，以爲一定是餓死，於是造出『義不食周粟』的一段故事來。這件故事越說越多，於是夷齊只成了殷朝的忠臣，沒有論語中『逸民』的氣息了。其實夷齊若果是殷朝的忠臣，論語上何以不加入『三仁』之內而曰『殷有五仁』呢？況且照了史記所載他們的行動和『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的歌辭，使得他們竟成了慷慨憤懣之士，又如何說得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呢？做僞史的人讀了論語，只把『餓於首陽之下』一語發揮盡致，却忘了『不念舊惡』，至今顯出一個漏洞。

我狠想把古史分析開來，每一事列一表，每表分若干格，格上紀事以著書之時代爲次，看他如何漸漸的轉變，如何漸漸的放大，或如何一不留心便忘記了使得作僞之迹無可遁形。這也是一件狠有趣的事情。但我的學問不知夠做到否？先生對此有何意見？

頡剛敬上。十，十一，八．

二九　告輯集鄭樵事實及著述書

適之先生：

上兩星期，詩辨妄的序雖沒有做下，卻做了兩篇文字：(1)鄭樵傳，(2)鄭樵著述攷。鄭樵在宋史裏只有三百餘字的傳，實在太不詳備。我在夾漈遺稿及莆田縣志裏找到些事蹟，同他另做一篇傳，約有萬字。他的著述名目，我也在各處書裏輯到六十餘種，又輯到一點說明，他一生的苦心孤詣也不致完全埋沒了。這兩

篇文字日內可以謄清，到京時卽行奉覽。

我想把詩辨妄列爲辨僞叢刊的第一種，古今僞書攷爲第二種。僞書攷我本想和其他辨僞書重行排輯的，但我改不掉的性情，只是過求完備，範圍越化越大，以至不能作而後已。我爲避免這一層困難，只得將着手的部分縮小。僞書攷我在去年春間曾經注釋一過，雖未完備，所費亦是無幾。這書原文有二萬字，注釋亦二萬字，再加上一篇序，一篇姚際恆的傳，一篇他的著述攷，便可完功。如此，也有七八萬字了。考信錄作爲第三種，原書太多，或分了幾次出版。

學生顧頡剛。十一，二，三。

三〇 論詩經歌詞轉變書

玄同先生：

今將「詩辨妄擬目」一紙奉覽，請審核。

本來我想在序裏詳細把漢儒詩學加一批評，後來因範圍太大，不是短時期所能作完，所以把牠獨立爲漢儒的詩學和詩經的眞相一文，以便逐節去做。詩辨妄的幾個附錄大致已經弄好，只要謄清，就算完工。非詩辨妄我也加上一個跋。

等我全部謄清之後，必須請先生爲我審查一過。如肯做一篇序，那是最好；否則亦不敢强求。

我想做一篇歌謠的轉變，說明唐風中的杕杜和有杕之杜同是一首乞人之歌，邶風中的谷風和小雅中的谷風同是一首棄婦之歌，小雅中的白駒和周頌中的有客同是一首留客之歌，只是一首的分化，不是各別的兩首。從此可以證明『風』和『雅』『頌』只是大致的分配，並沒有嚴密的界限。

頡剛敬上。十一，二，十九。

三一　論詩經眞相書

頡剛先生：

手示具悉。

詩辨妄底目錄甚好，我狠願意給它做序，不過我對於詩經沒有什麼研究，並無新義可以發揮，打算就寫出這樣三個意思：

（一）詩經只是一部最古的『總集』，與文選花間集太平樂府等書性質全同，與什麼『聖經』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聖經』這樣東西壓根兒就是沒有的）。這書的編纂，和孔老頭兒也全不相干，不過他老人家曾經讀過它罷了。

（二）研究詩經，只應該從文章上去體會出某詩是講的什麼。至於那什麼『刺某王』，『美某公』，『后妃之德』『文王之化』等等話頭，即使讓一百步說作詩者確有此等言外之意，但作者既未曾

明明白白地告訴咱們咱們也只好闕而不講；——況且這些言外之意，和藝術底本身無關，儘可不去理會它。

（三）將毛學究鄭獃子底文理不通處舉出幾條，「昭示來茲」

您看把這三個意思做成一篇序，行嗎？

您所說「歌謠底轉變」一個意思，狠好，我狠盼望您做成這篇文章。 您說唐風中的杕杜和有杕之杜是兩首叫花子底詩，極新穎，極確切，我讀來信後，將它們默誦一過，這眞是叫花子底口吻，不禁失笑。 我想這一類新解，您一定還狠多，我狠希望您陸續地發表出來。

玄同。 一九二二，二，二二。

三二 告編著詩辨妄等三書書

適之先生：

前日接讀來函，敬悉。

鄭樵著述考謄了一萬字出來，送上。 此文原爲詩辨妄的附錄，所以詩傳和詩辨妄的記述與評論全抄在「附錄三」裏去。 現在既把他獨立，只得又摘要寫了一點。 序亦重做過。 請先生再審查一下。

我對於詩辨妄的辦法，想把他分做三種書：

(1)鄭樵：

(a)鄭樵傳。（史志傳附）

(b)鄭樵著述攷。

(2)詩辨妄．

(a)序。

(b)詩辨妄輯本。

(c)鄭樵詩學緒論（由通志，遺稿等書內輯出。）

(d)六經奧論中的詩經一卷（每篇爲之辨，用上二種爲標準。）

(e)鄭樵詩說的批評：

(一)非詩辨妄。

(二)諸家評論。

(3)漢儒的詩學和詩經的眞相：

(a)删詩問題。

(b)三家。

(c)毛傳。

(d) 詩序。

(e) 鄭箋。

(f) 漢代歌謠書的失傳。

(g) 歌謠的詩經。

以上除第三種非一時所能作就外，一二兩種已經寫消一半，其餘亦都有草稿，有十數天的閒暇便可脫稿。鄭樵一種大約有五萬餘字，詩辨妄一種大約有四萬餘字，皆可單行。第三種逐篇發表，等一二年後再集爲一種書。

學生顧頡剛。十一，三，十八。

三三 論鄭樵與北宋諸儒關係書

適之先生：

鄭樵傳已於前日謄完，囑伯祥送覽。

這一篇傳的不愜意之處，就是沒有把他的學問與北宋諸儒關係之處說出。照我想，他的編通史，或是受司馬光編資治通鑑的觸發。他的辨毛詩，當然是受歐陽修詩本義，蘇轍詩傳的影響。他的拿一切字歸到六書，據中興藝文志說是出於王安石的字說，惜字說的大概情形亦不容易知道。他的辨石鼓，或亦出於

歐陽修。

我因爲這問題牽涉太大，一時不易知道明白，所以就闕去，等將來讀書多一點後再補。

這篇傳請先生批評。如有應改正處，請指出，以便改做。

學生顧頡剛。十一，四，九。

三四　論詩說及羣經辨僞書

頡剛先生：

別來將及一年了。

近閱小說月報第十四卷第一號，得讀鄭振鐸先生底讀毛詩序，極佩。『最後一頁』中預告將有先生底詩經的厄運與幸運一文，更盼早日快讀也。不是我瞎恭維先生，我認爲先生對於詩經的研究最爲精闢；雖專篇未見，然卽兩年來所見先生『東鱗西爪』之詩說，覺得無一不好。我極望先生將此書好好地整理它一番。救詩于漢宋腐儒之手，剝下它喬裝的聖賢面具，歸還它原來的文學眞相，是狠重要的工作。

但我別有一種希望，先生底詩說，除登入小說月報中的以外，可否分些給北大底國學季刊？小說月報是文學的雜誌，當然應該登載；但是我們又狠希望北大底國學季刊中多些『離經畔道』『非聖無法』之材料，免得它漸漸地『還老化』。這一層，我狠希望先生幫忙——不僅是關於詩經的。

棲霞牟庭（原名廷相，字陌人，號默人，與郝懿行同時）著有詩切一書，未刊行。他底兒子牟房剜雪泥

屋遺書目錄，把詩切序與詩篇義（牟庭所撰的小序）載在裏邊。這書目我近來買到了，打算把詩切序與詩篇義標點印行。（我還有一部牟庭底周公年表，說東山是周公『悼亡』之詩，這一段可以鈔出附記於東山底詩篇義之後。）我去年看李慈銘底越縵堂日記，才知道有牟氏此書。越縵堂日記第十五冊桃花聖解盦日記丁集第三十八至四十頁提及牟氏著作，大罵了一頓：一則曰，『默人之學盡棄古說，專任肊斷，持論不根；』再則曰，『嚮壁虛造，無所取資，恃其精心，敢於立異』三則曰，『夜郎自大，恣意肆言，卒爲學究之傖荒，經儒之梟賊。』他專罵詩切的話，則曰，『痛攻毛詩，悉反小序，甚至改定篇名，蓋近病狂之言』又舉牟氏新說三十餘條，目爲『風狂囈語，名教罪人。』李慈銘本是一個見解極陋的經生，他尤其甘心做鄭玄府上底丫頭；我看他用這樣的話痛罵牟氏，逆揣牟氏書中必多精義。果然，詩切序與詩篇義中極多新穎的議論，不讓姚際恆底詩經通論，方玉潤底詩經原始與龔橙底詩本誼，而且比姚，方與龔三人還要大胆。但不知詩切之稿尚在人間否，適之已託人在山東尋訪了。

（近見華國月刊第二『期』第四冊但燾底法學卮言中有這樣幾句，『丁君惟汾以舊藏牟庭所著同文尚書示章太炎先生，其書卷帙繁重，難於刊行』我想同文尚書稿本既然存在，則詩切稿本或者也還存在，我見到了丁鼎丞——惟汾——先生時，自當詳細問他。現在把這話記在這兒，希望讀者先生們也可以留心采訪。十五年九月二十二日，玄同。）

清乾隆時，湘潭羅典（字慎齋）有說詩之作，中多怪話，如東門之枌中『視爾如荍』他把『荍』字解作男子生殖器。這話見於民國元年中國學報之江叔海底筆記中。我曾問過楊遇夫黎劭西兩先生，據說

羅氏此書有刻本但不容易買到。

一年以來我蓄志要蒐集關於『羣經』之辨僞文字。我以爲推倒『羣經』比疑辨『諸子』尤爲重要。因『諸子』是向來被人目爲『異端』的，故『管子，列子是僞書，』『莊子底外篇和雜篇非莊周所作』……這類話，除清朝這班好讀僞書的經師外，皆不以爲是說不得的。若『羣經』則不然。閻百詩惠定宇諸人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推倒了『古文尚書』；然康有爲之新學僞經考，至今痛詆之者還是很多：因爲推倒『羣經』，他們總認爲『宜正兩觀之誅』也。然正惟其如此，咱們所肩『離經畔道』之責任乃愈重。我以爲不把『六經』與『孔丘』分家，則『孔教』總不容易打倒的；（其實還是孔丘被誣之沉冤未雪呢！一部論語，確是古代底大學者底言論。乃無端將幾部無條理，無系統，眞僞雜糅，亂七八糟的什麼『經』也者硬算是孔二先生底著作，還造了許多妖魔鬼怪之談，什麼『三統』咧，什麼『四始』咧，……强說是他老先生說過這樣不通可笑的話，他眞被寃誣了！）不把『經』中有許多僞史這個意思說明，則周代——及其以前——底歷史永遠是講不好的。我覺得宋以來有四個大學者本來都是可以有大成就的，因爲被『經』罩住了，以致大蒙其害。四人者，朱熹，顏元，章學誠，崔述是也。去年鈔得一部葉適底習學記言，其中常有『疑古』之論，疑得有理的很不少，於是更引起我幹此工作之興趣。現在打算隨見隨鈔，俟略略有些眉目，便擬著手編纂也。此志願實自先生前年冬天來書論堯，舜，夷，齊事蹟之僞造引起，我甚感謝先生。

弟玄同。一九二三，二，九。

三五　論詩經經歷及老子與道家書

玄同先生：

前旬接到來書，讀悉一切。先生說我的詩說好，使我很慚愧。我極希望對於詩經用力研究一番，無如找不到這個機會。到上海後，振鐸要我做一篇關於詩經的論文，我就擬定了詩經的厄運與幸運的題目，預備把詩經的經歷詳細一說。

所謂厄運，是：

（1）戰國時詩失其樂，大家沒有歷史的知識，而强要把詩經亂講到歷史上去，使得詩經的外部蒙着一部不自然的歷史。

（2）刪詩之說起，使詩經與孔子發生了關係，成了聖道王化的偶像。

（3）漢人把三百五篇當諫書看，得詩經完全爲美刺而作。

（4）宋人謂淫詩宜刪，許多好詩險些兒失傳——此說若在漢代起了，一定發生效力。

所謂幸運，是：

（1）詩篇有了一個結集，不致隨許多逸詩一齊亡了。

（2）漢人不當牠尋常的詩歌看，所以漢書藝文志中許多歌詩完全亡失，而此巍然僅存。

（3）宋代歐，鄭，朱，王，輩肯求牠的眞相，不爲傳統的解釋所拘；雖然蒙蔽之處還是很多，倒底漏了一線曙光。

（4）到現在，可以一點沒有拘束，赤裸裸地把牠的眞相表顯出來了。

我起初想，這些意思可以一次說完；不料做了半個月，只說得第一項的厄運。這篇計分五節：

（1）傳說中的詩人與詩本事　把尚書，左傳，國語中所記的詩人與詩本事集了起來，分別牠們的可信不可信，並指出牠們互相牴牾之處，證明詩人與詩本事在漢以前已不能明瞭，何況漢儒作序。

（2）周代人的用詩　說明詩經中一部分詩是貴族爲應用而做的，又一部分詩是平民的歌謠，給樂工采取入樂的。當時的用詩有四種：一是典禮，二是諷諫，三是賦詩，四是言語。典禮與諷諫是牠本身固有的應用，賦詩與言語是引伸出來的應用。凡是引伸出來的應用，只要達出用詩的人的意思，並不希望印合于作詩的人的意思，所以可以隨便亂用。他們雖是亂用，却不預備在詩上推考古人的歷史，又不希望推考作詩的人的事實，所以不會傷損詩經的眞相。（這一義很關重要。從前說詩的人把用詩的人的意思就算做作詩的人的意思，所以引起了無數糾紛。他們全不理會『斷章取義』，以爲古人既這麽用就不會錯。野有蔓草與褰裳原來都是情詩，但因給趙孟韓宣子稱贊了，就決不算是情詩了。）

（3）孔子對於詩樂的態度　孔子對于詩上，完全是傳統思想，要勸人去用。在樂上，因爲他遭

値的時勢正是新舊絕續之交，他是酷好雅樂的人，所以對於時勢痛下針砭。那時的音樂潮流在論語上可以看出有三個趨向：一是僭越，二是新聲的流行，三是雅樂的敗壞。雅樂到了孔子時決不能維持原來的地位了，所以孔子的正樂與社會上毫無關係。

（4）戰國時的詩樂　戰國時，詩的形式變了，有長篇的『騷』有不歌而誦的『賦』，有俳詩之類不規則的詩。樂也不同了：春秋時樂調簡單，樂與歌詩合一；戰國時樂調複雜了，離得開歌詩了，所以那時器樂重于歌樂，甚至齊宣王有三百人吹竽而不必有歌詩。詩經到這時候，幾乎與社會上斷絕關係了。幾個服膺孔子之道的人拚命鼓吹禮樂，但自己何嘗懂得古樂詩。既然不懂而又要硬去講牠，于是只得在歷史上胡亂揣測了。

（5）孟子說詩　孟子會說『知人論世，』『以意逆志，』但他自己是最不會『論世』和『逆志』的。一部詩經大部分是東周的詩，他却說『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戎狄是膺，荊舒是懲，』明明是頌僖公的，詩他却說成周公的事。倘使他自己標明和春秋時人一例的用詩，他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原也沒有什麼妨碍。現在他已經標明了『論世』和『逆志，』是已有了歷史的態度了。有了歷史的態度還是這般亂講，流毒所至，遂開漢人信口開河與割裂時代的先聲，這是決不可對他輕易諒恕的。

這些意思，請先生批評。我自恨空有求學之志而無求學之力，胸中的問題愈聚愈多，總沒有法子找到

閒暇去解決牠們。這一篇文字自謂解決了幾個問題，但匆忙的集材恐怕是免不了錯誤的。

先生囑我爲國學季刊作文，我也久有這個意思。我想做的文是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下見本冊中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此後我想做的是孔子與六經的關係及老子與道家。

我以爲孔子只與詩經有關係，但也只勸人學詩，並沒有自己刪詩。至于易，書，禮，春秋，可以說是與他沒有關係；即使說有關係，也在「用」上，不在「作」上。例如看報不即爲主筆，聽戲不即爲伶人。

老子決當如梁任公先生說，是戰國末年的書。于梁舉的證據外，我又得兩個證據：

其一，戰國後期因爲遊學之風極盛，誦習簡編，要求簡鍊易記，所以大家作「經」：墨家有墨經，荀子上引有道經，韓非子上有內外儲說之經。老子之文與此同類，當爲好言道妙之士所作之經。若戰國前期，則尚不會有此類著作。

其二，老子痛恨聖智，與莊子胠篋，韓非子五蠹，顯學雖歸宿不同，而出發點則一。實在因爲到戰國後期，社會上所受的遊士的損害重極了，不由得不做一致的呼聲。這種思想在春秋末年及戰國初期也是不會有的。

至于「道家」二字，我好久疑惑，覺得這個名詞起于漢代，非戰國所有。戰國時結羣成派的只有儒墨二家，此外則人自爲說，雖收徒弟，沒有很大的勢力（如許行等）；或者原沒有一定的主義，做什麼事就說什麼話（如蘇秦，張儀等）。漢代所謂「道家」，都是要把自己的心意越出於現實世界之外的這種人，貴於優遊

自得，決不能聚徒成黨，與儒墨分席。所以我做這一篇，要證明的，是老子非孔子之師，道家非戰國所立（老子也決不在莊子之前。）

以上所說的許多意思，拉雜極了，統請先生與適之先生諸位指正。

頡剛敬上。十二，二，二十五。

古史辨第一册中編

三六　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

（登十二，五，六，努力增刊讀書雜誌第九期）

顧頡剛

我二年以來，蓄意要辨論中國的古史，比崔述更進一步。崔述的考信錄確是一部極偉大又極細密的著作，我是望塵莫及的。我自知要好好的讀十幾年書，才可追得上他。但他的著作有二點我覺得不滿意。第一點，他著書的目的是要替古聖人揭出他們的聖道王功，辨僞只是手段。他只知道戰國以後的話足以亂古人的眞，不知道戰國以前的話亦足以亂古人的眞。他只知道楊墨的話是有意裝點古人，不知道孔門的話也是有意裝點古人。所以他只是儒者的辨古史，不是史家的辨古史。第二點，他要從古書上直接整理出古史蹟來，也不是妥穩的辦法。因爲古代的文獻可徵的已很少，我們要否認僞史是可以比較各書而判定的，但要承認信史便沒有實際的證明了。崔述相信經書卽是信史，拿經書上的話做標準，合的爲眞，否則爲僞，所以整理的結果，他承認的史蹟亦頗楚楚可觀。但這在我們看來，終究是立脚不住的：因爲經書與傳記只是時間的先後，並沒有截然不同的眞僞區別；假使在經書之前還有書，這些經書又要降做傳記了。我們現在既沒有『經書卽信史』的成見，所以我們要辨明古史，看史蹟的整理還輕而看傳說的經歷却重。凡是一件史事，應當

看牠最先是怎樣的，以後逐步逐步的變遷是怎樣的。我們既沒有實物上的證明，單從書籍上入手，只有這樣做才可得一確當的整理，才可盡我們整理的責任。

我很想做一篇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把傳說中的古史的經歷詳細一說。這有三個意思。第一，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如這封信裏說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有三皇，到漢以後有盤古等。第二，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時只是一個『無爲而治』的聖君，到堯典就成了一個『家齊而後國治』的聖人，到孟子時就成了一個孝子的模範了。第三，我們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眞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我們即不能知道東周時的東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戰國時的東周史；我們即不能知道夏商時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東周時的夏商史。

但這個題目的範圍太大了，像我這般沒法做專門研究的人，簡直做不成功。因此，我想分了三個題目做去：一是戰國以前的古史觀，二是戰國時的古史觀，三是戰國以後的古史觀。後來又覺得這些題目的範圍也廣，所以想一部書一部書的做去，如詩經中的古史，周書中的古史，論語中的古史………。

我想，若一個月讀一部書，一個月做一篇文，幾年之後自然也漸漸地做成了。崔述的學力我固是追不到，但換了一個方法做去，也足以補他的缺陷了。

這回適之先生到上海來，因爲不及做讀書雜誌的文字，囑我趕做一篇。 我當下就想做一篇論語中的古史因爲材料較少容易做成。 但今天一動筆之後，又覺得趕不及，因爲單說論語自是容易，但若不與他書比較看來就顯不出他的地位，而與他書一比較之後，範圍又大了，不是一二天內趕得出的。 因此，想起我兩月前曾與玄同先生一信，論起這事，固然是信筆寫下，但也足以說出一點大綱。所以就把這篇信稿鈔在這裏，做我發表研究的起點。 我自己知道既無學力，又無時間，說不上研究；只希望因了發表這篇，引起了閱者的敎導和討論，使我可以把這事上了軌道去做，那眞是快幸極了！

十二，四，二十七。

玄同先生：

（上略）

先生囑我爲國學季刊作文，我也久有這個意思。 我想做的文是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 現在先對先生說一個大意，——我這些意思從來沒有寫出，這信恐怕寫得淩亂沒有條理。

我以爲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那時人對於古代原沒有悠久的推測。 商頌說，『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大雅說，『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說，『厥初生民，時維姜嫄。』 可見他們只是把本族形成時的人作爲始祖，並沒有很遠的始祖存在他們的意想之中。 他們只是認定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始祖，並沒有許多民族公認的始祖。

但他們在始祖之外，還有一個『禹。』商頌長發說：『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禹的見於載籍以此爲最古。詩書裏的『帝』都是上帝（帝堯帝舜等不算，詳見後。尚書裏可疑的只有一個帝乙，或是殷商的後王尊他的祖，看他和上帝一樣，加上的尊號，也說不定。）這詩的意思是說商的國家是上帝所立的。上帝建商，與禹有什麼關係呢？看這詩的意義，似乎在洪水芒芒之中，上帝叫禹下來布土，而後建商國。然則禹是上帝派下來的神，不是人。小旻篇中有『旻天疾威，敷于下土』之句，可見『下土』是對『上天』而言。

商頌，據王靜安先生的考定，是西周中葉宋人所作的（樂詩考略，說商頌下）。這時對於禹的觀念是一個神。到魯僖公時，禹確是人了。閟宮說，『是生后稷，……俾民稼穡；……奄有下土，纘禹之緒。』（按，生民篇敘后稷事最詳，但只有說他受上帝的保衞，沒有說他『纘』某人的『緒。』因爲照生民作者的意思，后稷爲始事種植的人，用不到繼續前人之業。到閟宮作者就不同了，他知道禹爲最古的人，后稷應該繼續他的功業。在此，可見生民是西周作品，在長發之前，還不曾有禹一個觀念。）這詩的意思，禹是先『奄有下土』的人，是后稷之前的一個國王，后稷是後起的一個國王。他爲什麼不說后稷纘黃帝的緒，纘堯舜的緒呢？這很明白，那時並沒有黃帝堯舜，那時最古的人王（有天神性的）只有禹，所以說后稷纘禹之緒了。商族認禹爲下凡的天神，周族認禹爲最古的人王，可見他們對於禹的觀念，正與現在人對於盤古的觀念一樣。

在這上，我們應該注意的「禹」和「夏」並沒有發生了什麼關係。長發一方面說，「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一方面又說湯「韋顧既伐，昆吾夏桀，」若照後來人說禹是桀的祖先，如何商國對於禹既感他敷土的恩德，對於禹的子孫就會翻臉殺伐呢？　按長發云「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又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是商在湯以前國勢本已發達，到湯更能建一番武功，把韋，顧，昆吾，夏桀打倒罷了。　禹是他們認為開天闢地的人，夏桀是被湯征伐的一個，他們二人漠不相關，很是明白。

至於禹從何來？禹與桀何以發生關係？我以為都是從九鼎上來的。　禹，說文云，「蟲也，從禸，象形。」　禸，說文云，「獸足蹂地也。」　以蟲而有足蹂地，大約是蜥蜴之類。　我以為禹或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當時鑄鼎象物，奇怪的形狀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動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樣子，所以就算他是開天闢地的人。（伯祥云，禹或即是龍，大禹治水的傳說與水神祀龍王事恐相類。）　流傳到後來，就成了真的人王了。

九鼎是夏鑄的，商滅了夏搬到商，周滅了商搬到周。　當時不過因為他是寶物，所以搬了來，並沒有多大的意味；但經過了長時間的保存，大家對牠就有了傳統的觀念，以為凡是與國都應取九鼎為信物，正如後世的「傳國璽」一樣。　有了傳統的觀念，於是要追溯以前的統，知道周取自商，商取自夏，自然夏商周會聯成一系。成了一系，於是商湯不由得不做夏桀的臣子，周文王不由得不做殷紂的臣子了。　他們追溯禹出於夏鼎，就以為禹是最古的人，應做夏的始祖了。　（書中最早把「夏」「禹」二字聯屬成文的，我尚沒有找到。）

東周的初年只有禹，是從詩經上可以推知的；東周的末年更有堯舜，是從論語上可以看到的。　（堯舜

的故事從何時起，這個問題很難解決：左傳是戰國時的著作；尚書中的堯典臯陶謨也靠不住；論語較爲可靠，所以取了牠。） 論語中二次連稱堯舜（堯舜其猶病諸，）一次連稱舜禹（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又接連贊美堯舜禹（大哉堯之爲君—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禹吾無間然矣，）可見當時確以爲堯舜在禹之前。 於是禹之前有更古的堯舜了。 但堯與舜，舜與禹的關係還沒有提起，或者當時人的心目中以爲各隔數百年的古王，如禹和湯，湯和文武之類，亦未可知。 （論語堯曰篇雖說明他們的傳授關係，但論語經崔述的考定，自季氏至堯曰五篇是後人續入的。 堯曰篇的首章，在文體上很可見出有意摹古的樣子，在宗旨上很可見出秉着「王道」和「道統」兩個主義，是戰國時的儒家面目。）

在論語之後，堯舜的事蹟編造得完備了，於是有堯典，臯陶謨，禹貢等篇出現。 有了這許多篇，於是堯與舜有翁壻的關係，舜與禹有君臣的關係了。 堯典的靠不住，如梁任公先生所舉的「蠻夷猾夏」，「金作贖刑」都是。 即以詩經證之，閟宮說后稷「奄有下國」，明明是做國王，牠卻說成舜的臣子，（后稷的「后」字原已有國王之義，堯典上舜對稷說「汝后稷」，實爲不辭。） 閟宮說后稷「纘禹之緒」，明明是在禹後，牠卻說是禹的同官。 又以論語證之，(1)論語上門人問孝的很多，舜既「克諧以孝」，何以孔子不舉他做例？(2)論語上說「舜有臣五人，」何以堯典上會有九人？ 堯典上既有九人，各司其事，不容偏廢，何以孔子單單截取了五人？ (3)南宮适說「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可見禹稷都是有天下的，爲什麼堯典上都是臣而非君？(4)孔子說舜「無爲而治，」堯典上說他「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又說他「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不

相衝突嗎？ 這些問題，都可以證明堯典出於論語之後。（我意，先有了禪讓的學說而後有堯典，皋陶謨出來，當作禪讓的實證，禪讓之說是儒家本了尊賢的主義鼓吹出來的。） 作論語時，對於堯舜的觀念還是空空洞洞，只推尊他們做兩個道德最高，功績最大的古王；作了堯典等篇，於是堯舜的「文章」都有實事可舉了。

從戰國到西漢，偽史充分的創造，在堯舜之前更加上了多少古皇帝。 於是春秋初年號為最古的禹，到這時真是近之又近了。 自從秦靈公於吳陽作上時，祭黃帝（見漢書郊祀志。 秦國崇奉的神最雜，名目也最詭；秦文公夢了黃蛇作鄜時，拾得了一塊石頭作陳寶祠，實在還是拜物教。 黃帝之祀起於秦國，說不定黃帝即是「黃龍地螾」之類。） 經過了方士的鼓吹，於是黃帝立在堯舜之前了。 自從許行一輩人抬出了神農，於是神農又立在黃帝之前了。 自從易繫辭抬出了庖犧氏，於是庖犧氏又立在神農之前了。 自從李斯一輩人說「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於是天皇，地皇，泰皇更立在庖犧氏之前了。 自從世本出現，硬替古代名人造了很像樣子的世系；於是沒有一個人不是黃帝的子孫了。 自從春秋命歷序上說「天地開闢，至春秋獲麟之歲，凡二百二十六萬年」， 於是天皇十二人各立一萬八千歲了。 自從漢代交通了苗族，把苗族的始祖傳了過來，於是盤古成了開天闢地的人，更在天皇之前了。 時代越後，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無徵，知道的古史越多。 汲黯說，「譬如積薪，後來居上，」 這是造史很好的比喻。 看了這些胡亂偽造的史，堯典那得不成了信史！ 但看了詩經上稀疏的史，更那得不懷疑商以前的史呢！

這些意思如果充分的發揮，準可著成數十卷書。 古代的史靠得住的有幾，崔述所謂「信」的又何嘗

是信，即如后稷，周人自己說是他們的祖，但有無是人也不得而知。因爲在詩書上看，很可見出商的民族重遊牧，周的民族重耕稼，所謂「后稷」也不過因爲他們的耕稼爲生，崇德報功，追尊創始者的稱號。實際上，周人的后稷和許行的神農有什麼分別？這兩個倡始耕稼的古王，很可見出造史的人的重複。他們造史的人爲什麼要重複？原來禹的上面堆積的人太多了，后稷的地位不尊重了，非得另創一個神農，許行一輩人就不足以資號召了！

（下略）

頡剛敬上。十二，二，二十五。

附啓

玄同先生：

這封信發後，沒有接到回覆，使我記掛得很。

在歌戈魚虞模古讀考上讀到先生的跋。跋上說「許慎的說文是一部集僞古字，僞古義，僞古禮，僞古制和僞古說之大成的書。」我很希望先生有辨說文的文字發表。

前月把呂刑與堯典對看，又得了一個對於苗族的傳說的變遷。今天不及寫下，函詳告。

頡剛附啓。十二，四，二十八。

三七　答顧頡剛先生書

錢玄同

（十二，六，十，讀書雜志第十期）

頡剛先生

　先生所說「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一個意見，眞是精當絕倫。舉堯，舜，禹，稷，及三皇，五帝，三代相承的傳說爲證，我看了之後，惟有歡喜讚歎，希望先生用這方法常常考查，多多發明，廓清雲霧，斬盡葛藤，使後來學子不致再被一切僞史所蒙。我從前以爲堯舜二人一定是「無是公」「烏有先生」。堯，高也；舜，借爲「俊」，大也（山海經的大荒東經作「帝俊」）：「堯」「舜」底意義就和「聖人」「賢人」「英雄」「豪傑」一樣，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稱而已。中國底歷史應該從禹說起。各教都有「洪水」的傳說，想來是實有其事的，大概洪水以前便全無歷史可稽了。堯舜這兩個人是周人想像洪水以前的情形而造出來的；大約起初是民間底傳說，後來那班學者便利用這兩個假人來「託古改制」。這類把戲，其實早被韓非戳破了，只因秦漢以後底學者太無見識，糊里糊塗地相信這是眞人眞史，直到康有爲作孔子改制考才把它弄明白了。今讀先生之論證，以長發和閟宮兩詩，方知連禹這個人也是很可疑的了。王靜安說商頌是西周中葉宋國人底作品，此說我不以爲然。王氏不信衞宏序以商頌爲商詩之說，固然不錯；以「景山」及人名，地名，用語，稱名等等證明它是宋詩，尤爲卓識。但王氏所舉與商頌「語句相襲」的萇楚，隰桑，石鼓文，雲漢，烝民，

常武，江漢，采芑諸周詩，雖舊說以為宣幽時代底作品，然我却不敢貿然相信；况王氏又說，『其為商頌襲風雅，抑風雅襲商頌，或二者均不相襲而同用當時之成語，皆不可知，』則王氏本未嘗以此等詞句相像為商頌是西周時詩之證。但王氏又說，『魯頌之襲商頌，則灼然事實。夫魯之於周，親則同姓，尊則王朝，乃其作頌不摹周頌而摹商頌，蓋以與宋同為列國，同用天子之禮樂，且商頌之作，時代較近，易於摹擬故也；』因此斷定『商頌蓋宗周中葉宋人所作以祀其先王，正考父獻之於周太師，而太師次之於周頌之後，逮魯頌既作，又次之於魯後。』他這種證據是不能成立的。他說魯頌襲商頌之為『灼然事實，』大概是根據法言『公子奚斯嘗睎正考甫矣』一語，所以他斷定魯頌『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是擬商頌『陟彼景山，松柏丸丸。』但揚雄這種話實在沒有做證據的價值。其他什麼『同為列國，』什麼『同用天子之禮樂，』什麼『時代較近，』更是臆測無據之談。蓋王氏雖不信衞序，但極信國語『正考甫校（王氏讀為『效』，解為『獻也』）商頌於周太師』之說。我却以為國語這句話也不可輕信；因為用了『太師』和『校』這些字樣，很有漢朝人的色彩。據我看，還是史記說商頌是宋襄公時底詩底話比較地近情。因為商頌中誇大之語甚多，極與魯頌相像。魏源詩古微因魯頌閟宮有『荊舒是懲』及商頌殷武有『奮伐荊楚』之語，說『召陵之師為中夏攘楚第一舉，故魯僖宋襄歸侈厥績，各作頌詩，薦之宗廟，』其說似乎有理。還有，商頌文筆非常之暢達，實在不像東周以前底作品。我這意見，雖與王氏不同，然對於先生『商族認禹為下凡的天神，周族認禹為最古的人王（有天神性的）』這個意見並無衝突；而且我這種講法，與先生所說『可見生民是

西周作品，在長發之前，還不曾有禹一個觀念」的話尤覺契合。

伯祥兄說禹或是龍，此可備一說。先生據說文云「從禸」而想到「禸」訓「獸足蹂地」，以爲大約是蜥蜴之類，竊謂不然。說文中從「禸」的字，甲文金文中均不從「禸」（如「禽」「萬」「禹」「獸」諸字）那「象形九聲」而義爲「獸足蹂地」之「禸」字，殆漢人據訛文而杜撰的字。

我很喜歡研究所謂「經」也者，但我是很「惑經」的。我在十二年前看了康有爲底僞經考和崔觶甫師底史記探源，知道所謂「古文經」是劉歆遍班人僞造的。後來看了康有爲底孔子改制考，知道經中所記的事實十有八九是儒家底「託古」，沒有信史的價值。近來看葉適底習學記言，萬斯同底羣書疑辨，姚際恆底詩經通論和禮記通論（在杭世駿的續禮記集說中）崔述底考信錄等書和其他書籍中關於「惑經」底種種議論，乃恍然大悟：知道「六經」固非姬旦底政典，亦非孔丘底「託古」的著作（但其中有後來底儒者「託古」的部分；論語中道及堯，舜，文王，周公，這才是孔丘底「託古」）「六經」底大部分固無信史底價值，亦無哲理和政論底價值。我現在以爲——

（1）孔丘無刪述或制作「六經」之事。

（2）詩，書，禮，易，春秋，本是各不相干的五部書，（「樂經」本無此書。）

（3）把各不相干的五部書配成一部而名爲「六經」的緣故，我以爲是這樣的：因爲論語有「子所雅

言，詩，書，執禮』和『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兩節，於是生出『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史記孔子世家）之說，又因此而造出『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禮記王制）之說。這一來，便把詩經，尚書，儀禮三部書配在一起了。因爲『樂之原在詩三百篇之中，樂之用在禮十七篇之中』（邵懿辰禮經通論說）故實雖三部，名則四部。又因爲孟軻有『孔子作春秋』之說，於是又把春秋配上。惟何以配入易經，我現在還沒有明白。先生如其知道，請告訴我。

（4）『六經』底配成，當在戰國之末。『六經』之名，最初見於莊子天運篇。又莊子天下篇先說『詩，書，禮，樂，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下又臚舉『詩』『書』『禮』『樂』『易』『春秋』六個名目而不云『六經』。案莊子中可信爲莊周自作者，惟『內篇』七篇而已。天運在『外篇』，天下在『雜篇』，皆非莊周自作，當出於戰國之末。

（5）自從『六經』之名成立，於是荀子儒效篇，商君書農戰篇，禮記經解，春秋繁露玉杯篇，史記（甚多，）漢書藝文志，白虎通等，每一道及，總是六者並舉；而且還要瞎扯了什麼『五常』『五行』等等話頭來比附了！（到了劉歆等『古文家』出來，又在那五部書外加上一部周禮。至於春秋三傳，小戴禮記，以及論語，孝經，爾雅，孟子等書自來皆認爲『傳記』，故流俗所謂『七經』『九經』『十一經』『十三經』也者，都可用『六經』之名賅之。）

我們要考孔丘底學說和事蹟，我以爲只有論語比較的最可信據。我現在把論語之中與所謂『六經

有關的話分別記出如左：

關於詩的有十八則：

A 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學而）

B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爲政）

C 「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八佾）

D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八佾）

E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八佾）

F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述而）

G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泰伯）

H 子曰，興于詩，立於禮，成于樂。（泰伯）

I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泰伯）

J 子曰，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子罕）

K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罕）

L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罕）

M 南容三復「白圭」……（先進）

N「誠不以富，亦祇以異。」（顏淵）

O子曰，誦詩三百，……（子路）

P……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季氏）

Q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陽貨）

R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陽貨）

關于書的有四則：

A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為政）

B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述而）

C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泰伯）

D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憲問）

關於樂的有六則：

A子語魯太師樂，……（八佾）

B子謂韶，……謂武，……（八佾）

C子在齊聞韶，……（述而）

D子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泰伯）

E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泰伯）

F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子罕）

關于易的有三則：

A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述而）

B「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路）

C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憲問）

總說的有三則：

A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述而）

B子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泰伯）

C曰，學詩乎？…曰，學禮乎？…（季氏）

關于禮的話，論語中雖然很多，但大都是論禮意的，和儀禮全不相干。（「射不主皮，」「揖讓而升，下而飲」等語後人雖可引儀禮來附會，但不能說這是孔丘引儀禮的證據。）

關於春秋的話，簡直一句也沒有。「答子張問十世」和「答顏淵問為邦」兩節，今文家最喜徵引，說這是關於春秋底微言大義；但我們仔細讀這兩節話，覺得真是平淡無奇，一點也看不出是什麼「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而且春秋經，公羊傳，春秋繁露中也並沒有和這兩節相同或相近的話。這樣一件大事業，論語

中找不出一點材料來，不是極可疑的嗎！

論語中說到詩的最多。其中P或不足信（崔述說），G還在孔丘之後，將這兩則除開不算外，還有十六則之多。這十六則之中找不出一點删詩的材料來。ABCEIKMNR所引的詩句或篇名都在今本詩經之中，僅D與L爲「逸詩」（D爲逸詩說見後），則孔丘所見的詩，實與今本相差不遠（若說完全一樣，則亦決無此理，即使數目相當而經二千餘年的寫刻，內容底亡逸和增竄是必不能免的）。再看B與O，則孔丘所見的詩原來只有三百篇，並非删存三百篇，這是以前已經有好多人說過的了。只有J中有「樂正，雅頌得所」的話，但這話是論樂，不是論詩；就算是論詩，至多也不過說他編定詩篇次序，決不能作爲删詩的證據。我想孔丘如果曾經删詩，則鄭風必在被删之列，因爲他是主張「放鄭聲」的（前人有謂「聲」是「樂」，不是「詩」，這是要想曲爲彌縫而又强作解人的議論；而且若照秦漢以來底儒者那樣用「聖道」「王化」來論詩，則王柏，閻若璩，萬斯同底話眞是一點不錯，因爲必須將詩經如此删改，然後可以免於邪僻淫亂而合于聖道王化也。

關于書的四則，也找不出一點删書的材料來。除B以外，都是引書。但狠古怪：三次引書，都不在二十八篇之內。照此看來，現在這二十八篇「今文尚書」恐怕與孔丘所見的書狠不相同。

樂無經，則關于樂的六則似乎不必去討論它了。但就F看來，倒是這個沒有經的樂是經過孔丘底整理的。

關於易的雖有三則，但這三則不特不足以證明孔丘曾經贊易，而且反足以證明孔丘與易無關。 A底文句魯論與古論大異。 今本出于鄭玄，鄭于此節從古論讀。 若魯論，則作「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見經典釋文。） 漢高彪碑「恬虛守約，五十以學，」即從魯論。 我以爲論語原文實是「亦」字，因秦漢以來有「孔子贊易」的話，故漢人改「亦」爲「易」以圖附合。 古論是劉歆僞造的壁中經，固不足信；但此字之改，却並非始于古論，因爲史記孔子世家已經作「易」了。 大概漢人初則改「亦」爲「易」；繼則將論語此節改成史記底「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 這種改變，原意殆想將論語此節作爲贊易之證。 不料偶不經心，留下一個大漏洞：他們說孔丘暮年歸魯以後刪訂「六經，」其時他已在七十歲左右；于是論語中「五十」兩字便講不通了，什麼「或五年或十年，」什麼「用五用十，」或改作「卒，」或改作「吾，」講來講去，終難圓謊！ B只引恆卦底爻辭，也與贊易無涉。 至于C底曾參語，在易爲艮卦底大象，但多了一個「以」字，作「君子以思不出其位，」這明明是作大象者襲曾參語而加一「以」字，使與別卦大象底詞例一律，崔述曾據此以爲象傳出於孔丘以後之證。 這豈非反足以證明孔丘與易無關嗎？

至於總說的三則：C可疑，不去論它；A是記孔丘用國語（「雅言」姑從劉台拱說）讀文藝，讀歷史，贊禮；B是論教材底先後次第，與後世所謂「刪詩書，定禮樂」的話全不相干。

「六經」和孔丘無涉，略如上文所云。 那麼，「六經」究竟是些什麼性質的書呢？ 我以爲——

詩是一部最古的總集，其中小部分是西周底詩，大部分是東周（孔丘以前）底詩。什麼人輯集的，當然無可考徵了。至於輯集的時代，我却以爲在孔丘以前；孔丘說「詩三百」，「誦詩三百，」則他所見的已是編成的本子了。先生說，「詩經的輯集必在孔子以後孟子以前，」引今本無「素以爲絢兮」一句又無「唐棣之華」全首爲輯集於論語之後之證（小說月報十四卷一號）。我看似未必然。子夏所問並非碩人之詩。碩人第二章句句都是描寫莊姜底身體之美，末了決不能有「素以爲絢兮」一句。這一定是別一首詩，但「巧笑」二句與碩人偶同罷了。此詩後來全首亡逸。「唐棣」一詩也是全首亡逸。「素絢」爲孔丘所稱道，固不應刪去；即「唐棣」雖爲孔丘所不取，然今本無有，亦非有意刪去，乃是偶然亡逸的。有亡逸也許還有增竄。例如都人士底首章，惟毛詩有之，三家均無（見禮記緇衣釋文）不知是本有而三家亡逸呢，還是本無而毛詩據左傳（襄十四），禮記（緇衣），賈誼新書（等齊篇）增竄呢。無論異相如何，總可以作詩經傳寫必有亡逸或增竄之證。但雖有亡佚或增竄，總是原始本的變相，不能說它們是兩個本子。

書似乎是「三代」時候底「文件類編」或「檔案彙存」，應該認它爲歷史。但我頗疑心它並沒有成書，凡春秋或戰國時人所引夏志，周書等等，和現在所謂逸周書者，都是這一類的東西，所以無論今文家說是廿八篇，古文家說是一百篇，都不足信；既無成書，便無所謂完全或殘缺。因爲它常常被人稱引，於是「託古」的人們不免要來僞造了。現在的二十八篇中，有歷史底價值的恐怕沒有幾篇。如堯典，皋陶謨，禹

貢，廿誓等篇一定是晚周人僞造的。逸周書中，僞篇一定也占了大部分。還有一層，尚書卽無僞篇，也只是粉飾作僞的官樣文章，采作史料必須愼之又愼。前代學者不信任它的只有一個劉知幾。以崔述的勇於疑古，而對於它則深信不疑，這是他被『王道』『聖治』底觀念所蒙了。

禮。儀禮是戰國時代胡亂鈔成的僞書，這是毛奇齡，顧棟高，袁枚，崔述諸人已經證明的了。周禮是劉歆僞造的。兩戴記中，十分之九都是漢儒所作的。

樂。樂本無經，而古文家造出『魏文侯底樂人竇公獻書於漢文帝，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之說（見漢書藝文志），其意殆欲以此冒充『樂經』。但這故事造得太不像了，因爲照他所說，竇公獻書時已有二百五六十歲光景！（康有爲說。）

易。我以爲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時代底東西；『乾』『坤』二卦卽是兩性底生殖器底記號。初演爲八，再演爲六十四，大家拿它來做卜筮之用；於是有人做上許多卦辭，爻辭，這正和現在底『籤詩』一般；『无咎』『悔亡』，和『上上』『中平』『下下』一般。這些『籤詩』大概不止一種（但連山，歸藏之說則決不可信），所以左傳所載與今易經頗多不同。孔丘以後的儒者借它來發揮他們底哲理（這也是『託古』）有做彖傳的，有做象傳的，有做繫辭傳的，有做文言傳的，漢朝又有焦贛，京房一流人做的說卦傳，不知什麼淺人做的序卦傳，不知那位學究做的雜卦傳，配成了所謂『十翼』。

春秋。王安石（有人說不是他）說它是『斷爛朝報』，梁啓超說它像『流水賬簿』，都是極確當的

批語。孟軻因爲要借重孔丘，於是造出「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的話，就這部斷爛朝報，硬說它有「義」硬說它是「天子之事」。一變而爲公羊傳，再變而爲董仲舒之春秋繁露，三變而爲何休之公羊解詁，於是「非常異義可怪之論」愈加愈多了。但公羊氏（？）與董仲舒所說的春秋之義，雖非原始的春秋所有，却是有條理，有系統，自成一派學說；後來忽然跑出一個文理不通的穀梁氏（？）來學舌，說了許多幼稚可笑的話，那便真不足道了。至於左傳本是戰國時代一個文學家編的一部「國別史」，即是國語，其書與春秋絕無關係；到了劉歆，將它改編，加上什麼「五十凡」這類鬼話，算做春秋底傳，而將用不着的部分仍留作國語（康有爲說）。這部書底信實的價值，和三國演義差不多；但漢以前最有價値的歷史總不能不推它了。

這是我現在對於所謂「六經」是什麼性質的書的意見。

從實際上說，「六經」之中最不成東西的是春秋。但春秋因爲經孟軻底特別表彰，所以二千年中，除了劉知幾以外，沒有人敢對它懷疑的。孟軻是第一個講「道統」的人，他底全書底末章由堯，舜，湯，文王，孔子，敘到他的時候，明明有「獨力肩道統」的意思。他全書中講到春秋，共有三處（沒有子細查，不知有無遺漏）：

A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滕文公下）

B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離婁下）

C孟子曰，春秋無義戰。（盡心下）

B的話實在不通，詩和春秋的系統關係，無論如何說法，總是支離牽強的。我以為這三則都是孟軻要將自己底學說依託孔丘，正與朱熹自己底『格物窮理說』和王守仁自己底『致良知說』要依託大學同樣地心理。他要闢楊墨，為了他們是『無君無父』的學說，所以有A說；他是貴王賤霸的，所以有B說；他是說『善戰者服上刑』的，所以有C說。A底後面，有『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和『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等語，則依託孔丘以肩道統之意昭然若揭了。前人講春秋，很相信孟軻底話很不相信孫復底春秋尊王發微底話。其實照孟軻底意思，必須像孫復那樣講法才能圓滿的。

我上面那種翻案的議論，只是要研究所謂『六經』的那幾部書的原始面目，只是要研究它們與孔丘有無關係而已。若講偽書底價值，正未可一概而論。亂抄亂說的固然不少，至如易之彖，象，繫辭傳，如小戴禮記中之禮運，中庸，大學諸篇，如春秋之公羊傳與繁露，如周禮，這都是極有價值的『託古』著作。但不能因其有價值便說是姬旦孔丘所作，也不能因其非姬旦孔丘所作便說是無價值。我很佩服姚際恆，崔述，康有為那樣『疑古』的求真態度，很不佩服他們那樣一味痛罵偽書的衛道態度。

二千年中底學者對於「六經」的研究，以漢儒爲最糟。他們不但沒有把眞僞辨別淸楚，他們自己還要作僞。他們不但沒有把文句解釋明白，他們自己底文理大都是不通的。無論今文家，古文家，都是「一丘之貉」。什麼禘祫，明堂，封建，井田，宮室，祭器等等，人各一說，而且一個人還要自相矛盾；這可見他們全是望文生訓，閉眼胡說。淸儒以爲漢儒去先秦未遠，其說必有所受；於是專心來給他們考證疏解，想出種種方法來替他們圓謊，其實是上了他們底當了！毛亨（？）底文理最不通，鄭玄底學問最蕪雜，他倆注詩經，鬧的笑話眞是不少。鄭玄以後，直到賈公彥孔穎達諸人，不過將廢話越說越多罷了。中唐以後，曙光漸見，如李翶韓愈之於論語，啖助趙匡陸淳之於春秋，劉知幾之於尙書，春秋，都能不爲舊說所蒙，開宋明以來疑經的先路。宋儒所言經義，大都是將他們自己底學說套在古經底身上，無論好壞，總之十有七八非古經所本有。但如歐陽修，鄭樵，朱熹，葉適諸人底辨僞，成績却是很大。他們還有一種好處，是求文理通順；不但朱熹注四書很講究文理，就是被大家目爲「陋儒」的蔡沈和陳澔，他們注解尙書和禮記也比「僞孔安國」和鄭玄要通得多。從淸初到現代，既有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俞樾，孫詒讓，章太炎師諸人講通文義，又有閻若璩，姚際恆，崔述，康有爲諸人的推翻僞經，這幾部古書（「六經」）底眞相漸漸地可以撥雲霧而見靑天了。但以前底學者無論如何大胆疑古，總不免被成見所囿。先生說，「崔述著書的目的是要替古聖人揭出他們的聖道王功，辨僞只是手段，」眞是一針見血之論。姚康諸人也是這樣。所以他們總要留下一團最厚最黑的雲霧，不肯使靑天全見的。我們現在應該更進一步，將這團最厚最黑的雲霧盡力撥除。

中國底僞書眞多，現代人底著作之中還有僞的，章太炎的白話文中有錢玄同的文章（中國文字略說）！所以我們要看中國書，無論是否研究國學，是否研究國史，這辨僞的工夫是決不能省的。「六經」在古書中不過九牛之一毛，但它作怪了二千多年，受害的人眞是不少了；它作怪時用的許多法寶之中，「僞書」和「僞解」就是很重要的兩件，我們不可不使勁來推翻它。

「辨說文的文字，」現在還不能就做，因爲我對於這方面的研究還很淺。我現在只能將疑說文的理由簡單奉告：

許愼是表彰「壁中古文經」底文字的。「壁經」之出於劉歆「壞壁（即孔壁）虛造，」經康有爲和崔觶甫師底證明，我認爲毫無疑義了。壁經既僞，則其文字亦僞。許愼所記篆文，所釋形體，大都與甲文金文不合，而說文中所謂「古文，」尤與甲文金文不合。依我底研究，甲文最古，金文次之，石鼓文及大篆又次之（石鼓文爲秦文，從馬叔平說；大篆爲秦文，從王靜安說）秦之金石刻及小篆又次之。說文所列小篆，已多漢人傳譌之體；近見選橙理董許書稿本，他說說文中的小篆還不如漢隸的較爲近古，極爲有見。至於說文中所謂「古文，」所謂「奇字，」乃是劉歆輩依仿傳誤的小篆而僞造的，故與甲文金文底形體相去最遠。因爲小篆是傳誤的，「古文」是僞造的，所以說是「僞古字。」「僞古義」如「告，牛觸人角著橫木，所以告人也，」「射，弓弩發於身而中於遠也」之類。「僞古說，」如「楚莊王曰，止戈爲武」「孔子曰，

一貫三為王』之類。至於『偽古禮』和『偽古制』，這是從偽經上來的，若將偽經推翻，則說文中這兩部分便不攻而自倒了。

要說的話還沒有完，今天暫止於此，請先生教正。

先生關於呂刑與堯典方面的新發明，便希示我。

玄同。一九二三，五，二五。

三八　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

劉掞藜

（十二，七，一，讀書雜志十一期）

在讀書雜誌第九期讀到顧君頡剛的『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顧君是要辨論中國的古史，想比崔述那『儒者的辨古史』更進一步，作那『史家的辨古史』底事業；要由看傳說的經歷做一番『確當的整理』工夫。這種研究底精神是很可欽佩的。自另一方面言之，歷來少有人疑經書不是信史，現在顧君卻以為拿經書做標準是立脚不住的；因看古史傳說的變遷，遂大大疑起堯舜禹底史事來。這種疑古底精神，比崔述確是更進一步，也是很可欽佩的。

但我對于顧君所疑不惟不很滿意，反使我生了好些疑問。所以我信手寫下就問於顧君。

顧君說：「商頌長發說：「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禹的見於載籍以此爲最古。詩書裏的「帝」都是上帝（帝堯帝舜等不算……）……看這詩的意義，似乎在洪水芒芒之中，上帝叫禹下來布土，而後建商國。然則禹是上帝派下來的神，不是人。小旻篇中有「旻天疾威，敷于下土」之句，可見「下土」是對「上天」而言。」

這種推想是很不能使人滿意的。因爲卽把『禹敷下土方』的『下土』說作對『上天』而言，並不見得遂有『禹是上帝派下來的神，不是人』的意思。我們讀魯頌閟宮『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奄有下土，』及大雅下武『成王之孚，下土之式』這兩處並言『下土』如果以『禹敷下土方』說爲『上帝叫禹下來布土，……禹是上帝派下來的神，不是人，』然則后稷也是上帝叫他下來奄有下土，武王也是上帝叫他下來爲下土之法了，他們也是神，不是人麽？

果如顧君所說，『禹敷下土方』是『上帝叫禹下來布土，』則『帝立子生商』更明明白白說是上帝置子而生契，若以爲禹是神，不是人，則契更是神，不是人了。那末，我們將詩經展開來讀，神還多哩：如商頌玄鳥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這裏明言上帝叫燕子下來生契，後來又叫湯去正域彼四方，不但契是神，不是人，就是湯又何嘗是人呢？又大雅文王有聲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皇矣亦說『帝謂文王，無然畔援，……帝謂文王，予懷明德，……帝謂文王，詢爾仇方，……』看上帝給命與

文王，又和文王這樣地對語，然則文王也是神不是人麼？

顧君說：『商頌據王靜安先生的考定是西周中葉宋人所作的。……這時對于禹的觀念是一個神；到魯僖公時禹確是人了。閟宮說「是生后稷，……俾民稼穡；……奄有下土，纘禹之緒。」（按生民篇敍后稷事最詳，但只有說他受上帝的保衞，沒有說他「纘」某人的「緒」。因爲照生民作者的意思，后稷爲始事種植的人，用不到繼續前人之業。到閟宮的作者就不同了，他知道禹爲最古的人，后稷應該繼續他的功業。在此，可見生民是西周作品，在長發之前還不曾有禹的一個觀念）這詩的意思，禹是先「奄有下土」的人，是后稷之前的一個國王，后稷是後起的一個國王。他爲什麼不說后稷纘黃帝……堯舜的緒呢？這很明白，那時沒有黃帝堯舜。』

但是我們翻開詩經大雅，小雅一讀，西周時候的詩如韓奕嘗言『奕奕梁山，維禹甸之，』信南山亦言『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文王有聲言『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這三詩對於禹的觀念也是一個神麼？我們且拋開這些，再就顧君所承認爲西周宋人所作的商頌來看。商頌殷武說，『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這詩對於禹的觀念也是一個神嗎？不然，『西周對于禹的觀念是個神，到魯僖公時禹確是人了，』這句話恐怕不能成立吧？

至于生民詩作者的意思以『后稷爲始事種植的人，用不到繼續前人之業，』顧君已自言之。因爲生民作者以后稷爲始事種植的人，用不到繼續前人之業，所以無須把禹的事情牽進去。顧君何以又說『生

固是要振作意志，勉力把範圍縮小，作深入的研究，一方面又禁不住新材料的眩惑，總想去瞧它一瞧。等到一瞧之後，問題就來了；正在試作這個問題的研究時，別種問題又接二連三的引起來了。不去瞧則實爲難熬，一去瞧又苦無辦法。這眞是使我最感痛苦的一件事。要是研究學問的人多了，我感得到的問題別人也感得到，大家分工去做，我的本分以外的問題就可由他人去解決，我只要把他人研究的結果用來安慰我自己的好奇心就夠了。但在現在這樣的生活之下，又哪裏可以盼望這種境界的實現呢！

上條所述的不能分工治學的煩悶，原是現在中國許多有志學問的人所公同受到的。至於在生活上，我所受的痛苦也特多，約略可作下列的敍述。

我生平最可悲的事情是時間的浪費和社會上對於我的不瞭解的責望。但這應加上一個說明我隨順了自己的興味而費去的時間並不在浪費之內，因爲這是多少得到益處的。例如買書，看戲，聽鼓詞等等嗜好，當時固然完全爲的是欣賞，但到了現在，在研究上都受用了。就是賭博，喝酒，逛窰子，坐茶館等等，我也都犯過，但這只使我知道大家認爲嗜好的不過是這麼一回事，使我知道這些事情是不足以激起我的興味的，從此再不會受它們的引誘，時間的破費也不是徒然。一個人自幼年到成長原只在彷徨覓路之中：走的路通，就可永遠走下去；走的路不通，也可以不再費力去走。惟其當時肯耗廢覓路的功夫，纔能在日後得到該走的大道。所以只要自己有興味去嘗試，總與自己有益。我在這些事上耗廢的時間，是決不怨的。只有十餘年來在新式學校中過的上課生涯，使得我一想着就要叫屈。學校教員的智識大都是不確實的，他

們自己對於學問也沒有什麼樂趣，使我看着他們十分的不信任，幾乎沒有在課業中得到什麼。 中小學時代，我尚未發生愛惜時間的觀念，隨班上課，只是坐待鐘點的完畢。 在這煞耐鐘點的時候，逢着放任的敎員我就看課外的書，逢着嚴厲的敎員我就端坐冥思，上天下地般瞎想。 這樣的生活過了多少年，造成了我的神經衰弱的病症，除了極專心讀書作文之外，隨時隨地會得生出許多雜念，精神上永遠沒有安靜。 進了大學之後，因爲愛好學問，不由得不愛惜時間。 但是敎員仍不容我，我恨極了！ 看我民國初年的筆記，滿幅是這等的牢騷話。 我以爲我們所以要有學問，原要順遂自己的情性，審察外界的事物；現在所學的只有一些模糊影響之談，內既非情，外亦非物，爲的只是敎員的薪金和學生的文憑，大家假借利用，捱延過多少歲月。他們各有所爲而捱延，卻害苦了眞正願意自己尋求學問的我，把我最主要的光陰在無聊的課堂上消磨掉了！ 固然我也在學校敎育中得到些粗疏的科學觀念，但要得到這一點粗疏的觀念只消自己看幾本科學書，做上幾次實驗也就夠了，何必化去十餘年的大功夫呢！ 他們在那裏殺靑年眞可恨，靑年們甘心給他們殺也可鄙！

自從出了學生界，免去了無聊的上課，我總以爲可以由我自己支配時間了，哪知道又不然。 現在中國的做事的人不知道爲什麼會得這樣少，在社會上跳動的老是這幾個人，這幾個人似乎是萬能的，樣樣事情都須他們經手。 我因爲屢屢受了他人的邀約而發表些文字，姓名爲世所知，所以一般人也以爲我是有意活動的，結合什麼團體，每承招致。 我嘗把和我發生關繫的團體（不管是實際的或名義的）寫出一看，竟

有了二十餘個；分起類來，有歷史，古物，文學，圖書館，教育，哲學，政治，社會，商業，編輯十種。這眞使我驚駭極了！我一個人如何有這麼多的技能，又如何有這麼强的精力！在社會上活動固然有出鋒頭的樂趣，但我哪裏愛出這種的鋒頭呢。要是我永久這樣的做下去，我的將來的能力至多不過像現在一樣罷了，我的一生也就完了！再想我在社會上是到處退避的，尚有這許多牽掣，那麼，這些自告奮勇的人，他們名下的團體又要有多少？社會上多的是團體，有了團體的名目再從事於分頭拉人。無論拉進的人必不能實心實意地做，就是願意做切實的工作的也要不勝別方面的拉攏，做了一點就停止了。這樣做去，是永久活動而永久得不到結果的。

我感到生命的追促，人智的短淺，自己在學問上已竭力節縮慾望，更何能爲他人奪去時間，所以要極力擺脫這種漩渦，開會常不到，會費常不繳，祈求別人的見捨。可是時代的襲擊到底避免不盡，我的肩膀上永遠担負着許多不情願的工作。我只得取一點巧，凡是和我有關的事情總使它和自己願意研究的學問發生些聯絡：例如文學方面的要求，我就借此作些民衆藝術的文字應付過去；政治方面的要求，我又作了些歷史的文字應付了。這樣幹去，頗有些成效。這二年中，我所以和民俗學特別接近，發表的東西也最多之故，正因我把它與研究所的職務發生關係。研究所中有風俗調查會和歌謠研究會，我便借此自隱了。這當然是很不該的，但我深知道研究與事務的不相容，終不願爲了生計的壓迫而把自己的願望隨人犧牲。只是這樣做去，雖不致完全埋沒了自己，而所做的工作總是「雞零狗碎」的，得到的成績決不是我的意想中

的成功。我心中有許多範圍較廣的問題，要研究出一個結果來，須放下幾個月或幾年的整功夫的，它們老在我的胸膈間亂擂，彷彿發出一種呼聲道「你把我們悶閉了好久了，爲什麼還不放我們出來呢？」我眞是難過極了。所以我常對人說，「你們可憐了我吧！你們再不要教我做事情吧！我就是沒有一絲一毫的職務我自己的事情已經是忙不過來的了！」

我記得幼時常見人圈點一部書（如史記，漢書文選等）圈完了一遍之後買一部新的再圈下去。我很瞧不起這班人的迂拘和遲緩，以爲讀書只要翻翻就是了，照這樣的讀法，一生能彀讀得幾部。那時我的胸中既沒有宗旨，也沒有問題，所以看書雖多，時間依然是寬裕的；因時間的寬裕而把學問看得更輕易。現在有了宗旨，許多問題都引起來了，無論看哪種薄薄的書，只覺得裏面有許多是可供舊有問題的研究材料的，有許多是可以發生新問題的。因爲都是有用的材料，都不忍棄去，鈔出既沒有空閒，不鈔出又似乎負上了一筆債，所以我到現在，眞不敢隨便翻動哪一本書，除了我要把它自首至尾讀一遍的。我始迴憶先輩的讀書方法，很想揀出幾部必須精熟的基本書籍，一字一字地讀去，細細咀嚼，消化成自己的血肉。可恨現在的時勢只許人發議論而不許人讀書，所謂讀書也只是浮光掠影地翻覽，像我幼年的行徑一般，我懷了正式讀書的願望久久無法使它實現。豈但是讀書呢！我的袖珍筆記冊積了一抽屜了，裏面有許多是見聞所及的鈔撮，有許多是偶然會悟的見解，很有謄入紅格本筆記簿的價值。但是鉛筆的影子已經漸漸地澌滅了，急寫的字體也有許多認不清了，卻還沒有動手鈔寫。我眞悲傷，難道我的過去的努力竟不由得我留下一

些殘影來嗎？

這幾年，社會上知道我有志研究歷史的很多，對於這方面的期求也特別重，許多人屬望我編成一部中國通史。我雖沒有研究普通史的志願，只因沒有普通史，無論什麼歷史問題的研究都不易得到一種憑藉，爲自己研究的便利計，也願意從我的手中整理出一個大概來。我的心中一向有一個歷史問題，渴想借此得一解決，即把這個問題作爲編纂通史的骨幹。這個問題是：中國民族是否確爲衰老，抑尙在少壯？這是很難解決的。中國民族的衰老，似乎早已成爲公認的事實。戰國時，我國的文化固然爲了許多民族的新結合而非常壯健，但到了漢以後便因君主的專制和儒教的壟斷，把它弄得死氣沈沈了。國民的身體大都是很柔弱的；智識的淺陋，感情的淡薄，志氣的卑怯，那一處不足以證明民族的衰老。假使沒有五胡，契丹，女眞，蒙古的侵入，使得漢族人得到一點新血液，恐怕漢族也不能苟延到今日了。現在世界各強國劇烈地壓迫我們，他們的文化比我們高，他們再不會像以前的鄰族一般給我們同化；經濟侵略又日益加甚，逼得我們人民的生計困苦到了極端；又因他們的經濟侵略誘起我們許多無謂的內爭，人民死於鋒鏑之下的不計其數：眼看一二百年之中我們便將因窮困和殘殺而滅種了！在這一方面着眼，我們民族眞是衰老已甚，滅亡之期迫在目前，我們只有悲觀，只有坐而待亡。但若換了一種樂觀的眼光看去，原還有許多生路可尋。滿蒙回藏諸族現在還在度漁獵畜牧的生活，可以看作上古時代的人民。就是號稱文明最早的漢族所居的十八省中，苗猺獞僰等未開化的種族依然很多，明淸兩代「改土歸流」至今未盡。這許多的種族還說不

到壯盛，更哪裏說得上衰老。　就是漢族，它的文化雖是衰老，但託了專制時代「禮不下庶人」的福，教育沒有普及，這衰老的文化並沒有和民衆發生多大的關係。　所以我們若單就漢族中的智識階級看，他們的思想與生活確免不了衰老的批評，但合了全中國的民族而觀，還只可說幼稚。　現在國勢如此貧弱，實在僅是病的狀態而不是老的狀態。　只要教育家的手腕高超，正可利用了病的狀態來喚起國民的健康的要求。　生計固然困苦，但未經開發的富源正多，要增加生產，享用數千年來遺棄的地利，並不是件難事。　內爭固然繼續不已，但或反足以激動人民參預政治的自覺心，使得他們因切身的利害而起作內部的團結。（例如四川的民團因軍閥的殘暴而發生，現已力足抵制軍閥。　河南山東的紅槍會也是由於自衛的要求而起，可惜智識太低，以至流於義和團一類的行徑，這是須教育家補救的。）　體質固然衰弱，但教育方法和生育觀念的改變也足以漸漸造成強壯的青年，或者過了幾代之後可以一改舊觀。　因此，在這一方面着眼，只要各民族能彀得到相當的教育，能彀發生自覺的努力，中國的前途終究是有望的。　這真是關係我們的生死存亡的一個最重大的歷史問題。　這個問題究竟如何，非費多年的功夫去研究決不能清楚知道。　我生丁離亂之際，感觸所及，自然和他人一樣地有志救國；但是我既沒有政治的興趣，又沒有社會活動的才能，我不能和他人合作，我很想就用了這個問題的研究做我的唯一的救國事業，盡我國民一份子的責任。　我在研究別種問題時，都不願與實用發生關係；惟有這一個問題，卻希望供給政治家，教育家，社會改造家的參攷，而獲得一點效果。　至於研究的方法，我很想先就史書，府縣志和家譜中尋取記載的材料，再作各地的旅行，搜集

風俗民情的實際的材料。可是我的生活如不能使我作安定的研究，這個計畫是無從進行的；社會上固然期望我；從容容地期望而不給我以實現的境遇，也是望不出結果來的。（前年承沈尹默先生的好意，囑爲孔德學校編纂歷史講義，我卽想向着這一方面走去；只因諸務忙冗，到今沒有編了多少，很使我悵恨不安。）

我的第二種痛苦是常識的不充足和方法的不熟練。我幼年在翻書中過日子，以爲書多自然學富，心中很自滿。二十後讀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在橫通篇中見到以下一節議論

老賈善於販書，舊家富於藏書，好事勇於刻書，皆知雅名流所與把臂入林者也。……然其人不過琴工碑匠，藝術之得接於文雅者耳；所接名流既多，習聞淸言名論，而胸無智珠，則道聽塗說，根底之淺陋亦不難窺。周學士長發以此輩人謂之『橫通，』其言奇而確也。……學者陋於見聞，接橫通之議論，已如疾雷之破山，遂使魚目混珠，淸濁無別，而其人亦囂然自命，不知其通之出於橫也！……

讀了這一段，自覺我的學問正是橫通之流，不覺得汗流浹背。從此想好好地讀書，但我這時只把目錄平議一類書算作我的學問的標的。過了幾年，又使我羞愧了。民國五年的筆記中有一則道：

自章實齋以來，學者好言校讎，以爲爲學始於目錄，故家派流變區以別矣。然目錄者，爲學之途徑，非其嚮往之地也。今得其途徑而止，遂謂綱目條最之事足以盡學，而忘其原本，此則猶誦食譜而饜飫厨矣。太炎先生與人書云『往見鄉先生譚仲修，有子已冠，未通文義，遽以文史，校讎二種敎之。其後抵掌說莊子天下篇，劉歆諸子略；然不知其義云何。』按，此卽任目錄而廢學之弊也。予初誦實

齋通義，卽循力求目錄書得其一句，以爲知味。自受業於伯弢先生，頗願爲根本之學，以執簡御繁，不因陋就簡。乃校課逼迫，不得專攻；所可致力，仍繼前軌。思之輒汗顏不止。

到這時，我總算想讀原本書而不再滿足於目錄序跋所載的綱要了。但我的心中還沒有生出問題，以爲整理國故只要專讀故書好了；若與世界學問打通研究，恐有「古今中外派」的附會的危險。直到近數年，胸中有了無數問題，並且有了研究問題的工作，方始知道學問是沒有界限的，實物和書籍，新學和故書，外國著作和中國撰述，在研究上是不能不打通的。無論研究的問題怎樣微細，總須到渾茫的學海裏去撈摸；而不是浮沈於斷港絕潢之中所可窮其究竟。於是我需要的基本的知識和應用的方法乃大感不足！

我自小學到大學，爲了對於教員的不信任，大都沒有用過功。猶記在中學時初學幾何，我不懂得它的用處，問同學，問教員，都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我以爲這不過是算學上的一套把戲而已，並沒有實際的需要，就不去注意。到了現在，除了書首的幾條定義還有些影子之外，其餘完全模糊了。他種科學也都這樣，翻開來時有些面善，要去應用時便覺得隔膜。我很想得到二三年工夫，把以前所受的課業統統溫理一遍，因爲這些都是不可減少的常識，要在現在時代研究學問是不應不熟習的。外國文我雖讀過四種，只因都不曾出力去讀，也沒有一種讀好。近數年來，我用了極度的勉力，從沒有空閒中硬抽出些時間來自修，結果卻總是「一曝十寒」，沒有多大的效驗。我也想得到二三年工夫，把它讀好兩種。所以我惟一的想望，便是如何可以獲得五六年的閒暇，讓我打好一個學問的根底，然後再作研究，再在文壇上說話。我相信社會

（十二，七，一，讀書雜志第十一期）

中國古籍經過秦火一大刧，到了兩漢有許多學者利用着『託古改制』造成好些僞籍出來，眞僞雜糅，莫衷一是，所以上古的史學很難研究。近來國內許多有名學者對於古史都取懷疑的態度，這是我們最贊成的。不過古史裏比較稍近事實的地方却也不少，斷不能一概抹煞。

最近努力週報附刊的讀書雜誌第九期內登載顧頡剛先生給錢玄同先生論古史一書，顧先生主張以爲中國古史是層累地造出的，堯舜禹稷的事蹟都是靠不住。原文篇幅很長，想看努力報的人大都見過，這裏不必細說，我只抽出他說禹的那一段來和閱者談談吧。

本來戰國以前經傳和諸子書中說禹的地方很多，實物也有『岣嶁碑』等，顧先生却一概唾棄，只相信詩經和論語，所以本文也只就詩經來說。這點要請閱者注意。

顧先生因商頌長發篇說『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斷定當時作詩的人以爲禹是上帝派下來的神，不是人。並引小旻篇『旻天疾威，敷于下土』爲例，斷定下土是對上天而言。

我以爲『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二句，正是敍禹平治水土的話，和信南山篇說『信彼南山，維禹甸之，』韓奕篇說『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文王有聲篇說『豐水東注，維禹之績，』都是一樣意思，並沒有含着神祇的觀念，而且信南山篇下接『畇畇原隰，曾孫田之，』韓奕篇下接『有倬其道，韓侯受命，』文王有聲篇下接『四方攸同，皇王維辟，』把曾孫，韓侯，皇王和禹相提並論，都是人類，並不曾把禹當天神般看待。這三篇

不都是西周作品嗎？ 可見先生所說的『這時對于禹的觀念是一個神，』這個肯定完全錯誤了。 若說下土，對上天而言，更屬拘執。 那下武篇的『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又何嘗有天神的意思呢？

先生以生民篇不說后稷纘某人的緒，作閟宮的人却說他纘禹之緒，便斷定生民篇出世時還沒有禹一個觀念，到閟宮時纔有禹這個人。 又因閟宮不說黃帝堯舜，却偏說禹，更斷定那時最古的人王只有禹。 這種理論也欠圓滿。 須知生民篇是郊祀的樂歌，古人神權最重，若在迎神侑樂時對着所祀的神說他的功勞係纘述別人的餘緒，未免得罪神靈，所以這詩不說纘誰的緒大概因此。 不比閟宮篇頌禱當代國君，帶敍上代的事，儘可盡情暢說；兩詩體裁本絕不同。 此外還有別種原故（如後人作詩的趁韻等，）何能責詩人說一律的話。 至不說黃帝堯舜而單說禹，自因禹的水功和稷的土功有連帶的關係，所以單單說他，決不能就因此斷爲這時人的心目中最古的人王只有禹。

先生又因長發篇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以爲禹和夏並沒什麼關係。 又說若照後來人說禹是桀的祖先，如何商國對於禹既感他敷土的恩德，對于禹的子孫就會翻臉殺伐呢？ 先生這種意見好像每一朝開始的君主有些恩德於人，他的子孫就無論如何暴虐，天下人均應永遠絕對服從了。 這般拘執的論調我實不願更辨。

最奇妙的是先生因說文禹字訓蟲便以爲禹不是人類，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 又引伯祥云：「或即是龍。……」這般望文生義的解釋，如何叫人信服呢？ 若依這個例子，則舜字本義說文訓作蕣草，難道帝舜就

是一種植物嗎?

此外原文還說有「堯典作在論語之後，后稷有無是人不可知」種種議論，我都不敢盲從。只因爲篇幅的關繫，俟後有機會再談罷。

我以爲古史雖然雕雜，但只限在堯舜以前。若堯舜以後的史料，似乎比較稍近事實。我且把我依據的理由寫在下面：

一 古史官是世傳的，他們父傳子，子傳孫，容易把史料保存。就是突遭兵火，他們因職務上關繫，不能不盡法搜輯。況列國有史官，一國失傳，還有別國可以參互考訂，决不能各國同時間對於某時代造出一色的假貨。例如司馬氏在燒書以後，還能保全一部分史料，作成史記。他所敍商朝事實，和新近出土的龜甲文大致差不多相同。商代如此，夏代便也可知。可見那堯舜禹湯决不是完全杜撰了。

二 古人一命以上每每鑄造重器，各有款識，流傳下來，恰是考古的好資料，所以歷代學者多很注意。春秋時代那虞夏彝器當然還多。若依顧先生所說「堯舜禹湯係層累地添出，」當時學者豈有不知參考之理。例如九鼎既鑄有魑魅罔兩等怪物，諒必還有文字說明，何得把鼎上的蟲類忽然移到鑄鼎人身上作爲那人的名字呢?

三 天文家歲差之說創始唐一行，其理論則萌芽於晉虞喜，三國以前並沒有一人知道。若依顧先生

所說堯典是春秋以後造出的僞作的，那麼何以堯典的天象和春秋時代不同而又暗合歲差的公例呢？ 世間那裏有這般湊巧的事。 我想那假冒的人，在歲差原理未發明時，決不敢把天象說作兩岐，致惹反響。 今堯典却老實說出，可見牠是有根據幷非僞造了。

顧先生要推翻全部古史，當然要尋出幾個充分證據，方可叫人信服，斷不能這樣附會周納。 我很盼望先生和許多學者拋棄主觀的見解，平心靜氣細細研究，再把研究的結果整理一部上古的信史出來，那纔是我們最歡迎的事。

十二，六，二，作於績溪上川。

四〇 答劉胡兩先生書

顧頡剛

（十二，七，一，讀書雜志第十一期）

掞藜
堇人 先生：

由努力社轉到兩位先生的質問，披讀一過，眞使我高興得很。 我本來的意思，是要先把與古史有關的書一部一部的讀了，把內中說及古史的地方鈔出，歸納成為一篇『某書中的古史』；等到用得着的書都讀

完了，牠們說着的古史都抽出了，再依了牠們的先後關係，分別其眞僞異同，看出傳說中對于古史的變遷，彙成一篇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不幸豫計中的許多篇「某書中的古史」還沒有做，而總括大意的與玄同先生書先已登出，以至證據不充，無以滿兩位先生之意，甚以爲愧。

但我覺得我這一文的疏漏是有的，至於這個意思總不能輕易認爲錯誤，所以我想把胸中所有的意見詳細寫出，算做答文，與兩位先生討論下列諸項問題：

(1)禹是否有天神性？(2)禹與夏有沒有關係？(3)禹的來歷在何處？(4)禹貢是什麼時候做的？(5)后稷的實在如何？(6)堯舜禹的關係如何？(7)堯典，皐陶謨是什麼時候做的？(8)現在公認的古史系統是如何組織而成的？

以上的題目當在一二月內做畢，登入讀書雜志。

本期讀書雜志限于篇幅，不能登載我的答文；我現在僅把我對於古史的態度說了。研究古史自應分析出信史和非信史兩部分。信史的建設，適之先生上月來書曾說一個大旨，鈔錄於下：

我對於古史的大旨是：

1.商民族的時期，以河南爲中心。此民族的來源不可考。但商頌所記玄鳥的神話當是商民族的傳說。關於此一時期，我們應該向「甲骨文字的系統的研究」裏去尋史料。

2.周民族的時期，約分三時期：

(a)始興期，以甘肅及陝西西境爲中心。

(b)東侵期，以陝西爲中心滅了河南的商民族的文化而代之。周公之東征，召公之南下，當在稍後。

(c)衰落期，以東都爲中心，僅存虛名的共主而已，略如中古時代之「神聖羅馬帝國」。

3.秦民族的時期也起於西方，循周民族的故跡而漸漸東遷，至逐去犬戎而占有陝西時始成大國。

以時間言之，可得下表：

商民族

周民族　　戰國

秦民族

楚民族

(甲骨文字)　(金文)　(詩)　(歷史)

石器時代(附注)　銅器時代

至於以山西爲中心之夏民族，我們此時所有的史料實在不夠用，只好置之於「神話」與「傳說」

之間，以俟將來史料的發現。

(附注)發見澠池石器時代文化的安特森(J. G. Anderson)近疑商代猶是石器時代的晚期(新石器時代)。我想他的假定頗近是。

適之先生這段話可以做我們建設信史的骨幹。

在推翻非信史方面，我以為應具下列諸項標準：

(一)打破民族出於一元的觀念。在現在公認的古史上，一統的世系已經籠罩了百代帝王，四方種族，民族一元論可謂建設得十分鞏固了。但我們一讀古書，商出於玄鳥，周出於姜嫄，任宿須句出於太皞，郯出於少皞，陳出於顓頊，六蓼出於皐陶庭堅，楚夔出於祝融鬻熊(恐是一人)，他們原是各有各的始祖，何嘗要求統一！自從春秋以來，大國攻滅小國多了，疆界日益大，民族日益併合，種族觀念漸淡而一統觀念漸強，于是許多民族的始祖的傳說亦漸漸歸到一條綫上，有了先後君臣的關係，堯典，五帝德，世本諸書就因此出來。中國民族的出於一元，俟將來的地質學及人類學上有確實的發見後，我們自可承認牠；但現在所有的牽合混纏的傳說我們決不能胡亂承認。我們對於古史，應當依了民族的分合為分合，尋出他們的系統的異同狀況。

(二)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我們讀了史記上黃帝的『東至於海，西至於空桐，南至於江，北逐葷粥，』以為中國的疆域的四至已在此時規定了，又讀了禹貢，堯典等篇，地域一統的觀念更確定了。不

知道禹貢的九州，堯典的四罪，史記的黃帝四至乃是戰國時七國的疆域，而堯典的羲和四宅以交阯入版圖更是秦漢的疆域。　中國的統一始於秦，中國人民的希望統一始於戰國；若戰國以前則只有種族觀念，並無一統觀念。　看龜甲文中的地名都是小地名而無邦國種族的名目，可見商朝天下自限於『邦畿千里』之內。　周有天下，用了封建制以鎮壓四國—四方之國，—已比商朝進了一步，然而始終未曾沒收了蠻貊的土地人民以為統一寰宇之計。　我們看，楚國的若敖蚡冒還是西周末東遷初的人，楚國地方還在今河南湖北，但他們竟是『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鄭國是西周末年封的，地在今河南新鄭，但竟是『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　那時土地的荒蕪如此，那裏是一統時的樣子！　自從楚國疆域日大，始立縣制；晉國繼起立縣，又有郡；到戰國時郡縣制度普及，到秦併六國而始一統。　若說黃帝以來就是如此，這步驟就亂了。所以我們對於古史，應當以各時代的地域為地域，不能以戰國的七國和秦的四十郡算做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

（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　古人對於神和人原沒有界限，所謂歷史差不多完全是神話。　人與神混的，如后土原是地神，卻也是共工氏之子；實沈原是星名，卻也是高辛氏之子。　人與獸混的，如夔本是九鼎上的罔兩，又是做樂正的官；饕餮本是鼎上圖案畫中的獸，又是縉雲氏的不才子。　獸與神混的，如秦文公夢見了一條黃蛇，就作祠祭白帝；鯀化為黃熊而為夏郊。　此類之事，舉不勝舉。　他們所說的史固決不是信史，但他們有如是的想像，有如是的祭祀，卻不能不說為有信史的可能。　自春秋末期以後，諸子奮興，人性發

逢，於是把神話中的古神古人都『人化』了。人化固是好事，但在歷史上又多了一層的作僞，而反淆亂前人的想像祭祀之實，這是不容掩飾的。我們對於古史，應當依了那時人的想像和祭祀的史爲史，考出一部那時的宗教史，而不要希望考出那時以前的政治史，因爲宗教是本有的事實，是眞的，政治是後出的附會，是假的。

（四）打破古代爲黃金世界的觀念。古代的神話中人物『人化』之極，於是古代成了黃金世界。其實古代很快樂的觀念爲春秋以前的人所沒有；所謂『王』只有貴的意思，並無好的意思。自從戰國時一班政治家出來，要依託了古王去壓服今王，極方把『王功』與『聖道』合在一起，於是大家看古王的道德功業眞是高到極頂，好到極處。于是異於征誅的禪讓之說出來了，『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的人也出來了，堯典皋陶謨等極盛的人治和德化也出來了。從後世看唐虞，眞是何等的美善快樂！但我們返看古書，不必說風雅中怨苦流離的詩儘多，即官撰的盤庚大誥之類，所謂商周的賢王亦不過依天託祖的壓迫着人民就他們的軌範，要行一件事情，說不出理由，只會說我們的占卜上是如此說的，你們若不照做，先王就要『大罰殛汝』了，我就要『致天之罰於爾躬』了！試問上天和先王能有什麼表示？況且你既可以自居爲天之元子，他亦可以自說新受天命，改天之元子；所謂『受命』『革命』，比了現在的僞造民意還要胡鬧。又那時的田畝都是貴族的私產，人民只是奴隸，終年服勞不必說，加以不歇的征戰，死亡的恐怖永遠籠罩着。試問古代的快樂究在那裏？我們要懂得五帝三王的黃金世界原是戰國後的學者造出來給君王看樣的，

庶可不受他們的欺騙。

以上四條為從雜亂的古史中分出信史與非信史的基本觀念，我自以為甚不誤。惜本期篇幅甚短，不能暢說。

頡剛敬上。十二，六，二十。

四一　研究國學應該首先知道的事

錢玄同

（十二，八，五，讀書雜志十二期）

我今天到讀書雜志的編輯部去，看見新寄來的三篇文章：兩篇是胡堇人和劉掞藜二君駁顧頡剛君論古史的；一篇是顧君答劉胡兩君的信。他們辨駁的問題，我暫時不加入討論；因為我對於這些問題還未曾子細研究，雖然我是很贊同顧君的意見的。我現在所要說的，是因看了胡劉二君的文章而聯想到現在研究國學的人有三件應該首先知道的事（應該首先知道的事不限於這三件，不過我現在只想到這三件罷了。）下面雖然借着胡劉二君的文章做個例，其實和胡劉二君所討論的問題是沒有關係的。

哪三件事？（一）要注意前人辨偽的成績。（二）要敢于「疑古」。（三）治古史不可存「考信于六藝」之見。

（一）中國的僞書僞物很多，研究國學的第一步便是辨僞（但辨僞的工夫是常常要用着的，並不限於第一步。） 前人辨訂僞書僞物，有許多已有定論的，我們應該首先知道，一則可以免被僞書僞物所欺，二則也可以省却自己辨訂的工夫。 但現在研究國學的人太不注意這事了，所以常要誤認已有定論的僞書僞物爲眞書眞物。 如胡堇人君相信岣嶁碑眞是夏代之物便是一例。 他不知道這是楊愼造的假古董。一般講歷史的人相信明人假造的竹書紀年爲汲冢舊物，講文學的人相信東晉僞古文尚書中的五子之歌眞是夏代之詩；……都和胡君犯着同樣的毛病。 我以爲胡應麟的四部正譌，姚際恆的古今僞書考，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孫志祖的家語疏證，崔述的考信錄，康有爲的僞經考，王國維的今本竹書紀年疏證等等辨僞的名著，都是研究國學的人應該先看的書。

（二）僅僅知道了前人辨僞的成績還不夠事，因爲前人考訂所未及或不敢認爲僞造的書物還狠不少。 我們研究的時候應該常持懷疑的態度才是。 我們要是發見了一部書的可疑之點，便不應該再去輕信牠，尤其不應該替牠設法彌縫。 我看了劉掞藜君論堯典的話，覺得他是錯誤的。 劉說全本梁啓超君；我現在把梁說錯誤之處說明如下。 梁君因堯典中有『蠻夷猾夏』一語是『時代錯迕』而疑爲僞作（中國歷史研究法再版頁一七五）；又因堯典所記中星在公歷紀元前二千四五百年時確是如此而說『堯典最少應有一部分爲堯舜時代之眞書』（同書再版，頁一五九。） 我以爲『猾夏』一語確可認爲僞書的證據（梁君此疑本于其師康有爲君的孔子改制考，中華民國九年重刻本卷十二頁五）；而中星的問題却

還不能認爲眞書的證據。 我們說堯典是戰國時代的作品，堯舜是『無是公，』『烏有先生，』或者大家不肯相信這話。 現在姑且讓步從舊說認堯典爲古史，堯舜是有這兩個人的。 但堯舜是什麽時代的人，我們實在無從知道；因爲比較可信的舊史只有史記，史記的紀年始於周召共和元年，卽公歷紀元前八百四十一年，這以前的年代便絕無可攷。 堯舜的時代既無從知道，那就不能因堯典所記中星合於公歷紀元前二千四五百年時的情形而認牠是堯舜時代的眞書了。 其實堯典之不足爲信史，梁君也狠知道，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明明說虞夏書是周人所追述的（頁二八及三七），只因被『彌縫』之一念所誤，于是總想保存牠一部分，認爲堯舜時代的眞書，而不顧立說之難通了。 這個毛病，犯的人最多；所以中庸，禮運，毛詩，周禮諸書常常有人揭穿牠們可疑之點，而常常有人替牠們彌縫。 彌縫的原故便是『不敢疑古。』 他們總覺得較後的書可以疑而較古的書不可疑，短書小記可以疑而高文典冊（尤其是經）不可疑。 殊不知學術之有進步全由於學者的善疑，而『贋鼎』最多的國學界尤非用極熾烈的懷疑精神去打掃一番不可。 近來如梁啓超君疑老子，胡適君和陸侃如君疑屈賦，顧頡剛君疑古史，這都是國學界狠好的現象。 我希望研究國學的人都要有他們這樣懷疑的精神。

（三）我覺得胡劉二君的文章中狠有『信經』的色彩，因此聯想到現在治古史的人仍舊不脫二千年來『考信於六藝』的傳統見解。 他們認經是最可信任的史料，我以爲不然。 我現在且不談我的『離經畔道非聖無法的六經論，』姑照舊說講，也不能說經是最可信任的史料。 舊時說經，有『今文家，』『古

文家，」『宋儒』三派，雖彼此立說不同，但總不出『受命改制，』『王道聖功』這些話的範圍；沒有說到牠在史料上的價值。到了近代，章學誠和章炳麟師都主張『六經皆史，』就是說孔丘作六經是修史。這話本有許多講不通的地方，現在且不論。但我們卽使完全讓步承認二章之說，我們又應該知道，這幾部歷史之信實的價值遠在史記和新唐書之下；因爲孔丘所得的史料遠不及司馬遷，宋祁，歐陽修諸人，『夏禮殷禮不足徵』之語便是鐵證。梁玉繩對於史記還要『志疑，』吳縝對於新唐書還要『糾謬，』則我們對於六經更應當持『志疑』『糾謬』的態度，斷不可無條件的信任牠的。

一九二三，六，二五，於北京。

四二　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

顧頡剛

（十二，八，五——十二，十二，二，讀書雜志十二期）

得了兩位先生的質問，禁不住我作答的興致。但胸中存着的意思太多，只得分期回答。這一期登的專是辨禹，預計下一期辨禹貢，又下一期辨堯典皋陶謨，又下一期辨后稷及文王之爲紂臣（文王的問題爲我的原文所無，因劉先生說起這事，也提起我辨論的興致，）末一期辨現在公認的古史系統。希望這文登完之後，兩先生及其他讀者都給我嚴正的批評，使得我的意思應該修正的修正，應該取消的取消，而不誤的

主張亦可以成立。

(1)禹是否有天神性？

我所以疑禹為天神，是由『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而來。劉先生以為說了『下土』不即是天神，引后稷武王作例，我也承認。我並且想到雅頌中所以說『下土』，『下國』特多之故，是由於對上帝及祖先而言；帝與祖皆在上天，故自言為下；若對『人』言，便為『王國』，『王土』，『四方』，『四國』，『土宇』……了。我原來又以為楚詞上說『禹降省下土方』，自上至下為降，也有上帝派下的意思；但看了『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等句，覺得還不能算做理由。故此文中把『下土』與『降』的兩詞擱起。

但我雖把這兩詞擱起，依舊以為禹是一個神。現在把詩書中說及禹的話鈔在下面一證：

詩——

（一）信彼南山，維禹甸之。（信南山）

（二）豐水東注，維禹之績。（文王有聲）

（三）奕奕梁山，維禹甸之。（韓奕）

（四）是生后稷，……纘禹之緒。（閟宮）

（五）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長發）

（六）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殷武）

書（除去堯典，皋陶謨，禹貢三篇）——

（七）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敍。（洪範）

（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立政）

（九）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呂刑）

我們從這九條看來，可以歸納出周代人對于禹的四條觀念：

(a)禹平水土是受的上帝命。（七），（九）

(b)禹的『迹』是很廣的。（一），（二），（三），（六），（八）

(c)禹的功績是『敷土，』『甸山，』『治水。』（一），（二），（三），（五），（九）

(d)禹是一個耕稼的國王。（四）

以上只有(d)條最特別，我現在就先說這條。

我在上次文中說『禹是后稷之前的一個國王，后稷是後起的一個國王，』現在想想，覺得猶不盡然。所謂『纘禹之緒，』實在是纘禹的耕稼之緒。這詩的語意正與論語所說相同。論語說：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泰伯）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憲問）

論語上不說禹何由治洪水的大功績而只說禹『躬稼』，『盡力溝洫，』這是很奇怪的事。論語中所說的禹與閟宮的一模一樣，惟此二書與他種傳說立異，這是很應注意的事。按魯頌與論語俱作於魯國，時間距離約二百年，可見魯國人對于禹的觀念是最平常的；不似王朝與宋國人的想像中的禹那樣偉大。（鄒魯間人神權思想甚是淡薄，讀論語孟子可知。一讀左傳楚詞，郊祀志等，就覺得齊晉秦楚諸國的神話的發達了。這個緣故須得考究。）

倘使詩書所記盡如閟宮和論語，禹確是人王，不應當再有天神的懷疑了。若有人說，禹的事實惟魯國爲得其眞，其餘都是流傳而失其眞的，以此證明禹的爲人，似乎也說得過去。但我想，禹若果是在后稷之前的一個耕稼的國王，后稷之名也就不會有了；后稷之所以爲后稷，原是尊崇他倡始耕稼，加上的名號。若他只有『纘緒』，也不應獨居此名了！我們再看，在西周時，古王任農事的惟有后稷；在東周的魯國，后稷之前又有禹；到戰國時，烈山氏之子柱先做后稷了，舜也『發於畎畝之中』了，倡始耕稼的尊號又給神農奪去了。在西周時，原以進入農業社會不久，而耕稼的事又倡始於周民族，周民族既得了中國，要想竭力的推廣牠，所以有始祖后稷的尊崇，所以有『純其藝黍稷』的告教（酒誥），所以有『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公劉）及『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無逸）的稱美。若果有神農，杜，舜，禹的耕稼在前，則到周初已有一二千年了，農業的發達已久了，又何必這樣的鄭重鼓吹呢？

(d)條既是後起之說，（或是魯國特有之說，）我們再看上三條。

(a)條洪範上『天』『帝』互稱，可見帝卽是天；殛鯀的是天，與禹的亦是天。呂刑上的『皇帝』向被說經者因堯典而解作帝舜。但試看上文『虐威庶戮方告無辜於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下卽接說『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又接說『皇帝淸問下民，』末又說『上帝不蠲，降咎于苗，』文義原是一貫。上下。既言上帝，不容中間獨言人帝。況『皇』與『上』俱爲形容詞，故天可稱『上天』亦可稱『皇天』，『上帝』與『皇帝』爲一名的互文，意義甚明。皇帝既是上帝，他所命的三后當然含有天神性。合之於洪範所言禹的治洪水，平水土，由於上帝的命令，自無可疑。

劉先生說，『若以爲禹是神，不是人，則：……商頌玄鳥有：……「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湯又何嘗是人呢？又大雅文王有聲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皇矣亦說「帝謂文王，無然畔援；……帝謂文王，予懷明德，……」看上帝給命與文王，又和文王這樣地對語，然則文王也是神，不是人麼？』我對於這問的解答，以爲『稱天而治，』『替天行道，』是古代王者的慣技。他們說上帝與之接近，是爲自己的聲勢計；故出了他們的勢力範圍，這種神話也就沒有勢力。所以玄鳥的古事不見於周人的詩，而文王受命一般的事決不會見於商族的稱說。且武湯文王的來踪去跡甚是明白，他們有祖先，有子孫，所以雖有神話而沒有神的嫌疑。至於禹，他的來踪去跡不明，在古史上的地位是獨立的（父鯀子啓全出於僞史，不足信）。他不是周族的祖先而爲周族所稱，不是商族的祖先而亦爲商族所稱，他的神話是普遍的。地位的獨立，神話的普遍，

惟有天神纔能如此！

(b)條禹迹之廣，立政上說得稍詳。「方行天下，至於海表，」可見禹的足迹無所不至。(後來的山海經即本此觀念而作者。) 在這一條上，我們無從懸揣他是神是人因爲人迹固是迹，「獸蹄鳥迹」也是迹，漢武帝時的「大人迹」也是迹。

禹的最有天神的嫌疑的地方，我以爲乃在(c)條上。(c)條所舉禹的功績是敷土，甸山，治水。還是劉先生以爲最無神的氣味的。但我始終不解，土是怎樣的敷法？山是怎樣的甸法？敷，前人解作分，以爲即是分州；又解作賦，以爲是分配九州的賦役。這種解法，很覺牽强；且在「洪水芒芒」中就有這般上軌道的辦事也未免太早計了。我們看詩書上「敷」字的用法不出二種：長發的「敷奏其勇，」康誥的「往敷求於殷先哲王，」爲普遍義；顧命的「敷重篾席，」小旻的「旻天疾威，敷於下土，」長發的「敷政優優，」爲鋪放義。解作普遍義的，爲副詞或形容詞；解作鋪放義的，爲動詞。又古無輕唇音，敷與鋪二字音義均同，故可通用：如周頌的「敷時繹思，」左傳引作「鋪時繹思」(宣十二年)；毛詩的「鋪彼淮濆，」韓詩作「敷彼淮濆」(釋文引)，均可證。長發的「禹敷下土方，」敷是動詞，當然是鋪放之意。這一句的意思，即是說「在茫茫的洪水中，禹鋪放土地於下方。」天問言禹治水，有「洪泉極深，何以寘之？」的問。寘與塡同。這一句的意思，即是問「在極深的洪泉中，如何鋪塡着土地來？」正可與長發所言對照。

甸，詩經上除了兩個「維禹甸之」以外找不到別的，無從比較。從前人都作「治，」這不過看見禹貢

上有「治梁及岐」的話而牽引上來了，無根據。鄭玄周禮注云，「甸，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稍人。）可見漢時詩經有不作甸而作敶的。甸敶同音，敶即陳，為軍陣之陣的本字，乃是排列分布之意。天問云，「日月安屬？列星安陳？」乃是問日月繫屬在什麼地方，星宿是那一個所陳列的。尚書多士云，「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這是把賢才分布到四方，正是敶意。信南山謂南山為禹所甸，韓奕又謂梁山為禹所甸，試問禹把這些山是如何排列分布的？我意陳山正與鋪土相連，土為禹所鋪，山亦為禹所陳。我上文中曾說周代人對於禹的觀念正和魏晉間人對于盤古的觀念差同，此意甚覺不誤。

治水的「治」字是後人加上去的。詩經中說「豐水東注，維禹之績，」績當即是迹。照了上條所說，那時人看得土是禹鋪的，山是禹陳的，則水道自然也是禹所排列的了。洪範說他治水的話甚不明白，似乎他一得到了上帝的九疇，洪水就會平復似的。我們所以深信他治水之故，乃是受了孟子，禹貢等書的影響。

若禹確是人而非神，則我們看了他的事業真不免要駭昏了。人的力量怎能敷鋪土陳山？就說敷土是分畫九州，甸山是隨山刊木，加以疏瀹江河，試問要做多少年？在「洪水橫流，禽獸偪人」的時候又應做多少年？據孟子，說他做這番事業只有八年，就硬用了禹貢的「作十有三載乃同」之句也不過十三年，試問有何神力而致此？現在導一條淮河，尚且費了許多時間無數工力還沒有弄好，何況舉全國的山川統幹一下，而謂在幾年之間可以成功，這不是夢話嗎！

廣雅說，『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此本山海經）。我們就算他單走這兩條直線，八年之中一天已經要走十八里半；何況人類不能走鳥道，他又不是單單定一個四至，一定要盤岸縈迴，繞山轉水，每天豈不要走幾百里路！這個樣子，除非說他專在路上飛跑總還說不過去。但飛跑了，試問『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鄣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周語下）等大功績又如何做法呢？就說全國的人民各來工作，他只是監工，試問他一個人到各處查勘一週已經要費多少日子？何況皐陶謨明說他『予乘四載，隨山刊木，……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而益稷的幫助只在『奏庶鮮食，』試問在我們的理性上能說他是一個『人』嗎？若他可說為人，則六天造成世界的上帝也可以拉到人類中來了！

禹之為神，我想大家總可在此承認。至於禹的神職是什麼，我以為可在呂刑看出。呂刑說，『禹平水土，主名山川，』這句話一向給人看得最平淡的，他們以為禹平了水土更去題山川的名字。但我讀了左傳，不信這是確解。左傳道：

『或間茲盟，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襄十一年傳

『名有五，……不以山川，……以山川則廢主』（桓六年傳

可見所謂『名山川』是『名山名川』；『名』是形容詞，不是動詞。所謂『主名山川，』乃是主領名山川，為名山川之神；『主』是動詞，不是副詞。漢書郊祀志謂始皇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八神為天

主，地主等。『主名山川』爲名山川之主，義甚顯豁。我常疑周代以后稷配享上帝，上帝以下最尊者莫如稷，何以又禹稷連稱，若甚有關係者？（因我不信禹稷同官，故有此疑。）一天讀魯語，恍然大悟。魯語道：

『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杜，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

這一條雖是戰國時的話，但很有注意的價值。『皇天后土』爲春秋時習語，但在周頌中只見祀上帝，祀祖先，以后稷配上帝，不見有天地享祀並立的痕跡；照他們的意思，恐是以地屬天而不是以地齊天的。不知何時始有『后土』字出現；又不知何時始以『皇天后土』並言。小雅甫田有『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之語；大雅雲漢又有『祈年孔夙，方社不莫』之語。社从示从土，方亦訓地，其爲祀地無疑。祀社之禮不知始于何時。甲骨卜辭中無『社』字。甘誓雖有『戮于社』之言，但甘誓本僞書，不足信。論語哀公問社，宰我答的『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恐亦是無徵之言。自有社祀，其後乃以『社稷』連稱。社爲土地，稷爲民食，兩者爲國家根本，故春秋時以『社稷』一名爲『國家』的代名詞。（社稷連稱爲詩書中所無而左傳中所特多。）稷之爲后稷，自無疑義。戰國時因古史已提高不少，故另立一柱于后稷之前，這也是他們的長技。社之爲禹，國語雖無明文，而看其『能平九土』之語，實卽是禹。又看周語中太子晉的話：

昔共工氏……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共工用滅。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共之從孫四嶽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

滯，……可見魯語的共工氏乃是戰國時人拿來裝在禹的上面的，與杜加于稷上正同。 知共工氏裝于禹上，則禹之爲社又得一間接的證明。 禹爲社，稷爲稷，禹稷之所以連稱由于社稷的連稱，禹稷之所以並尊由于社稷的並尊，甚是明白。 小雅楚茨以下，有信南山，甫田，大田諸篇，皆是祀農神之詩。信南山讚美禹德而言「維禹甸之，」甫田，大田述祀事而言「以社以方，」「以御田祖，」「田祖有神。」 田祖雖不必爲禹，而禹既爲土地之神，則大而敷土甸山，小而濬畎澮耕稼，莫非其分內之事。 閟宮與論語所說，恐即由社神與田祖的傳說上來。大小雅皆宣王前後詩（我信西周初期的詩只有周頌），則禹爲社神之說起于西周後期可知了。

總以上的話，可以對于禹的性質下一假定：

西周中期，禹爲山川之神；後來有了社祭，又爲社神（后土）。 其神職全在土地上，故其神蹟從全體上說，爲鋪地，陳列山川，治洪水；從農事上說，爲治溝澮，事耕稼。 耕稼與后稷的事業混淆，而在事實上必先有了土地然後可興農事，易引起禹的耕稼先于稷的觀念，故閟宮有后稷纘禹之緒的話。 又因當時神人的界限不甚分清，禹又與周族的祖先並稱，故禹的傳說漸漸傾向于「人王」方面，而與神話脫離。

(2)禹與夏有沒有關係?

上面所引詩書中言禹的九條，完全沒有連及夏字。 今再看詩書中言「夏」的有沒有連帶說禹;

詩——(一)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蕩)

(二)韋顧既伐，昆吾夏桀。(長發)

書——(三)相古先民有夏……有夏服天命(召誥)

(四)有夏不適逸……殷革夏命。(多士)

(五)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多方)

(六)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立政)

這六篇上也是全沒有提起夏與禹的關係。 固然像劉先生所說，「詩篇上有省文節字使句子長短整齊或音節便讀底道理，」但我依然疑惑何以詩書中有九篇說禹，六篇說夏，乃一致的省文節字而不說出他們的關係? 況詩經中有一個例，凡是名詞只有一個字的每好湊成兩字，而兩字以上的名詞則不刪。 如「螽斯」「鹿斯」則以「斯」湊成兩字，「維莠」「維鳩」則以「維」湊成兩字。 若「麀鹿濯濯」「鳲鳩在桑」則名詞已有兩字，便不須加襯字了如「王命仲山甫」「命程伯休父，」名詞雖在二字以上，也不加省節了。 十月之交云: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

讀此，很可見人名爲單字的則「維」字加于人名官名爲單字的則「維」字加于官名，務使一句湊成四字。「維禹何之」「維禹之績」正是此例。禹若果是人王，亦應照了「后稷」「公劉」「王季」之例而稱他爲「后禹」，（至少也要像國語和堯典的稱他爲「伯禹」）禹若果是夏王，亦應照了「夏后」「夏桀」之例而稱他爲「夏禹」。何以詩書上九處說禹，卻只有一個禹字，或襯上一個維字，再沒有別字聯屬，篇篇有省文節字的需要呢？就說維字不爲襯字而爲頓重語氣之用，贊美禹功必用維字以致其情，用了維字則四字已全，禹只能爲單字，這無論只適用于詩經上的三條，尚有六條說不過去，即就這三條而論，頓重語氣原不必定爲四字之句，如「維仲山甫補之」「維此王季其心則友」，仲山甫與王季的名號亦無礙其不爲單字也。

多士，多方並言夏殷，言殷則必舉成湯，言夏則從不舉禹。這是什麼道理？我們且說這是偶然的漏略罷，試再看立政：

>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
>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克用三宅三俊。……嗚呼，其惟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

這一段是把夏與商對舉的，都是說夏商起先的時候如何好，後來的時候如何壞。但何以在商則舉出創業的成湯與亡國的受，而在夏則但舉出亡國的桀而不舉出創業的禹？做立政的人並不是不知道禹的（篇

末卽言「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他何以不把禹和湯並舉呢？又何以在篇末卻又單舉了禹呢？這不是在劉先生所說的「省文節字」的範圍之內的，因爲在誥謨的文中原不必省，而且在對舉的文中也不應省。

禹爲人王，讀閟宮篇可知在春秋時的魯國已經確定了。但禹與夏的關係，詩書上沒說，論語上也沒說，直至戰國中期方始大盛，左傳，墨子，孟子等書卽因此而有「夏禹」的記載。（依我考定，左傳是紀元前三百年間所著，約當赧王初元。墨子書決是「墨分爲三」之後所作。諸子著書都在戰國後期，若前期則並無著書觀念。此係另一問題，後當詳論。因爲這種話到了戰國才有，所以我不敢相信。

禹與夏沒有關係，是我敢判定的；禹與夏何以發生關係，我還不敢下一斷語。現在把我的推想寫在下面以備商榷：

（1）周始於后稷，商始於契，是有明文的；獨夏代則只知有末王而不知有首王。爲稱說「三代聖王」便利計，有補足的需要。論語中以夏商爲「二代」，又單言堯舜禹。以堯舜禹置於夏商之上，則禹與夏最爲近，故有合一的趨勢。

（2）詩書中屢言「有夏」「時夏」，此是對四夷而言之「中國」，疆域既不大，且含有種族之義。迨乎「禹迹」，是無遠不屆的。春秋以後種族觀念日微，「諸夏」的境界日事擴張，與理想中的禹迹相當，遂使「夏」與「禹」合而爲一。「諸夏」之夏改指夏代，言禹遂爲夏代首王。

（3）我們稱禹爲夏禹，正和稱堯爲唐堯，舜爲虞舜一樣的無稽。論語上只言堯舜而不言唐虞，唐虞之號不知何自來。左傳上所說的陶唐和有虞乃是夏代時的二國，引之於下：

> 夏書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哀六）
>
> 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歸于有仍，生少康焉。……澆使椒求逃奔有虞，爲之庖正。……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哀元）

在左傳上，舜沒有姚姓，虞亦不言舜胤，堯沒有唐號，唐亦不言堯後，或猶保存得一點唐虞二國的本相，（雖亦未始不可說爲丹朱商均之裔，但他們二人即根本不可信。）我尋求禹和夏，堯和唐，舜和虞所以發生關係之故，以爲這是戰國的僞史家維持信用的長技。他們覺得堯舜禹都是冥漠中獨立的個人，非各裝在一個着實的地方不足以使得他們的地位牢固，於是這些假人經由僞史家的作合，就招贅到幾個眞國度裏做主人了！這確是很有效力的事。試看蚩尤共工之類，當時的傳說何嘗不盛，只是沒有經過僞史家的安頓，至今在古史中永是浮沈不定，隨人轉移，比了堯舜禹相去何啻天淵，這可見沒有占到地盤的苦處了！

(3)禹的來源在何處？

我上一文疑禹爲動物，出於九鼎，這最引起兩先生的反對。我於此並不抗辯，因爲這原是一個假定。

我只把當初立此假定之故條列於下

(1)我讀了左傳上王孫滿對楚子的話，「昔夏之方有德也，……鑄鼎象物，……魑魅罔兩莫能逢之，」以爲九鼎是神話的出產地。又見說文訓「禹」爲「蟲」，訓「内」爲「獸足蹂地，」合此二義，頗似蜥蜴，而彝器上有「螭，」正作蜥蜴之形，似禹有出于九鼎的可能。

(2)魯語有「木石之怪曰夔罔兩，水之怪曰龍罔象」的話，與左傳所言可相證合。夔龍正是堯典上的九官之二，而竟是九鼎上的魑魅罔兩，然則與夔龍同官的禹既有疑竇，自亦有出于九鼎的可能了。

(3)彝器上的夔係屬獸形，呂氏春秋又記樂正夔有一足的傳說（察傳）堯典上又說他會使「百獸率舞，」夔之爲獸實無可疑。推之于禹，頗覺說文所說近是。

(4)左傳所記貪于飲食的縉雲氏不才子饕餮乃是彝器上圖畫的獸。呂刑所記苗民中始作亂的蚩尤，乃是彝器上大耳大眼長面的獸。合之于夔螭之類，可見「古史的人」很有出于「鼎上的獸」的可能。

(5)在傳說中，鯀是先禹治水的人。說文云，「鯀，魚也。」左傳云，「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昭七。）朱熹楚詞注云，「左傳言鯀化爲黃熊；國語作「黃能。」按：熊，獸名，能，三足鱉也。說者曰，獸非入水之物，故是鱉也」（天問。）則鯀爲水中動物古代已有此說。禹既繼鯀而興，自與相類，故淮南子即有禹化爲熊以通轘轅之道的故事。

(6)天問言治水事，有『鴟龜曳銜，鯀何聽焉？』及『應龍何畫？』之問。山海經本此，言『禹治水時有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流通，禹因而治之也。』可見治水的神話中水族動物極多；引禹爲類，並不足奇。

(7)左傳與天問均說鯀化熊，天問又說『伯禹腹鯀，』又說『焉有龍虬負熊以遊，』覺得『伯禹』與『龍虬』有合一的可能。龍螭同形，覺得第一條理由又得一憑藉。

以上是說明我所以有『禹爲動物，出於九鼎』的假定的緣故。我現在對於這個假定的前半還以爲不誤，對於後半便承認有修正的必要了。

我所以要修正這條假定之故，因爲九鼎不鑄于夏代，禹說緣起于西周的中葉，已有堅強的理由了。王孫滿對楚子一段話最露破綻的是『貢金九牧』一語。九州的傳說起於戰國（詩經上『九有』『九圍，』猶言『四方』『八表，』乃是四方四隅加上中央，不是畫分土地爲九州。）九牧之說當然不可靠。貢金之說，適之先生來書云『鐵固非夏朝所有，銅(bronze)恐亦非那時代所能用。發見澠池石器時代的安特森疑商代猶是石器時代的晚期（新石器時代），我想他的假定頗近是。』本來夏代彝器從沒有發見過，即學者考定的商代彝器亦並無確實出于商代的證據，不過比較了周器，把語句簡單的，字體特異的歸在商代罷了。商器尚如此茫昧，夏之尚未進於銅器時代自不必說，那裏能鑄出九鼎！至於九鼎的來源，我以爲當是成王建立東都時鑄下的大宗器（或商末所鑄而西周所遷，）用來鎭撫王室的。當時初入銅器時代，銅料豐富，鑄器要求重大，也是可有的事。至於鼎上刻鏤神物，乃是古代的風氣，左傳所謂『鑄鼎象物』

還是可信，（現在保存的彝器有物象的很多，這上的神話必有資於古史，惜考古家不注意此事。） 不過禹說既是後起，他的神蹟還來不及對上九鼎罷了。

我對於禹的來歷很願意再下一個假定：『禹是南方民族的神話中的人物。』 我所以下此假定，有下列數項理由：

(1)楚詞天問對於鯀禹有很豐富的神話。

(2)越國自認爲禹後，奉守禹祀。

(3)傳說中有禹會諸侯於塗山的故事（左傳哀公七年，）又有禹娶于塗山的故事（皐陶謨天問塗作涂。） 塗山在今安徽懷遠縣東南八里；周代時在淮夷與羣舒之間。

(4)傳說中有禹致羣神于會稽的故事（國語，）又有禹封禪于會稽的故事（郊祀志，）又有禹道死葬會稽的故事（墨子。） 會稽山在今浙江紹興縣東南；春秋時爲越都。

(5)會稽山西北五里有大禹陵。 按，有了陵墓原不足以證明眞有這個人但陵墓所在之處確很足以證明這一地是這一個神話的中心點。 如黃帝是西北民族的神話人物，而他的陵在橋山（今陝西中部縣西北，）正在鄜畤附近。 如盤古是西南民族的神話人物，而他的墓在南海，又在桂林；南海的墓延亘到三百餘里（見任昉述異記。） 可見這種陵墓乃由於神話的指實。 他們在某一種神話的集中地方，指定一個高大的陵阜，算做神的陵墓；就了這一點神蹟，他們更可安頓着他們的信仰和崇拜。 禹陵既在會

稽，會稽自可定爲禹的神話的中心點。

(6)漢書郊祀志（管子與封禪書文均同，因兩書有晚出之疑，故舉此書）記管仲講了十二個封禪之君——無懷氏，虙羲，神農氏，炎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湯，周成王——他們封的地方只有泰山一處，禪的地方只有云云，亭亭，社首，會稽四處。云云在蒙陰，亭亭在鉅平，社首在博縣，都是泰山附近的小山，在漢代泰山郡之內；的獨有禹所禪的會稽乃遠在南方。封禪的事原是戰國時鄒魯的儒者造出來的（當在辨堯典時詳論，）他們心目中只有一個泰山可爲天下之望，所以非拉了百代的帝王到泰山去封禪不可。但何以他們竟肯單單讓禹到會稽去禪呢？這大概因爲禹在會稽的立足點太堅强了，有非依從習慣不可之勢，所以如此。

(7)古代開化的民族只有中原一處，因此中原人很藐視四方半開化和未開化的民族。他們看西北方獸多，故以西北方的民族爲獸種：如獯鬻，玁狁，狄……加上犬旁，見得他們是犬類。又看南方蛇多，故以南方的民族爲虫種：東南之越號爲閩，（說文云，『閩，東南越，蛇種，』）西南岷江間號爲蜀，而總名南方種族曰蠻（說文云，『蠻，南蠻，蛇種。』）詩采芑云，『蠢爾蠻荊，』蓋不但名荊人爲蠻，且以其動作爲蟲之動作（說文云，『蠢，蟲動也。』）可見中原人對於南方，隨處可以引起虫族的聯想，故文字上以虫表南方的極多。禹名從虫，恐亦此例。越人自稱爲禹後，恐亦與蜀人以蠶叢爲祖先是相同的。

(8)楚之古文爲𣏟，可見他們是在林中建國的。楚亦名荊，當以荊棘繁多之故。看荊楚一名，草木暢

茂的樣子已是活現。楚辭天問云：『東南何虧？』又云：『康回憑怒，地何故以東南傾？』蓋當時的東南為水潦所歸，故有『地不滿東南』之說。積水氾濫，自是那時實事。漢書地理志于楚地曰：『江南卑溼；』于粵（即越）地曰：『其君禹後，…封于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可見楚越一帶因林木的繁茂，土地的卑溼，人類與龍蛇同居，飽受了損害。又可知當時吳越人之所以斷髮文身，乃是起于保護生命的要求，其效用與動物的保護色相等。那時那地的人生是何等的可怖！平定水土的事是何等的需要！

孟子上言禹治水情形的有兩段話，錄下：

>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于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迹之道交于中國。……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滕文公上）

>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于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滕文公下）

這固是孟子想像中的堯舜時代的情形，但何以與實際上的周代時楚越情形竟這等的相似？楚越間因地土的卑溼，有積水的氾濫，故有宣洩積水的需要；因草木的暢茂，有蛟龍的害人，故有焚山澤驅蛇龍的需要。有了這種需要，故禹益的神話足以增大牠們的價值，發展牠們的傳播。禹之出于南方民族，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證據。孟子所說的古代『中國』的情形，實已露出受了楚越的暗示的破綻了！

若有人駁我，說；『周代的楚越固是過的這種生活，但上古的中原那知道不也是過的這種生活呢？』

那見堯舜時代不是真的如此？』 這個問題自然須請地質學家研究，非我所能解決。 但我也有一點意思可供參考。 第一，中國的黃土區域綿延甚廣，爲古代膏腴地。 但別處還有山林險阻，惟河南省的東部是一個大平原，沒有平水土的需要，故文化發達最盛，亦最早。（我很疑夏的國都離商不遠，不在今山西安邑，理由頗多，俟後辨。） 夏商以前，如中原果有文化，亦應起於此。 第二，楚國經過了幾百年的經營，水土平了；到戰國時，這可怖的景象只留在楚國的南方了。 讀楚詞中的招魂和大招，牠們所說的四方毒害，東方是弱水，西方是流沙，北方是增冰，這些都是地文上的險阻，還無足深怖。 獨有南方，炎火千里，有蓁蓁羣聚的蝮蛇，有九首的雄虺，有騫舉的王虺，有傷躬的蜮，在山林險隘之中往來倏忽地吞人。 可見即在楚國人——中原人號爲南蠻的——的觀念中，也是最怕着南方。 我們看，春秋時的楚國併力開發北疆，而對於南越的用師獨杳然無聞。 戰國時，各國竭力的闢草萊，但楚國的南境還只到着衡山。（戰國策記蘇秦說楚威王語，謂楚地『南有洞庭蒼梧。』 後人據之，謂楚的南境直至今之廣西梧州。 但離騷中以蒼梧與縣圃崦嵫等許多理想地名並列，爲作者所欲駟虯乘鷖御風而游者，可見其甚渺茫。 蓋當時意想中，楚的南方有名蒼梧的一地；至于究竟怎樣，連楚國人也不能知道，因爲往南山林險阻，過去不得，實不容知道了。） 這也可證中原所以稱南方爲蠻之故，而南方的可怖確在水土未平與龍蛇偪人。

南方民族在這樣的環境裏，如何不會有鯀數平水土的神話出來，更如何不會有平水土的最有力量的禹出來！

(9)商代與南方民族有無關係雖不可攷（商頌殷武的『奮伐荊楚，』頌的是春秋時的宋桓公非頌商王，）但看殷高宗所伐的鬼方在汧隴間（依王靜安先生考定，）而商頌所特標的服屬的種族也只有氐羌，周亦興于岐山所以我們可以說商代時的中原只有與西方民族發生關係。到了周代，始有召公闢國至江漢的事（召公是世襲的，不能定說爲召公奭，）于是封建諸姬至于漢陽。關于當時的傳說，有成王封熊繹爲楚子的話（史記，）又有熊繹服事康王的話（左傳。）但這些話既不見于詩書，而昭王已經『南征不復，』采芑並罵他們『大邦爲讎，』可見楚在西周時國勢已盛，常與周室對壘，受周封建之說甚不可信；即使有之，也不過周室的一種羈縻手段罷了。直到宣王時，周的武力有一度的旺盛，始有『用遏蠻方』（抑）及『蠻荊來威』（采芑）的快意之詞。然而漢陽諸姬到春秋初期卒盡爲楚所吞滅了。南方民族與中原諸國有直接的關係的，惟有楚及淮夷徐戎。淮徐二國偏在江北，又牠們的史蹟已得不到什麼，不知牠們與江南民族有無聯絡；楚則沿江立國，因伸其勢力于羣舒，而與吳越早就交通（越通中原在春秋後三年——哀公二十一紀元前四七四，——但楚與越的交通在宣公八年——紀元前六〇一——早就見于左傳了。這決不是第一次，惜以前無可考耳。）從此，可知南方民族的神話從楚國傳到中原是很可能的：一來是楚國爲南方民族的領袖，與中原交通甚早；二來是周室封諸姬于漢陽，使周民族與楚民族日益接近；三來是周民族與楚民族常有用兵的事，有交換文化的鼓動力。

中原與南方民族發生關係由于封建，這是確切不移的事。至於封建諸姬至于漢陽，依了周室的國

力和次序而言，自當在成康以後。 一部詩經，可信爲最古的詩惟有周頌。 周頌有「自彼成康，奄有四方」之語，可見作于成康以後昭穆之世。 細繹周頌的話，牠們也說山河（如「天作高山，」「及河喬嶽，」「猗與漆沮，」「墮山喬嶽，允猶翕河，」）但沒有道出一個「禹」字。 牠們也說耕稼（如思文，噫嘻，豐年，載芟，良耜，桓等篇）但又沒有道出一個「禹」字。 牠們也說后稷（如「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非爾極，」）但又沒有道出他和禹曾有過什麼的關係。 一比了商魯頌及大小雅的對于禹的尊崇的態度，就顯出周頌的特異了。 周頌爲什麼特別的不稱禹？ 原來做周頌時尚沒有禹的偉大的神蹟傳播到周民族來；或者雖經傳播而勢力不廣，還沒有引起共同的信仰。

今按詩書中說及禹的九篇，閟宮，長發，殷武作于春秋時，已無疑義。 呂刑爲穆王時所作，韓奕爲宣王時所作，似尚可信。 洪範，立政二篇文義明暢，與大誥，康誥等篇文體相差甚遠，當是後世史官補作，與無逸，金縢等篇同其性質。（關於這一個問題須俟將來研究古文法再行判定。 依我豫測，尚書二十八篇中確可信爲眞蹟的不過十二三篇；爲東周時史官補作的也有十篇左右。） 信南山及文王有聲二篇的時代雖無考，但我疑大小雅都是西周後期及東周初期之作，因詩中愁歎失政的甚多，合於東西周交界時的情形，而誇揚武功的亦不少，按之記載亦可信爲宣王。 恐「雅音」自爲西周後期風行的樂調。 我們看雅中如文王，大明等篇確是宗廟之詩，何以不入頌而入雅？ 再看周頌篇幅短少，何以雅體甚是寬展？ 可見雅頌之分不在奏樂的地方不同，而在時代的先後不同，音節的繁簡不同。 （魯頌，商頌雖居頌名而實雅

體。）在此種理由之下，信南山及文王有聲自可定為西周後期所作。

周頌三十一篇沒有「禹」的一字，那時人竟沒有禹的偉大功績的觀念；一到穆王末年的呂刑，禹就出現了；到西周後期，社祀也舉行了，大小雅及商魯頌屢屢把禹提起，看得他在古史中的地位是最重要的了。這一點分別是何等的顯著！且當時既與他方種族關係較輕，而適在專力開闢南疆的時候，中原民族初與南方民族接觸的時候，這一個環境更是何等的重要！

總合以上的理由，可以為我所立的假定——禹是南方民族的神話中的人物——作一個概括的說明：

商周間，南方的新民族有平水土的需要，醞釀為禹的神話。這個神話的中心點在越（會稽）；越人奉禹為祖先。自越傳至羣舒（塗山）；自羣舒傳至楚；自楚傳至中原。流播的地域既廣，遂看得禹的平水土是極普遍的；進而至于說土地是禹鋪填的，山川是禹陳列的，對於禹有了一個「地王」的觀念。

中原民族自周昭王以後，因封建交戰而漸漸與南方民族交通，故穆王以來始有禹名見於詩書，又特設后土之祀，得與周人的祖先后稷立於對等的地位。

(4) 堯舜禹的關係是如何來的？

詩經中有若干禹，但堯舜不曾一見。尚書中除了後出的堯典，皐陶謨，有若干禹，但堯舜也不曾一見。

故堯舜禹的傳說，禹先起，堯舜後起，是無疑義的。後起者立於前，也是杜撰古史的成例，我們是看慣的。但他們何以發生了關係，這個問題我們應該探索一番。

玄同先生說堯爲高義，舜爲大義，意義相承，可見出于同時，有互相關係的可能。至於禹，我們看洪範，明明說是上帝殛鯀之後而繼起的；看呂刑，也明明說是上帝降下來的；看殷武，立政，又只說禹迹而不言舜域。他只有受命於上帝，沒有受命於人王。他乃是獨當一切，不是服政效忠。若照後世人所說的堯舜禹之關係看來，則禹所畫的九州原是堯舜的天下，何以反把這兩個主人撇落在一旁呢？

詩書中言禹的九條，全沒有做了堯舜之臣的氣息，不必提了，就看僞作的禹貢也是說：

>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
>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
> 錫土姓。
>
>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
>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這是何等的獨斷獨行，稱心布置！這何曾有一點兒做了他人的臣子的意味！末句所謂「禹錫玄圭，告厥成功，」乃是告成功于上帝，上帝把玄圭賞賜與他，與洪範的「天錫禹洪範九疇」正是一例的事實。（帝王世紀和宋書符瑞志有「禹治水畢，天錫玄珪」的話，正作如此解。僞孔傳謂「堯錫玄圭以彰顯之，」大

（禹貢上何曾有堯來！）可見做禹貢的人對於禹的觀念還是詩書上的禹的觀念，而不是諸子上的禹的觀念。

堯舜的傳說本來與治水毫沒干係，論語上如此，楚詞上也是如此。自從禹做了他們的臣子之後，于是他們不得不與治水發生關係了。但治水原是禹的大功，口碑載道，堯舜奪不得的；沒有法想，只得請堯做了一時的朦矓由他任鯀治水；等到『九年，績用弗成，』堯沒有辦法，就做了堯舜交替的關鍵，并為舜舉禹的地步。如此，禹的功績既沒有減損，而堯舉了舜，舜舉了禹，成就了這件事，堯舜也很有間接的功勳，治水的事是他們三人合作的成績了。但殛鯀的是誰呢，大家說不清楚；連一部左傳也忽而說堯，忽而說舜（昭七年傳，『堯殛鯀于羽山』；僖三十三年傳，『舜之罪也殛鯀』。）這可以見出一種新傳說出來時，前後顧全不得的情形。

我們既知堯舜禹的關係起于戰國，要尋出這個關係的來源，應當先看戰國時的背景。戰國時，四方民族漸漸與中原民族融合為一，各民族的祖先平時不相聞問的，到這時也都胡亂搭湊而成一系。孟子說舜為『東夷之人』，若果為東夷的祖先，則他與南蠻的祖先禹發生關係自在情理之內。但這決不是最重要的理由，因為堯舜禹的關係是有意味的，不比黃帝少皞顓頊之類的無端湊合。

最重要的理由乃在當時的政治背景。戰國時各強國的國王都有統一天下的大志，不息的戰爭攻伐，貴族又是說不盡的奢侈，殘傷民命，暴奪民財，人民憔悴于虐政之下，真是創深痛鉅。那時的學者看着人民

的苦痛，對于政治問題的解決方法非常要求得急切。解決方法最直截的無過革命，革命的事原有湯武的好例在前，所以他們竭力的罵桀紂，頌湯武。但當時人民對于國王，正和現在人民對於軍閥一樣，雖是疾首痛心到極點，而要自己起來剗除他們的勢力終是無力的。他們在這般有心無力的境界中，只有把自己的希望構成一種根本解決的想像，做宣傳的功夫。根本解決的想像是什麼？乃是政治的道德化。他們想像：若有一個道德最好的天子出來，捨棄了一切的權利，他的目的單是要天下安樂，自然可以「天下為公」，沒有爭奪的事。他們想像：倘若天子的位不是固定的，做天子的必是天下最賢的人，他必能識拔許多賢才做各項的職務，使得天下之民歸心，成就最好的政治。這一種想像就是禪讓說。墨子，孟子書中這類的話甚多，茲不備舉。

但自古只有父兄傳子弟的局面，而沒有先聖傳後聖的局面，他們鼓吹禪讓說是得不到證據的。沒有法子，就拉了兩個「無能名」的古帝——堯舜——和一個在傳說的系統上列於夏初的古王——禹——做他們鼓吹學說的憑藉。好在這幾個人的事蹟是沒有什麼確實的記載的，你要那樣說就可那樣說，你要那樣造就可那樣造。堯舜禹的關係就因了禪讓說的鼓吹而建築得很堅固了。

但禪讓之說起來時，禹早已做了夏后了；夏是世代相承的，故不得不使他把傳賢的局面改為傳子的局面。然而益相禹的傳說與舜相堯，禹相舜的傳說是有同等的勢力的，故又不得不使他舉益自代。舊史必使他傳啟，新興的禪讓說必使他傳益，但結果又不能違背舊史，亦必使他傳啟，這個謊如何圓法呢？在這一

點上，造偽史的人真做夠了難題了！國策道：

「禹授益，而以啓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

這一說是歸過於啓的，然已有「禹令啓自取之」的嫌疑了。天問道：

「啓代益作后。」

這是禹已禪益，啓更代益，間接而成傳子的局面。但啓何以代益，是啓搶來呢，是益傳與他呢，這文沒有說明。竹書紀年道：

「益干啓位，啓殺之。」

這是禹不禪益，啓即代禹，爲直接的傳子。但啓何以代禹，是禹有意呢，是啓搶來呢，這文也沒有說明。以上三說雖可解釋，但總是禪讓制的惡散場，在「比戶可封」的時候不應當有這種事。于是孟子上有一個極巧妙的回答：

「禹薦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于民未久。」

這一個解釋真是何等的美滿！禹是肯薦益的，益是肯避啓的，啓又是實在得民心的，沒有一個人失德，沒有

一個人貪有天下，然而『民意』的趨嚮如此，禪讓制便輕輕的改到傳子制了！

洪水未平，舉賢治之，是禪讓制之所由起。啓有賢德，傳子卽是傳賢，是禪讓制之所由終。這一個起訖的時間，名爲禪讓時代，公推爲人治最美滿的時期。一班兼做僞史家的政論家竭其全力爲這個時期張皇幽眇，編造了無數佳話。堯舜與禹經過了這一番的陶鑄，他們就成了拆不開的伴侶；凡是稱道一個人，必定聯帶稱道其他二人。比較詩書中只說禹而不言堯舜的時候，一般人對于古史的觀念眞是大不同了！

那時禪讓之說鼓吹既盛，故戰國中期卽有燕王噲實行這個學說的事實出來。這是紀元前三一六—三一四年的事。堯舜禹禪讓之說雖不知起于何時，但可見在這時已經傳播得普遍而確定了，所以燕國的羣臣會得很信服的把這事勸燕王做，而燕王也會得很願意做。不幸當時學者理想中的堯舜的人格太高超了，燕噲與子之的人格不能得到當時學者的信服，所以卽在極端主張禪讓說的孟子，也得說『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

在禪讓之說未起時，也有讓國的事；關於這類事的記載，有論語及左傳上的泰伯，宋公子目夷，曹子臧，吳季札（伯夷叔齊態度不明，恐不可信。）但他們的讓乃是出於良心的主張，不是由於學說的鼓勵，乃是未居其位而不居，不是已居其位而忽讓；乃是一家兄弟叔姪的推讓，不是君對於臣的禪讓。我們在這上，可見那時並沒有堯舜禹禪讓之說，故讓國者全沒有堯薦舜，舜薦禹的觀念，而不受讓的也沒有舜避丹朱，禹避商均的觀念。故論語上也只有稱美泰伯的讓，而沒有稱美堯舜的讓。到了戰國中期，堯舜禪讓之說大占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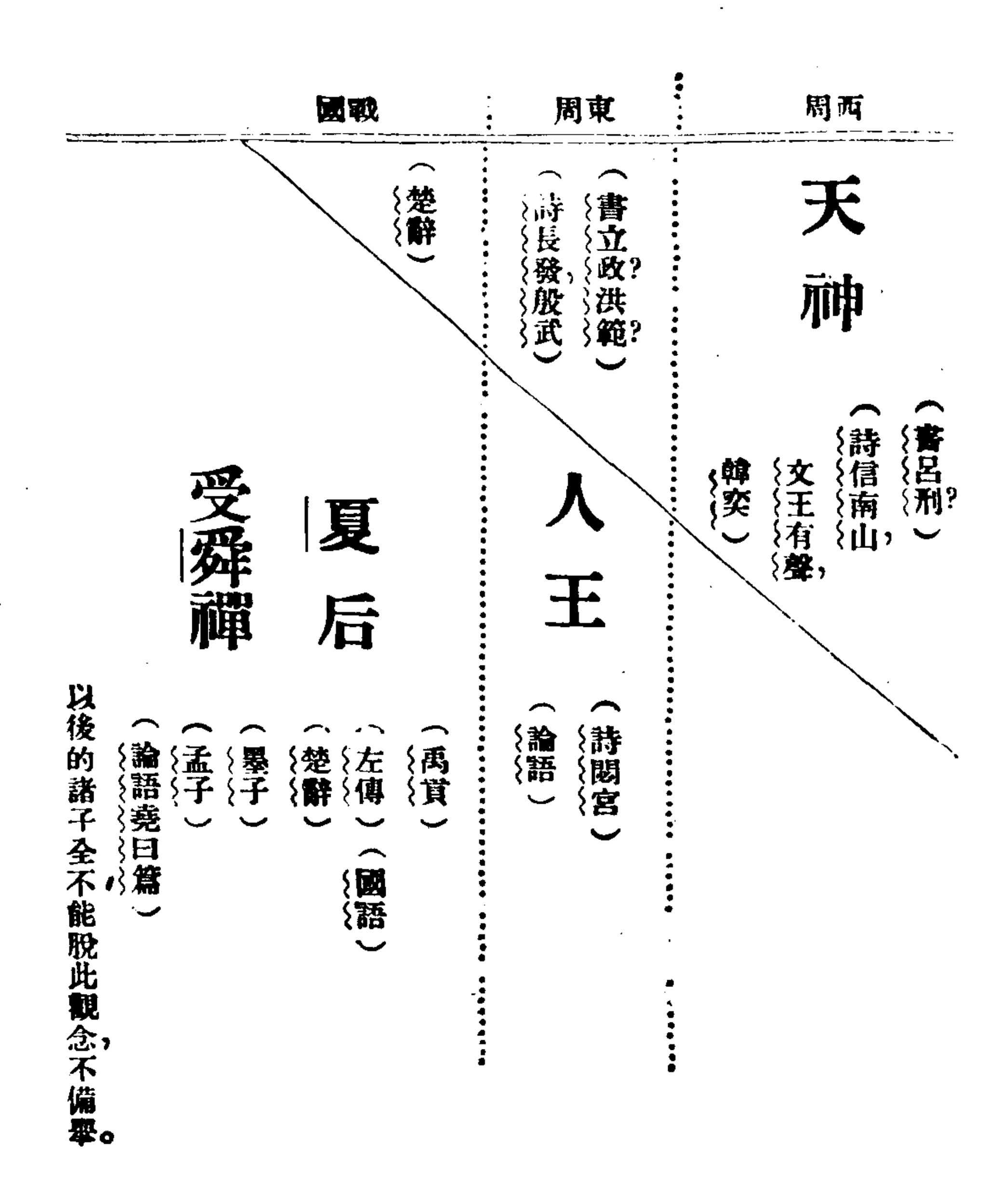
力，有鼓吹的，有實行的，而泰伯等讓國之說就退了下去，不見有人稱引了。

在這章的終結，我可以大膽的說：禹是西周中期起來的，堯舜是春秋後期起來的，他們本來沒有關係。他們的關係是起於禪讓之說上，禪讓之說乃是戰國學者受了時勢的刺戟，在想像中構成的烏託邦。

✽　✽　✽　✽　✽

總以上四章——(1)禹是否有天神性？(2)禹與夏有沒有關係？(3)禹的來源在何處？(4)堯舜禹的關係是如何來的？——爲下列一表，表明自西周以至戰國的人對於禹的觀念的轉變：

（注）呂刑，立政，洪範三篇尙不能確定其時代，故加疑識。左傳，國語，楚辭三種已微有禹受舜禪的氣息，但尙無明文，故入之「夏后」欄下。


西周
東周
戰國
天神
（書呂刑？）
（詩信南山，
文王有聲，
韓奕）
（書立政？洪範？）
（詩長發，殷武）
（楚辭）
人王
（詩閟宮）
（論語）
（禹貢）
（左傳）（國語）
（楚辭）
（墨子）
（孟子）
（論語堯曰篇）
夏后
受舜禪
以後的諸子全不能脫此觀念，不備舉。

(5)后稷的實在怎樣?

西周人對於后稷的傳說，詳見於生民一詩。把這詩分析開來看：

(a)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這一章是說姜嫄孕后稷的原因，見得她的這個兒子是向上帝討來的。『履帝武敏歆』一語雖不可解，總是她的生育與上帝有關係的意思。

(b)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甯，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這一章是說姜嫄產生后稷時的順利，和上帝的關心后稷產生的樣子。

(c)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

這一章是說后稷生下後的神蹟。從前人說后稷名棄，說后稷是給姜嫄棄去的，棄去之故是為了無人道而生子。但我覺得這說很涉附會。姜嫄這個兒子是她自己去求來的，生產的時候又是這般順利，為什麼要棄去？棄名始見於左傳國語，乃是戰國時人已立了烈山氏之子做了后稷以前的后稷，所以不得不別立一名以示區別。至於這章的本身，我以為牠不過要表示后稷幼時的神蹟，為『以赫厥靈』的證據，不必求其理由。

(d)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

這二章都是說后稷在種植上的功績；說他幼年時如何就好種植，一生的種植的成績如何美滿。

(e)即有邰家室。

這句說他的根據地在有邰。

(f)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以歸肇祀。

這章的意思很糢糊：是后稷降嘉種於人民，他就國而肇祀呢？還是后稷在天之靈降嘉種于下民，下民得到了很好的收穫而祀他呢？還是天降嘉種與后稷，如閟宮所謂「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呢？這很不容易解答。好在此章無關重要，可以勿論。

在此很可注意的后稷只是后稷，他沒有做帝嚳的兒子，沒有做禹的輔佐，沒有做舜的臣子，也沒有做契的同官。我前次因了閟宮說后稷「纘禹之緒」而生民篇不言；堯典上乃以禹稷為同官，是一個破綻。胡堇人先生駁我，說：

> 生民篇是郊祀的樂歌。古人神權最重，若在迎神侑樂時對着所祀的神說他的功勞係纘述別人的餘緒，未免得罪神靈。所以這詩不說纘誰的緒大概因此。不比閟宮頌禱當代國君，帶敘上代的事，儘可盡情暢說。

我以爲說了「纘緒」如要得罪神靈，則說了比生民更好的功績當然可使神靈更爲快樂，但若減去了他的第一等功績而只說他的第二等功績，也當然使得神靈更爲惱怒。堯典云：

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在黎民阻飢的時候去播百穀，是何等重要的事！何以生民與閟宮都只說他自己的種植而不說當時黎民阻飢的樣子呢？皐陶謨云：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因「播奏庶艱食鮮食」而連帶做「懋遷有無化居」，因「烝民乃粒」而其效至于「萬邦作乂」，這更是何等的大事！生民篇竟不拿來稱頌后稷，神靈聽了應該何等的不樂，說「我的『懋遷有無化居』及『萬邦作乂』的功績竟都給子孫抑沒了！」我們再想，舜命九官是古代極盛的政治，是中國最有光榮的歷史，後世如秦起於西戎，尚且把伯翳（一說卽益）拉作祖先，誇張地佐禹之功；像后稷這般在九官中坐了第二位，輔助舜禹成就大業，這是應該何等稱道的事，而他的子孫倒一切不理會，只說他產生時的神蹟和自幼及壯種植的成績，豈不是舉其細而忘其大嗎？想來做郊祀樂歌的人不會得如此糊塗罷？

劉掞藜先生駁我，說：

禹是盡力乎溝洫的；后稷是從事於種植的。禹把溝洫都治好了，使后稷得以種植：這種纘緒並不須在幾十年後，或幾百年後。若使不必在幾十年幾百年後，則在舜幾十年長底朝廷裏何以不得同官？

但我讀到閟宮篇，覺得「是生后稷，……纘禹之緒」與下面「至於文武，纘大王之緒」的文義是一致的。大王的緒爲翦商，文武纘了他的緒自然更去翦商；后稷的緒爲稼穡，他所由纘緒的禹自然也是稼穡。所以我在上面說，閟宮對於禹的態度和論語是一致的，他們看得禹是在后稷之前的一個耕稼的人王，對于治水方面反甚輕忽。照劉先生所說，閟宮的話乃是說禹稷在虞代分功作事；這比較了下文的「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很覺講不過去。且詩中明明言他「奄有下土，」而「纘禹之緒，」並不是「受舜之命，待禹成功」而「纘禹之緒。」劉先生一定要把堯典和閟宮併爲一談，似乎彌縫的痕跡太顯露了！至說「奄有下土」即是「封於有邰，」后稷之爲國君由於舜之所命，則連堯典尚無此等話，更不必說詩經了。

后稷的名爲棄，是後世人所公認的。詩經上只稱他爲后稷而沒有提到棄字，還可以說是子孫尊崇先祖，（雖已有了公亶父，公劉的例。）至於堯典，皐陶謨本說是虞廷的記載，后稷爲舜的臣子，史官自應直記其名，何以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暨皐陶，」及「暨益奏庶鮮食，……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的記載，惟稷稱官，而禹益契皐陶乃皆稱名？況舜未說「汝后稷」之前，棄尚未正式做后稷的官，何以在命禹的時候，禹已說「讓於稷契」而不言「讓於棄契？」這無非后稷二字在人心目中的印象太深了，棄是後出的名字，不甚占勢力，作者一時竟改不過來，或者竟忘懷了！

「后稷」二字在堯典上看，自然是官名。但堯典的作者誤看「后稷」爲官名，正和漢朝人誤看堯典的「汝作朕虞」而解「朕虞」爲官名是同樣的可笑。（堯典上，舜對益說的「汝作朕虞，」是說「你做

我的虞官，」「虞」是官名，「朕」是第一身所有格的代名詞，意義很明。漢人如司馬遷班固等都把「朕虞」二字聯作一個官名王莽時又有「予虞」的官豈不可笑！）后稷的后字本是國王之義周人因爲推他做古代的國王，所以稱他爲后稷。至於在虞廷上，他乃是天子之臣，那能復稱爲后！「羣后」之稱指四方的國君是講得通的，至於朝廷上的官職以后爲名是講不通的。若說爲了后稷是有國之君，故官名定爲后稷，則他去職之後使沒有封地的人接任，這「后」字要否摘去？若說爲了尊重天子之官，看他們與羣后一例，則禹何不稱后司空，契何不稱后司徒，皋陶何不稱后士，倕何不稱后虞？他們也是天子之官，也是有國之君（依劉先生說「禹封於有夏，契封于商」諸語）又何以都不稱后，單單稱稷官爲后？這實是一個很大的漏洞。推他們所以有這個漏洞之故，也無非「后稷」二字在傳說中連接得太密切了，作者聽得爛熟，以致改不過來，或者竟忘懷了！

因了堯典皋陶謨稱名的惑亂，敍述的與生民，閟宮相去太遠，所以我敢斷定他們是晚出的書，后稷在虞廷作官是晚出的故事。

現在我再進一步而討論生民，閟宮中的后稷。我在上次的文中說道：「即如后稷，周人自己說他們的祖宗，但有無是人也不得而知。……所謂后稷，也不過因爲他們的耕稼爲生，崇德報功，追尊創始者的尊號。」劉先生駁我道：「顧君已承認后稷爲創始者了，何以又說『有無是人也不得而知？』」我對於這個質問的解答可分爲下列三層：

(1)周人稱其祖先，公亶父，公劉，王季是名上加一階位；太王，文王，武王是階位上加一謚法。后稷的『后』字是階位而『稷』字，則既非名又非謚，乃是他所做的事業。自公亶父以至文武（公亶父在公劉之前，說見下章）各有開闢土地建立國家的事，而后稷則只有耕稼的事，可見周人所崇拜后稷的只有耕稼。

(2)古代記載闊略，所謂史官只會記君主的起居，絕不注意于社會事物的創始者即在同時亦不能知道。何況民族始基之時，本無史官，只有傳說，創始者的真相又那裏可以知道。到了後世，有了崇德報功的觀念，要一一立出事物的創始者，又以為人類惟帝王為最聰明，於是有庖犧，神農，有巢，燧人等許多古帝出來，而黃帝一身甚至包辦了好幾十件東西。如黃帝般，是先有了人帝的傳說而後把物件堆上去的，且不論；如庖犧，神農……則為了要舉起這一個創始者而因事所立之名，甚是可見。造史的人想着太古的人專事漁獵，必有創始漁獵的，就有庖犧氏；想到太古的人一定茹毛飲血，必有創始火食的，故有燧人氏……其實這種事情是從不知不覺中來，不知道經過了若干年代的醞釀推移，誰也不能做創始的人。猶之人類之為人類，不知經過了多少變化，決不能指定那一年是始有人類之年，那一人是人類的第一人。但在古人的想像中必以為人類是突然生出來的，因此苗族有盤古的傳說，猶太族有亞當夏娃的傳說。傳說雖流行，我們決不能承認盤古亞當等真是人類的始祖，這是無可疑的。后稷之名，很可看出是周人耕稼為生，崇德報功，因事立出的，與庖犧燧人……有同等的性質。沒有庖犧氏

出來，難道人類就不會漁獵嗎？ 沒有燧人氏出來，難道人類就不會火食嗎？ 沒有后稷出來，難道周民族就不會進於耕稼社會嗎？ 我們信周民族先進於耕稼社會，但不能信后稷為創始者，正和我們信古代曾有漁獵社會，但不能信庖犧氏為創始者一樣。 所以我對於劉先生的回答是：後人意想中的創始者是一件事，實際上有無是人又是一件事，決不能因為後人意想中有了這一個創始者就說實際上必有此人。

(3)周頌思文云：『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非爾極。 貽我來牟，帝命率育。』 魯頌閟宮云：『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 大雅雲漢云：『旱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 后稷不克，上帝不臨。』 讀此，可見后稷是配饗上帝的，雖也是先祖，但比了別的先祖，他的任務特別大：『貽我來牟』是他的『率育，』『蘊隆蟲蟲』是他的『不克。』 周民族所祀之神，自上帝之外，最尊的沒有過於他了。 生民與閟宮上，除了說他耕稼的成績之外，只有『奄有下國』與『即有邰家室』二語為政治上的事實；但這二語卻實在空洞得很。 有邰即是周民族的根據地，『奄有下國』乃是周民族勢力的發展。 這二語雖是說的一人，實不啻說的一民族。 他的本身在政治上究竟做了些什麼，依然毫無所知。 可見他在周人的想像中，為農神的分數多，為人王的分數少。 我們既知道周民族是特重耕稼的，又知道耕稼的事是不會由一個人突然發明而且驟得到無數種類的極美滿的成績的，又知道後人想像中的創始者是不必真有其人的，故我們可以懷疑后稷本是周民族

所奉的耕稼之神，拉做他們的始祖，而未必眞是創始耕稼的古王，也未必眞是周民族的始祖。

(6) 文王是紂臣嗎？

劉先生說，『如以爲后稷「奄有下國」是做了國君，不當說成舜的臣子，然則王季「奄有四方，」文王爲「萬邦之方，下民之王，」遂可說王季文王不是商紂的臣子嗎？ 他們兩個何嘗不是明明做國王咧？』我對于這問的回答是：后稷非舜臣，王季文王亦非紂臣。 並且可以推到商民族上去，說：契亦非舜臣，湯亦非桀臣。 這一個公案本是最容易明白的，不知道許多人爲什麼還要很情願的上僞史的當？

讀古史的人每易有一個成見，以爲中國自黃帝『方制萬里，畫野分州』以來，永遠是一統的；地域的區畫，秦以前是封建，秦以後是郡縣。 因爲有了這一個成見，所以覺得唐虞三代的天子威嚴與秦漢是沒有差異的，唐虞夏商的政治綱領與周代是沒有差異的。 因爲沒有差異，所以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商湯不得不做夏桀的臣子，周文王不得不做商紂的臣子。

他們不知道中國在戰國以前是不曾統一過，在周代行封建制以前還是滿地的立着許多部落的國家。（卽在行封建制以後，除了所封之國，依然還是部落的國家。 試看左傳上齊魯晉衛的境上莫不有戎狄；只要疆埸無主，就立刻生豺狼之心。 我們試想，未有封建時應該怎樣？） 商之所以爲商，周之所以爲周，自有他們民族成立的歷史。 商之所以滅夏，周之所以滅商，也本合於他們民族發展的程度。 湯和文王不過是

繼了他們的先人的事業而努力，他們恰恰生於他們的民族的極盛時期，故得成就了最光榮的功績。 這班戰勝民族的領袖對於戰敗民族的領袖本所欲得而甘心，一旦遭逢時會達到願望，是何等的快樂！ 他們強弱之爭還來不及，那有什麼君臣之誼呢！ 他們歡欣鼓舞還說不盡，又那有什麼「慚德」呢！

他們的實在情形，商頌長發和魯頌閟宮說得都明白，不過讀者一向疏忽着。 長發道：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帝命式于九圍。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百祿是遒。……

武王（湯）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蘗，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這詩說的是：商民族是上帝建立的（「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一語義甚明白，帝是上帝，他借了有娀之女而立自己之子，與姜嫄的「履帝武敏歆」是同樣的意思。 朱子為堯典所誤，謂「契於是時始為舜司徒，掌布五教於四方，而商之受命實基於此」，真是附會之辭）；建立之後，在玄王時如何興盛，在相土時又如何興盛；直到湯時，商族盛極了，湯又是最能幹的人，所以會得受了上帝的命，像火一般的旺烈，把韋顧昆吾與夏桀一起打倒了。 他和夏桀有什麼君臣名分上的關係？ 他的祖玄王和虞舜也有什麼君臣名分上的關係？

閟宮寫得更顯明了，牠道：

> 赫赫姜嫄，……是生后稷。降之百福，……奄有下國，俾民稼穡。
>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於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於牧之野。「無貳無虞，
> 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

這篇詩說太王是周民族中蓄志翦商的第一人，文王武王是繼續太王的事業而翦商的人。本事直書，沒有一點拘牽和隱諱，因爲這事本是自己民族的光榮，用不到拘牽和隱諱的。在這上，我們可以知道稱王自太王已經稱了，翦商自太王已經翦了。我們又可以知道，文王只有受命而『制殷』（書多士）沒有受命而稱王；只有『昭事上帝』（詩文王）沒有服事殷紂；只有『纘太王之緒』而翦商，更沒有纘太王之緒而事商！

我們再看大雅蕩篇：

>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於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於中國，覃及鬼方。

這簡直是文王伐商的誓師辭了。這篇中充滿着撻伐的口氣和對壘的神情，那裏有一點君臣名分的氣息！（此詩固非文王自作，但西周時的作者代他立言，也應爲他設身處地。若文王實爲商紂的臣子，而且終身恭謹的服事他，作者也不會如此無端詬罵。）

一面做國君，一面做天子的臣子，這是周代封建制度之下所有的事。所以能彀如此之故，只因所封的國君本是王朝的臣子，這個名分是立得起來的。至于不經封建的國家，異族對於中原，小國對于大國，原只有強弱的區別，並無天澤的定分。小國爲保全自己的生存計，所以瞻依趨附着強者；最強的國家，給牠保護及征服的小國就最多。長發中所謂「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即此之謂。這種情形，在左傳中屢屢看見，隨便舉出幾條如下：

徐，卽諸夏；楚人伐徐。（僖十五年）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服事諸夏。（僖二十一年）

六人叛楚，卽東夷。（文五年）

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成七年）

我很疑心夏商間所謂「王，」實卽春秋時所謂「霸。」春秋時，一個霸主出來，便有許多服屬的小國。如鄭衞陳蔡許曹諸國，永遠依違於幾個大國之間。說牠服屬，確是服屬；說服屬的是臣，所服屬的是君，那就大誤。所以齊桓晉文假使生於夏商，未必不爲王者；只因齊晉爲周王所封建，不便取而代之，所以不做到「王」的地步罷了。更想周之與商，正似楚之與周：周強則「蠻荊來威，」周衰則「觀兵問鼎。」這完全是勢力的關係，有什麼名分在內！春秋時，東周尚是諸夏的共主，但楚也稱王，盡力拓地，自定制度。試問王朝有什麼力量可以裁制牠？所以看了周代時的楚國，舉一反三，周本是商代時的強國，牠對于商的關係也可知

了。

尚書上說:

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大誥)

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召誥)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同上)

可見周人稱殷爲大邦，自稱爲小邦；看殷爲兄長(元子，)自居于弟輩。他們的伐商，只是想把弟輩的地位改到兄長的地位，把小邦的地位改到大邦的地位罷了，有什麼「臣弒其君」的嫌疑，更何必做什麼「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的曲解!

商民族發展的情形，記載缺略，僅有長發一詩，不足以知其詳。但我們讀了「玄王桓撥」「相土烈烈」諸語，很可知道湯以七十里成王業的話是不足信的。周民族的發展，幸有大雅和周魯頌保存了一點史料，可以作一個系統的敍述。今試擬如下:

(一)周民族並沒有很久的歷史，大約牠的成立還是在商代(史記記周世系，自后稷至文王不過十四代，而商則自湯至紂已有二十九代。這十四代還是有一大半全無事跡可指的，不知道有無其人。自從秦漢間人把后稷拉做了堯的胞弟，于是就覺得周民族立國甚早，而這十四代人物個個要在耄耋中生子。其實國語尚以周棄爲在夏衰時—魯語云，「夏之衰也，周棄繼之」—左傳亦謂商以來祀棄爲稷—昭二十九年傳，—戰國時人尚不敢把他放在堯時呢。)

（二）在公亶父的時候，周民族還穴居在漆沮一帶。公亶父向西尋去，到了岐山之下的胥，那地是一塊很肥美的平原——周原——他們就在那兒住下。（據大雅緜篇前三章。「古公亶父」的「古」字係詩人加上的形容詞，非稱號，從崔述說。「聿來胥宇」的「胥」字，把公劉篇的「于胥斯原，」「于京斯依，」「于豳斯館」等句比較看來，是一個地名，從適之先生說。公亶父這人，自孟子以來都說是太王，我覺得不對。公亶父在緜篇上看，是一個「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的國君；太王是文王的祖，已在周民族很盛的時候：他們的時會是不同的。況且太王既已稱王，謚太，何以于緜篇又稱公呼名？雅頌同爲西周時作，不應當把稱號亂用如此。推其所以致誤之故，一由于公亶父「至于岐下」而太王亦「居岐之陽，」二由于公亶父娶的是姜女而文王之母亦「思媚周姜。」但我以爲周國始終不曾離開過岐山，「至岐」只有始遷的第一代，「居岐」儘不妨沿着多少代，這二者不能强合爲一事。周與姜本係老親，看后稷母名姜嫄可知，不能說太王娶的周姜卽是緜篇上的姜女，而合太王于公亶父，使他們併作一人。又看緜篇以「緜緜瓜瓞」發端，而首章言「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末章言「文王蹶厥生，」其爲原始要終之詩，言周民族自微而盛，自開國以至成大業，此意甚明。公亶父乃是初定國基之君，故詳言其始至之狀；若在太王時，便不容有這等事了。自從孟子言太王避狄，硬拉公亶父覓地的事做證據，又言太王好色，硬引緜篇「爰及姜女」的話做證據，于是公亶父與太王合而爲一，反在公劉之後，有似乎中衰，而緜篇紀始的本義就失去了。）

（三）公亶父之後有公劉。公劉時，周民族開拓的地域廣了，除了原有的胥以外，又有京和豳，渭水芮水一帶地都是他們的領土了。公劉很勤于農業，又獎勵武事，故周國益臻富強。（據大雅公劉篇。）

（四）太王承公劉之後，勢力向東方發展，始致力于翦商。（據魯頌閟宮篇。）前人謂太王王季文王是武王克商後所追王，這句話我不敢相信。詩書中全沒有追王的迹象。況且那時本不必做了統一的君主才可稱王，只要有稱王的實力就不妨自己加上這個名號：看春秋時楚國並周稱王，甚可明白。周國在公劉時既已富強，到太王時進而稱王，也是很平常的事。皇矣說王季『王此大邦，』又說文王為『下民之王，』王季文王非商紂臣，非追稱王，於此皆可見。劉先生謂據此足以取消后稷非舜臣之說，我以為這幾句話非但不能取消這說，實足以建立王季文王非商臣之說。試問王季文王為商臣有何證據？太王王季文王的追王除秦漢間人所作的中庸外有何證據？而太王王季文王在詩書上直稱為王何以反不信？）

（五）王季是一個德行很好的君主，但似乎沒有什麼大功績。他的妻太任是從殷商娶來的。（據大雅大明皇矣兩篇。）

（六）文王是有大幹才的人，又有許多的好輔佐。他事上帝很謹慎；四方之國歸附他的很多。他驅了混夷（串夷，）平夷了岐山的道路，判斷了虞芮的質成，伐滅了密崇二國，東作邑于豐，自謂受

丁上帝的命而伐商。（据大雅大明，緜，皇矣，文王有聲四篇，周頌天作篇。）

（七）文王伐商的功績沒有做成，就死了。他的長子武王繼起順天命以伐商，和商國的兵旅在牧野開戰，勇將師尙父奮力戰鬥，遂把商國滅了。（据大雅大明篇。）

以上從詩經裏抽出周初的史蹟，自公亶父立國至武王滅商，次序井然。試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論語）『文王以百里』（孟子）『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左傳）『紂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史記）這一類傳記中的話如何插得進去？

推原所以有文王爲紂臣之說的緣故，實由于春秋後期以至戰國初期的時局的引導。春秋之末，世卿已極專橫，到了戰國，小國的卿就成了小國之君（如魯之季氏），大國的卿就成了大國之君（如晉之韓魏趙三家，齊之田氏）。他們起初都是諸侯的臣子，只有很小的采邑，以巧占豪奪的結果，漸漸的『奉邑侔於諸侯；』更進一步，就分占故主之國而代之。但他們雖是自己成了國君，對於故主的君臣名分上總不免有些挂絆，對于被欺凌和被推倒的故主身上總不免有些『慚德』。在這慚德之下的自解，惟有以湯武革命爲理由。他們以爲以臣滅君是古來一例的，他們爲故主之臣，正與湯和文武爲桀紂之臣一樣；故主不振作，該得由大臣來『易位』。湯和文武滅了故主，無損其爲聖王；然則他們自己正有相當的地位可占，初不必沒臉見人。這一種心理，一半是有意的造作，一半是無意的誤會。有意的造作，只爲自己裝面子，可以弗論。無意的誤會，則實由于當時人歷史常識的太缺乏。凡是沒有歷史常識的人就不會有歷史觀念，只覺

得當前的事物無一非古來生成的，無一非萬世不易的。 現在鄉下人看辮子是盤古以來束髮的老法子，現在無智識的婦女看纏足是周公所定的禮制，這類見解沒有不是從這個「古來如此」的觀念之下所生出來的。 古代民神的雜糅，祖先的模糊，史籍的稀少，都是那時歷史觀念缺乏的表徵。 新興的國君生出這一種的誤會，那是當然之事。 我們看曹丕受了漢獻帝之禪而云「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反映過來，豈不是這一班滅公室的權門正作着「湯武之事，吾知之矣」的口吻嗎？ 所以在這個時期之中，可以斷說湯和文武的故事一定造出了許多有意的謊話和說出了無數誤會的謊話。 又一方面，那時的學者（政客）為了游說人主，鼓勵風氣，都有待於取證，而取證務必以適合於當世情形的為動聽，故不管古代事實如何，定要說成與現代同一的狀況，使得所說的在古可徵，在今可用，而後足以盡其能事，所以又發生了許多有意的謊話。 例如他們要勸一個國君行王道，這個國君的國小，就說，「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文王也是百里起的，湯還不過七十里；」這個國君的國大，就要換句話說，「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為小」了。 究竟文王實有多少地，他實有多麼大的一個園子，他的一個園子是否實有湯的一國大，他們說話是不負正確的責任的。 所以戰國學者口中的歷史，只能注意他的立說的意義，切不可看作真實的歷史，因為他們原沒有考實自己的說話的觀念。

（本章完，本篇未完。）

四三　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

（十二，九，二——十二，二，讀書雜志第十三——十六期）

劉掞藜

頡剛先生：

自讀書雜志第九期上先生那「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很引起我們的疑問後，在第十期上又讀到玄同先生答先生的書及到十一期十二期始有先生答覆我們的書，這書所討論的問題很多，所以文也很長。第十一期所載，只僅僅表明先生對於古史的態度；第十二期始有正式答覆我們質問的文字。但是爲讀書雜志底篇幅所限，第十二期纔只論及：(1)禹是否有天神性？(2)禹與夏有沒有關係？(3)禹的來源在何處？第三問題的論文在第十二期上還沒有登完，所以(4)禹貢是什麼時候作的？(5)后稷的實在如何？(6)堯舜禹的關係如何？(7)堯典皋陶謨是什麼時候做的？(8)現在公認的古史系統是如何組織而成的？及後來增加的「文王之爲紂臣」的問題等等，皆在下幾期陸續登載去了——這很足使我們欲早日一覩爲快的心陷於渴望的情境。

掞藜近在報紙上時時讀到吳稚暉先生的箴洋八股及勸梁任公先生緩提倡國學，少葬送青年……等等文章，深感吳先生的見識和愛國的熱忱。想來中國現在所處的地位和物質文明的程度，目下中國國民眞應當有十分之八九趨向於科學和實業，不應當羣集於玄學文學和國故。有名望的人眞應當提倡切用於中國現在情形的學術，使國民自立自強，使國家得存于東亞、得存于世界，眞不應當以空疏的和妝飾的學

術迷導青年。不過我們從事歷史的人，整理史料，辨僞別眞，勘錯訂誤，皆是分內的事，是我們應當努力去做的。我希望我們既從事于歷史學和文學的人努力去做我們分內的事；從事其他科學或實業的人呢，也不宜妄自菲薄，也應當努力去做他們分內的事。總之，人于其所從事而不能盡本分以求有成，以符國民之責，以盡人生之職，是最可恥的。

這段對於本書所討論的問題本是贅言若使先生萬一看得以下討論問題的文字有登入讀書雜志的價值，將其登出，這便是我希望我們大家各盡其分的一點愚忱。

第十期上玄同先生答先生的書，其中所論列乃是(1)孔丘無刪述或制作六經之事，(2)詩，書，易，禮，春秋，本是各不相干的五部書，(3)不相干的五部書配成一部而名爲『六經』的原故，(4)『六經』配成的時候，(5)『六經』是些什麼性質的書。這篇『翻案的議論』只是要研究所謂『六經』的那幾部書的原始面目，只是要研究牠們與孔丘有無關係而已。』其中雖有爲掞藜所不敢苟同之處，但對於先生所欲討論的那八九問題沒有關係，所以我在此處也不牽作一起談了。

我對於先生所已經登出的答覆，贊成的地方和可佩服的見解固然很多，却是不敢苟同之處亦自不少。我原來的意思，本想等待先生的文章全篇登完後才作一整篇的文字和先生商量，但是一讀了佳作以後，於心所不安之處輒欲一吐爲快，故隨手寫出，就商於先生。在下幾期讀書雜志將陸續登載的答書，若有不得不與先生討論之點，仍當逐期奉商。因爲這種翻案的議論，這種懷疑的精神，很有影響於我國的人心和史

界，心有所欲言，不敢不告也。

(一)關於先生所持古史態度的討論

信史的建設，先生引胡適之先生的古史大旨三條作爲骨幹；胡先生的說法本與我們及一般人的商周秦民族觀念相同，可不再說。至於推翻非信史方面先生所說應具的標準有

(一)打破民族出於一元的觀念

(二)打破向來地域一統的觀念

(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

(四)打破古代爲黃金世界的觀念

關于第(一)條所說，很與我個人的意見相符。我向來以爲中國民族在幾萬年前縱或出於一元，但有史時代的夏商周秦實在各有各的始祖。一統的世系籠罩百代帝王，實在不敢信。「中國民族的出于一元，俟將來的地質學及人類學上有確實的發見後，我們自可承認牠；但現在所有的牽合混纏的傳說我們決不能胡亂承認。我們對於古史應當依了民族的分合爲分合，尋出他們的系統的異同狀況，」這話十分贊成。只是說堯典乃因「許多民族的始祖的傳說……歸到一條線上，有了先後君臣的關係」而產生出來，這話尚待先生辨堯典的文字登出讀後，纔敢說贊成或不贊成。

關於第（二）條所說，我却有點意思不同了。先生謂「史記上黃帝的『東至於海，西至於空桐，南至於江，北逐葷粥，』……禹貢的九州，堯典的四罪，……乃是戰國時七國的疆域，而堯典的羲和四宅以交趾入版圖更是秦漢的疆域。……商朝自限於『邦畿千里』之內。周有天下，用了封建制以鎮壓四國—四方之國，—已比商朝進了一步，然而始終未曾沒收了蠻貊的土地人民。……到秦併六國而始一統。若說黃帝以來就是如此，這步驟就亂了。所以我們對於古史，……不能以戰國的七國秦的四十郡算做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我以為先生錯了。「步驟就亂」不足以證明戰國的七國秦的四十郡不是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因為轄地大小廣狹不是自古至今有一定步驟的，不是古代定局的地域極小而後來定一代一代推廣的。我們知道漢朝定局的地域廣，到了晉朝，疆域便狹了到了東晉，更狹小了。唐朝定局的地域廣，到了宋朝，疆域便狹了，到了南宋，更狹小了。元朝的疆域極廣，不僅為中國前古所無，而且為明清所遠不及。如果按步驟去推測，定然是再亂，三亂，四亂……了，難道遂可據東晉的疆域說漢書地理志所載非漢時早就定局的地域，據南宋明清的疆域說唐書元史所載非唐元早就定局的地域嗎？如果以黃帝的四至，禹貢的九州，堯典的四罪所放殛之地為合於戰國時七國的疆域，便以為不應是黃帝時堯時禹時早就定局的地域，難道遂可說漢代疆域合於唐代的疆域，便不應是漢代早就定局的地域嗎？如果以商朝自限於『邦畿千里』之內，周朝始終未曾沒收了蠻貊的土地人民，證交趾是秦漢的疆域，不應入堯典的版圖，難道可以南宋自限於大江之南，清朝始終未曾發展至葱嶺以西，遂說漢朝不應服西域，元朝不應跨歐亞嗎？

先生或要說如果堯時已將交趾併入版圖，何以夏商來絕無人道及，絕無書提及呢？ 這疑問最好以歷史上相同的事實解釋之。 從前亞歷山大的帝國版圖東至印度河以東，南至尼羅河上流，後來羅馬帝國繼起，西盡歐洲，北至來因河布列顛，皆其疆土。 此數百年間，希臘羅馬的人誰不知道世界之大。 可是到了中世紀羅馬既衰，希臘與羅馬時之地理知識盡失，只知道有地中海沿海的各地，以耶路撒冷為世界的中心，不復知有東方；亞歷山大所親自到過而收入版圖的印度河，再也無人知，無人到了。 到了歐洲黑暗時代（四七六年至八百年，）歐人蒙昧的狀態幾欲返乎草昧時代了，甚麼學術和知識都不知道了。 以此看來，前代入版圖的遼遠地方，後來失掉了，或竟至於數百年千餘年隔絕不知，是常有的事；不可因中間有時隔絕，遂說牠不是那時那代的疆土。 且交趾非周朝非春秋非戰國時代的疆域所及，乃「秦漢的疆域，」這是先生承認的。 先生既只承認交趾為秦漢時的疆土，則必謂堯典的義和四宅以交趾入版圖乃堯典為秦漢人所偽造之證，至少或亦以四宅為秦漢人竄入之證。 若是我所猜的不錯，則是先生的意思以為秦漢以前中國與交趾無關係，中國與交趾遠隔絕，所以必沒有交趾之可知可言。 但是就我所知，春秋之末，秦漢之前，竟時時有人道及交趾，甚且是堯舜撫有交趾。 我且把他們分寫如下：

(a)墨子節用中　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際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

(b)尸子輯逸文　堯南撫交趾，北懷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

(c)韓非子十過　昔者堯有天下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

(d)大戴禮記少閒　昔虞舜以天德嗣堯，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

在這四條之中，我們縱把（d）條目爲漢儒所作，將牠和淮南子修務訓所云『堯北撫幽都，南道交趾，』賈誼新書修政語所云『堯撫交趾，北中幽都，』史記顓頊紀所云『南至于交趾，』舜紀所云『南撫交趾』等觀，而于（a）（b）（c）三條，無論其爲墨子尸子韓非子親寫或彼等之徒黨所記，總可認爲戰國時文。然則彼等所言係憑空臆造耶？抑有所據耶？豈其預知後世之地名耶？抑將謂其承前代之舊耶？如曰漢人竄入，則何不幷論語，孟子，荀子……諸書而俱竄入之以爲完全之彌縫？若曰非秦漢人所竄入，則是秦漢以前知有交趾了。知有交趾，則是早已與交趾有關係了。但是我們知道春秋東周西周商夏都與交趾沒有來往，是墨子尸子韓非子等所言實由堯之撫有交趾也。以韓非之疑古，猶且稱道之則交趾入堯之版圖亦可以無惑。如曰託古改制，則何三子所言似出諸一口耶？反覆思維，覺先生以交趾爲秦漢疆域便疑其不能入堯時版圖，實在錯了。

先生又說『我們看，楚國的若敖蚡冒還是西周末東遷初的人，楚國地方還在今河南湖北，但他們竟是「篳路藍縷以啓山林。」鄭國是西周末年封的，地在今河南新鄭，但竟是「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那裏是一統時的樣子！』這段話也是欲說明自黃帝至周地域不統一的一個證據。以我看來，不禁發笑。（一）蓬蒿藜藋是容易生長的某地亂到一年，蓬蒿藜藋便可沒人；某地無人一年，蓬蒿藜藋也便可沒人；況且有人居的地方蓬蒿藜藋也須時時斬艾的。這不過可以說明人少，安得據爲『地域向來不

統一』之證？山林也是容易長成的，數十年沒有人居，後來的人便須啓牠了。這也不過可以說明人少，安得據為『地域向來不統一』之證？現在青海西藏新疆蒙古及內地的蓬蒿藜藿的地方和山林，須斬艾啓闢的尚多哩，豈可說地域還未像統一，還未入我國版圖？（二）商民族以河南為中心，此適之先生所說，此我們所共承認的。商朝天下自限於『邦畿千里』之內，此先生所說，我也可承認的。商在河南，後來鄭亦在河南，其在商代邦畿千里之內是顯然的。豈可因在鄭封之初須斬艾蓬蒿藜藿，遂說『地域向來不統一』嗎？鄭封地不屬于商統一的邦畿千里之內嗎？楚國地方在今河南湖北，是我們所公認的。但是周南召南所歌詠江漢汝間的化行俗美，人物繁盛，這也想是先生所肯承認的。然則楚國地方在周朝統一的地域裏頭顯然明了。豈可因若敖蚡冒的『篳路藍縷以啓山林』，遂說『地域向來不統一？』（三）所謂『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不過是楚鄭的後人表白他們祖先勤勞的意思。且封地于人，豈必先為之啓闢山林，斬之蓬蒿藜藿？且地經一統，豈山林立即全啓，蓬蒿藜藿即不生耶？反覆推求，覺先生欲以此證『不像統一，』亦屬錯了。

所以我的態度只是打破古來各代地域一致的觀念。

關於第（三）條所說，我也有些不贊成的地方。即如先生所說『古人對于神和人原沒有界限，所謂歷史差不多完全是神話。人與神混的，如后土原是地神，卻也是共工氏之子；實沈原是星名，卻也是高辛氏之子。人與獸混的，如夔本是九鼎上的罔兩，又是做樂正的官；饕餮本是鼎上圖案畫中的獸，又是縉雲氏不

才子，」這段似是而非，很足以淆惑視聽。謂古史中多神話，是我所承認的；但舉這些例來證『古人對於神和人原沒有界限，所謂歷史差不多全是神話，」是不可不辯的。(a)辯『后土原是地神，卻也是共工氏之子。」先生須知道古『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這段話就是說治理木火金水土的五個官名叫作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作這五個官的人就是重，該，修，熙，犂，句龍。他們在生時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因爲他們不失職，後人遂感他們的恩惠；祀爲貴神，是尊是奉。所謂貴神的神名，就是那五個官名。猶之田官之長叫作稷，作稷這官的人死了，後人遂祀這作稷官的人爲稷神。祀他爲神是由後人感他的恩惠而尊奉的，所以如果後來又有做這官的人功勞更大更密切，後人不惜把後來的這個人祀作神以代替從前那個祀作神的人。夏祀柱爲稷，商以來祀棄爲稷，便是這個道理。由上看來，不見得『后土原是地神；』后土乃原是官名。後來后土成爲神名，乃是借官名作神名的。共工氏之子—句龍—原不是與地神混，乃是作治土的官—后土，—後來人祀他爲神，始把他的官名當作神名的。先生這種錯誤，好像和認『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爲原是儒神，卻也是叔梁紇之子』一樣，尚可說得去麽？(b)辯『實沈原是星名，卻也是高辛氏之子。

」這句話的錯誤和上句一樣，均是把事實前後倒認。 先生須知道「昔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 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 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 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 帝用嘉之，封諸汾川。 沈，姒，蓐黃實守其祀。… 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 這是說實沈遷于大夏，「主祀」參星，後來人奉他爲參神，「如臺駘被封於汾川，死後沈，姒，蓐黃祀他，奉之爲汾神一樣。 是參原是星名，實沈原是人名而不原是星名，明矣。 是因實沈居於大夏，而大夏爲參星之分野，遂「主祀」之，後人因謂參星爲實沈，猶之豕韋氏處於衞地，衞地爲營室之分野，後人因謂營室爲豕韋一樣。 是實沈原是人名而後人以他的人名名星益明矣。 先生這種錯誤，豈不是和上句相同嗎？ 退一步言之，以星名名人者後世多有，如「參原是星名，郤也是曾晳之子；太白原是星名，郤也是杜甫之朋。」 難道就可以說「人與神混」春秋和唐朝的人「對於神和人原沒有界限」麼？ (c)辯「夔本是九鼎上的罔兩，又是做樂正的官。」 關於這事先生又在讀書雜志第十二期論「禹的來源在何處」內第(3)條中說：「彝器上的夔係屬獸形，呂氏春秋又記樂正夔有一足的傳說（察傳），堯典上又說他會使「百獸率舞」，夔之爲獸實無可疑。」 我以爲（一）各書上不是傳說的事先生猶多懷疑，何以呂氏春秋明明載是傳說的話，先生反如此相信？ 且呂氏春秋所載乃「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 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敎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爲樂正。 夔

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惟聖人為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這明明是說夔非一足，這明明是傳說之誤，這明明是呂覽教人須『察傳』，這明明警人得如『夔一足』一類的話須『熟論其於人，必驗之以理。』 若先生相信『夔之為獸』而夔獸又只有一足，驗之於古今動物界，有是獸乎？（二）退一步言之，無論夔獸為幾足，亦無論夔為魖獸，古今以鬼以獸等等名人者多矣。如桓魋，以鬼名者也；如夔同時之虎熊羆，春秋時之郤豹，成熊，羊舌虎，饔犨等，俱以獸名者也；祝鮀，史鰌，梁鱣，孔鯉，以魚名者也；公孫蠆，以毒蟲名者也；其他以物名者不可勝舉，至今阿毛阿狗之類猶多。那些耍把戲的阿毛阿狗之類都能使狗和獸率舞，遂可說他們為獸實無可疑嗎？至如夔所以名夔之故，或者以其生來之容貌醜惡強健，因之以夔名之，如柳宗元所傳郭橐駝，只因背駝，遂因人呼橐駝而即以為名之類；或者以其與夔獸有什麼關係，因名為夔，如鬭穀於菟為於菟所乳，遂名為於菟之類；或者以其好畜夔，因名為夔，如豢龍御龍之因擾龍，狙公之因養狙而名之類：皆不可知。即無此諸因，亦何嘗不可名？今以鑄鼎象物的夔是獸形，遂證夔為罔兩為獸，先生亦可以彝器上的虎豹……蛇鯉……橐駝……係屬獸形魚形蟲形，遂證於菟，郤豹，……祝鮀，孔鯉，……公孫蠆，郭橐駝……為獸為魚為蟲；以彝器上的魖為鬼形，遂證魖為罔兩嗎？（三）再退一步言之，即使夔只有一足，或因夔之一足而名夔，也不能即證明其為罔兩，證其不是樂官。我們知道古代樂官多是殘體人做的，取其靜而不便動，宜於審音律也。如師曠之聰，因其目瞽，即其著例。夔縱只有一足，何不可為樂官？

墙保己一生而盲，猶能編輯史料及武家名目鈔等書至千餘卷，「驗之以理，」怎麼變不可爲樂官呢？ 至於「禹的來源在何處」中第(2)條，其證明夔是罔兩邏輯異常錯誤，更不足稱證據；等到討論「禹的來源」時再說去吧。

(d)辯「饕餮本是鼎上圖案畫中的獸，又是縉雲氏的不才子。」 這話的誤處，也和上句一樣。以爲鼎上圖案畫中有這種獸，便說縉雲氏的不才子即是此獸，不是人。 須知圖畫自圖畫，人自人，不容混證，好像鼎上圖案畫中有虎，我們不能遂將反證鬬穀於菟便是虎，或把來證「人與獸混」「古人對神和人原沒有界限。」 且左傳不是說「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寬，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嗎？ 這是因他爲人貪婪無厭，天下之民惡之，以爲他與饕餮這獸無異，（呂氏春秋先識篇曰，「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 經義述聞王念孫曰，「饕餮本貪食之名，故其字從食，因謂貪得無厭者爲饕餮耳。」 可知獸之號爲饕餮，亦以其貪而名之，如此，）因謂之爲饕餮，正如南子與宋朝淫亂，宋人惡之，以爲他們與豕類無異，因喩南子爲婁豬，宋朝爲艾豭一樣。 若說「婁豬艾豭是鼎上彝器上圖案畫中的獸，又是衞靈公的夫人和她的情人，」以證「人和獸混，」還可通嗎？ 是故渾敦檮杌窮奇饕餮固是獸（此本服虔張揖之說）不得因把他們名四不才子，或彝器上有這類的像，遽斷古人對於人和神原沒有界限，或四不才子本無其人也。

故我對于古史，只採取「察傳」的態度，參之以情，驗之以理，斷之以證。

關于第（四）條所謂「打破古代黃金世界的觀念，」是我很贊成的。 雖然這條的解釋如說堯典臯

陶謨等極盛的人治和德化出于戰國時一班政治家託古之類很引起我懷疑，但是先生還有「辨堯典」「辨皋陶謨」的文章在後將陸續登出，等到讀了那文，如果滿意，當然不要說了；如不滿意，那時再說罷。

王充說得好，他謂「古之戎狄今爲中國，古之躶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跗今履商舄。以盤石爲沃田，以桀暴爲良民，夷埳坷爲均平，化不賓爲齊民，非太平而何？ 夫實德化則周不能過漢，論符瑞則漢盛于周，度境土則周狹于漢，漢何以不如周？」（論衡宣漢篇） 我們知道堯有八愷八元不能舉，有四凶不能去，舜的父頑母嚚弟傲，又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 他們所居，又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飯於土塯，啜於土形，禹也是惡衣服，卑宮室。 人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惡臭。」 婚姻未別：堯的兩女同嫁一夫，簡狄姜嫄私淫野合而生契稷（予以爲「履帝武敏，」「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皆是淫奔野合，生子而不知有父之證。）…… 凡此皆草昧榛狉的現象，有什麽黃金世界之可言？ 其使民亦不過如先生所說「依天託祖的壓迫着人民就他們的軌範，」實在沒有什麽黃金世界的樣子。 不過堯舜禹這幾個帝王能努力盡職，時代沒有後來的擾攘，後來的人遂嘆爲不可及，而不知那時地曠人稀，人易于生，簡單樸素，自是當然，而所以爲草昧亦正以此也。

以上關於先生所持古史態度的討論完了。 錢玄同先生說我很有「信經」的色彩，其實我所持的態度却有不然：於可信者信之，不可信者還是不信。 今趁這裏和先生討論「態度」之便，略附論之如下，得以請益于玄同先生！

例如孟子的話，我間或有些不敢相信。我且舉出二事言之：（一）孟子說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三使往聘之，然後就湯，是伊尹不苟進也。乃孟子又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且言治亦進，亂亦進，而爲聖之任。夫伊尹既不枉己而正人，辱己而正天下，潔身至矣，何以又五就湯，五就桀，治亦進，亂亦進呢？當湯未聘伊尹之先，夏固已亂矣，而伊尹不往夏以正桀，可謂亂亦進耶？當湯三聘之之後而後始往商以就湯，可謂治亦進耶？若說伊尹之五就湯五就桀乃是謂湯既得伊尹而命之就桀，桀不用而復返就湯，湯復命之就桀，如是往返去就，至於四五，然則迹雖近於治亦進亂亦進，而實則非其本心，不過爲湯所促迫而如此耳，尙得爲聖之任者耶？否則其五就湯五就桀在湯未得之之前也，何以湯又三使往聘？且若其五就湯五就桀而在湯未得之之先也，何以伊尹得爲『不枉己而正人，辱己而正天下』『歸潔其身而已』者耶？反往參驗推證，何孟子之言自相矛盾如此！毋乃湯與伊尹的事已無徵于戰國之際，故墨子莊子韓非子和呂氏春秋所言臆測而孟子之言亦自相矛盾也歟？（二）武成書武王之伐紂也，曰『血流漂杵』。以逸周書世俘篇證之，似乎這事屬事實。而孟子以武王之仁聲仁聞推想武王不至如此，——或欲『託古改制』爲他勉强辯護，因以爲書不可盡信；但我以爲孟子錯了，——或以爲他欲『託古改制』的破綻露了：武王殺敵縱不如世俘所書，要必不少。戰國時代一種口頭禪，謂仁人之師不多殺戮。但是我們知道文王至仁，乃當其伐崇之役，嘗『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絕是忽』，是仁人之師未嘗不多殺戮。我們也知道周公至仁，乃當其征東之役，嘗破斧缺斨，缺錡缺銶，是仁人之師未嘗不殺戮。以文王周公用兵之多戮，可知武王與紂之大戰，其必多殺戮

無疑，孟子雖常勉強辯護，他的話豈可相信？

以上兩例，略表示我對於經書或任何子書不敢妄信，但也不敢閉着眼睛，一筆抹殺；總須度之以情，驗之以理，決之以證。經過嚴密的考量映證，不可信的便不信了。但不能因一事不可信，便隨便說他事俱不可信，因一書一篇不可信，便隨便說他書他篇皆不可信。如玄同先生在讀書雜誌第十期答顧頡剛先生書中說『我從前以為堯舜二人一定是「無是公」「烏有先生」。堯，高也；舜，借為「俊」，大也（山海經的大荒東經作「帝俊」）；「堯」「舜」的意義，就和「聖人」「賢人」「英雄」「豪傑」一樣，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稱而已。中國的歷史應該從禹說起，各教都有「洪水」的傳說，想來是實有其事的……』這種薄弱的證據和推想，我卻不敢以之不相信有堯有舜：因為(1)玄同先生相信有禹，是由各教都有『洪水』的傳說，想來是實有其事，何以各教都有『堯』『舜』的傳說，卻又想來一定是『無是公』『烏有先生』呢？(2)就『堯』『舜』二字的意義說，『堯』，高也，『舜』，大也，遂決定堯舜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稱，但是我們知道『高宗』，『高祖』，『太宗』，『太祖』都是『高』『大』的意思，難道遂可斷定歷來許多高宗高祖太宗太祖都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稱而無其人嗎？即以堯舜或為名字論之，我們知道春秋時有伯黯，黯，大也；有卜商字子夏，商通章，章，大也，夏亦大也；有郭賈字子方，賈通夏，大也，方亦大也。又有僑字子產，僑高也，產，大也；有騶帶字子上，帶讀為蔕，蔕高也，上亦高也。其餘以『高』『大』名者不可勝數。若使如玄同先生所說，我們應以為這班人都是『無是公』『烏有先生』『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稱』了。以此疑古，

不是笑話麽？　這種錯誤，皆是迷于說文的餘毒，而不知訴于邏輯，大前提早已錯了，怎能推論得合法呢？

(二)討論禹是否有天神性

先生上次『所以疑禹爲天神，是由「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而來。』　現在已承認『下土』二字不能證明禹是天神了：但又據詩書上說禹的話歸納出下列四條：

(a)禹平水土是受上帝的命。

(b)禹的『迹』是很廣的。

(c)禹的功績是『敷土』，『甸山』，『治水』。

(d)禹是一個耕稼的國王。

上列四條，本少『禹有天神性』的意味；但先生一句總話說『依舊以爲禹是一個神。』　我初看這句話，以爲下文一定有很好的意思足以說明禹是一個神。　那想將下文一看，不覺大失所望。

在這四條中，先生以爲『禹的最有天神的嫌疑的地方……乃在(c)條上。』　我們且把(c)條先行討論。

(c)條所歸納出『禹的功績是「敷土」「甸山」「治水」』是根據：

詩—(1)信彼南山，維禹甸之。(信南山)

(2)豐水東注，維禹之績。(文王有聲)

(3)奕奕梁山，維禹甸之。（韓奕）

(4)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長發）

書——(5)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乃命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於民。（呂刑）

由上五條，先生發了『土是怎樣敷法山是怎樣甸法』的疑問。因為先生早已有『禹有神性』的主見在腦子裏，將前人把『敷』字解作『分』解作『賦』，把『甸』字解作『治』的一並抹撥，自己牽強傅會將『敷』換作『鋪』，用之解『禹敷下土方』為『禹鋪放土地於下方』；將『甸』依漢朝或本作『敶』的解作『列』，說為『排列分布』之意，用之解『維禹甸之』為『山亦為禹所陳』；又憑空說『治水』的『治』字是後人加上去的。又硬把『豐水東注，維禹之績』的『績』字當作『迹』。原來傳訓『績』為『業』，箋訓『績』為『功』，是極好解極通順的，弄到極不通（原來是說『豐水之向東流，乃禹之功績，』意謂豐水為禹所治好而向東流。今改作迹；說文『迹，步處也』我們解起來是『豐水之向東流，乃禹之步處，』尚可通麽？）於是胡亂說『那時人看得土是禹鋪的，山是禹陳的，水道自然也是禹所排列的了。』這樣一牽強傅會，遂算作證明『禹的最有天神性的嫌疑』。

這種主觀的意見是我所最不贊成的。我們解釋古書上的字，應當依古代的解說。若穿鑿傅會，遷就己意，是樸學者所最忌的。我們解釋『敷』字，應當從最古的解法。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

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這「敷治」是兩字連用的動詞。凡兩字連用的動詞，意義是一樣的，故用時可獨用，亦可雙用。例如「變化」「遷徙」「辨別」「處理」「替代」「逼迫」「憂愁」「奔走」……不勝枚舉，用時皆可分之爲二，合之爲一，可單用，可雙用，意義是毫不變的。孟子把「敷治」兩字連用，是孟子時代解「敷」作「治」的證據。我們再看荀子成相「禹傅土」，廣雅釋言「傅，敷也」，釋詁「傅，治也。」「傅」＝「傅，」是「敷」＝「治」也。此「敷」解作「治」的又一證據。上兩證是直接的。我們再看古人把「敷」解作「分」字的到底怎樣。禹貢「禹敷土，」馬注，「敷，分也，」「分」者，論語曰「五穀不分，」鄭注，「分，猶理也。」「理」即「治理」之意。說文「理，治玉也；」廣雅釋詁三「理，治也。」）此間接證明「敷」之解爲「治」也。我們再看山海經海內經「禹鯀是始布土，」注，猶「敷」也。「布」「敷」古同音通用，故「敷土」即是「布土。」到底「布」字的意義又怎樣呢？廣雅釋詁三，「列，布也；」又「列，治也。」「列」＝「列，」是「布」＝「治」也。「敷土」既即是「布土」，而「布土」即是「治土，」是「敷土」亦即是「治土」而訓「敷」爲「治」也。山海經雖僞書，太史公已曾讀之，其爲戰國或秦代之作可知，是又漢前訓「敷」爲「治」之證也。由上諸證，可知「禹敷下土方」本作「禹敷治下方土地」解，毫無疑義。既然是「禹敷治下方土地，」那麼這「禹敷治下方土地」就是如孟子所說的「堯舉舜來敷治天下，」或孟子自己擔當的「能平治天下」一樣，沒有「天神性的嫌疑」了。豈容牽強傅會？至於天問言禹治水，有「洪泉極深，何以寘之？」的問，寘字同塡，訓塞，解作「洪水淵泉極深，大

禹何用寘塞而平之乎？」這是極平常的話，怎見得有「天神性的嫌疑？」譬如我說「黃河決堤，水大得很，顧先生將何以寘塞牠？」難道遂可以說顧先生有天神性的嫌疑麼？（況且寘字又卽是寔字，古者寘寔雙聲通假。寔，止也。把來解「何以寘之」爲「何以止之，」又甚通順。而寔寘的古訓又常解作「是；」「是」者，楚語「王弗是」注，「理也。」是寘又有「敷理」「敷治」之義也。）

論到「甸」字呢，我們也不可牽强傅會。先生以詩經上兩個「維禹甸之」爲「從前人講作「治」」不合於先生的成見，憑空說「這不過看見禹貢上有「治梁及岐」的話而牽引上來，了無根據。」好，我們且把「甸」字造字的原意研究研究看，畢竟是古人了無根據呢？還是先生了無根據？「甸」字从田，包省。按从勹田會意，田亦聲。勹，裹也。中有田而外有所包裹，顯然是田外圍以田塍之意，卽作界畫也，畔也。這豈不是治田嗎？我們再看从田得聲的有「佃」有「畋」有「畕」。「佃，」中也；中者正也，已有正經界之意；而易繫辭的「以佃以漁」則訓佃爲治田矣。「畋，」平田也，平田卽治田也；書多方「畋爾田」訓爲「治爾田」是也。「畕，」比田也，從二田會意，爲次比田土之意，是亦治田也。甸字本意既是治田之義，而同聲同偏旁之字又皆爲治田之義，範之以「音同義同」「同聲通假」之凡例，已無不鑿鑿可據，而先生乃說毛傳之訓「甸」爲「治」是了無根據，不知果何所據而云然？抹撥「甸」字的武斷話不能成立了，我們且退一步而論「敶」字。說文，「敶，列也；」列者，廣雅釋詁三曰，「治也。」又廣雅釋詁三，「敶，布也，」而布，敷，訓爲治，於上文已證之，昭然。是「維禹敶之」與「維禹甸之」的解釋毫無差異，豈容强爲傅

會？先生所說的『分』『列』『布』在古本皆有『治』的意義.但先生欲牽強傅會，因將他們連讀來作『排列分布，』解為現在的意思，以遷就所謂『神性的嫌疑。』殊不知現在所謂『排列分布，』必定要有許多東西在那裏等待『排列分布』而後可說的。我們看信南山所說只有一個南山而韓奕所說又只有一個梁山，一個山怎能說得『排列分布』？譬如說『信彼許多兵士，維將官排列分布之』這總可以；若說『信彼顧先生，維將官排列分布之，』這豈可通？由上結局起來；『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卽是『信彼南山維禹治之，』『奕奕梁山，維禹治之，』與『天作高山，大王荒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一樣地沒有什麼『天神性的嫌疑。』否則天作的高山（岐山）大王且能大之（『荒』傳曰『大也』此本于晉語。晉語鄭叔詹曰，『在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如果咬文呆看，這是何等的有天神性！

論到『治水』的『治』字，雖欲牽強傅會而不可能，蓋因『治』字的意義最明顯，最為人所熟知故也。於是憑空說：『治水的「治」字是後人加上去的。』我把這句話足足看了四五遍，又反覆看了前後，總不知先生何所指。這段迷離徜彷，前後不貫，既然說不出什麼道理來，所以我也不論。洪範言禹治水雖不明白，但不能因不言禹治水遂謂禹為神。且洪範之言「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乃由『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是則『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乃由『禹平水土』（呂刑。）此處雖未言『禹平水土，』按文意却是天之錫禹洪範九疇乃在禹有所成之後，明甚。而先生乃曰『似乎他（禹）一得到了上帝的九疇，洪

水就自會平復似的。』──這完全將『禹有所成而天乃錫禹』倒作『天錫禹而禹始有所成』了。還全是先生自己之意，非洪範之意，足見先生蔽於成見矣。

以上辨『禹的最有天神的嫌疑的地方』在『禹的功績是「敷土」「甸山」「治水」』之說不能成立。

次之討論（a）條。（a）條所歸納出『禹平水土是受上帝的命』是根據：

書──(1)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敍。（洪範）

(2)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於苗。……乃命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於民。（呂刑）

先生說：『洪範上「天」「帝」互稱，可見帝即是天，』這很對的。又說『殛鯀的是天，與禹的亦是天；』』這便錯了。我們只要略略小心一讀洪範這段，便只看出『不畀洪範九疇』的是天，『錫禹洪範九疇』的也是天；鯀之殛死乃由『彝倫攸斁』，禹之嗣興乃由鯀之殛死，並不見得『殛鯀的是天，與禹的亦是天。』這裏又只言禹之嗣興，並未說禹受天命而平水土，是『禹平水土是受上帝的命』的話與這裏沒有關係，不能引這裏作證。退一步言之：這裏有『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可據以說天和禹有關係，但不能因此遂說可證明『禹是一個神。』因為我們知道閟宮說『天錫公（僖公）純嘏』，不能遂謂僖公是一個神；大誥說

「于天……遺我大寶龜，」不能謂周公是一個神，大明說「天作之（文王）合，」不能謂文王是一個神；既醉說「天被爾祿，」不能謂那班士君子俱是神，召旻說「天……瘨我饑饉」不能謂凡伯是一個神；烝民說「天……保……天子，生仲山甫，」不能謂天子（宣王）和仲山甫皆是神……故也。再退一步言之，即使說「帝殛鯀，天與禹，」（這本非洪範之意：禹爲主詞，與是自動字，天與禹，禹是賓詞，與是他動字——這天與禹是依先生的意思說的，）也不能因此遂說可證明「禹是一個神。」因爲我們知道皇矣說「上帝耆之，（耆，惡也，又斥也；之，指夏商，）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此指文王，）」不能謂夏商人和文王是神；黃鳥說「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天保說「天保定爾，以莫不興，」不能謂奄息仲行鍼虎等是神，西伯戡黎說「天既訖我殷命，」大誥說「天……與我小邦周，」不能謂殷周之王是神；微子說「天毒降災荒殷邦，」洪範說「惟天陰隲下民，」不能謂殷人下民皆是神……故也。

呂刑上的「皇帝」的解說，向來已有兩種。鄭康成以爲皇帝指堯（此「皇帝清問下民」之皇帝，至「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之皇帝，鄭氏以爲是顓頊，）三國志魏志鍾繇傳繇上疏引此經所說，亦以「皇帝」爲堯，——此今文義也。趙岐注孟子引甫刑皇帝作帝（按呂刑馬注亦曰，皇帝一作帝；惟墨子尙賢中作「皇帝清問下民，」與今本書合，）謂帝爲天，此今文歐陽夏侯異說也。無論解「皇帝清問下民」之「皇帝」爲「上帝」或「帝堯，」參之以上下文義皆可通。不過依鄭康成據楚語等言苗民作刑之歷史，以爲「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

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于西裔者爲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之說觀之，『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指顓頊，『皇帝清問下民』指帝堯，似乎很正確。且若兩『皇帝』皆指『上帝，』則呂刑此段前有『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的『上帝』領起，下兩『皇帝』皆不應著。復次，『命重黎，……』『命三后：．』乃顓頊帝堯兩時代之事，故各用『皇帝』領起。——總之，不論『皇帝』解爲『上帝』或『人帝，』皆不能證明『禹是一個神。』拔棃前面討論洪範所引許多『天和人的關係』的證據，已足解惑。如果先生以爲『皇帝既是上帝，他所命的三后當然含有天神性，』我且再舉些上帝和天命人的例，請先生看他們都有天神性沒有。（一）詩：(A)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殷武。(B)思文后稷……貽我來牟，帝命率育—思文。(C)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昊天有成命。(D)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假樂。(E)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玄鳥。(F)帝謂文王—皇矣。(G)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大明。(H)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於周服—文王。（二）書：(A)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文侯之命。(B)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立政。(C)帝……伻我有夏式商受命—立政。(D)天……簡畀殷命—多方。(E)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多方。(F)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君奭。(G)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於厥躬—君奭。(H)惟時天……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多士。(I)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多士。(J)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康

誥。（K）天既孚命正厥德——高宗肜日。……（三）最奇者，墨子之說天命湯等也，其非攻下曰：「還至乎夏王桀，天有酷命，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於）國，鶴鳴十夕餘，乃命湯於鑣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于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湯焉（焉乃也）敢奉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火於夏之城間西北之隅。」湯奉桀衆以克有（夏），屬諸侯于薄，薦章天命，通於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下接着說「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亦是同樣離奇。——先生於上面所舉許多天命的人也要說他們「當然含有天神性」否？湯與天，天神，鬼完全混作一團，先生更當說他是一個神「自無可〔疑〕」嗎？孔丘也常言「畏天命，」「知我者其天，」「天喪予，」「天生德於予，」子貢且謂「天縱之將聖，」想先生也必以爲孔子有天神性無疑了？所以如果先生以爲「禹是一個神，」便該承認孔子及其前頭三代的帝王人民皆是神，且更當從「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赫赫姜嫄……上帝是依……是生后稷」的商稷說起。如果不承認孔子以前的人都是神，則「禹是一個神」的話不能成立。

先生自然也說過「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帝謂文王，予懷明德」等爲「他們說上帝與之接近，是爲自已的聲勢計；」但是我們看閟宮「天錫公純嘏，」既醉「天被爾祿，」召旻「天癝我饑饉，」烝民「天……保……天子，生仲山甫，」黃鳥「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天保「天保定爾，以莫不興，」西伯戡黎「天既訖我殷命，」微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洪範「惟天陰騭下民，」「天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殷武「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文侯之命「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子貢謂孔子「固天縱之將聖」：何嘗是他們說上帝與之接近乃為自己聲勢計耶？ 我因此知道古人說天說上帝，不是以為「人含有天神性，」倒是以為「天神含有人性，」所以任何事皆牽及天，不僅僅是王者稱天而治已也。 適之先生說得好：「老子以前的天道觀念，都把天看作一個有意志有知識，能喜能怒，能作威作福的主宰。 試看詩經中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大明，「帝謂文王」—皇矣，是天有意志。 「天監在下，」「上帝臨汝」—大明「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illegible]之莫」—皇矣，是天有知識。 「有皇上帝，伊誰云憎？」—正月；「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板，是天能喜怒。 「昊天不傭，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節南山「天降喪亂，降此蟊賊」—桑柔「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雲漢，是天能作威作福。」 因為古人有這種天道觀念，所以不僅呂刑上皇帝所命的禹平水土，伯夷降典，稷降播種，不能說他們為神，即凡古書上「天和人有關係」的人也不能隨便說他們為神了。

先生又說，「武湯文王的來踪去跡甚是明白，他們有祖先，有子孫，所以雖有神話而沒有神的嫌疑。 至於禹，他的來踪去跡不明，在古史上的地位是獨立的；父鯀子啓全出於偽史，不足信。」 先生所謂偽史，大概是指堯典，皋陶謨，禹貢，先生尚有辯論文在後未登，雖然不知道能否成立，但是現在我暫且承認先生所說不提——前面所以不提三篇之故也是如此。 洪範非偽史，是幾千年來的人所共認的；先生嘗引來作證，是先生也承認無疑了。 既然承認洪範非偽史，於是我敢說禹是鯀的後裔。 因為洪範說，「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我們知道「嗣」古文作「孠」一見而知其為「子」的意義。 再看說文，「嗣，諸侯嗣國也，」請問「諸侯嗣國」該不該承認是「子繼父位」的 再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的齊慶嗣，字子息，請問「子息」是不是「兒子」的意思? 再看詩小雅斯干「似續妣祖，」似嗣古同聲通用，故傳曰「似，嗣也，」「嗣續妣祖」是不是「承繼先人」的意思? 再看書上所說的「閔予小子嗣，」「命汝嗣訓，臨君周邦，」「嗣守文武大訓，」「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於觀於逸，……」「嗣王其監于玆，」「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

……皆是子孫嗣祖先。 由是禹之為鯀子亦明矣。 至啓為禹子，除皋陶謨外，孟子言之最詳；孟子雖戰國時人，然其言此也必所有據。 且禹傳位於啓事由萬章問之，可知此事為當時所通知，是必為舊史明矣。 然則啓為禹子亦無可疑。（詳見下論禹與夏有沒有關係條。） 既然鯀為禹父，啓為禹子，禹的來踪去跡何嘗不明? 「父鯀子啓全出於偽史，不足信」之說豈能成立?

以上辯禹「當然含有天神性」乃在「禹平水土是受上帝的命」之說不能成立。

復次，為(b)條。 (b)所歸納出「禹的「迹」是很廣的」是根據：

詩—(1)信彼南山，維禹甸之。（信南山）

(2)奕奕梁山，維禹甸之。（韓奕）

(3)豐水東注，維禹之績。（文王有聲）

(4)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殷武）

書—(5)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立政）

在這條上先生說『我們無從懸揣他是神是人』，所以無可討論之處。

復次，爲(d)條。此條祇根據詩閟宮『是生后稷，……纘禹之緒』，生出一個『禹是一個耕稼的國王』的斷語，以爲與論語『子曰，禹，吾無間然矣！……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泰伯『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憲問之說相合。先生且言：『……所記……如閟宮和論語，禹確是人王，不應當再有天神的懷疑了。』所以此條于禹不惟不能證爲天神，乃反可證明爲人王，我也不再說了。

惟是先生于這條附帶說：『禹若果是在后稷之前的一個耕稼的國王，后稷之名也就不會有了！后稷之所以爲后稷，原是尊崇他倡始耕稼，加上的名號；若他只有纘緒，也不應獨居此名了。』我却有點意思，請分言如下：

(1)禹不是后稷之前的一個耕稼的—『純其藝黍稷』的—國王。先生所以疑禹爲后稷之前的一個耕稼的國王，乃由於誤看了論語南宮适所說的『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又看了詩閟宮所說的『是生后稷……纘禹之緒』。請更分言如下：

(a)誤看了『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本是一個『平水土』『盡力乎溝洫』的人，而『平水土』『盡力乎溝洫』雖非耕稼，却是耕稼前頭的第一步緊要事。因爲平水土，開溝洫與耕稼的關係好像是一件事，所以最容易作一事混談。古人于這種連類的混談是數見不鮮的。我且請顧炎武和俞

隨帶我舉幾個例　古書疑義舉例兩事連類而幷稱例引日知錄曰，『孟子云「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　攷之書曰「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此禹事也，而稷亦因之受名。（例一）「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　考之列女傳曰，「哭于城下七日而城爲之崩，」此杞梁妻事也，而華周妻亦因之以受名。（例二）』……『呂氏春秋曰，「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考之論語「吾不復夢見周公，」此孔子事也，乃因孔子而及墨翟，因周公而及文王。（例三）』——按黎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亦屬此類。　考之詩生民，思文，與書酒誥等，躬稼者乃后稷，絕無禹亦從事稼穡之文，是以孔子只說『禹……盡力乎溝洫。』　然則因稷而連及禹，昭然明矣。　故曰，禹不是一個耕稼的——『純其藝黍稷』的——國王也。

（b）籠看了『是生后稷……纘禹之緒。』　凡詩——包括古今詩歌——最不可籠看的。　若將詩經籠看，便會爲他所誤。　例如前面所舉許多天和人有關係的字句，若果將他們籠看必定會疑春秋時代以前只有神而無人。　這是因爲『老子以前的天道觀念』與後來不同，所以不可籠看者一。　崔述豐鎬考信錄謂閟宮詩語夸誕：如僖公本乞師於楚以伐齊，而此詩反謂『荊舒是懲』；『太王居岐之陽時而謂「實始翦商。」』　這是詩歌言語浮誇，所以不可籠看者二。　凡詩人發舒情感而發爲言辭，往往形容過當：如召旻言『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雲漢言『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文王言『有商孫子，其麗不億？』小明言『念彼共人，涕零如雨；』節南山言『國旣卒斬』等，豈其可信。　此因詩歌常過于形容而非

事實，所以不可笨看者三。閟宮言「……后稷……纘禹之緒，」正亦是詩語夸飾者之一。因爲我們知道禹爲「平水土」「盡力乎溝洫」的人；不是耕稼的人，而閟宮引以爲榮，乃說后稷纘他的緒，豈非夸誕？乞援于楚與懲楚是絕對相反的事，尚且言之如此，何況「平水土」「盡力乎溝洫」是和耕稼有要緊關係的第一步事自然要引以爲榮而說「后稷……纘禹之緒」了。

(2)后稷不是一個最初「倡始耕稼」的人，乃是一個「洪水滔天」播蕩稼穡後而復始「純其藝黍稷」的人。魯語曰：「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又左傳曰「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這斷不是憑空杜撰的。因爲我們知道人類生在地球之上已不止幾千年了。人類一生了便須吃動物和植物的。好吃的植物和動物，在蟻類且知道將他們蓄養種植起來以供食用；何況于人，反不能培種植物嗎？后稷之生至乎今日，不過四千年左右，而人類之生已不止萬年，所以烈山氏時有「殖百穀百蔬」之可能者一。中國，埃及爲世界上首先文明之國，這是各國史家所公認的。我們知道帝堯之前二千餘年，埃及已入金器時代；帝堯之前千餘年，埃及已爲金字塔時代(The Pyramid Age)帝堯之前七八百年，塞姆種之游牧民族已定居于巴列斯登等處，自是 Zoser Khufu So-rgon 等王繼起，時尚在堯前三四百年也。埃及巴比倫于堯前已進于文明如此，中國民族進化雖遲，豈有堯前尚不知種植之理？此烈山氏時有「殖百穀百蔬」之可能者二。有此二理，故可斷國語左傳所言實非虛造。縱或烈山氏與柱果爲眞爲僞尚不可知，后稷之前必有人類也當無

疑。人必藉動植物以生；既有動植物矣，則必有穀有蔬也無疑。夫所謂種植耕稼者，不過以一舉手一投足之勞，播荒薉，培所欲之植物而已，此植物卽所謂「百穀百蔬」也。及夫「洪水芒芒，」「蕩蕩懷山襄陵，」則陵上之植物已被淹蓋，況乎平原下隰，寧有不搖蕩之理。然而水雖「懷山，」而山上猶有植物可食用可耕稼也，是以有「舜耕于歷山。」斯時也，「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水由地中行，」然後水土平，后稷乃得「播種，農殖嘉穀，」而「俾民稼穡」矣。當此之際，杜之農功已盡，君民上下惟知周棄「純其藝黍稷，」「立我烝民，」于是舜命棄爲官，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言以汝爲后稷之官也，卽「田正」也，）播時百穀，」故后稷得「奄有下國，俾民稼穡」也。此所以「烈山氏之子……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耳。此事線索甚明，次序甚整，諸書所言，若合符節之毫無牴觸，所謂「舜發于畎畝之中」又何足疑？至於先生說，「若果有神農柱……的耕稼在前，則到周初已有一二千年了農業的發達已久了，又何必這樣的（指酒誥，公劉，無逸）鄭重鼓吹呢？」我且以問作答而說道，「自周初到現在又有三千多年了，農業的發達更久了，又何必立農業大學或如章士釗先生想倡「農業立國論」一樣地去鄭重鼓吹呢？」

以上附辯禹非「是一個耕稼的國王」及后稷不是一個最初「倡始耕稼」的人。

（a）（b）（c）（d）四條在前面都已討論完了，可算足以證明禹確是人而非神。於是先生說：「若禹確是人而非神，則我們看了他的事業眞不免要駭昏了。人的力量怎能彀……分畫九州，……隨山刊木，……

…疏淪江河；試問這事要做多少年？ 據孟子說，他做這番事業只有八年，就硬用了禹貢的「作十有三載乃同」之句也不過十三年，試問有何神力而致此？」 這種疑問，西洋史家夏德的支那太古史也嘗言之。 但是我們不必駁昏不要以爲禹是一個人獨力做這番事業。 我們看

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數。 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无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莊子天下篇引）

所謂「親自」者「非親自」之對言也。 言「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則禹外尚有人，非只禹一人可知也。 譬如說，「欲辦好這事，先生須親自去」，則知辦這事者除先生以外尚有人也；又如說「昔者歐戰方殷，德皇親自出馬而戰世界之兵，」我們斷不能說是德皇一個人，一見此文而知德皇之外尚有多人也。我們更觀之史記以明吾說：例如始皇本紀梁父刻石曰，「皇帝……親巡遠方黎民，」吾人一讀此文，不惟知道平時有官吏巡遠方黎民，且知此時必不止始皇一人。（例一） 又項羽本紀「項王…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以伐秦，然身（親自也）被堅執銳……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吾人亦必不以爲被堅執銳者只將相諸君與籍，必還有許多士卒。（例二） 又高祖本紀「趙相國陳豨反代地，……上自（親自）東往擊之；」「淮南王黥布反，……高祖自往擊之，」無論何人，豈能說只高祖一人擊陳豨，擊黥布歟？（例三例四）、 凡此等例，不可勝舉，故曰，由墨子之言，知治洪水者非只禹一人也。 于是因此而知墨子之前，春秋以上，必有禹率人治水之史無疑。

雖然，此尚未明言禹外有何人也，我們可以看國語和荀子。周語既言禹之治水有「四嶽佐之」而荀子書說：

禹傅土，平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為輔。（成相篇）

由此觀之，是禹之「敷土」和「平天下，」皆有益，皋陶，橫革，直成等為輔也明甚。且此亦非荀子一人之言也，呂氏春秋亦嘗言之。呂覽求人篇曰：「得陶，化益（困學紀聞曰，「化益即伯益」）真窺（盧文弨曰「窺與成音同，與窺形似，呂氏春秋舊本作窺，傳寫誤為窺耳，直與真亦形似」——拔棃按，直真古雙聲通假），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 夫禹之功績莫大乎治洪水，詩書頌之，孔孟歎之，諸子稱之，是此處所謂「功績」指「敷土」「治水」也；得五人佐禹而後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是禹得此五人為輔而後治水敷土始有成也。然則禹非一人獨力治水也又明。

豈獨此五人佐禹治水麼？ 曰，不止此。我們可再看韓非子所說：

五蠹篇曰：「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為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

韓子曰：「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築臿，脛毋毛，臣虜之勞不烈于此矣。」（史記始皇本紀秦二世引。）

夫韓非，一最疑古之人也，其有所信必極審慎，此觀于難一，顯學等篇攻擊孔墨之稱道堯舜而可知也。彼既曰「無參驗而必之者，愚；弗能必而據之者，誣」然則凡其所據必有參驗者也。其言禹事也既所據有參驗，則

禹之治水『身執耒臿以爲民先』爲三代以來信史明甚，且可證明周語太子晉和荀子所言皆有所據。退一步言之，今人疑古過甚，往往妄疑古書，或者以韓非五蠹爲僞。然吾人皆知五蠹爲太史公所嘗讀，而二世且引其中之語以爲談，豈爲僞造？夫韓非五蠹之可靠如此，然則禹之治水乃有天下人民幫助，不獨陶化益眞窺橫革之交五人佐之，更非一人獨力治水也又明。

豈獨韓非子言之耶？雖淮南子要略亦有之，其言曰：

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虆垂，以爲民先。

淮南子一書固多『妄作妖言』（史記淮南衡山列傳）然此條實非『妖言』，因吾人參驗之淮南子以前的墨子荀子韓非子呂覽所言而知其可據也，是則禹與民共治水也又明。

由是吾人縱或于僞孔傳所云『治洪水，輔成之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以爲非確數，而于史記夏本紀所云『禹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與人徒以傅土』則斷其爲『……文直，事核，不虛，……』（班固語）既爲信史，則于禹成治水傅土事業何疑之有？以有許多人佐禹，復命諸侯百姓與人徒，而禹又親自操橐耜，執耒臿虆垂，以爲民先，至於股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則欲『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汩九川，陂鄣九澤，豐殖九藪，汩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周語下）何難之有？而況本之以『三過其門而不入』聞『啓呱呱而泣……弗子』之精神，延及八年或十三年之時日，焉往而不成功？

曰，何以爲獨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耶？曰，度之以情，驗之以理，參之以辭言『予』言『

予，」乃人之常情，事所時有，毫不足怪。　謂予不信，請看史記（任取之以便舉例。）　高祖曰「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　其實項羽本是自刎而後爲王翳，楊喜，呂馬童，呂勝，楊武所分，且圍項羽于垓下者，有淮陰侯將三十萬，有劉賈軍，有大司馬周殷舉九江兵，有齊梁諸侯，更有彭越，孔將軍，費將軍，絳侯，柴將軍等，而高祖乃只曰「爲我擒，」此凡首領能以「我」字代表全體之例一（史記高祖本紀）　又高祖入關時與父老約法三章：「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　其實此時從之入關者，將士甚多，而亦只曰「吾所以來，」此首領能以「吾」字包舉全體之例二。（仝上）　此類例證，舉不勝舉，皆可以證知禹之稱「予決九川，……」實非止禹一人也，乃以禹爲治水之首領之故，遂得稱「予」以包舉全體人員耳。

何以禹貢亦只言曰「禹敷土……」耶？　曰，禹貢本史臣紀功頌德之作，其性質體例正與李斯爲始皇作刻石文同。　所有嶧山，泰山，琅邪臺，碣石，會稽諸刻石文，無不只曰皇帝能力怎樣大，功德怎樣高，做了怎樣的大事。　所以我們不能以只言「禹」遂疑治水爲一人獨力所爲，猶如不能以李斯刻石文僅言「皇帝」遂說征服六國，統一天下，爲始皇一人獨力所爲也。

以上辯「鯀禹平水土爲一人獨舉」之非。

禹既是人而非神，自然先生的「禹的神職」之說不攻自破了。　雖然，不言及之，猶恐不足以服先生之心也，故略爲討論之。　大概先生的說法如下：

(a)「禹平水土，主名山川」解作「禹平了水土，……乃……主領名山川，爲名山川之神。」

(b)讀魯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而恍然大悟「社之爲禹，」且說「國語雖無明文而看其「能平九土」之語，實即是禹。」

由此，先生的結論是「禹爲山川之神；後來有了社祭，又爲社神。」這便先生所謂「禹的神職。」

其實（a）（b）兩條說法大是笑話；眞如適之先生所常說的「不值一駁」了。因爲兩條都是臆測的牽强傅會，(b)條尤誤。我且分言如後：

（a）條是臆測的牽强傅會。因爲先生解「主名山川」爲「主領名山川，爲名山川之神。」「爲名山川之神」——尤其是「神」字，乃是先生所私加的。這正犯了「增字解經」的毛病。凡是「增字解經，」沒有不是自己先有了成見，去牽强傅會原文，以遷就自己的臆測的。故清代漢學大家都以「增字解經」爲大忌，蓋以一經「增字」解釋，便將原文的本意失掉，變成解者之私意故也。「主名山川，」前人本解作「命山川以名，」先生將他換解爲「主領名山川，」這還可以硬要加上「爲名山川之神」——尤其是「神」字，——這便是憑空傅會了。我們若將憑空加上的——即私增的「爲名山川之神」——刪去，使原文回復本意，先生的說法即不攻自破。無論「主名山川」爲「題山川的名字」或是「主領名山川，」皆不見得有什麽「神職」的意味。因爲「題山川的名字」是任何人所能，

固然不待乎神;卽「主領名山川」也不過如孔子所說的「顓臾爲東蒙之主,」—論語「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又何嘗是「神職?」(掞藜因先生解「名山川」爲「名山名川,」另生了一個解說,卽是「禹平水土,主名山川」者乃是說「禹之平治水土也,以名山名川爲主」也。這是因爲莊子天下篇有「名川三百(川原作山今依俞樾諸子平議說改正)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之言,而墨子節用中又有「愼其行」一語以釋「禹平水土,主名山川,」故予以爲禹之平治水土,以名山名川爲主;次之乃及於支川;最後乃及于小者。先大後小,以洩水之下流,而後乃更治水之源流也(凡小水必在源流,大水必爲下流,名川必爲長大之水,衆小水和支川所會集者也,)故曰「愼其行,」以求有功而「惟殷于民」耳。——此雖不敢以爲正解,但亦可備一說。)

(b)條是爲「少見多怪」而臆測的牽强傅會。因爲先生讀了國語而忘却了左傳,故恍然大悟的「社之爲禹」竟是錯悟了。我們知國語固然說着「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但是我們又知道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傳也說「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土正也,官名,)……祀……后土爲社。……」此祀共工氏子句龍爲社也明甚。句龍是一個人,禹又是另一人,豈可謂「社之爲禹?」「平九土」是一事,「平水土」又是另一事,豈可說「國語雖無明文,而看其「能平九土」之語,實卽是禹?」縱或說「平九土」「平水土」爲一樣的事,也不可臆測兩人是一人。譬如起於布衣而統一天下是一樣的事,但是不可臆測朱元璋遂是劉邦。因爲先生有此「

恍然大悟」的大誤，而加以要遷就自己的「社神之說起于西周後期」的臆說；于是逐大大武斷起來憑空便說「甘誓雖有「戮于社」之言，但甘誓本僞書不足信。論語哀公問社宰我答的「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恐亦是無徵之言」。又加以要牽強傅會「禹爲社，稷爲稷，禹稷之所以連稱由於社稷的連稱，禹稷之所以並尊由于社稷的並尊」之臆測，於是又武斷的說「閟宮與論語所說，恐即由社神與田祖的傳說上來。」——「恐亦是」「恐卽由」「本僞書」九字，何以服讀者？且縱或祀禹爲社，亦是後人尊功（平水土）報德之舉，加之之名，豈爲「神職？」縱或祀禹爲社，如祀棄之爲稷，則亦由禹稷並尊而後社稷連稱，豈容倒爲「禹稷之所以連稱由於社稷的連稱，禹稷之所以並尊由于社稷的並尊」？

以上辯「神職」等說之誣。

全章討論已完，依先生現在的證據和說法，我老實不客氣地辯駁覺得先生所說俱不能成立；但是先生有很好的證據和說法時，我願恭恭敬敬地承命將這篇大話一筆勾銷，以表示我毫無成見。先生這個翻案很足影響人心；我所不安，不敢不吐，所以我對于這篇暫時的結論是：

禹並沒有天神性。

（未完）

四四　啓事三則

（讀書雜志十四，十五，十七期）

顧頡剛

一

讀劉掞藜先生「再質」一文，使我非常欣喜。我久要尋覓這樣的一個伴侶而不可得，現在覺得到了！中國的古史全是一篇糊塗賬。二千餘年來隨口編造，其中不知有多少罅漏，可以看得出牠是假造的。但經過了二千餘年的編造，能夠成立一個系統，自然隨處也有牠的自衛的理由。現在我儘尋牠的罅漏，劉先生儘尋牠的自衛的理由，這是一件很好的事。即使不能遽得結論，但經過了長時間的討論，至少可以指出一個公認的信信和疑疑的限度來，這是無疑的。多辨論一回，總可多少得些成績，這也是無疑的。所以我們應該各照着自己的信仰，向前走去，看到底可以走到那麼遠才歇脚。實在像這樣大的一個問題，便是犧牲了幾個人的一生的精力去討論，也是値得的。不知劉先生肯應我否？

我現在仍依了上次的主意，把我對于古史的懷疑之點詳細說了，把我對于古史成立的程叙的假定立起來了，然後再做別的事。劉先生再質一文，只得等我這文發表完了之後再行回答，請鑒原！在我這文陸續發表的時候，仍希望劉先生陸續辯駁，愈駁得猛厲我愈感謝。

我更希望再有許多人加入我們的討論，因爲這個問題的解決不僅是我們幾個人的責任。加入的人多了，我們可以分工：那幾個人專討論制度，那幾個人專討論文字，那幾個人專討論天文地理；……這樣的做

去，我不信一篇糊塗賬的古史不會有弄清楚的一天！我們努力！

十二，九，十五。

二

依本文的次序，這一期應辨「禹貢」，但我的事務太忙，而這題牽涉的地方又太多，實在找不到整段的時間，使我可以把以前聚得的材料整理連綴成爲一篇文字，所以只得停着。「后稷」與「文王」兩題範圍較小，容易急就，現在把牠們先做好了，在這二期上發表。等到這兩章登完，我的職業已經變換了，或者可以多得一些空間，在明年一年之中把「禹貢」，「堯典」，「古史系統」三題詳細論辨一番。我數月以來，覺得對於這三題的意見愈積愈多，非有十萬言說不完，非得整整的四個月做不盡。我雖終不能專事研究，但我所回復的舊職業已是有寒暑假的了，總可以說便利一點。我很快樂的在此豫祝我明年辨論古史的順遂如願！

十二，十，二十。

三

我初到北京，下月又要到河南，在兩個月內無暇討論古史。等努力月刊出版後，我當繼續討論。無論如何，此文必在明年一年內做完。現在只得暫以「文王是紂臣嗎？」作一個小結束。請讀者原諒！

十二，十二，二。

四五　古史討論的讀後感

胡適

（十三，二，二二，讀書雜志第十八期）

讀書雜志上顧頡剛，錢玄同，劉掞藜，胡堇人四位先生討論古史的文章，已做了八萬字，經過了九個月，至今還不曾結束。這一件事可算是中國學術界的一件極可喜的事，他在中國史學史上的重要一定不亞於丁在君先生們發起的科學與人生觀的討論在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這半年多的努力和讀書雜志的讀者也許嫌這兩組大論爭太繁重了，太沉悶了；然而我們可以斷言這兩組的文章是努力出世以來最有永久價值的文章。在最近的將來，我這個武斷的估價就會有多人承認的。

這一次古史的討論裏最徼幸的是雙方的旗鼓相當，陣勢都很整嚴，所以討論最有精采。顧先生說的眞不錯：

中國的古史全是一篇糊塗賬。二千餘年來隨口編造，其中不知有多少罅漏，可以看得出牠是假造的。但經過了二千餘年的編造，能夠成立一個系統，自然隨處也有牠的自衞的理由。現在我儘尋牠的罅漏，劉先生儘尋牠的自衞的理由，這是一件很好的事。即使不能遽得結論，但經過了長時間的討論，至少可以指出一個公認的信信和疑疑的限度來，這是無疑的。

我們希望雙方的論主都依着這個態度去搜求證據。這一次討論的目的是要明白古史的眞相。雙方都

希望求得真相，並不是顧先生對古史有仇而劉先生對古史有恩。他們的目的既同，他們的方法也只有一條路：就是尋求證據。只有證據的充分與不充分是他們論戰勝敗的標準，也是我們信仰與懷疑的標準。

現在雙方的討論都暫時休戰了，──顧先生登有啟事，劉先生也沒有續稿寄來。我趁這個機會研究他們的文章，忍不住要說幾句旁觀的話，就借着現在最時髦的名稱「讀後感」寫了出來，請四位先生指教。

第一：所謂「影響人心」的問題。這是開宗明義的要點，我們先要說明白。劉先生說：

> 因為這種翻案的議論，這種懷疑的精神，很有影響於我國的人心和史界，心有所欲言，不敢不告也。(十三期)

他又說：

> 先生這個翻案很足影響人心，我所不安，不敢不吐。(十六期)

否認古史某部分的真實，可以影響於史界，那是自然的事。但這事決不會在人心上發生惡影響。我們不信盤古氏和天皇地皇人皇氏，人心並不因此變壞。假使我們進一步，不能不否認神農黃帝了，人心也並不因此變壞。假使我們更進一步，又不能不否認堯舜和禹了，人心也並不因此變壞。──豈但不變壞？如果我們的翻案是有充分理由的，我們的翻案只算是破了一件幾千年的大騙案，於人心只有好影響而無惡影響。即使我們的證據不夠完全翻案，只夠引起我們對於古史某部分的懷疑，這也是警告人們不要輕易信

仰，這也是好影響，並不是惡影響。 本來劉先生並不曾明說這種影響的善惡，也許他單指人們信仰動搖。但這幾個月以來，北京很有幾位老先生深怪顧先生『忍心害理』，所以我不能不替他伸辯一句。 這回的論爭是一個眞僞問題；去僞存眞，決不會有害於人心。 譬如猪八戒抱住了假唐僧的頭顱痛哭，孫行者告訴他那是一塊木頭，不是人頭，猪八戒只該歡喜，不該惱怒。 又如窮人拾得一圓假銀圓，心裏高興，我們難道因爲他高興就不該指出那是假銀圓嗎？ 上帝的觀念固然可以給人們不少的安慰，但上帝若眞是可疑的，我們不能因爲人們的安慰就不肯懷疑上帝的存在了。 上帝尚且如此，何況一個禹？何況黃帝堯舜？ 吳稚暉先生曾說起黃以周在南菁書院做山長時，他房間裏的壁上有八個大字的座右銘：

實事求是，莫作調人。

我請用這八個字貢獻給討論古史的諸位先生。

第二，顧先生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見解眞是今日史學界的一大貢獻，我們應該虛心地仔細研究他，虛心地試驗他，不應該叫我們的成見阻礙這個重要觀念的承受。 這幾個月的討論不幸漸漸地走向瑣屑的枝葉上去了；我恐怕一般讀者被這幾萬字的討論迷住了，或者竟忽略了這個中心的見解，所以我要把他重提出來，重引起大家的注意。 顧先生自己說『層累地造成的古史』有三個意思：

(1)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

(2)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3)我們在這上卽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眞確的狀況，也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狀況。

這三層意思都是治古史的重要工具。顧先生的這個見解，我想叫他做『剝皮主義』。譬如剝筍，剝進去方才有筍可吃。這個見解起於崔述；崔述曾說：

世益古則其取舍益愼，世益晚則其采擇益雜。故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而司馬遷作史記乃始於黃帝。……近世以來……乃始於庖犧氏，或天皇氏，甚至有始於開闢之初盤古氏者。……嗟夫，嗟夫，彼古人者誠不料後人之學之博之至於如是也！（考信錄提要上二二）

崔述剝古史的皮，僅剝到『經』爲止，還不算徹底。顧先生還要進一步，不但剝的更深，並且還要研究那一層一層的皮是怎樣堆砌起來的。他說：

我們看史蹟的整理還輕，而看傳說的經歷却重。凡是一件史事，應看他最先是怎樣，以後逐步逐步的變遷是怎樣。

這種見解重在每一種傳說的『經歷』與演進。這是用歷史演進的見解來觀察歷史上的傳說。

這是顧先生這一次討論古史的根本見解，也就是他的根本方法。他初次應用這方法在百忙中批評古史的全部，也許不免有些微細的錯誤。但他這個根本觀念是顚撲不破的，他這個根本方法是愈用愈見功效的。他的方法可以總括成下列的方式：

(1)把每一件史事的種種傳說，依先後出現的次序，排列起來。

(2)研究這件史事在每一個時代有什麼樣子的傳說。

(3)研究這件史事的漸漸演進，由簡單變爲複雜，由陋野變爲雅馴，由地方的（局部的）變爲全國的，由神變爲人，由神話變爲史事，由寓言變爲事實。

(4)遇可能時，解釋每一次演變的原因。

他舉的例是「禹的演進史。」

禹的演進史至今沒有討論完畢，但我們不要忘了禹的問題只是一個例，不要忘了顧先生的主要觀點在於研究傳說的經歷。

我在幾年前也曾用這個方法來研究一個歷史問題—井田制度。我把關於井田制度的種種傳說，依出現的先後，排成一種井田論的演進史：

(1)孟子的井田論很不清楚，又不完全。

(2)漢初寫定的公羊傳只有「什一而藉」一句。

(3)漢初寫定的穀梁傳說的詳細一點，但只是一些「望文生義」的注語。

(4)漢文帝時的王制是依據孟子而稍加詳的，但也沒有分明的井田制。

(5)文景之間的韓詩外傳演述穀梁傳的話，做出一種清楚分明的井田論。

(6)周禮更晚出，裏面的井田制就很詳細，很整齊，又很煩密了。

(7)班固的食貨志參酌周禮與韓詩的井田制，併成一種調和的制度。

(8)何休的公羊解詁更晚出，於是參考孟子，王制，周禮，韓詩的各種制度，另做成一種井田制。（看胡適文存二頁二六四—二八一）

這一個例也許可以幫助讀者明瞭顧先生的方法的意義，所以我引他在這裏。其實古史上的故事沒有一件不曾經過這樣的演進，也沒有一件不可用這個歷史演進的（evolutionary）方法去研究。堯舜禹的故事，黃帝神農庖犧的故事，湯的故事，伊尹的故事，后稷的故事，文王的故事，太公的故事，周公的故事，都可以做這個方法的實驗品。

第三，我們既申說了顧先生的根本方法，也應該考察考察劉掞藜先生的根本態度與方法。劉先生自己說：

我對于古史只採取「察傳」的態度，參之以情，驗之以理，斷之以證。（讀書雜志十三）

他又說：

我對於經書或任何子書不敢妄信，但也不敢閉着眼睛，一筆抹殺，總須度之以情，驗之以理，決之以證。

這話粗看上去似乎很可滿人意了。但仔細看來，這裏面頗含有危險的分子。「斷之以證」固是很好，但

『情』是什麼?『理』又是什麼?劉先生自己雖沒有下定義,但我們看他和錢玄同先生討論的話,一則說:

但是我們知道文王至仁。

再則說:

我們也知道周公至仁。

依科學的史家的標準,我們要問,我們如何知道文王周公的至仁呢?『至仁』的話是誰說的?起於什麼時代?劉先生信『文王至仁』爲原則,而以『執訊連連攸馘安安』爲例外;又信『周公至仁』爲原則,而以破斧缺斨爲例外。不知在史學上,皇矣與破斧之詩正是史料,而至仁之說却是後起的傳說釀成的成見。成見久據于腦中,不經考察,久而久之便成了情與理了。

劉先生列舉情,理,證,三者而證在最後一點。他說『參之以情,』又說『度之以情。』崔述曾痛論這個方法的危險道:

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往往逕庭懸隔,而其人終不自知也。…… 以己度人,雖耳目之前而必失之。況欲以度古人,……豈有當乎?(考信錄提要上四)

作皇矣詩的人並無『王季文王是紂臣』的成見,作破斧詩的人也並無『周公聖人』的成見;而我們生在幾千年後,從小就灌飽了無數後起的傳說,於今戴着傳說的眼鏡去讀詩,自以爲『度之以情,』而不知只是度之以成見呵。

至於「驗之以理」更危險了。歷史家只應該從材料裏，從證據裏，去尋出客觀的條理。如果我們先存一個「理」在腦中，用理去「驗」事物，那樣的「理」往往只是一些主觀的「意見」。例如劉先生斷定國語，左傳說烈山氏之子柱能殖百穀百蔬的話不是憑空杜撰的，他列舉二「理」，證明烈山氏時有「殖百穀百蔬」的可能。他所謂「理」，正是我們所謂「意見」。如他說：

> 人必藉動植物以生；既有動植物矣，則必有穀有蔬也無疑。夫所謂種植耕稼者，不過以一舉手一投足之勞，擁荒壅培所欲之植物而已。此植物卽所謂「百穀百蔬」也。(讀書雜志十五，圈點依原文。)

這是全無歷史演進眼光的臆說。稍研究人類初民生活的人，都知道一技一術在今日視為「不過一舉手一投足之勞」的，在初民社會裏往往須經過很長的時期而後偶然發明。「藉動植物以生」是一件事，而「種植耕稼」另是一件事。種植耕稼須假定(1)辨認種類的能力，(2)預料將來收穫的能力，(3)造器械的能力，(4)用人工補助天行的能力，(5)比較有定居的生活……等等條件備具，方才有農業可說。故治古史的人若不先研究人類學，社會學，決不能了解先民創造一技一藝時的艱難，正如我們成年的人高談闊論而笑小孩子牙牙學語的困難；名為「驗之以理」，而其實仍是「以己度人，以今度古」。

最後是「斷之以證」。在史學上，證據固然最重要，但劉先生以情與理揣度古史，而後「斷之以證」，這樣的方法很有危險。我們試引劉先生駁顧先生論古代版圖的一段做例。堯典的版圖有交趾，顧先生疑心那是秦漢的疆域。劉先生駁他道：

就我所知，春秋之末，秦漢之前，竟時時有人道及交趾，甚且是堯舜撫有交趾。

他引了四條證據：

（a）墨子節用中。

（b）尸子佚文。

（c）韓非子十過。

（d）大戴禮記少閒。

大戴禮是漢儒所作，劉先生也承認。 前面三條，劉先生說『總可認為戰國時文。』——這一層我們姑且不和他辯；我們姑且依他承認此三條為『戰國時文。』 依顧先生的方法，這三條至多不過證明戰國時有人知有交趾罷了。 然而劉先生的『斷之以證』的方法却眞大胆！ 他說：

> 知有交趾，則是早已與交趾有關係了。 但是我們知道春秋東周西周商夏都與交趾沒有來往，是墨子尸子韓非等所言，實由堯之撫有交趾也。（圈是我加的）

戰國時的一句話，卽使是眞的，便可以證明二千年前的堯時的版圖，這是什麼證據？ 况且劉先生明明承認『春秋東周西周商夏都與交趾沒有來往』若依顧先生的方法，單這一句已可以證明堯典為秦漢時的僞書了。

我們對於『證據』的態度是：一切史料都是證據。 但史家要問：(1)這種證據是在什麼地方尋出的？

(2)什麼時候尋出的？ (3)什麼人尋出的？ (4)地方和時候上看起來，這個人有做證人的資格嗎？ (5)這個人雖有證人資格，而他說這句話時有作僞（無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嗎？

劉先生對於這一層，似乎不很講究。 如他上文舉的三條證據，(a)墨子節用篇屢稱『子墨子曰，』自然不是『春秋之末』的作品。 (b)尸佼的有無，本不可考；尸子原書已亡，依許多佚文看來，此書大概作於戰國末年，或竟是更晚之作。 (c)韓非子一書本是雜湊起來的；十過一篇，中敘秦攻宜陽一段，顯然可證此篇不是韓非所作，與初見秦等篇同為後人僞作的。 而劉先生卻以為『以韓非之疑古，猶且稱道之。』 不知顯學篇明說『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五蠹篇明說『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 即用此疑古的兩篇作標準，已可以證明十過篇之為僞作而無疑。 這些東西如何可作證據用呢？

以上所說，不過是我個人的讀後感。 內中頗有偏袒顧先生的嫌疑，我也不用諱飾了。 但我對於劉掞藜先生搜求材料的勤苦是十分佩服的；我對他的批評全無惡感，只有責備求全之意，只希望他對他自己治史學的方法有一種自覺的評判，只希望他自己搜來的材料也有一種較嚴劉的評判，而不僅僅奮勇替幾個傳說的古聖王作辯護士。 行文時說話偶有不檢點之處，我也希望他不至於見怪。

十三，二，八。

古史辨第一冊下編

四六　論帝天及九鼎書

頡剛：

得來信，甚慰。

關於『帝』字，我也認爲『天帝。』此字是世界最古的字，古義『帝』與『天』當相同，正如其音之同紐。試看

梵文　deva　帝，天
希臘　zeus　上帝 ⎫
拉丁　deus　上帝 ⎭ z與d相通。
中文　帝，天

五字同出一源，大概是很可能的。看郊祀志，可見許多『帝』原爲西方民族（秦民族）的天神，此是無可疑的。『帝乙』的解釋，我以爲你的說法頗可用，——如果商朝眞有帝乙。此如唐有『神堯，』淸有『聖祖，』並不稀奇。至如『神宗，』更不少了。

郊祀志最宜細讀。如云漢高祖加一帝而成『五帝，』此必是僞史無疑。

關於古史，最要緊的是重提尚書的公案，指出今文尚書的不可信。我盼望你能抽出工夫，把猶太民族的古史——舊約——略讀一遍，可以得不少的暗示。

「九鼎」我認為是一種神話。鐵固非夏朝所有；銅（bronze）恐亦非那時代所能用。發見澠池石器時代文化的安特森（J.G. Andersson）近疑商代猶是石器時代的晚期（新石器時代）。我想他的假定頗近是。……（下論古史分期見本冊中編答劉胡兩先生書引。）

適。十二，五，三十。

四七　論今文尚書著作時代書

適之先生：

承告古史分期大旨，極感。將來討論當秉着此旨做去。

九鼎的來源固是近于神話，但不可謂沒有這件東西。看左傳上楚子問鼎，國策上秦興師求鼎，史記上秦遷九鼎，九鼎沒于泗水，恐不見全假。九鼎不見于詩書，與國遷鼎的話自是靠不住。或者即是周朝鑄的，置于東都，以為觀耀；後人不知其所自來，震于其大（國策云「一鼎九萬人輓之」）遂編造出許多說話耳。九鼎沒于泗水而非銷燬，將來儘有復出的可能。

關於銅器時代的問題，哈同花園印有一部殷文存，我想買來看看，不知和甲骨文字比較之下相像否。

我覺得周代始進入銅器時代的假設頗可成立，因爲發見的鼎彝多半是封國後或嗣位後鑄的宗器，可見當時看鑄金是很珍貴的。 又看春秋時鑄兵器皆用銅，鐵器始見于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晉趙鞅以鐵鑄刑鼎，繼見于孟子『以鐵耕乎，』可見用途不廣。 又看古代金銅不分，銀錫二物到漢代還分不清楚，可見冶金的工藝是進得很遲的。

先生要我重提尚書的公案，指出今文尚書的不可信，這事我頗想做。 前天把二十八篇分成三組，錄下：

第一組：（十三篇）

盤庚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多方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這一組，在思想上，在文字上，都可信爲眞。

第二組：（十二篇）

甘誓　湯誓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牧誓　金縢　無逸　君奭　立政　顧命

這一組，有的是文體平順，不似古文，有的是人治觀念很重，不似那時的思想。 這或者是後世的僞作，或者是史官的追記，或者是眞古文經過翻譯，均說不定。 不過決是東周間的作品。

第三組：（三篇）

堯典 皋陶謨 禹貢

這一組決是戰國至秦漢間的僞作，與那時諸子學說有相連的關係。那時擬書的很多，這三篇是其中最好的；那些陋劣的（如孟子所引「舜浚井」一節）都失傳了。

但我雖列出這個表，一時還不能公布。因爲第三組我可以從事實上辨牠們的僞，第一組與第二組我還沒有確實的把握把牠們分開。我想研究古文法，從文法上指出牠們的差異。但這是將來的事情。

對於第三組，我想做兩篇文字——禹貢作於戰國攷，堯典皋陶謨辨僞——登在國學季刊的二卷或三卷上。文字的大綱如下：

（一）禹貢作於戰國攷：

(1)古代對於禹的神話只有治水而無分州。

(2)古代只有種族觀念而無一統觀念。

(3)古代的「中國」地域甚不大。

(4)戰國七雄的疆域開闢得大了，故有一統觀念；交通便了，種族糅雜得多了，故無種族觀念。因此，九州之說得以成立，而秦始皇亦得成統一之功。

(5)騶衍「大九州」之說即緊接九州之說而來。

(6)「分野」之說亦由九州之說引起。

(7) 九州州名及各地名之初見在何時，何書；

(8) 九州州名的來歷（取義。）

(9) 九州疆域與七國疆域的比較。

(10) 九州州名未嘗統一，貢賦服屬之說亦未嘗統一，故呂氏春秋，爾雅，周官（逸周書）與禹貢之說均不同。

(11) 所以考定禹貢爲戰國時書而非秦漢時書之故。（一，禹尚是獨立而非臣于舜；二，每州尚無一定的一個鎮山；三，不言「南交。」）

(二) 堯典，皋陶謨辨僞：

(1) 堯舜之說未起前的古史。

(2) 春秋時的堯舜與戰國時的堯舜。

(3) 一時並作的堯典，舜典（論語堯曰篇及孟子萬章篇所引。）

(4) 今本堯典，皋陶謨的出現：

1. 取事實于秦制。
2. 取思想于儒家（禪讓）與陰陽家（五行。）
3. 取文材于立政（三宅，九德）與呂刑（降三后，絕苗民。）

(5)堯典，皋陶謨與他書的比較：

1.堯典上的舜臣與論語上的舜臣。

2.堯典，皋陶謨上的禹與詩經，周書，論語，楚詞，禹貢上的禹。

3.堯典上的后稷與詩經，論語上的后稷。

4.堯典上的伯夷與呂刑上的伯夷。

5.堯典上的鯀與洪範，楚詞上的鯀。

6.堯典，皋陶謨上的苗與呂刑上的苗。

7.堯典上的五服與周書上的侯甸男衛。

(6)堯典，皋陶謨的批評：

1.「倒亂千秋」式的拉攏。

2.思想進化程序的違背：

(一)商周人的先王和上帝的神權思想與堯典等的人治思想。

(二)商周人的威力思想與堯典等的德化思想。

(三)商周人的大邦小邦並立思想與堯典等的中央集權思想。

(7)所以考定爲秦漢時書之故（此條或可併入第四條：）

1.『南交』卽秦之象郡，交趾至秦始入版圖。

2.羲和四宅，惟西無地名這因秦都咸陽，已在國境西偏了。

3.帝號的作爲職位和稱謂始于秦。

4.巡狩封禪始于秦。

5.秦以六紀而此之山州，師亦均以六紀。

(8)堯典皋陶謨雜評：

1.『蠻夷猾夏』係春秋時成語。

2.『金作贖刑』由呂刑來。

3.甲骨文只有『十三月』而無閏，閏名當始于周。

4.『日中星鳥』，『日永星火』，話說得太簡單，不能斷爲紀元前二千四百年時確是如此。——這須請教天文學家。

5.啓與禹的關係，啓與夏的關係。

6.皋陶與益在春秋戰國間的傳說。

7.契與玄王。

以上寫的節目很雜亂。請先生審定一下，如此做法適宜否？這兩篇文字我所以要慢一點做，因爲牽涉的

地方太多了，非多下些苦工，不易做得愜心。好在我在努力上既引起了這問題，將來討論的事正多，一方面在報上與人討論，一方面即可將討論的結果隨時加入文中。到此二文刊入國學季刊時，堯舜禹在歷史上的位置不由得不推倒了。

郊祀志雖說漢高祖加一黑帝，但呂氏春秋上已把天上五帝分配好，頗不可解。我意，戰國時五行之說如此盛，天上不容不有五帝，既有靑黃白赤四色，不容不有黑色。必待漢高而具五帝，誠爲可疑。或者秦王稱帝，代周而標水德，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乃自居于黑帝乎？

學生顧頡剛。十二，六，一。

四八 詢禹貢僞證書

在君先生：

前日適之先生告我，謂先生極不信禹治水之說。我擬推翻禹貢，此說極所願聞。

去年四月間，曾擬一禹貢作于戰國攷之目錄。今抄在下面，請鑒正：

(1)禹治水之說的由來。

(2)古代對于禹的神話只有治水而無分州。

(3)古代只有種族觀念而無一統觀念。
(4)古代的『中國』地域甚不大。
(5)九州之說的由來及其影響。
(6)九州之說的擴大(騶衍『大九州』之說。)
(7)戰國雖有『九州』之說，但九州之說未嘗統一。
(8)九州之名的取義及其初見。
(9)九州疆域與七國疆域之比較。

此文在荷至今未作。但卽作，亦只能證明九州之說出于戰國，而禹之治水根本上無此事則力不足以說明。先生專攻地質，足跡甚廣，能從實地上證明治水之說的虛誕，于辨禹貢尤為重要。務請有暇則著專篇，無暇則通函告我以大概，不勝盼感。

頡剛敬上。十三，二，六。

四九　論禹治水說不可信書

頡剛先生：

禹治水之說絕不可信。江河都是天然水道，沒有絲毫人工疏導的痕迹——江尤其如此。去年同揚子江水道委員會的技師 Palmer 君等同赴萬縣，他對我說，『就是要用現代的技術來疏導長江，都是不可能的。石器時代的禹如何能有這種能力？』

我說禹是石器時代的人，因為我們至今沒有發見夏代的銅器。揚子江的水患絕對不能如黃河下流的利害，所以你的『南方洪水』的假設是不能成立的。但是黃河的水患也只能在下游，垣曲縣以上萬不能有洪水。龍門砥柱我都親自到過，並且略有研究。龍門是黃河出峽的口子，河面在峽中寬不過幾十丈，兩岸的峭壁卻有一千尺多高，同長江的三峽情形一樣。一出龍門，峽谷變為廣川，河面有二里以上。這也全是有天然的理由的，與禹毫不相干；況且龍門是天然的峽口，用不着人鑿的，也非人工所能為力的。

砥柱又叫做三門，是因為有兩塊火成岩侵入煤系的岩石之中；煤系軟而火成岩硬，所以受侵蝕的遲速不一樣。煤系被水衝開一丈，被風蝕低一丈，火成岩卻不過受了十分之一的影響，成功了所謂三門。與禹何涉？

所以治水的話我向來不信，不過『導江』『導河』的導字應該如何講，本來是疑問。禹不能治水，不一定是不曾導河導江的憑據，因為導字若是作『溯源』講也未始不可通。

禹貢係晚出的書，是沒有疑問的。據我的朋友章演羣考證（石雅末篇），鐵是周末（最早是周的中

葉）纔發見的（他的證據很多，）而禹貢已經講梁州貢鐵。鋼的發明比鐵還遲，而禹貢梁州貢璆鐵銀鏤，許慎訓鏤爲鋼。若許氏說的不錯，則禹貢爲戰國之書無疑。

這是據我所曉得的隨便寫給先生供參攷，若是細細的考證起來，當然還有許多憑據。

聽見適之說，你在開封照了許多相（爲研究新鄭銅器用。）很希望代我印一分，不知先生能否見惠。關于新鄭發見的古物，我這裏材料很多。最重要的就是一副人骨。現在李濟之博士代我研究，不久大約可以發表了。

丁文江頓首。十三，二，十一。

五〇　論禹治水故事書

在君先生：

接讀來書，承告以禹無治水之事，極感。

先生書謂「揚子江的水患絕對不能如黃河下流的利害，所以你的『南方洪水』的假設是不能成立的。」

我意，揚子江無水患不即是南方無水患，洪水也不必定出於長江黃河。（注重江河的乃是戰國時的禹貢，不是商周時的傳說。）禹的故事最有名的兩個地方是塗山與會稽。塗山在淮河旁，淮河的水患至

今依然。會稽在浙東，浙東以山多之故，時發山洪。記得前年那地卽曾發過一次大水，錢塘江裏浮屍無數。所以兩地儘可都有洪水的傳說。甲地的洪水與乙地的洪水本非一物，但因兩地同受此水患，所以故事流傳所及，會得合成一物。禹的故事所以能由越舒流傳至中原，亦因中原有黃河的水患故。中原的人受了黃河的水患，有求得一水神（或一個有治水的大神通之人）之需要，恰由越舒傳了一個禹來，於是就十分的信奉了。（周頌沒有禹，決是禹不出于中原的一個重要證據。）

水患的事，現在因因交通的便利，有了清楚的地域觀念，知道是一地的，但在古代各以自己地域看作世界中心的時候，逢到了水患，望汪洋無際，說不定是看得極普遍的。創世紀的洪水和詩書上的洪水恐怕都是這種心理的表現。若把創世紀和詩書上的洪水併作一物，以爲這眞是全世界同時共起的一件事，這更是一種錯誤的聯想了。

先生說，「禹不能治水，不一定是不曾導河導江的證據因爲導字若是作「溯源」講也未始不可通。」我以爲禹貢作於戰國，不過是戰國時人把當時的地域作一整理而託之於禹蹟，原無原始意義可尋，不必爲之講通。若導字作溯源講，講固講通了，但禹只是一個地理學家，不是一個治水的偉人了。看『微禹，吾其魚乎』等話，禹在傳說中的不能單單走過一次是甚顯明的。

卮見如蒙教正，至幸。

頡剛敬上。十三，二，廿六。

五一　我的研究古史的計畫

顧頡剛

我在讀書雜誌第十七期上曾聲明在這兩個月內無暇作文，待努力月刊出版時當繼續討論。（為努力月刊作）但現在這個約言竟不能如期實踐了。其故，因上海亞東圖書館要我標點東壁遺書，舊籍的標點很不容易，加以各種事務的牽制也趕不快，豫料非到半年之後不能完工；倘使再把作文的事加了進去，勢必將此事無期的遷延下去。所以我現在立定計畫：本年八月以前儘力用在東壁遺書上，九月到年底儘力將去年辨論古史的未完之稿作完；從明年起，更把古史澈底研究一番。澈底的研究當然不是容易的事，豫算須經廿餘年工夫。這是我一生惟一的事業，也是惟一的願望，所以做成這篇與同志討論。

我是一個喜歡定計畫的人。從前和傅孟真先生同舍時，他曾笑我，『你老是規畫終身的大計，我決得定你一件也做不成的！』他的話真不錯，這六七年來我所豫定的計畫無往而不失敗，激起的煩悶一天重似一天。假使我沒有這種計畫，就無所謂失敗，也就不會激起煩悶。這真所謂『徒自苦』了！但我終是一個熱烈的人，無論如何受挫折，總不會使我灰心。我終覺得計畫是應當定的，一個人必須有了計畫才可使生活有意味。至於計畫的不能實現，乃是由於外界的牽制，並不是我自己的過失。倘使社會上能原諒

我，肯供給我一個可以發展才性的境界，我自信所定的計畫是不會成虛願的。所以我現在還是把終身的大計繼續的規畫。

我的生活為外界所逼迫，脫出軌道已有七年了。此七年中，無時不想把生活回復到軌道上，但至今沒有做到。這一次到北京，我立下一個大願：儘本年作豫備，使明年的生活上得軌道。在這一年中，勉力將未了的事作一結束，新發生的事再也不要過問，寫信和看書（指隨手翻覽的）也竭力求其減少。至于希望中的上軌道的生活，是把一天二十四小時分為六個單位，每一單位計四小時，以二單位供睡眠，一單位供生活上的消耗與休息，一單位供辦事及交際，一單位供讀常識書，一單位供研究古史；星期日則完全供休息與游覽；一年中更作一二度的長途旅行。如此，研究古史和讀常識書兩項每年各可有一千小時左右。這固然明知不能如願——因為我不是一個富人，生活可由自己支配的，——但總希望這兩項各能保持每年六百小時的數目，在無可奈何的境界中，我也肯以義命自安了。倘使碰着的機會好些，竟能稍稍超過這個數目，我就要以為自己是一個很有幸福的人了。

讀常識書一項，種數甚多，如：(1)世界史，(2)中國史及各種舊籍，(3)各種專史，(4)數學，(5)天文學，(6)年代學，(7)地理學，(8)地質學，(9)生物學，(10)人類學，(11)言語學，(12)宗教學，(13)社會學，(14)政治學，(15)法律學，(16)經濟學，(17)統計學……都是。這一個名單粗看似乎太多，但我原想儘着一生的時間去讀，並且不希望深造，我的願望只要使得凡他們可以輔助我的研究的地方我能彀明瞭：在技術上（如曆日的推算及地圖統計表的製繪等）會

得使用，在理論上會得提出問題，請專門家作答好了。所以我還覺得這是可能的事。

研究古史的計畫，是把全體分作六個學程，費廿一年的工夫做去。計畫如下：——

第一學程——從民國十四年至十九年，讀魏晉以前史書。

這六年內，我希望把我的研究古史的根基打好。主要的古史書有兩部，一是左傳，一是史記；我都想費一年的工夫，把牠細細地讀過。第三年至第六年，讀漢書及後漢書。這兩部書為什麼要讀四年呢？因為古學與古書均至漢時始從流質變成固體，在牠凝結的時候加入漢人的分子不少。這些加入的分子，有的與周秦的原質混合，有的竟是化合了。魏晉以下的偽書偽史，現在要辨明牠是很容易的，因為塗附在漢時定形的外面，很可不費力地拂拭而去；兩漢的偽書偽史便須經過一番化學的分析工夫了。分析之後，漢歸漢，周秦歸周秦，然後古史始可做切實的整理。所以當讀兩漢書的時候，必將漢人的經注經說和其他著作統讀一過，指出他們的作偽和傳誤的種種事實，並把今古文的黑幕一齊揭破，剗鏟漢學搗鬼的根芽。

第二學程——從民國二十年至二十二年，作春秋戰國秦漢經籍考。

漢人的附會撥去了，各種古書始可顯出牠們的本相，考證之事方才有所憑藉。所以第二步便做這事，把古書的時代與地域統考一過。固然材料既少，羼雜又多，這個工作要做得完滿是不可能的，但我們總可以得到一個大概情形。

第三學程——民國二十三年，依據考定的經籍的時代和地域抽出古史料，排比起來，以見一時代或一地域對于古代的觀念，並說明其承前啓後的關係。

第四學程——民國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研究古器物學。

古器物學的常識是前幾年早應備的；到這時，書籍方面既經整理好，實物方面就更當着力研究。我覺得中國的古器物學雖已研究甚久，但所定的器物的時代還不可靠。例如商器，通常都將文字特異的，日干紀名的歸入；其實文字在秦以前原未統一過，不妨有特異的字體，而日干的紀名在周代還是行用（如齊之丁公乙公。）所以我很想在研究的時候，把傳世的古器的時代釐正一過，使得牠們與經籍相印證時可以減少許多錯誤。

第五學程——從民國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研究民俗學。

經籍器物上的整理，只是形式上的整理；至於要研究古史的內部，要解釋古代的各種史話的意義，便須應用民俗學了。老實說，我所以敢大膽懷疑古史，實因從前看了二年戲，聚了一年歌謠，得到一點民俗學的意味的緣故。我們看古人的善惡這般的截然分殊（如桀紂堯舜），古人的能力這般的無窮偉大（如禹黃帝），古人的境遇這般的十分奇特（如后稷舜）：我們還是相信牠呢？還是不相信牠呢？我想，我們對付牠們的態度逃不出三種：一是信，一是駁，一是用自己的理性去做解釋。譬如大雅生民篇中說姜嫄生后稷由于『履帝武』，這原是一段神話，很可能且極平常，但自古至今終不曾給牠一個適當的地

位。 相信牠的人老實在史書上寫着「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悅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史記。）不相信牠的人便駁道「不交而孕是不可能的事；或者姜嫄那時適有孕，恰巧踏了大人跡，就引起了誤會；況且姜嫄是帝王之妃，何爲適草野！」（王充與崔述。） 用自己的理性去做解釋的人說「這個「帝」不是上帝，是她的丈夫帝嚳高辛氏；他們一同去祀郊禖，姜嫄走在後頭，步步踏了帝嚳的腳印」（毛傳與歐陽修等。） 近人有了一種新觀念了，於是他們的解釋也換了一種話頭，說道「那時原是母系時代，故只知有母」；或者說「姜嫄原是自由戀愛，故不能說出其夫。」 話雖說了許多，但是都不對的。 我對于這三種態度下一個總評是：信牠的是愚，駁牠的是廢話，解釋牠的也無非是鍛鍊。 我們若用了民俗學的眼光去看，就可見這種故事正和現在上海戲園子裏鬧翻的關公出世，包公出世，薛仁貴出世一類戲一樣。 這種故這些戲中的偉人，或是黑虎星下降，或是文曲星臨凡；到母腹中時，或是觀音送來，或是仙人引到。 這種故事，在事實上是必不確的，但在民衆的想像裏是確有這回事的：他們總以爲大人物的來歷與普通人不同，該有這類奇蹟。 因爲牠在事實上必不確，所以信牠的是愚。 因爲牠在民衆的想像裏確有這回事，所以駁牠的也成了廢話。 因爲牠在民衆的想像裏原是這麼一回事，原不能勉强牠與我們的理性相合，所以用了自己的理性去做解釋的總離不掉鍛鍊。 我希望自己做這項工作時，能處處順了故事的本有的性質去研究，發見牠們在當時傳說中的眞相。

我做這項研究時，再有一個希望 古人心中原無史實與神話的區別；到漢以後始分了開來。 因爲

歷來學者不注意神話，所以史實至今有系統的記載，而神話在記載上就斬然中絕（在實際上，當然自古至今沒有間斷過，如現在的玄穹高上帝及東嶽大帝之類皆周秦之所留遺。）我希望做這項工作時，更把漢以後民衆心中的古史鈎稽出來，直到現在家家懸挂的「神軸」爲止，看出牠們繼續發展的次序。這個研究如能得到一個結果，古史在古代的地位更可確定了。

第六學程——從民國三十年至三十四年，把以前十六年中所得的古史材料重新整理，著成專書。這一部專書的組織，應將下列諸問題作爲系統的說明：

(1)某時代的古史觀念如何？

(2)這個古史觀念是從何時，何地，或因何事來的？　爲什麼要來？

(3)這個古史觀念在當時及後來發生了什麼影響？

以上三條，爲當時的古史觀念。

(4)這時的史事可以考實的有多少？

(5)這時的實物留遺至今的有多少？

(6)對于這時的民族和文化的大概情形的想像是怎樣？

以上三條，爲當時的史事。

到第六學程做完，我的古史研究可以告一結束了。　我今年三十一歲，若絕不停滯，準期完功，已須五十

二歲；若以研究的困難，人事的牽掣，稍一停留，六十歲是很容易到的。 像我這般不結實的身體，卽使善爲保養，尙不知能到六十歲否。 社會上如果恨我搖動人們的信仰，給我以種種挫折，那末我的賫志而沒自是應有之事。 若以爲天地間不妨有此一人，或進而說這是應當做的，那末，請大家給我一點幫助。 幫助的方法有二種：積極的是供給我一個適于研究的境地，消極的是無論什麼事情都不要責望我做。 我並不是不識擡舉，專想規避社會上的責任，實在我只有這一點精力，我願意做的這件事情已經夠消耗我的全部的精力了。 我前作鄭樵傳，說他在獻皇帝書裏說的『使臣得展盡底蘊，然後鶴歸蕙帳，狐正首丘，庶幾……不孤爲陛下之一民也』爲他的發揮學問的哀音。 我自知學力淺薄，還說不上發揮，但是求智識的慾望在我的心中已經震盪得非常劇烈了，勞髯渴驥奔泉，再不能加以羈勒，勉强抑止，這一段哀苦之情原與鄭樵無異。 相知的師友們，請你們仁惠地收受我這一個懇切的請求能！

十三，三，廿六。

五二　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

柳詒徵

（十三，四，一，東南大學史地學報第一二合期）

今人喜以文字說史，遠取甲骨鼎彝古文，近則秦篆。 爬羅抉剔，時多新異可喜之誼。 顧研究古代文字

雖亦考史之一途術，要當以史爲本不可專信文字，轉舉古今共信之史籍一概抹撥。即以文字言，亦宜求造字之通例，說字之通例；雖第舉一字必證之他文而皆合。此清代經師治諸經治小學之法也。不明乎此第就單文隻誼矜爲創獲，尠不爲通人所笑矣。

比有某君謂古無夏禹其人，諸書所言之禹皆屬子虛烏有。叩其所據，則以說文釋「禹」爲蟲而不指爲夏代先王，因疑禹爲九鼎所圖之怪物，初非圓顱方趾之人。按說文固未釋禹爲夏代先王，

說文：「禹，蟲也。从厹，象形。」

然本書固數舉禹，如「鼎」「呂」之說，皆指禹爲人，非蟲也。

說文：「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荊山之下……

又「呂，脊骨也。象形。昔太嶽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

假使許君知禹非人，不當仍沿舊說。胡許君既知禹爲蟲，復引禹之事實，初不自病矛盾；而千數百年讀說文者從未致疑及此，獨某君始具明眼，發前人之所未發乎？

以說文證經考史，必先明說文之誼例。不明說文之誼例，輒取一語，輒肆論斷，雖曰勇於疑古，實屬疏於讀書。何則？說文者，解字之書，非爲後世作人名字典也，故於字之形，誼可解者，不引古人作證。如「堯，」如「舜，」如「湯，」如「桀，」如「禼，」如「發，」如「旦，」皆不釋爲某帝某王。

說文：「堯，高也。从垚在兀上。」

又「舜，艸也，楚謂之葍，秦謂之藑，蔓地連華。象形。从舛，舛亦聲。」

又：「湯，熱水也。从水，昜聲。」

又「棄，捐也。从廾推𠦒棄之，从㐬，㐬，逆子也。」

又：「發，射發也。从弓，癹聲。」

又「昌，美言也。从日，从曰。一曰，日光也。」

又「旦，明也。从日見一上，一，地也。」

必其字之孳見而又無誼可解者，始舉人物爲證。如「羿，」如「媧，」如「媊，」如「娥，」如「偰，」如「偓，」如「佺」皆是。

說文「羿，帝嚳時射官，夏少康滅之。从弓，幵聲。論語曰：「羿善射。」」

又「媧，古之神聖女化萬物者也。从女，咼聲。」

又：「媊，甘氏星經曰「太白上公妻曰女媊，女媊居南斗，食厲；天下祭之曰明星。」从女，前聲。」

又「娥，帝堯之女舜妻娥皇字也。从女，我聲。」

又：「偰，高辛氏之子，堯司徒，殷之先。从人，契聲。」

又：「偓，偓佺，古仙人名也。从人，屋聲。」

又：「佺，偓佺也。从人，全聲。」

其字雖有誼而人名罕見者亦舉以爲證。如「敤」如「奭」如「䀠」如「孔」皆是。

說文：「敤，研治也。从攴，果聲。舜女弟名敤首。」

又：「奭，盛也。从大，从皕；皕亦聲。此燕召公名，讀若郝。史篇名醜。」

又：「䀠，驚走也一曰往來也。从夰，䀠。周書曰伯䀠。䀠，古文冏。」

又：「孔，通也。从乚从子。乚，請子之候鳥也。乚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

由此觀之，舜之女弟名見說文而舜不見，不得謂古無舜也。周公，召公名德相儷，召公名見說文而周公不見，不得謂古無周公也。又如代號國名女姓之類，皆是有形誼者。釋誼無形誼者引史。如「唐」如「虞」如「夏」如「商」如「殷」如「周」，許君非不知爲代號，然皆但釋字誼，不舉二帝三王之朝代爲證。

說文：「唐，大言也。从口，庚聲。」

又：「虞，騶虞也：白虎黑文，尾長於身，仁獸，食自死之肉。从虍，吳聲。」

又：「夏，中國之人也。从夊从頁从臼：臼，兩手；夊，兩足也。」

又：「商，从內知外也。從冏，章省聲。」

又：「殷，作樂之盛稱。从㐆，从殳。」

又：「周，密也。從用口。」

如「吳」如「楚」如「蔡」如「衞」如「晉」如「齊」，許君非不知爲國名，然皆但釋字誼，不舉春秋之

國號爲證。

說文：「吳，姓也，亦郡也。一曰，吳，大言也。」（據王菉友說文釋例，謂姓郡二語皆淺人所增。）

又：「楚，叢木，一名荊也。从林，疋聲。」

又：「蔡，艸也。从艸，祭聲。」

又：「衞，宿衞也。从韋帀从行；行，列衞也。」

又：「魯，鈍詞也。从白，鮺省聲。」

又：「齊，禾麥吐穗上平也。象形。」

惟「陳」「秦」「𨛫」「鄭」之類始稱某某封國。

說文：「陳，宛丘，舜後嬀滿之所封。从𨸏，从木，申聲。」

又：「秦，伯益之後所封國也，宜禾。（此尚有誼）从禾，舂省聲。」

又：「𨛫，夏后時諸侯夷羿國也。从邑，窮省聲。」

又：「鄭，周封黃帝之後於鄭也。从邑，契聲。」（邑部引古國甚多，舉此爲例。）

女部之姓，許君多不得其解，故多引古以證。

說文：「姜，神農居姜水以爲姓。从女，羊聲。」

又：「姬，黃帝居姬水以爲姓。从女，𦣞聲。」

又：「姞，黃帝之後百鯈姓，后稷妃家也。从女，吉聲。」

又：「嬴，少昊氏之姓。从女，羸省聲。」

又：「姚，虞舜居姚虛，因以爲姓。从女，兆聲。」

又：「嬀，虞舜居嬀汭，因以爲氏。从女，爲聲。」

又：「妘，祝融之後姓也。从女，云聲。」

而姒之爲姓，本字作似，似又有誼，故不著其姓。

說文：「似，象也。从人，㠯聲。」

明於前例，自不致疑古無姒姓也。

此等誼例淺近易曉，本自不待解說，故王菉友釋例亦未言及。然學者苟熟復段懋堂之書，即知段氏實嚴辨此例。如人部之「伋」字「伉」字，許君皆以人名爲釋，而段斥其非例，以字既有誼，不得泛稱人名也。

說文：「伋，人名。」段注：「以此爲解，非例也。古人名字相應。孔伋字子思，仲尼弟子燕伋字子思，然則伋字非無義矣。「人名」二字非許書之舊也。」

又：「伉，人名。从人，亢聲。論語有陳伉。」段云：「非例也。左傳施氏婦曰，「不能庇其伉儷。」杜注曰「伉，敵也；儷，偶也。」」

今之學者欲從文字研究古史，盍先讀熟許書，潛心於淸儒著述，然後再議疑古乎？

五三　答柳翼謀先生

（十五，一，十三，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週刊十四期）

顧頡剛

柳翼謀先生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一文，是爲我而作的，所以現在編集古史辨時應當作一個回答。此文舉了說文中的許多人名地名，歸納出牠對於人名地名的幾條通例：(1)原字無義的舉人物爲證。(2)原字有義的則解義而不舉人物爲證。(3)字雖有義而人名罕見的則於字義之下兼舉人物。(4)但也有非例的，如『伋』與『伉』可以解義而僅舉人名。這篇文字很可補王筠的說文釋例之缺，讀之甚佩。但是我要鄭重聲明一句話：這和我的辨論古史是沒有什麽關係的。

我的辨論古史的主要觀點，在於傳說的經歷。我對於古史的最早懷疑，是由堯典中的古史事實與詩經中的古史觀念相衝突而來。在這個衝突中，中樞的人物是禹，所以使我對於禹在傳說中的地位特別注意。從此旁及他種傳說，以及西周東周戰國秦漢各時代人的歷史觀念，不期然而然在我的意想中理出了一個古史成立的系統。（這個系統的確實與否自是另一問題。）我要說明這個系統，當然要依了時代去搜集材料，從各時代的材料中看出各時代人對于古代的中心人物的觀念的演變。只因古代的材料缺佚的太多，爲聯串許多零碎材料的便利計，難免有幾處要借了後代的材料來說明前代的觀念的。但是，這僅是一種假設而已，我決不願把牠作爲確實的證據。

固然我的假設也許是極謬誤，我的證據也許是很薄弱但總還有些引起我建立假設的主要理由在。柳先生未能瞭解我的主要理由單是斷章取義的截取了引說文的一段，說道：

比有某君謂古無夏禹其人，諸書所言之禹皆屬子虛烏有。叩其所據，則以說文釋禹爲蟲而不指爲夏代先王，因疑禹爲九鼎所圖之怪物，初非圓顱方趾之人。

言下似乎以爲我的推翻禹的歷史上的地位全由于說文一語；這實在是深文周納了！ 柳先生又據了說文上說及禹的事實的數條而說道：

胡許君既知禹爲蟲，復引禹之事實，初不自病矛盾，而千數百年讀說文者從未致疑及此，獨某君始具明眼，發前人之所未發乎！

這又是太輕蔑我了！ 我雖不學，難道還不知道說文是東漢時的著作嗎？ 到了東漢，不但漢以前的僞史全都成立，連王莽時的僞史也成立了。 難道我會以爲許愼連禹爲夏王的一件事還不知道嗎？

我引說文的說禹爲蟲，正與我引魯語和呂覽而說夔爲獸類，引左傳和楚詞而說鯀爲水族一樣。 我只希望在這些材料之中能彀漏出一點神話時代的古史模樣的暗示，借了這一點暗示去建立幾個假設，由了這幾個假設再去搜集材料作確實的證明。 如果沒有確實的證明，假設終究是個假設。 如果得到的材料足以否定我的假設，這個假設當然由我自己去推翻。 照柳先生的意思，似乎我既引了說文這一條，便已把這個單詞隻義當作金科玉律般看待了。 這實是最不瞭解我的態度之處。 如果我眞信說文等書爲金科

玉律，得到了偶然的一語便看作眞確的典實，不煩旁證，便施獨斷，那麼，我早已作了一個漢儒的傳人，我自己就是一個造僞史的（或是信僞史的）而決不會像現在這般處處存了懷疑的態度而去研究古史了。

我當時所以引用說文這一句話，也有數項理由：

第一，在說文一書上看，鯀作魚解，禼（契）作蟲解，夔作獸解。禹在傳說中既與他們同時同事，覺得解禹爲蟲也不算得過分。

第二，禹本爲古代神話所集中的人物，看九鼎，山海經，禹本紀（史記引）諸文物可知。司馬遷等雖不信這些東西，但這是用了他們的理性去做量度，他們原是不識得民衆社會的神話傳衍的本相的。這種神話在書本上流傳下來的雖不多，但看隨巢子（前文中誤據朱熹楚詞注作淮南子）有禹化爲熊的故事，吳越春秋又有禹娶九尾白狐的故事，可見在神話中禹與動物原是很接近的。

第三，蟲是動物的總名（大戴禮中有羽蟲，毛蟲，甲蟲等稱謂。）言禹爲蟲，就是言禹爲動物。看古代的中原民族對于南方民族稱爲『閩』，稱爲『蠻』，可見當時看人作蟲原無足奇。禹既是神話中的人物，則其形狀特異自在意內。例如山海經所說『其神鳥身龍首，』『其神人面牛身，』都是想像神爲怪物的表徵。這些話用了我們的理性看固然要覺得很可怪詫，但是順了神話的性質看，原是極平常的。

第四，古人在器物上刻鏤神蹟，是很普通的事實，有現存的遺物可證。左傳所謂『鑄鼎象物，使

民知神姦，』是不錯的。 呂氏春秋說『得陶，化益，眞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于金石，著于盤盂』（求人篇）可見禹一起人也是刻鏤在器物上的。 但器物上的人總是怪物模樣的（現存古器可證）所以禹有怪物模樣也是在情理之內。 呂氏春秋又言『周鼎著饕餮』（先識覽）又言『周鼎著倕』（離謂篇）。 饕餮的形象，現在在鼎上很易看見，乃是大耳大眼長面的獸。 倕即垂，正是堯典中禹的同官。 呂氏春秋所謂『周鼎』，就是左傳中所謂『夏鼎』，即『九鼎』。 垂既上得九鼎，那麼禹的圖上九鼎也未始不是可能的事了。

因爲有以上幾項理由，所以我有以下的一段文字：

至于禹，……我以爲是從九鼎上來的。 禹，說文云，『蟲也，從禸，象形。』 禸，說文云，『獸足蹂地也。』以蟲而有足蹂地，大約是蜥蜴之類。 我以爲禹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當時鑄鼎象物，奇怪的形狀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動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樣子，所以就算他是開天闢地的人。 流傳到後來，就成了眞的人王了。

我的意思，只是希望在說文這條中漏出一些古代的禹的神話的本相，故取了牠的兩句話立起一個假設。因爲是假設，所以連說了兩個『我以爲。』

發表了這文之後，玄同先生給我覆信，說道：

說文中從『禸』的字，甲文金文中均不從『禸』（如『禽』，『萬』，『禹』，『獸』諸字。） 那『

象形，九聲』而義爲『獸足蹂地』的『禸』字，殆漢人據訛文而杜撰的字。

我看了這段，知道說文中的『禹』字的解釋並不足以代表古義，也便將這個假設丟掉了。丟掉了這一個假設，我依然有旁的證據可以建立我的假設。說文本作在思想昏亂的時代，那時人的思辨力非常薄弱，這部書的信實的價值原是很低微的，牠有證據給我固所樂受，牠沒有證據給我（或是把假的證據騙我）也沒有什麼懊喪。因爲我們知道現在辨論古史的最主要的事情，是在搜集西周至戰國的史實和傳說，以及各項的傳說的背景；至于失掉說文的一證，正如失掉帝王世紀和僞古文尚書的證據一樣，是無關輕重的。不料柳先生已借了這一點理由來鍛鍊我的罪狀了！

柳先生在文尾又說：

今之學者欲從文字研究古史，盍先熟讀許書，潛心于清儒著述，然後再議疑古乎！

這種隘狹的見解，我不敢領受。我們現在研究學問，自有二十世紀的學問界做我們的指導。我們只有以不能達到當世的學問界的水平線爲自己的愧恥。至于許書和清儒著述，原只能供給我們以研究的材料，並不能供給我們以學問的準繩。就是要從文字研究古史，也應以甲骨文金文爲正料，以說文等隨便湊集的書爲副料。照柳先生的話，若是我們沒有許書和清儒著述，我們便沒有疑古的可能；若是我們不熟讀許書和潛心清儒著述，我們便沒有疑古的資格了。這等意思是否合理，不待費言。至于我引據說文，未能依了柳先生的例，這是無關重要的，因爲許愼的書本就沒有例，我們現在所有的說文的例都是後來人替牠尋

出來的，與春秋家替春秋詩例一般。因為是替牠尋出來的，所以很雜亂。即如柳先生所舉的例，「娥」是無義可解的嗎？（秦晉好曰娥，見揚雄方言。）「偓」是無義可解的嗎？（偓促，拘愚貌，見劉向九歎。）為什麼他只舉了人物為證而不解義呢？「伉」許但舉人名，段氏非之是也。但伉下第三十四字「健」，即解云「伉也」，可見伉之有義，許慎亦自知之；其所以單舉人名，因為他沒有例，所以他疏略得很。這正是他的書的幼稚的證據。但是他的書幼稚，我們就瞧不起牠嗎？不，他這書原是最早的一部字書，方法的幼稚原是不應苛責的。只要我們知道牠是一部東漢時的字書，我們肯用東漢時的字書的眼光去看牠，而不用適用于現在的字書的眼光去看牠，也不用適用于商周的字書的眼光去看牠，那麼，牠就可以表現出牠的眞價值來而不致迷誤許多人了。清儒的著述也應當這般看待。總之，我們要用了時代的眼光去看古書，總可不受古書的欺騙。若把古書作我們治學的標準，不去研究而去服從，希望在服從之下再去疑古，這正和「援木求魚」一樣的無望；我們如此，我們只有一生一世在僞史中打混了。所以柳先生文中責我的話，我很知道這是精神上的不一致，是無可奈何的。

許慎書中，儘有許多靠不住的地方。玄同先生說：

說文是一部集僞古字，僞古義，僞古禮，僞古制和僞古說之大成的書。

我覺得這是不能怪許慎的，他所處的時代原是一個「僞古字，僞古義，僞古禮，僞古制和僞古說」昌行的時代。他在序中說：

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燿于世。 諸生競說字解誼，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 乃猥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虫者屈中也」……

可見他也正恨着「僞古字僞古義，……」的猖狂妄行，想做一番肅淸的工夫。 但他生在這個時代之中，終究沒法擺脫，無意中不免受到許多薰染，留下許多誤謬；正似韓非子罵人信僞古史的爲「非愚則誣，」而他自己書中卻引用了多少僞古史一樣。 我們現在在說文裏，可以看見許多荒謬話，例如：

禿　王育說，「蒼頡出見禿人伏禾中，因以制字。」

无　王育說，「天屈西北爲无。」

黍　孔子曰，「可爲酒，禾入水也。」

士　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

易　祕書說，「日月爲易。」

這種話與「馬頭人爲長」有什麼區別？ 新青年四卷三號中有王敬軒一信，中云：

「人」字左筆爲男，男爲陽，爲天，故此筆之末尖，其鋒以示輕淸上浮之意。 右筆爲女，女爲陰，爲地，故此筆之末頓其鋒，以示重濁下凝之意。 又如「暑」字，中從土，上從日，謂日晒地上也。 下又從日，謂夕陽西下之後，日入地下也。 土之上下皆有日，斯則暑氣大盛也。 中以丿貫其上下二日，以見二日仍是一日。 古人造字之精如此。

我們要是知道王敬軒的話是可笑的，我們便可知道說文引孔子王育等說話是同樣的可笑了。

許慎的說文既如此雜亂而謬誤，我們就丟了牠嗎？不，我已在上面說過，我們只要用東漢時的字書的眼光去看牠，就可表現出牠的真價值來。他所處的時代，連諸生也要看隸書爲倉頡時書的，我們正可看他們種種異想天開的解釋字義，做他們的思想史和他們的文字學的研究。

同樣，我們若是研究東漢時的神話和傳說，說文中也有材料供給我們。例如以下諸條，都是很可寶貴的材料：

廌　獸也，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訟，令觸不直。

巂　蜀王望帝婬其相妻，慚，亡去，化爲子巂鳥。故蜀人聞子巂鳴，皆起云望帝。

鳳　神鳥也。天老曰，鳳之象也鴻前，麐後，蛇頸，魚尾，鸛顙，鴛思，龍文，龜骨，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于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崐崘，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

朋　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爲朋黨字。

以上這些話似乎出于答柳先生的範圍之外了。但我的意思，只是要借此說明我們如何對付古書的一個態度。我自己守着的不變的宗旨，是用史實的眼光去看史實，用傳說的眼光去看傳說。從前人因爲看古書古史莫非史實，故有信而無違。現在我們知道古書古史中儘多傳說的分子了，我們便該順了傳說的性質而去搜尋牠們的演化的經歷。因爲要尋出牠們的演化的經歷，所以儘不妨施用假定。用了這個態度

來看我的文字，便可看出我的文字雖是瑣雜淺陋，裏邊自有一貫的意思，並不成立于某一書上的單詞隻義。希望柳先生以後對我作辨駁的時候，能彀瞭解我這個態度。

十四，十一，廿八．

五四　論說文及壁中古文經書

（十五，一，十三，北京大學國學門週刊第十四期）

頡剛先生：

承示駁柳翼謀氏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一文，精確明快，佩甚，佩甚。他們看錯了咱們啦。

咱們對于一切古書，都只認爲一種可供參考的史料而已。對于史料的鑒別去取，全以自己的眼光與知識爲衡，決不願奉某書爲唯一可信據的寶典。

辨古書的眞僞是一件事，審史料的虛實又是一件事。譬如周禮，列子，雖然都是假書，但是周禮中許也埋藏着一部分周代的眞制度，列子中也許埋藏着一部分周漢間道家的思想（這只是泛說，非指楊朱篇而言。我絕不信楊朱篇的思想是楊朱的思想，可以拿它來作楊朱學說的史料；我對于楊朱篇的思想，與蔡子

民先生所見全同認爲是「淸談家之人生觀」雖然我不同意蔡先生說周朝那個眞的楊朱就是莊周，）因爲以前的人們總受着許多舊東西的束縛的，卽使實心實意的想擺脫一切，獨闢新蹊，自成一家言，而「過去的幽靈」總是時時要奔赴腕下，驅之不肯去；所以無論發揮怎樣的新思想而結果總不免有一部分做了前人的話匣子。 那麼，成心造假古董的，所造的假古董裏面埋藏着一部分眞古董——或將舊料鎔化了重鑄，或卽取整塊的舊料嵌鑲進去——更是可有的事了。 反過來說，一切眞書儘管眞是某人作的，但作者之中，有的是迷于荒渺難稽的傳說，有的是成心造假，如所謂「託古改制；」有的是爲了古籍無徵，憑臆推測：咱們並不能因其爲眞書就來一味的相信它。 這是咱們跟姚際恆，崔述，康有爲及吾師崔觶甫，章太炎兩先生諸人最不同的一點。

就拿崔章兩師來做個例：他們倆都是經師，崔師是純粹的今文家，不信一切古文經說而絕對的相信春秋公羊傳；章師是純粹的古文家，不信一切今文經說而絕對的相信周禮。 我對于兩師那種「不信」的態度，認爲大體是不錯的（自然也有一小部分覺得是疑所不當疑的，）而對于他們那種「相信」的態度，實在不敢贊同。 我固然不相信姬旦眞做了一部周官（這里不從習慣稱周禮者因爲省得略略讀過幾句古書的人要來挑眼，）也不相信孔丘眞做了一部春秋；但卽使讓步的說，相信周官是姬旦作的，春秋是孔丘爲了「臣弑君子弑父」而作此書「以道名分」的，卻還要問：姬旦作的周官在時間上通行於周代嗎？ 在空間上通行於侯國嗎？ 這樣「ㄉㄧㄝㄍㄛ四方」的制度能夠完全實行嗎？ 孔丘作的春秋，果有爾許「微

言大義」嗎？要是有的，何以孟軻荀況賈誼那班「名人」們都沒有看見這個悶葫蘆由一位「無名小卒」公羊先生秘藏了三百多年才把它打破，到了那位董道士手裏才把那許多啞謎揭穿呢？何以簡簡單單一個「正名定分」的題目要「ㄑ一ㄝㄙㄅㄝㄉㄣ」的說上那許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呢？——這一類的疑問要是得不到確切的解釋，我總是不敢像崔觶甫師那樣相信周官跟公羊的。

那麼，我就把周官跟公羊一腳踢開，正眼兒也不對它們瞧嗎？這又不然。不但如上文所說假書中也許有眞料，就是假書也是一種史料哇。周官如其是劉歆他們造的，便是關於他們的政治思想的史料；公羊便是周漢間一部分儒者的思想的史料，或者就是董道士的思想的史料。還有，拿周官跟國語（包左傳）等書中的制度比較，拿公羊跟論語，孟子，荀子等書中的思想比較，觀其異同之點，可以明其變遷之故，這也是一種史料。

他們看見偲偶引說文，劉掞藜氏譏爲「說文迷；」柳氏則用教訓的口吻說，「盍先熟讀許書，」更用輕薄的口吻，一則說「此等誼例，淺近易曉，本自不待解說，」再則說「不明說文之誼例，剿取一語，輒肆論斷，雖曰勇於疑古，實屬疏於讀書，」三則說「……第就單文隻誼矜爲創獲，尠不爲通人所笑矣。」殊不知考史而引說文跟引別的書一樣，不過在考證時覺得說文中某字某義或可作爲某史料的旁證而已。這字這義以外，其史料的價值如何，全非所問；至於什麼說文之義例（我不願跟着柳氏寫古字，故除引他原文以外不寫作「誼例。」「仁義，」「意義，」依說文應作「誼，」這個我早就知道，因爲我是在二十年前已經「熟

讀許書」了。不過照那樣寫，非但不適用于今日，亦且不合於比許愼更古的董仲舒之說。難道「仁義」「意義」古字一定作「誼」嗎？我却有些不信！）更是全不相干的東西。柳氏說「宜求造字之通例，說字之通例，」這話固然冠冕堂皇，像煞有介事，可是還夠不上叫咱們嚇的直哆嗦。「造字之通例」不錯；若是研究文字史，是「宜求」的，但是跪在許老爹的膝前就能求得到嗎？哈哈！不見得吧！說文裏假字誤體不知凡幾，據說文以求造字之通例，比據顏元孫的干祿字書，張參的五經文字，唐玄度的九經字樣，郭忠恕的佩觿，李文仲的字鑑，龍啓瑞的字學舉隅，以求造字之通例，實在高明不了多少。甲骨跟鐘鼎上面的文字，現在還未經整理，但據王筠，吳大澂，孫詒讓，羅振玉，王國維，容庚諸人所釋，足以訂正許書之違失的已經不少；今後更用新方法去研究整理，我敢預斷，許老爹的胡說八道，瞎三話四，一定還可以揭穿出許許多多來。他們守着一部說文，以爲足以「求造字之通例，」多見其「疏於讀書」也！至於「說字之通例，」那更無謂了，求了出來，與造字之本何關！王安石的字說，爲世詬病，其書雖亡，而據傳說的幾條，確多可笑，但他既特著此書，當然也有他的「說字之通例，」但誰也知道這一定與造字之本是無關的；夫許老爹的「說字之通例」固亦猶是也。「清代經師治諸經治小學之法」確有可取的；「淸儒著述」確也有值得「潛心」的。但他們正因爲缺乏「勇於疑古」的胆量，所以「創獲」未免太少了；正因爲太「熟讀許書，」對於假字誤體不敢「議疑古，」所以承誤襲謬的解說又未免太多了。咱們正想改變那「信而好古」的態度，不料反有人來勸咱們做許老爹的忠奴；這種盛情只好「璧還」他們了。

你那天疑心「陳」本是「軍陳」字（今作陣，）許慎專作「陳國」解是不對的。我以爲你這疑心極有道理。我的意見是這樣：

說文：「陳，列也。」覀，讀爲軍陳之陳。陳，宛丘也，舜後嬀滿之所封，從𨸏，從木，申聲；陣，古文陳。」於是「說文迷」的先生們便「一死兒咬着牙」的說：「陳的本義是陳國，陳列跟軍陳都是陳字的假借。」這種說法，從江聲，段玉裁，李富孫，朱駿聲以來，早巳看作天經地義了。據我看來，殊未必然。鐘鼎中陳國字狠多，不是作「陳，」便是作「陴，」然則「陳」字不僅作陳列跟軍陳解，而陳國的古字也並不作「陳」了。究竟「陳」爲「陳，陴」之省體乎，抑「陳」爲「從攴，陳聲」乎？這話尚難論定；今且不論。但說文那個「申從𨸏，從木，申聲」的陳字必是誤體，那個古文陴字必是僞體，此可斷言。鐘鼎各陳字，沒有一個從申的。申本是誤體，申之眞古文作㫃，其形漸誤作申（說文以申爲籀文，但石鼓文尚與眞古文相同，不作申，）小篆又把中筆拉直而作申。鐘鼎陳字的右半大抵像「東」字，或稍變之，但只有上下切斷而作東，却沒有左右分開而作東的。鐘鼎時既無申字，陳的右半又不作東，可證陳之必不從申也。至於那個古文，從古文𨸏跟古文申，似乎可靠矣；但陳之從申既不可信，則此古文亦在可疑之列了。今按小篆之陳尚與鐘鼎爲近，可證其爲鐘鼎中「陳，陴」諸字的誤體，而古文之陴則與鐘鼎形體絕遠，顯係依傍小篆而造者；因小篆誤爲從小篆申，于是造僞古文的遂改從古文申而去木（去木者，筆畫少些，可以充古董也，）彼初不知眞古文陳字並不從申也。說文誤分「陳」「陳」爲兩字，「陳」既訓列，則「陳」字自然只好請它專作陳國之用了。因

義爲宛丘而從阜還勉强可說從木便古怪了，段玉裁異想天開，釋之曰「太皞以木德王，故字從木，」這話眞要令人失笑。總而言之，「陳」不從申，義亦不僅爲陳國，其字或爲「敶陣」之古體，或爲它們之省文，其義大概當以陳列爲主。柳氏說「陳」字是「無形（此「形」字狠費解！）詛者引史，」蓋自謂能「熟讀許書，」能「求造字之通例，」其實，「證之他文而皆「不」合，」所以雖列了許多「例，」可是在文字史上却還欠「通。」

說文「說字」之不「通，」是由於許老爹的瞎三話四。但說文中所列的文字是有合于古的嗎？不合的狠不少。這是什麽緣故呢？一般的說法，總以爲說文根據的是小篆，小篆是秦時李斯所改作的，故不合於古；古古文跟籀文是合於古了，可惜又太少。這話是狠錯誤的。小篆雖不可以道古，但它確從眞古文中變來，所以拿它跟甲骨跟鐘鼎的眞古文比勘，可以探得輾轉變遷之迹。對於小篆的形體而「望文生訓」固然不對，但它是自然演變的，不是「向壁虛造」的，所以還是眞字。要是說文所列都是小篆，雖不足以窺文字之本，而這書自有它的價值，跟漢隸字原，隸辨，隸篇，楷法溯源，草字彙等書一樣，是文字變遷史上一段信實的史料。可惜許老爹既沒有歷史的眼光，又沒有辨僞的識力，竟把不全的史籀篇中的大篆，倉頡篇等中的小篆，跟劉歆他們「向壁虛造」的僞經中的古文羼在一處，做成一味「雜拌，」於是今字跟古字，眞字跟假字，混淆雜糅，不可理析，不但不可以道古，就是小篆也給他搗亂了。所以說文中所列的文字，其價值還比不上隸辨，楷法溯源，草字彙等，只堪與汗簡跟古文四聲韻相比耳。

說文序中有「今敘篆文，合以古籀」二語，段玉裁，鄭知同，王國維三人有不同的解說，我以爲王國維的話最不錯。他說：

> 說文解字實合古文籀文篆文爲一書；凡正字中，其引詩，書，禮，春秋以說解者，可知其爲古文；其引史篇者，可知其爲籀文；引杜林，司馬相如，揚雄說者，當出倉頡，凡將，訓纂諸篇，可知其爲篆文。雖說文諸字中有此標識者十不逮一，然可得其大略。昔人或以說文正字皆篆文，而古文籀文惟見于重文中者，殆不然矣。（觀堂集林，卷七，頁九。）

他又說：

> 漢代鼎彝所出無多，說文古文又自成一系，與殷周古文截然有別。其全書中正字及重文中之古文，當無出壁中書及春秋左氏傳以外者。（同書，卷七，頁八。）

王氏說說文中之古文無出壁中書及春秋左氏傳以外者，我從各方面研究，知道這話極對。要問這種古文是否眞古文，先要問壁中書等是否眞物。關於這一點，從劉逢祿龔自珍諸人疑左傳起，至康有爲著僞經考，崔觶甫先師著史記探源，跟春秋復始，而壁中書之爲劉歆諸人所僞作，得了種種極確切的證明。據我看來，壁中書一案，經康崔兩君之發覆，僞證昭昭，無可抵賴，所謂「漢古文經」者，此後應與「晉古文尙書」，家語，列子等書同等看待，歸入一切僞書之中。

但康崔兩君所考明者，在年代之不符，跟傳授之僞造等等方面；關於文字上之問題，非他們所注意。康

氏雖力詆說文，但都是泛論（此等泛論中有極精闢之論，如說「文字之流變皆因自然，非有人造之也，」在康氏以前從沒有人說得出這樣一句明白話的；但也有極謬誤之論，如以鼎彝為劉歆所僞造）先師少年時本是治「許鄭之學」者，後見僞經考，乃專主今文，但對於文字上新論極少。

我嘗稍稍涉獵吳，孫，羅，王，容諸家之書，覺得說文中的小篆近于鐘鼎，鐘鼎近于甲骨；而說文中的古文則與鐘鼎甲骨均極相遠，而且有些字顯然是依傍小篆而改變者。這一點，羅王兩氏亦早致疑。羅振玉說：

刻辭（按，指甲骨文）中文字，同於篆文者十五六，而合於許書所載之古籀乃十無一二。蓋相斯所罷者皆列國詭更正文之文字，所存多倉史之舊文。秦之初雖僻在西戎，然密邇西周之舊都，豐歧文化流風未沫，其文字故應勝於列國也。（殷商貞卜文字考，頁十二。）

他又說：

而由文字（按，亦指甲骨文）之可識者觀之，其與許書篆文合者十三四，且有合於許書之或體者焉，有合於今隸者焉；顧與許書所出之古籀則不合者十八九，其僅合者又與籀文合者多而與古文合者寡。以是知大篆者蓋因商周文字之舊，小篆者因又大篆之舊，非大篆剏於史籀，小篆剏於相斯也。……至許書所出之古文僅據壁中書，所出之籀文乃據史籀篇，一為晚周文字，一則亡佚過半之書，其不能悉合於商周間文字之舊固其宜矣；至於篆文本出古籀，故與卜辭合者頗多。（殷虛書契考釋，頁七十三——七十四。）

商代的甲骨文能合於秦漢的小篆跟隸書，反不能合於說文所錄出於壁中書之古文，則壁中古文之爲後人僞造，非眞古字，即此已足證明。

但羅氏是決不敢大胆的說「壁中書是假造的，宅所用的古文也是假造的」這樣兩句話的，於是乃曲爲之說，認壁中書的古文是「晚周文字，」是「列國詭更正文之文字。」 此說不但無徵，且用舊說而與舊說又不合。

羅氏所謂「列國詭更正文之文字，」這是根據說文序的，那上面說：

其後（段注以爲指孔丘死後，）諸侯力政（同征）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田疇異畝，車途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

這是說，戰國七雄毀壞舊章，改易新法，連言語文字都改變了。 其實哪有這回事！ 周代舊章的毀壞，匪伊朝夕矣，不統於王亦不自戰國始；並且周天子的政令是否曾經統一全國過，實在狠是疑問。 各國的制度不同於周，彼此也不相同，這種狀況決非始於戰國。 至於言語文字，豈能在短時間之內要改就改，有這樣容易的？還有一層，七雄之中，政俗一切最特別，最有她自己的特殊的面目的，就是秦國；羅氏說別國文字都變古，反是這秦文與周爲一系，這話我覺得很難相信。 此說之無徵者也。

說文序又說：

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

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禮記（下「禮」字依段注補）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

這是說，孔二先生用古文寫了六經，藏在他府上的牆壁裏，後來給魯恭王挖了出來；左丘明兒用古文寫了左傳（不知藏在哪兒，）後來給張蒼獻了出來。所以若認這古文是眞的，那就應該承認是孔左兩公所寫的。那兩公所寫的古文至遲也只能是春秋時候的文字（這話其實不對，照說文序的口氣看來這古文應是「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以前的文字，）決不能是晚周文字。若是晚周文字，則非請孟軻荀況之流重抄不可（！）但卽使請孟荀用晚周文字重抄六經，還是不能與壁中書及張蒼所獻的左傳併為一談。既然相信張蒼獻傳跟魯恭得經是眞事實，則非相信這古文是周宣王以前的眞古文不可。此用舊說而與舊說又不合者也。

王國維也知道壁中古文與殷周古文不合，但他又造出「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之說。他說：

司馬子長曰，『秦撥去古文。』揚子雲曰，『秦剗滅古文。』許叔重曰，『古文由秦絕。』案，秦滅古文，史無明文，有之惟有「一文字」與「焚詩書」二事。六藝之書，行於齊魯，爰及趙魏，而罕流布於秦（原注：猶史籀篇之不行於東方諸國，）其書皆以東方文字書之。漢人以其用以書六藝，謂之「古文」，而秦人所罷之文與所焚之書皆此種文字，是六國文字卽古文也。觀秦書八體中有大篆，無古文，而孔子壁中書與春秋左氏傳凡東土之書用古文不用大篆，是可識矣。故古文籀文者，乃戰國

時東西二土文字之異名，其源皆出於殷周古文；而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猶有豐鎬之遺，故籀文與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較東方文字（原注：即漢世所謂古文）爲近。自秦滅六國，席百戰之威，行嚴峻之法，以同一文字，凡六國文字之存於古籍者，已焚燒剗滅，而民間日用文字又非秦文不得行，用觀傳世秦權量等，始皇廿六年詔後多刻二世元年詔，雖亡國一二年中，而秦法之行如此，則當日同文字之效可知矣。故自秦滅六國以至楚漢之際，十餘年間，六國文字遂遏而不行。漢人以六藝之書皆用此種文字，又其文字爲當日所已廢，故謂之『古文』；此語承用既久，遂若六國之古文即殷周古文，而籀篆皆在其後，如許叔重說文序所云者，蓋循名而失其實矣（觀堂集林，卷七，頁一一二。）

王氏自信『此說之不可易』（見所引一段的前面），據我看來，『不但可易，』而且還着實該『易』，我現在便來『易』它一下。

秦之『同一文字』，其事之性質正與今之『統一國語』相類；其竭力推行，務期普及，今昔亦正相類；所異者，今之統一國語是含ㄉㄝㄇㄛㄎㄦㄚㄙㄧ的精神，所以不廢止方言（咱們還狠希望它發展呢）；秦之同一文字，是用專制的手腕，所以要『罷其不與秦文合者』罷了。秦所要『罷』的係專指形式『不與秦文合者』而言，大不合的固然要罷，小不合的也是要罷，因爲目的在於使文字統一。六國的文字究竟比秦文差了多少，這個我們固然不能臆斷，但就現存的鐘鼎看來（連秦國的），則可以說這樣幾句籠統話：要說異，似乎各國文字彼此都有些小異；要說同，也可以說是彼此大體都相同；ㄍㄨㄟㄉㄠㄗㄨㄟ一句話，大

同小異而已。若區為「東土」「西土」兩種文字，則進退失據之論也。而況今所存齊魯邾諸國的鐘鼎文字跟壁中古文距離之遠，正與秦文跟壁中古文距離之遠一樣呢！還有，王氏說「秦書八體中有大篆無古文，」這是因為秦時還沒有所謂「孔子書六經以古文」之說。儒者之傳授六經，其初僅憑口耳，漸乃著於竹帛；著竹帛之時通用什麼樣的文字，他們就寫什麼樣的文字，傳經之儒對於文字的形式是絕不注重的，所以彼此所傳，異文假借非常之多。講到史記中的「秦撥去古文」一語，那是劉歆們竄入的。凡史記中「古文」二字都是劉歆們竄入的，這個意思，康氏的偽經考已啓其端，先師的史記探源乃盡發其覆。楊雄之時，古文偽經已出，楊雄便是上當的一個人（他識得許多古文奇字，）許慎更是迷信古文經的，所以他們倆的話是絕不足信的。

總而言之，羅王兩氏都是精研甲骨鐘鼎文字的，他們看到說文中的古文與甲骨鐘鼎文字差得太遠，知道它不古；這是他們的卓識；但總因為不敢懷疑於壁中書之為偽物，於是如此這般的曲為解釋，或目它為「列國詭更正文之文字，」或目它為「晚周文字，」或目它為「東土文字；」其實皆無稽之談也。

康崔兩君雖能推翻壁中古文經，但是他們倆是根本相信孔子定六經那件事的；所以孔壁所藏雖能證明其為偽作，但站在像他們倆那樣的「今文家」的地位，「孔子書六經」那件事卻還是狠有可能性的。咱們現在則不然，根本不相信「孔子定六經」那件事，對於所謂「經」也者，只認為是古代留下來的幾篇文學作品，幾本檔案粘存，幾張禮節單子，幾首迷信籤詩，幾條斷爛朝報而已。這些東西，孔二先生大概是看

過的，但他老人家所看的跟傳到現在的，多少詳略，大概總不見得恰恰一樣吧？「孔子定六經」那件事咱們既不相信，則「孔子書六經」那件事在咱們看來眞合着一句笑話了：兩個近視眼看匾，甲說「關常廟」，乙說「闕帝廟」，其實匾還沒有掛，哪兒來的字！ 咱們既認爲孔二先生並沒有寫過什麽勞什子的六經，則對於漢朝突然發現的壁中書本已不能相信；何况年代跟傳授處處露出作僞的馬脚來，如康崔所云，文字又與商周的眞古文差得最遠，如羅王所云，尙有絲毫可信據之價值乎？ 說文中古文甚多，而這古文便是采自壁中書，則說文不是一部「僞字舉要」嗎？ 「僞字舉要」自然也有它的用處，但決不能認作眞的古字，則毫無疑義也。

壁經的僞字，說文所錄，僅可以稱爲「舉要」，尙不能稱爲「大全」。 三體石經，古文四聲韵，汗簡，書古文訓中保存着說文所未錄的壁經僞字不少，不過輾轉傳寫，失其本眞，僞字又須晉加「誤」銜了。 不曾晉加「誤」銜的，便是最近發現的三體石經。 我覺得三體石經中的古文，有好些字明明白白看得出是依傍小篆而僞造的，有好些字是眞古文本有其體，作僞者未之見，因杜撰一體以當之的；自然也有好些字與眞古文相合的，這與周禮中可以埋藏着周代的眞制度之理相同。 關於這一點，我打算將來單做一篇東西來說明它，今天暫且不談了。

疑古玄同。 一九二五，十二，十三。

五五　新史料與舊心理

魏建功

（十五，一，二十，北京大學國學門週刊第十五期）

何年何日可以掃除乾淨學術思想的因襲和謬妄兩個大病？　兩大病的根源，我曾經指出是「樸學」的短處。「樸學」的長處我也說過是訓練我們有純科學化的腦筋和手腕，就是思想縝密，方法正確。頡剛先生與疑古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引起的問題，顯然證明了這兩方面。　因襲與謬妄兩者說明了就是——

(1)信古而愚，——爲古人所奴，失之株守執拗。

(2)不知而作，——憑臆見妄斷，失之鑿空嚮壁。

這便是韓非說的「愚」和「誣」。　現在且不談「誣古」的方面，我單說一說「愚古，」「奴古，」「泥古」方面的毛病。　這個毛病在古史討論裏表現的十足！　一般人都是這般想——

古的都比今的好。　某事某物古已有之。　所以那一定是好的。

舊說都比新說眞。　某事某物舊說有之。　所以那一定可信的。

物希爲貴。　某事某物世所罕有（或時久，或地遠。）　所以那很足貴。

多半他們既沒有方法，又沒有思想，結果便只有學學古人的舌；假使只有方法，又沒有思想，結果也只有學學

古人的舌。學舌的人教不學舌的人學舌去，實在是一件夢想的事！不學舌的人與學舌的人分別就在思想的基礎和方法的施展上。我不敢說看到頡剛的文字譁然以爲怪的人是些學舌的；但是我相信這是思想的基礎和方法的施展根本不同。

頡剛辨禹之爲神話中的「擬人」，曾引說文做旁證，柳翼謀先生爲之作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頡剛已經自己答復了他，說的很明白的：「柳先生文中責我的話，我很知道這是精神上的不一致，是無可奈何的。」疑古先生因爲柳文特地給頡剛討論說文，也很足以表示我們的精神與他們不同的地方。我並非以治史學爲職志的，對於史學的蹊徑當然更摸不著路頭，不過讀了柳先生文章的起端，有點膚淺的話要在這兒說說。柳先生起首說：

「今人喜以文字說史，遠取甲骨鼎彝古文，近則秦篆，爬羅抉剔，時多新異可憙之誼。顧研究古代文字，雖亦考史之一塗術，要當以史爲本，不可專信文字，轉舉古今共信之史籍一概抹摋。即以文字言，亦宜求造字之通例，說字之通例，雖第舉一字，必證之他文皆合，此清代經師治諸經治小學之法也。不明乎此，第就單文隻誼，矜爲創獲，鮮不爲通人所笑矣。」

縱然許多通人大笑，我也要發出下面些個疑問：

(1)以文字說史所得的「新異可憙之誼」究竟要得要不得？

(2)「新異可憙」是要不得的呢，爲什麼？

(3)「新異可憙」是要得的呢，那末「單文隻誼」爲什麽要不得?

(4)考史既可由研究古代文字的途逕，又有什麽叫「不可專信文字」?

(5)「史」究竟是什麽?以文字考「史」時「要當以史爲本」的「史」是什麽?以文字去「考」的「史」又是什麽?

(6)既有「古今共信之史籍，」何以又要以文字考史呢?

(7)然則中國的信史如何?

(8)中國的「信史」中未收的材料可不可以加入參證?

(9)證史的材料究竟應該怎樣運用?

(10)以文字證史的方法與文字構造的通例和解說文字的通例有什麽關係?還就是問:「文字」與「文字構造的通例」是什麽分別?他們與史有什麽關係?「解說文字的通例」與「文字」的本身有什麽關係?與證史有什麽關係?

(11)「舉一字必證之他文皆合，」是以文字證史的方法呢?還是造「造字之通例」「說字之通例」的方法呢?是解釋經訓的方法呢?還是治「小學」的方法呢?

(12)「清代經師治諸經治小學之法」與「今人以文字說史」的方法有大相逕庭的地方嗎?

(13)以文字證史如何可以不就「單文隻誼」得「新異可憙之誼?」「經學家」所謂「孤證」與「單

文隻誼」是否相同?

(14)若「單文隻誼」不足爲證史之資料，敢問不「單文隻誼」之以文字證史法何如?

(15)即「單文隻誼」之以文字證史方法爲不足信，於疑古何傷?

這十五個疑問，我們不必拘泥著禹的問題講，因爲這可以說是「治史的方法」問題，——「以文字證史的方法」問題。未曾聽到大笑的通人說話以前，我要先發表點意見解答這些零零碎碎的問題；並且希望一切治史學者給我一點糾正或補充，好解決那大的問題，——史學方法論中的問題。

柳氏本不贊成疑古，在他文章末了說的很結實：「今之學者欲從文字研究古史，盍先熟讀許書，潛心於清儒著述，然復再議疑古乎?」這不單反對疑古，而且反對以文字說史了。假使我說的不錯，那他所謂「喜以文字說史，……時多新異可憙之誼，」便是表示一種冷誚的話了。或者第一疑問也就要這樣回答：「以文字說史所得的「新異可憙之誼」是要不得的!」

要不得的爲什麽他就說過了：「顧研究古代文字雖亦考史之一涂術，要當以史爲本，不可專信文字，轉舉古今共信之史籍一概抹摋。」這明明是說：「已經有了古今共信的史籍，這些新異的東西要不得! 要不得!」所以他一死兒咬定「以史爲本，」於是我的第三疑問自不成立，而引起我第四疑問。

他教人以文字證史時却不可以專信文字! 我不懂文字既做了證史的材料，怎麽好不信這個材料?

君說他注重在不可信的「專」字上倒可說的過去可是他又講了「以史爲本」「古今共信之史籍」則根本就否認了以文字爲史。我們怎麼會不有第五第六的疑問呢？

他既然以史爲本，當然有他的「古今共信之史籍，」而不用再以文字證史，自然不用去疑古，——古人給了許多假古董把他了！我們不知道中國信史是什麼！要是說歷來少有人懷疑的便是可信的，這未免是笑話。可是柳氏就有這種心理；他難顧頡剛辨禹爲疑人的話道：「假使許君知禹非人，不當仍沿舊說。」許叔重他沒有懷疑禹，禹當然有其人了；這種邏輯是柳教授特有的，也就是中國一般的治學者的心理。這彷彿是「古聖昔賢」從來沒有錯的；他們不疑惑的，你就不應該胡思亂想的懷疑。何況「許君既知禹爲蟲，復引禹之事實，初不自病矛盾；而千數百年讀說文者從未致疑及此？」大家不疑惑的，你更不應該自作聰明的懷疑！所以，許叔重是漢人，是古人，他可以不懷疑禹而使禹成爲信史中的人王；而顧頡剛是民國時代的人，是今人，他不應該獨「具明眼，發前人之所未發」來懷疑禹！這便是「夫子之道」——「述而不作！」顧頡剛不應自我作古；不然，也都是爲的「矯新立異！」許老頭爲什麼能得如此大的權威？這是我們「抱殘守闕」的因襲性的成全啊！死人比活人有權威，是我們中國的社會定律。死人能夠由壞變好，由弱變强，使得活人恐怖懾服，稱道。這樣的社會民衆心理，我們治學的人能夠跳出他的範圍，那是一件好容易的事嗎？他們以爲中國信史是什麼？凡是陳死人說的「神話，」「鬼話，」「怪話，」「人話，」和「畜牲話」都是的；所以，自帝王家譜的廿四史和中世紀新編的竹書紀年，路史，繹史，道士式的儒者關着門造

的古史（皇極經世）莫不被一般「通人」奉爲秘寶當做奇貨了。他們把一個「史」字看的眞正太死了！他們不知道「史」的重要作用和內容不是爲那些人類中的單個分子寫傳記便算了事；實在爲了全人類整個生活的進化而作，他的內容應該注意社會生活的狀況，個人的事實是大的生活中的點點滴滴經驗的實例罷了。所以我們要的史，我們的信史，不是凡古書，凡古人說的話，寫的文都是眞的。「神話」「鬼話」「怪話」「畜牲話」都應該老實實以「人」的眼光去看他，都應該老實實還他個本眞，然後我們「人」的信史才可以顯出，才可以眞正能信。中國的信史在那兒？誰能答我第七個問題？

柳氏一面承認以文字考史是承認中國史之不信了；一面又教人考史時「要當以史爲本」，實在應該！「自病矛盾！」史不信才以文字考他，考出的史才可信，中間竟有個「爲本」的史無異於「此地無銀三十兩」的笑話，自己道出自己的心孔了！

史料的蒐集和鑑別本是最難的工作。我們除非抱殘守闕；不然，就是所謂「信史」一朝在他的部分中有更可信的材料晚出或再現，那當然要隨時採用，致史還到信之又信的地步。然則即便信史中未收的材料發現了，我們採用得來，竟把原有系統打破，重新組織，也不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以文字證史自然並非例外。那麼，只是中國史料需要的材料，不但可以加入參證，並是必要加入參證。

講到史料，從有系統的長篇鉅製的著述到片紙隻字在我們都是一樣重要，一般有價值。那些個無價值，不只是一般人指的不可計算價值的好東西，那算不上價值來的壞東西也包括在內。文字是史料的

種，在他本身和他所表現的兩方面都有重大價值。那些完整而豐富的東西固是證史的好材料，即是鱗爪片斷的點畫也有他的用處。記載縱然很多，實在都不足憑信，這種材料只有拋棄，只有另尋眞的。這樣，關於證史的材料寧可用片斷可靠的，決不應抱著假的整個的不肯放鬆。例如柳氏所謂「古今共信之史籍，」我不知道是否全是可靠的？在他總覺得既是史籍都可相信，這種不加思想的誤失實在不小！孔丘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所以，不但要學，還得要思；不但靠思，必須有學。所以只學不思的人就是只吞而不嚼的現象；只吞不嚼的人決不能消化，不能消化縱然肚皮脹大了也決不是眞胖子！那末史料的運用便是一種消化作用，決不能囫圇吞的不加咬嚼了。吃東西知道咬嚼就如治學問知道思想；咬嚼之所以需要，一面是消化的初步，一面便是爲的選擇。所以選擇材料的工夫在治學問的過程中是一件最要緊的。柳氏承認所謂史籍是古今共信的，便是不重視選擇材料——辨僞和正誤——的工夫。他擬編全史目錄議中歷代史類裏定商代史料把商書，商頌，全上古文中所集商代文字，繹史卷十四至卷十七，和殷墟書契一類的實在可信的東西放在一起，並不管商書的眞僞，商頌的時代，和繹史的可信點若干。我並不反對他採用商書或繹史，以至於用封神榜（可是他必不用）我只不贊成他對於史料的鑑別和運用的態度！他不能反對甲骨鐘鼎的實物上的文字，他又不肯否認史籍中一些不可信的東西，所以鬧出一面贊成考史，一面仍舊以原有史籍爲可信的笑話來了。做學問的路子跨在兩條跳兒上，不鬧笑話鬧什麼？我始終看了他們處置史料的方法不對，根本沒有考量考量材料的用處，好的好用，壞的壞用，他們只有因襲！劉掞

蔡對頡剛論古史的疑問便是不滿他所舉的證據和推想，便是對於史料運用方法的見解不同，便是「學」與「思」兩點上有了差異。頡剛用說文證禹，劉氏斥他做「說文迷。」劉氏以爲「顧君一時忘卻古來名字假借之說。」其實「名字假借」是一回事，以說文禹字證史又是一回事；他根本斥以文字證史的是「想入非非，任情臆造底附會，」便沒有了解研究文字和以研究文字而治史的分別。柳氏也就把頡剛以說文爲史料非以說文爲研究的意義弄錯了，和劉氏一般；那歷史料的運用與史料本質的研究界限那裏有如此的分不開嗎？還是他們分不清呢？考藏金石的金石學，與應用金石學中材料做的考古學，有分別沒有？能知道這個分別，就可以明白專門研究說文的文字學，和應用文字學上形義音來考訂的歷史，究竟同不同。所以，我第九個問題便是請教用來證史的文字材料是否當做治文字學去研究呢？還是只當做史料拿來運用呢？

在柳氏的眼光看來，文字學中造字說字的通例，與史學裏應用文字學中造字說字的通例的對象，並無分別。我顧不得放野馬，在此把我對於文字，文字構造的通例，解說文字的通例的解釋說一下，並且講明這些與史的關係和與證史的關係。我的確認爲這幾個觀念也是關係到思想的基礎和方法的施展，——文字學方面的問題。疑古先生論的很透澈，把說文的價值說的很切當，我現在只是除開說文本身來講。什麼是文字？一般人類互相傳達意志的手段是運用符號。語言是用聲音表現的大家公認而實行傳達意志的符號。運用繪畫的方法將語言拿有形的符號記載下來就是文字；文字就成了符號的符號。符號是

人造的，不是一成不變古今如一的，所以語言文字便有的變遷。語言文字的變遷并不是退化的，是進化的；因爲符號怎樣用的方便便怎樣的用，所以規定非常活動，隨時可以修改。修改次數越多，簡便的程度越深，這就是進化的標準。既然文字是如此的性質，自然決不是一二人所能獨制的了。那末，連帶的我們該知道文字是一種族中公認最明白確切足以表示他們意志的符號，倉頡造字的謬論決不能成立。我們的文字製作者是最初的祖先，倉頡不過參加修改的一個人，如我們參加修改一樣。這點關於文字的淺顯常識若不明瞭，那關於研究文字的文字學的觀念也就難得清楚。文字學是什麽？我們中國的文字學，這個名稱沒有叫出之先，就早有了他的實在，而分屬在別的學問的範圍裏；其中的一部分單獨成爲「小學」。小學不能包括文字學，文字學可以包括小學，因爲小學的內容只是所謂「六書」，是講的「文字構造的原則，」而文字學的內容却包括了「形」「音」「義」三部分。「六書」不過是構成形體的通例，是有了文字以後找出來的通例。例如，有幾個形體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我們當然指每個單獨的爲「文字」；而看了這幾個字想到他所表示的意思，將他這樣表示的方法歸納到某個原則中去，便成了「造字通例」，所以我們就可以叫這幾個字做「象形」的。我們再因爲看了這個「文字」，定了他構造的方法屬於某條「通例，」於是說「象四達之衢人所行也。」這樣，「文字」是指的形體的本身，「文字構造的通例」是自形體表現上找出的假定原則罷了。文字既是不絕變遷的，他本身自然是治史的重要材料，因爲他的變遷痕跡是有歷史的背景。文字構造的通例依附在文字的本身，決不能與史發生多大的關係，因爲原則與構成原則

的對象不是一個東西。文字本身有變遷，他所依附原則也隨著變遷，所以上面的例本是甲骨文字在金文仍是如此，等到許老頭做說文的時候，便寫做行了，並且他定為是「會意」說「人之步趨也，从彳亍」。照此看來，說字通例并無定準，他依了文字的形體變化；至於造字通例也真是假設的，不然一個「行」字為什麼一個解做道路而是象形，一個解做步趨而是會意呢？說字通例與造字通例自然是連貫一致的，不過與「文字」本身都沒有甚麼密切關係，那便可以附著起來，只要你看了那一點就那一點立說，沒有矛盾就是了。在證史的方面講，「行」字作「象四達之衢，人所行也」解與作「人之步趨也」解於史無關，在「行」字本身的歷史上，就是文字學合筆上，却有關係而屬於形義學和文法學的範圍。我們假使說到商周時代的行字[illegible]考見而許氏[illegible]說却絲毫無用，我們并不管他是會意還是象形？假使以許叔重的說文為天經地義，他說的就是最初先民用來做行字符號的原意，就錯之又錯了！我們可以用文字的本身證史，却不可以用說文字的人們的揣度的話證史。例如禹字，我們不能因為許叔重說了「蟲也」就相信，但也不能因為許叔重在「鼎」下「[illegible]」下講了禹便就不相信。所以，頡剛就沒有拘泥在這上面，而柳翼謀却就有些拘執了。說文的證例靠不住，證史可以用靠不住的證例嗎？何況證例與證史無關呢？提到古人命名的事實，我很覺得與現在風俗一樣；這本是語言學的研究之一種，不應說的太遠，然而與禹的問題不無有關。大抵命名離不了：(1)取自然界的名物命之，(2)依其本身之特點—優或弱—命之，(3)以有關其本身之事為現象命之，(4)將對其希望之意思命之。這是一般民

彙的公法，那些道學先生和文雅搢紳的命名又是例外。 虎兒，龍兒，鳳兒，黛兒，芸兒，蘭兒，玉兒，珠兒，何以異於象，禹，夔，益，舜，稷，丘，軻，鯉，……？ 這是就命名的方面說，至於最初的以名物命名與後來以名物命名的意義是否很簡單的相同，這不是我們斷定得了的，更不是憑許書的誼例可以定準的；那末，頡剛以禹字本身證史的方法與憑許書誼例證史的方法當然就有些分別了。 例如車字，說文作『車，輿輪之總名也，夏后時奚仲所造，象形。』我們從這樣的形體只能有個很簡單的印象車，中間一條軸，兩旁兩片輪，輪子中間一個車身而已。他記的籀文車轂，我們便莫明其妙。 等到看到甲骨文字作

，，，，

我們就較詳細的知道了最早的車前面是用牲畜拉的；這挽車用的橫轅與車輪車身是分開的。 所以，我們又可用下面的形體證明這個假設：

，，。

我們又可以知道古時挽車多用雙牲，因為上面的例字多半作兩個軛形；再拿金文看，也是這樣：

，，，，，，

這最後一個字，王國維先生說是古時戈建於車上，畫車形便並畫了所建的戈。那我們又可以知道，古時的兵車形狀大體與通常的車相同。從倒第二字看來在○右的[illegible]形想係也是車上所建的戈了。這樣運用他字體本身證史，雖不能言之鑿鑿，也都不至於十分謬誤；若是拘拘於說文誼例，就得鬧笑話！就如這個事字，他寫的籀文从兩戈，明明是把象幟的[illegible]等形體弄錯了的，我們跟著許叔重去錯嗎？例如育字，他寫做[illegible]，解做「養子使作善也，從𠫓肉聲；」於是育字是「形聲」字。但是在甲骨文字中看來，他是「象形，」指的生養兒子，這相去又如何？甲骨文字中作女字下一個倒子字的很多，也有作母字下一個倒子字的；他們就是畫畫一般，將生產時的血液還有用點子表明出來的，如[illegible]；至於[illegible]更表示的清清楚楚[illegible]象女陰，子從[illegible]而下為育。什麼「肉聲！」他把[illegible]的形體訛作[illegible]或者就是把[illegible]訛變了[illegible]我們怎樣奉守許叔重的說文解字誼例法？思想的基礎打在泥古奴古上面的人怎麼會不上當怎麼能離了許老頭誼例來用文字的本身；因為丟了誼例，在他們就認為無法可想，就不足以證史了！

照上面說來，離了誼例以文字證史，才是運用「文字」史料的方法；那末更可以明白的知道，「舉一字必證之他文皆合」不是運用文字證史的方法了。這是為在同樣事物中間證明一條原則的歸納法不是引援證據證明另一事物的主要原則；固然有時為一個證明而在引證的時候又為這個證據做了很多證明也是有的事。假使我現在要說古代文字描畫一個形體，有時滿形平塗，有時只鈎輪廓。這是一個假設，而且是一個文字學上的很要緊的原則，當然就要以「舉一字必證之他文皆合」為方法。於是我就要先找

一個證據，再去和其他證據來相印證，都符合了，我的假設就成立了。我們看下面舉的例子，就可以明白。

天字　甲骨文有作[illegible]的，金文有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的。

帝字　甲骨文有作[illegible]的，金文作[illegible]，[illegible]。

王字　甲骨文有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金文作[illegible]，[illegible]。

小字　金文有作[illegible]，[illegible]的。

吉字　甲骨文有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的。

咸字　甲骨文作[illegible]；金文有作[illegible]的。

前字　甲骨文有作[illegible]，[illegible]的。

正字　甲骨文作[illegible]；[illegible]金文作[illegible]，[illegible]。

往字　甲骨文作[illegible]，[illegible]。

後字　甲骨文作[illegible]，[illegible]。

韋字　金文作[illegible]，[illegible]。

旅字　甲骨文作[illegible]；[illegible]金文作[illegible]，[illegible]。

赫字　甲骨文作[illegible]，[illegible]。

匚字　甲骨文作[illegible]，[illegible]。

土字　甲骨文作[古文字]，[古文字]；金文作[古文字]，土。

在字　甲骨文作[古文字]，[古文字]，[古文字]。

降字　甲骨文作[古文字]，[古文字]；金文作[古文字]，[古文字]。

乙字　金文作[古文字]，[古文字]。

丙字　金文作[古文字]，[古文字]。

丁字　甲骨文作□，[古文字]，○，○；金文作●，▼，[古文字]。

戊字　金文作[古文字]，[古文字]。

辛字　甲骨文作[古文字]，[古文字]；金文作[古文字]，[古文字]。

子字　金文作[古文字]，[古文字]。

這種方法，我們定造字通例是對的，就是柳氏定許書說字通例也是對的，可是他怪顧頡剛以文字證史沒用這個方法就錯了！　他把舉一字必證之他文皆合的方法誤解了！　所以他只知道這是清代經師治諸經治小學之法，卻沒有理會得顧頡剛治史引證的用意。

　我相信顧頡剛做學問決不是愚迂好古的，也不是狂妄自斷的，他的方法並非怎樣荒謬的，與清代經師的治學並不有什麽逕庭的地方。　清儒治學的方法是很科學的，直到最近大家都認識明瞭了；顧頡剛就是其中的一個認識者，並且是採納他們精神治學的一個人；不能了解清儒的治學方法和現代治學的態度，那就難

於啓齒議論這些地方。例如，柳翼謀的正史之史料，我們就不好批評，因爲他走的路子是另一途逕，根本你東我西，不得談攏上來。那錢基博却說過：

「柳翼謀……自南海康有爲作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績溪胡適吸其流，倡新漢學；以爲周禮爲僞作，尙書非信史，六籍皆儒家托古，持勿輕信古人之論。而胡氏尤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一時風動，後生小子不事研誦，好騁異議，疑經蔑古，卽成通人！……而柳氏不徇衆好，獨以爲古人古書不可輕疑。……」

科學方法是淸儒的學問成功的大手腕，我們說到底，科學方法的重要在求眞，在勇於懷疑。柳氏不贊成勇於懷疑，表現出他的精神如何，我們不用說了。至於他做的正史之史料，我看也不免是對新的治史方法的反感所表現的；我們只要看這幾句就可以明白：

「今之治史學者罔不以考證史料爲要務，蓋史料徵實始可從事編纂，然不知史料所自來，僅憑本文以意之，亦不能明其眞若僞也。此審查史料之來源爲尤足重也。來源正確，則史料不煩考而信矣。「正史」者今人咸目爲史料，故先討其源焉。……今人讀古史動輒懷疑，以爲此爲某某作僞，此爲某某增竄，囂然以求眞號於衆；不知古人以信爲鵠，初未嘗造作語言以欺後世。若謂今人始善考史，昔之人皆逞肊妄作，則由未讀古書，不詳考其來歷耳。……要之，史書無一事無來歷，其小有出入乃一時之疏，非故意以誤後人，不得執一以疑其百也。今不務考其本源，而憑空言出私見，冀以補其

遺而正其僞，吾不知其可也。』

他相信有「正史」這正史却是一家或衆手專爲帝王而作的。對於一家著作，他也承認了他們取材於傳說的方法，爲之找出了例證，並沒有說到僞不僞的話；然則顧頡剛之辨史與傳說何以便是柳氏所反對的呢？這就是因爲那是正史，他們將傳說寫下便是正史，我們只應知道古人這樣拉雜的用了傳說，但不能懷疑而推翻他。這是沒有注意原來寫所謂「正史」者沒有「審查史料」沒有審查的史料，我們不能審查嗎？他又承認衆手著作，『掌之者立帝座之後，定時日以報，勢不敢僞；史官據以撰述，亦莫由僞也！』這個問題，我們看清東華錄可信程度如何，究可知道其僞不僞的程度。「正史」云乎哉！「正史」云乎哉！這是附帶的說到審查史料，我們能不懷疑嗎？能不勇於懷疑嗎？生當學術自由發展之世，若不免除民賊專制時被壓迫的思想，反或受其拘執，信史何年何日可以實現啊？假使你想私淑清儒的治學方法，你就該知道怎樣去辨僞，去正訛！

上面已經說過，以文字證史的方法注重在以「文字」本身爲史料。史料之多寡是物質的量的問題；我們不能因爲只有一個字而嫌他少不用，更不能把由一個字證明的東西認爲不可用的「新異可喜之誼」！假如由一個字證明的結果，在所證明的客觀條件上很强有力，我們不能以「單文隻誼」來反對；因爲以「文字」本身證史的「單文隻誼」與所謂「孤證」不同。所以，以文字證史之不「單文隻誼」法，我還得請教！例如，我說古人占卜是把甲骨拿來燃燒，看甲骨上的裂紋而定兆的，可以從這個「卜」字證明，牠的

古文便是卜，橫看一是甲骨，ㄏ是所燒物出烟之形。你說，『不行！你是單文孤證太新異了！』我有什麼法子拿另外字形來說呢？

讓步就這種方法不對，我們不用好了，究竟與疑古的一回事有妨礙沒有？疑古的如果只有這一條方法，或者可以被你一刀見血的壓服了。

我的結論：中國的歷史，眞正的歷史，現在還沒有。所謂「正史」的確只是些史料。這些史料需要一番澈底澄淸的整理，最要緊將歷來的烏煙瘴氣的舊心理消盡，找出新的歷史的系統。新歷史的系統是歷史敍述的主體要由統治階級改到普遍的民衆社會；歷史的長度要依史料眞實的年限決定，打破以宗法封建等制度中敎皇兼族長的君主的朝代爲起訖；歷史材料要把傳說，神話，記載，實物……一切東西審愼考查，再依考查的結果，客觀的敍述出來。如此，我們倒不必斤斤的在這個舊心理磅礴的人羣裏爲新史料的整理伴他們吵嘴，把重大工作停頓了！然而這一個新史料與舊心理的糾纏，至少也得費一些工夫說一頓費話，不過是所謂「盡心焉爾矣」！

所以，「國故」能敎人鑽不出頭，我始終這樣想，雖然頡剛兄很有些不謂然；因爲我不能解決這個治「國學」的人們中間的問題：『何年何日可以掃除因襲和謬妄的大病？』

一九二六，一，一一，北京。

五六　論說文誼例代顧頡剛先生答柳翼謀先生

容庚

（十五，一，二十，北京大學國學門週刊第十五期）

昨夜往候顧頡剛先生，顧先生適不在，見案頭有柳翼謀先生論以說文爲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史地學報第三卷第一二合期）及顧頡剛先生答柳翼謀先生，錢玄同先生與顧頡剛先生論說文書，取歸讀之，疑柳先生所舉頗有違失。時適病頭痛，以手按頭取說文翻閱一過，而後知柳先生「第就單文隻誼，矜爲創獲，」證之他文而未必合也。顧先生答書「只是要借此說明我們如何對付古書的一個態度，」故於說文誼例未有論辯，姑就所知爲顧先生代答可乎。

柳先生謂「於字之形誼可解者不引古人作證，」又云「其字雖有誼而人名罕見者亦舉以爲證，」其說不幾矛盾乎？使所舉人名而果罕見者，則其補充之例尙可以成立，今按之說文，除柳氏所舉外，其證實繁，列舉如下：

玎，玉聲也，从玉丁聲。齊太公子伋謚曰玎公。

牼，牛厀下骨也，从牛巠聲。春秋傳曰宋司馬牼字牛。

齹，齒差跌皃，从齒佐聲。春秋傳曰鄭有子齹。

睔，目大也，从目侖。春秋傳有鄭伯睔。

眅，多白眼，从目反聲。　春秋傳曰，鄭游眅字子明。

羿，羽之羿風，亦古諸侯也；一曰射師，从羽幵聲。

雃，石鳥，一名雝𪇰，一曰精列，从隹幵聲。　春秋傳秦有士雃。

雂，鳥也，从隹今聲。　春秋傳有公子苦雂。

釗，刓也，从刀从金。　周康王名。

𦣻，出气詞也，从曰，象气出形。　春秋傳曰，鄭太子𦣻。

嚭，大也，从喜否聲。　春秋傳吳有太宰嚭。

寮，穿也，从穴尞聲。　論語有公伯寮。

覵，很視也，从見肩聲。　齊景公之勇臣有成覵者。

碫，厲石也，从石叚聲。　春秋傳曰，鄭公孫碫字子石。

赧，面慚赤也，从赤㞋聲。　周失天下於赧王。

奡，嫚也，从百从夰，夰亦聲。　虞書曰，若丹朱奡，讀若傲。　論語曰，奡湯舟。

悝，啁也，从心里聲。　春秋傳有孔悝。　一曰病也。

紇，絲下也，從糸气聲。　春秋傳有臧孫紇。

絑，純赤也；虞書丹朱如此；从糸朱聲。

縉，帛赤色也；春秋傳曰，縉雲氏；禮有縉緣，從糸晉聲。

以上皆有諡而兼有人名者其人名十之八見于經傳十之一爲周王名諡，不知其果罕見否乎？ 柳氏所舉四條，其人名誠罕見也不知余之所舉二十條柳氏見之否乎？ 不知而言，則爲空疏，知而不舉，則欠忠實，二者必居一於此矣！

柳氏又云：「必其字之罕見而又無諡可解者始舉人物爲證。」 古人名字多製專名，此例彝器文多有之，非必無諡可解而始舉人名也。 但其所舉娥字乃有諡可解者，但遺落其下「秦晉謂好曰娙娥」一句而以爲無諡可解，「實屬疏於讀書」矣。

許氏於邑部之字，如鄦，鄭，郜，邾等從邑之字皆稱國名，而其字之有本諡如吳楚蔡衞等字者皆不舉國名。陳秦二字皆有本諡而猶稱某某封國，說文而有例也，許氏不幾自亂其例乎？ 段氏於伋伉二字皆云非例，吾不知例者何例也。

女部之姓，如姜，姬，姞，嬴，姚，嬀，妘等皆其本諡，何謂「許君多不得其解。」 其見於彝器文者尚有媿，妃，妊，妀，嬭等，亦姓也。 「凡經典姒字皆當作始，古文台以爲一字，許書無姒字，」吳大澂說。 則姒之作似者乃其借諡，故謂「本字作以」者非也。 「此等諡例淺近易曉，本自不待解說，」稍習彝器文者當能知之，豈柳先生深閉固拒，不一涉獵乎？

許氏說文既未自訂諡例，柳氏欲爲之「求造字之通例，」「盡先紬繹許書，潛心於清儒著述，」然後再

擬通例乎！

抑尚有爲柳先生進一言者，方今甲骨及彝器日出而不窮，如欲治文字之學，當博采以爲證，不能守許氏一先生之言爲已足。如欲辨顧先生謂古無夏禹其人之說，當取秦公敦「鼏宅禹責（即績）」齊侯鎛鐘「虩虩成唐……處禹之堵」證之。何必「剿取一語，輒肆論斷，」氣矜之隆，與人以難堪也哉。

一五，一，一五，于[illegible]室。

五七　古史新證第一二章

（清華學校研究院講義）

王國維

第一章　總論

研究中國古史爲最糾紛之問題。上古之事，傳說與史實混而不分：史實之中固不免有所緣飾，與傳說無異，而傳說之中亦往往有史實爲之素地，二者不易區別。此世界各國之所同也。在中國古代已注意此事。孔子曰，「信而好古；」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於夏殷之禮曰，「吾能　之，杞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孟子於古事之可存疑者則曰「於傳有之，」於不足信者曰「好事者爲之。」太史公作五帝本紀，取孔子所傳五帝德及帝繫姓，而斥不雅馴之百家言，於三代世表，取世本而斥黃帝以來皆

有年數之諜記，其術至爲謹愼。然好事之徒世多有之，故尙書於今古文外在漢有張霸之百兩篇，在魏晉有僞孔安國之書。百兩雖斥於漢，而僞孔書則六朝以降行用迄於今日。又汲冢所出竹書紀年自夏以來皆有年數，亦諜記之流亞。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亦爲五帝三王盡加年數。後人乃復取以補太史公書。此信古之過也。至於近世，乃知孔安國本尙書之僞，紀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過，乃併堯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於懷疑之態度及批評之精神不無可取，然惜於古史材料未嘗爲充分之處理也。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爲實錄，卽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爲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

所謂紙上之史料，玆從時代先後述之：——

(一)尙書　虞夏書中如堯典，皐陶謨，禹貢，甘誓，商書中如湯誓，文字稍平易簡潔，或係後世重編；然至少亦必爲周初人所作。至商書中之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周書中之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諸篇，皆當時所作也。

(二)詩　自周初迄春秋初所作。商頌五篇，疑亦宗周時宋人所作也。

(三)易　卦辭，爻辭，周初作。十翼，相傳爲孔子作，至少亦七十子後學所述也。

(四)五帝德及帝繫姓　太史公謂孔子所傳。帝繫一篇與世本同。此二篇後並入大戴禮。

(五)春秋　魯國史孔子重修之。

(六)左氏傳，國語　春秋後，戰國初作；至漢始行世。

(七)世本　今不傳；有重輯本。漢初人作；然多取古代材料。

(八)竹書紀年　戰國時魏人作。今書非原本。

(九)戰國策及周秦諸子

(十)史記

地下之材料僅有二種：

(一)甲骨文字　殷時物，自盤庚遷殷後迄帝乙時。

(二)金文　殷周二代。

今茲所講，乃就此二種材料中可以證明諸書或補足糾正之者一一述之。

第二章　禹

『鼏宅禹賚。』（秦公敦）

『崇崇成唐……處禹之堵。』（齊侯鎛鐘）

秦公敦銘有『十有二公在帝之𡉚』語，與宋內府所藏秦盄和鐘同。歐陽公集古錄跋盄和鐘云，『太

史公于秦本紀云「襄公始列爲諸侯，」於諸侯年表以秦仲爲始。今據年表始秦仲，則至康公爲十二公，此鍾爲共公時作也。據本紀自襄公始，則至桓公爲十二公而銘鍾者當爲景公也。』近儒或以秦之立國始非子，當從非子起算，則鍾當作於宣公成公之世。要之，無論何說皆春秋時器也。齊侯鎛鍾，以字體定之，亦春秋時器。秦敦之『禹賨，』即大雅之『維禹之績，』商頌之『設都于禹之蹟。』『禹賨』言『宅，』則『賨』當是『蹟』之借字。齊鎛言『虩虩成唐（即成湯）有敢（即嚴字）在帝所，博受天命，……咸有九州，處禹之堵。』『堵，』博古圖釋『都。』『處禹之堵，』亦猶魯頌言『纘禹之緒』也。夫自堯典，皐陶謨，禹貢皆紀禹事，下至周書呂刑亦以禹爲『三后』之一，詩言禹者尤不可勝數，固不待藉他證據。然近人乃復疑之。故舉此二器，知春秋之世東西二大國無不信禹爲古之帝王，且先湯而有天下也。

附跋

頡剛案，讀此，知道春秋時秦齊二國的器銘中都說到禹；而所說的正與宋魯二國的頌詩中所舉的詞意相同。他們都看禹爲最古的人，都看自己所在的地方是禹的地方，都看古代的名人（成湯與后稷）是承接着禹的。他們都不言堯舜，彷彿不知道有堯舜似的。可見春秋時人對於禹的觀念，對於古史的觀念，東自齊，西至秦，中經魯宋，大部分很是一致。我前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中說，『那時（春秋）並沒有黃帝堯舜，那時最古的人王只有禹。』我很快樂，我這個假設又從王靜安先生的著作裏得到了兩個有力的證據！

十四，十二，廿二記

五五　古史問題的唯一解決方法

李玄伯

（十三，十二，二十七，現代評論一卷三期）

研究歷史已是件難事，研究古史更是難上加難。我國人素來懶于動筆，所以關於近代的史料，比起歐西各國來已經算少了。加以古代世既遼遠，史料眞僞揉雜，研究起來，較之歐西古史似乎更難了。近來顧頡剛錢玄同諸先生審別史料，將東周至於今對於古代的錯點指穿，於古史研究盡力眞算不少！但現在這個問題是否算是解決？還是必須有待？這也是關心古史研究的所欲知的。

研究前人的往跡，所可藉的材料約分二種：曰載記，曰遺作品。第一類包括一切紙片的記載。近人研究古史所用的證據皆屬于這一類。古代載籍去今既遠，展轉鈔刻，錯誤愈多。何況中間更有人僞造呢！在用史證以前，分別眞僞是件不可免的要務。前淸以來，學者對于這節甚爲注意，頗有重要的發現。但是我對于眞僞書籍之辨頗覺懷疑。作僞的人去古比我們爲近。他們所見的古書，如果我不敢說絕對比我們見的多，至少可以說他們所見的各種有與我們所見的不同。那麼，他們所造僞本的全體雖然不是古人的原樣，若分段看起來，也許有一兩段眞是古人的。或者其語出自古某人，但其意則「斷章取義。」或其

語雖非古人原文，其意則係古人的。我們設再前進一步講。造偽的人是否受了種暗示？若然，則所謂某時代如此如此雖不盡然，但與某時代有關而為造偽者所可聞見的或係如此。那麼，這類記載雖不足供作研究某時代的材料，但頗可為研究某時代有關的材料。譬如所謂夏禮如此，商禮如此，雖不必盡實，或係受杞禮宋禮的暗示，由于杞夏宋商的關係而涉想到禮的同樣。供作夏商的史料固然不可，卻可作研究杞宋的材料。在「偽書」中分出真的，這樣的難。反著去看，現在所謂真書又全是真的麼？論語一書，現在學者多半認為真的。孔子當時的言語總不能這樣的簡單。弟子們或覺得他話中的一二句說的好，就記在「小板」上了。這種是取其言。或覺得他說的全體有興味，綜簡起來合成數句，也記在「小板」上。這種是取其意。取其言多係斷章，對於原意有否改變？取其意則所記是種改造的話，與原意是否仍合？這兩件皆是甚要緊的問題。果與原意有所改變，雖不能說他是偽書，價值卻減少了許多。

這分別真偽的困難既然如此，何者絕對可用作史料，何者絕對的不能用，真是個極難的問題了。所以用載記來證古史，只能得其大概——譬如西周以前的形勢與西周時不同，而不能得其詳情。顧頡剛劉掞藜兩先生所爭論的「禹的存在」兩造所引的書籍皆是那兩句，實不足以解決這個問題。

載記既不能與「我們」一個圓滿的回答，我們只好去問第二種材料「古人直遺的作品。」

直遺的作品直接出自古人。古人所能看見的，除了缺破以外，我們仍能看見。所以他的價值遠非傳鈔錯誤，偽作亂真的載記所可比擬。現地中藏品，除為商賈盜發者外，大半仍未發掘。設以科學的方法嚴

密的去發掘，所得的結果必能與古史上甚重大的材料。這種是聚訟多久也不能得到的。所以要想解決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攷古學。我們若想解決這些問題還要努力向發掘方面走。

五六　答李玄伯先生

顧頡剛

(十四，二，十四，現代評論一卷十期)

在本刊第三期中，讀到李玄伯先生的「古史問題的唯一解決方法」，非常快樂。李先生所說的「用載記來證古史，只能得其大概；……要想解決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學；我們若想解決這些問題，還要努力向發掘方面走」，確是極正當的方法。我們現在研究古史，所有的考古學上的材料只有彝器文字較為完備，其餘眞是缺得太多。發掘的事，我們應當極端的注重，應當要求國家籌出款項，並鼓吹富人捐出款項，委託學者團體盡力去做。

但李先生這句話頗有過尊遺作品而輕視載記的趨向，我還想加上一點修正。我以為無史時代的歷史，我們要知道牠，固然載記沒有一點用處；但在有史時代，牠原足以聯絡種種散亂的遺作品，並彌補牠們單調的缺憾，我們只要鄭重用牠，牠的價值決不遠在遺作品之下。我們現在討論的古史，大都在商周以降，已入有史時代，載記的地位已不可一筆抹煞。要講遺作品直接出于古人，載記何嘗盡是後人寫的。要講載

記多僞作難以考定，遺作品又豈純粹無僞作而又易考定呢。所以我覺得我們若是多信一點遺作品，少信一點載記，這是很應當的；若說惟有遺作品爲可信而載記可以不理，便未免偏心了。推原從前人對于古史專主載記的弊病，只爲他們用了聖道王功的見解去看古人，用了信古尊聞的態度去制伏自己的理性，所以結果完全受了謬誤的主觀的支配，造成許多愈說愈亂的古史。若是他們能彀用了客觀的態度去做整理的功夫，像他們對于名物訓詁一樣，他們所得的成績當然不能菲薄。我們生於今日，初懂得用歷史演進的眼光去讀古書，初懂得用古人的遺作品去印證古書，乍開了一座廣大的園門，滿目是新境界，在載記中卽已有無數工作可做。依我看，我們現在正應該從載記中研究出一個較可信的古代狀況，以備將來從遺作品中整理出古史時的參考。若我們輕易跳過這個階級，那就失去了研究的基礎了。

前年，我們對於古史作過一番汗漫的論辨；承李先生稱引，甚爲慚感。但李先生似乎看得我們的論辨過於有力了，髣髴我們所討論的問題已經自許爲解决似的。這一點誤會使我不敢領受。我要在此聲明一句：我作這些文字只是想把我的假設開出一條研究的路；我固然未嘗不希冀從我的假設上解决古史，但我深明白從假設到解决不知要費多少日子的研究，在研究中間不知要經過多少次的困難，我决不敢貿貿然想在半年之內所作的幾萬字中作一個輕率的解决。

李先生說，「載記既不能與我們一個圓滿的回答，我們只好去問第二種材料，古人直遺的作品。」我對於這句話，以爲在學問的目的上是無疑義的，但在我們研究的工作上則未必便應這般。學問是無窮無

盡的，只有比較的近眞，決無圓滿的解決。另一方面，學問是隨時隨地可以研究的，材料多固然便於研究，材料少也應把僅有的材料加以整理，不必便爾束手。現在古史問題在載記的研究上剛總開頭，面前原有許多路徑可走，並不是已經碰住了死胡同裏的牆腳，非退出來不可。若說因爲終究不能給我們一個圓滿的解決，不如把牠丟過一旁，專從發掘去求圓滿解決，話雖說的痛快，其如眼前放着路不走，反而伸長了頭頸去待不知何年可以實現的事業，豈不是與鄉下人不去種田單想候着觸樹的兔子的辦法相同呢？語云，「俟河之淸，人壽幾何！」我們若必等到材料完備而後去做研究的工作，恐怕永遠沒有工作的日子吧。所以我們在研究的工作上，對於新材料的要求加增，對於舊材料的細心整理，有同等的重要，應當同時進行，不宜定什麼輕重，分什麼先後。

以上說的，是我對於李先生所論的解決古史方法的一點意見。至於研究的工作，是學問界全體的職責，應當有許多人分工去做，不能獨責一二人作全部的包辦，這是無疑的。我自己就性之所近，願意着力的工作，是用了「故事」的眼光去解釋「古史」的構成的原因。現在就討論之便，敍述於下。

十年前，我極喜觀劇，從戲劇裏得到許多故事轉變的方式，使我對於故事的研究甚有興味。後來讀到適之先生的井田辨與水滸傳考證，性質上雖有古史與故事的不同，方法卻是一個，使我知道研究古史儘可應用研究故事的方法。回憶觀劇時所得的敎訓，覺得非常親切；試用這個眼光去讀古史，牠的來源，格式，與轉變的痕跡，也覺得非常淸楚。例如看了八仙的結合，卽可說明堯典九官的結合；看了薛仁貴薛平貴的化

名，即可說明伯翳伯益的化名；看了諸葛亮的足智多謀，即可說明伊尹周公的足智多謀；看了曹操秦檜的窮兇極惡，即可說明桀紂的窮兇極惡；看了何仙姑的爲武平人，又爲歙人，又爲零陵人，孟姜女的爲杞人，又爲同官人，又爲澧州人，又爲華亭人，即可說明舜的爲東夷人，又爲冀州人，舜妻的爲都於平陽的堯女，又爲湘夫人，又爲三身之國的母親。 因爲我用了這個方法去看古史，能把向來萬想不通的地方想通，處處發見出牠們的故事性，所以我敢大膽打破舊有的古史系統。 從此以後，我對於古史的主要觀點，不在牠的眞相而在牠的變化。 我以爲一件故事的眞相究竟如何，當世的人也未必能知道眞確，何況我們這些晚輩；但是我們要看牠的變化的情狀，把所有的材料依着時代的次序分了先後，按步就班地看牠在第一時期如何，在第二時期如何，……這是做得到的，而且容易近眞的。 例如我前年考的禹，知道他起初是一個天神，後來變成人王，後來又變爲夏后，最後作了舜的臣子而受禪讓。 又如去年考的孟姜女，知道她起初是郤君郊弔，後來變爲善哭其夫，後來變爲哭夫崩城，最後變爲萬里尋夫。 這樣的『不立一眞，惟窮流變』地做去，即使未能密合，而這件故事的整個的體態，我們總可以粗粗地領略一過。 從前人因爲沒有這種的眼光，所以一定要在許多傳說之中『別黑白而定一尊』，或者定最早的一個爲眞，斥種種後起的爲僞；或者定最通行的一個爲眞，斥種種偶見的爲僞；或者定人性最充足的一個爲眞，斥含有神話意味的爲僞。 這樣做去，徒然弄得左右支吾。 結果，這件故事割裂了，而所執定的一個郤未必是眞。

我研究古史的願望還有一個，是把神話與傳說從古代的載記中，後世的小說詩歌戲劇以至道經善書

中整理出來，使得二者互相銜接，成爲一貫的記載。　本來古代人對於眞實的史蹟反不及神話與傳說的注意，所以古史中很多地方夾雜着這些話。　後世智識階級的程度增高了，懂得神話與傳說不能算做史蹟，他們便把這些話屏出了歷史的範圍以外。　但牠們的勢力雖不能侵入歷史範圍，而在民衆社會中的流行狀況原與古代無殊，牠們依然保持着牠們的發展性與轉換性。　黃帝雖不提起了，老子卻『一炁化三淸』抵着他的地位而有餘了。　風后力牧雖消失了，但關帝岳王又起來了。　禹的故事雖平淡了許多，但金龍四大王的故事又風靡一世了。　活了八百歲的彭祖變爲『一[目悤]睏千年』的陳摶的兒子了。　齊景公時叫天的庶女，變爲明朝海瑞審淸官司的竇娥了。　這種事情在從前的學者看着只有一笑置之；便是認眞一點，也只有加上『荒唐悠謬，不可究詰』的八字批語。　現在我們可不能這樣了。　我們在比較上，要瞭解古代的神話與傳說的性質，必須先行瞭解現代的神話與傳說的性質；在系統上，要瞭解現代的神話與傳說所由來，必須先行瞭解古代的神話與傳說所由去。　二者交互縈迴，不可分割；不過從前人因爲沒有這種觀念，硬把今古同性質的東西打成兩橛罷了。　我希望我能彀得到時間，從左傳楚辭等書研究起，直到東嶽廟，義和團，同善社，悟善社的神位，神壇，神咒，神乩，以及平話家口中的歷史，鄉下人口中的『山海經』，一切搜集，爲打通的研究，爲系統的敍述。

以上兩項——(一)用故事的眼光解釋古史的構成的原因；(二)把古今的神話與傳說爲系統的敍述——是我個人研究古史願意擔任的工作。　我自己知道，我現在學力太淺薄，不夠正式做這項工作；我只願

從此勉力下去至竭盡我的力量爲止。 至於能解決多少問題，我自己全沒有把握，惟有聽諸天命而已。

李先生說「顧頡剛劉掞藜兩先生所爭論的「禹的存在，」兩造所引的書籍皆是那兩句，實不足以解決這個問題。」 關於這件事我久有一點意見要說。 可是我實在沒有閒空，只得停住了。 記在這裏，待將來的討論。

寒假中雜事苦多，匆匆寫此，甚不愜意，請李先生原諒！

十四，二，三。

六〇 論春秋性質書

（十四，十，十四，北京大學國學門週刊第一期）

頡剛先生：

先生對於春秋一經的意見，頗願賜教一二。 弟以爲此書只有兩個絕對相反的說法可以成立：

（一）認它是孔二先生的大著，其中蘊藏着許多「微言大義」及「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當依公羊傳及春秋繁露去解釋它（自然公羊及繁露的話決不能句句相信，但總是走這一條路去的） 這樣，它絕對不是歷史。

（二）認它是歷史。 那麽便是一部魯國底「斷爛朝報」，不但無所謂「微言大義」等等，並且是沒有組織，沒有體例，不成東西的史料而已。 這樣便決不是孔二先生做的；孟子書中「孔子作春秋」之說，只能認爲與他所述堯，舜，禹，湯，伊尹，百里奚底事實一樣，不信任它是眞事。 孔丘底著作究竟是怎麽樣的，我們雖不能知道，但以他老人家那樣的學問才具，似乎不至於做出這樣一部不成東西的歷史來。

我近年來是主張後一說的。 但又以爲如其相信「孔子作春秋」之說，則惟有依前一說那樣講還有些意思。

玄同。 一九二五，三，十六。

六一 答書

（十四，十，十四，北京大學國學門週刊第一期）

玄同先生：

對於春秋一經的意見，我和先生相同。 其故，因：——

(1)論語中無孔子作春秋事，亦無孔子對於「西狩獲麟」的歎息的話。

(2)獲麟以後定爲「續經」，沒有憑據。 春秋本至「孔丘卒」，儒者因如此則不成爲孔子所作，所

以採了一段較爲怪異的記載—獲麟—而截止，以爲此前爲孔子所作，孔子所以作春秋是爲了『感麟，』此後便爲後人所續。

(3)如果處處有微言大義，則不應存『夏五』『郭公』之闕文。存闕文是史家之事。

(4)春秋爲魯史所書，亦當有例。故從春秋中推出些例來，不足爲奇。

(5)春秋中稱名無定，次序失倫，舉例見六經奧論卷四『例』條，）如果出於一人之手，不應如是紊亂。何況孔子的思想是有條理的，更何至於此。可見其出於歷世相承的史官之手。

(6)孟子以前無言孔子作春秋的。孟子的話本是最不可信。

至春秋何以說爲孔子所作，這步驟我試作以下的假定以說明之：——

(1)春秋爲魯史官所記的朝報。這些朝報因年代的久遠，當然有闕文；又因史官的學識幼稚，當然有許多疏漏的地方。

(2)孔子勸人讀書，但當時實無多書可讀，詩書是列國所共有的，易與春秋是魯國所獨有的（依左傳所記，均爲七十子後學者所讀之書。

(3)春秋當然不至『孔丘卒』而止，但因儒者的尊重孔子，故傳習之本到這一條就截住了。如此，春秋就變爲是儒家所專有的經典了。

(4)春秋成爲儒家專有的經典之後，他們尚不滿意，一定要說爲孔子所作。於是又在『西狩獲麟』

截住，而說孔子所以作春秋是因于『傷麟感道窮。』（5）自有此說，於是孟子等遂在春秋內求王道，公羊氏等遂在春秋內求微言大義。經他們的附會和深文周納，而春秋遂眞成了一部素王手筆的經典。

以上的話，未知先生以爲如何？ 匆促寫此，淺陋的很，請指正。

頡剛敬上。 十四，三，廿一。

六二 論獲麟後續經及春秋例書

（十四，十，十四，北京大學國學門週刊第一期）

頡剛先生：

本年三月裏你回我的信，談對於春秋的意見，大體我都佩服；只有兩點，我跟你所見不同，寫在下面請教：

（1）獲麟以後底『續經』幷非魯史之舊，乃是劉歆他們僞造的。 左傳是眞書，但它本是國語底一部分，並非春秋的傳。 康長素底僞經考與先師崔觶甫先生底史記探源，春秋復始中都說漢書藝文志有新國語五十四篇，這是『原本國語』，劉歆把其中與春秋有關的事改成『春秋左氏傳』，那不要的仍舊留作國語，遂成今本國語。』 這話我看是很對的：

左傳記周事頗略，故周語所存春秋時代底周事尚詳（但同於左傳的已有好幾條）

左傳記魯事最詳，而殘餘之魯語所記多半是瑣事，薄薄地兩卷中關於公父文伯的記載竟有八條之多。

左傳記齊桓公霸業最略，「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底事蹟竟全無記載，而齊語則專記此事。

晉語中同於左傳者最多，而關於霸業之犖犖大端記載甚略，左傳則甚詳。

鄭語皆春秋以前事。

楚語同於左傳者亦多，關於大端的記載亦甚略。

吳語專記夫差伐越而卒致亡國事，左傳對於此事的記載又是異常簡略，與齊桓霸業相同。

越語專記越滅吳之經過，左傳全無。

綜上所記，此詳則彼略，彼詳則此略，顯然是將一書瓜分爲二。 至於彼此同記一事者，往往大體相同，而文辭則國語中有許多瑣屑的記載與支蔓的議論，左傳大都沒有，這更顯出删改底痕迹來了。 劉歆把國語底一部分改成春秋的傳，意在抵制公羊傳。 漢書劉歆傳說，「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這就是他給春秋跟國語底一部分做媒人的證據。 所以左傳中的「春秋經」實在比公羊傳中的還要靠不住。 那幾條「續經」我以爲是他們假造了來破壞公羊傳所云「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這句話的。 以上的話似乎做

了「今文家」底話匣子，其實不然。我現在對于「今文家」解「經」全不相信，我而且認爲「經」這樣東西壓根兒就是沒有的；「經」既沒有，則所謂「微言大義」也者自然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了。但關於漢代今古文之爭這重公案，則至今承認康崔之說，以爲是劉歆他們鬧的鬼。所以對於今之左傳，認爲它裏面所記事實遠較公羊傳爲可信，因爲它是晚周人做的歷史，而公羊傳則是「口說流行，」至漢時始著竹帛者；至對於左傳之「五十凡」及所論書法等等，則認爲比公羊傳所論微言大義更爲不古，更不足信。）

（2）春秋乃是一種極幼稚的歷史，「斷爛朝報」跟「流水賬簿」兩個比喻實在確當之至。它本來講不上什麼「例。」您說「春秋爲魯史所書，亦當有例，」我竊以爲不然。其實對於歷史而言例，是從劉知幾他們起的；不但極幼稚的春秋無例可言，即很進步的史記，漢書等亦無例可言。章實齋說，「遷書體圓用神，班氏體方用智，」哪有這回事！不過司馬遷做文章貴自然，班固做文章尚矜錬罷了。講到「稱名無定，」更不算什麼一回事。比春秋進步得多的「左傳」稱名更無定，史記也是這樣；漢書較守規矩了，但還稱田千秋爲「車千秋。」關於這一點，倒未必是古人底壞處，只是後人愛「作繭自縛」罷了。（我底偏見，以爲凡講什麼文章公式義例的都是吃飽飯，沒事幹，鬧扯淡。）

玄同。一九二五，九，二十二。

六三 論莊子眞僞書

頡剛先生：

今本莊子三十三篇，思想跟文章前後不一致，說它不全是莊先生一個人底著作，自然是對的。但像蘇老大疑心盜跖，漁父，讓王，說劍這幾篇靠不住，拿它們太對不起孔二先生做理由，這却是不能成立的。在那位「改了姓，更了名，喚做漢高祖」的劉老三排了道子，走到山東，請孔二先生底鬼魂吃牛肉以前，尤其是在董道士奏請那位「文成將軍跟五利將軍底信士弟子」劉徹「定孔教爲國教」以前，孔二先生底徒子徒孫雖然布滿天下，可是他老人家底地位實在跟墨老爹莊先生這班人是平等的，墨莊諸公不贊成他底見解，向他開開玩笑，說幾句尖刻俏皮的話來挖苦他，本不算什麼一回事；不像董道士以後誰要敢對他瞪一瞪眼，挺一挺胸，馬上會有人來把你揪到「兩觀」之下，「嚓」地一聲，腦袋瓜兒就得跟脖梗子告別了也。所以，說墨子非儒不像兼愛，莊子盜跖不像齊物論，若相信兼愛跟齊物論是墨莊兩公底大著，則非儒跟盜跖便不是他們倆底大著，這樣說法是可以的。（據我看來，盜跖底思想跟胠篋實在不差什麼，跟老子第十八，十九兩章也很相同，不過他說得更淋漓盡致罷了。）但即使如此，還是不能斷定他們倆沒有蹧蹋過孔二先生。

有人說，莊子底內篇最精深，外篇便遠不及內篇了，雜篇則尤爲淺薄。這話也不可靠。即如雜篇中之天下，眞是一篇極精博的「晚周思想總論」，雖然還不見得是莊先生親筆寫的。

你前年給我的信論老子跟道家極精闢。關於莊子眞僞問題，我希望你也賜致一二。

玄同。 一九二五，八，二十四。

六四 答書

玄同先生：

昨接來書，談及莊子眞僞問題。我的意思，以爲莊子是戰國秦漢間『論道之人』（『道家』一名似出漢人所撰）所作的單篇文字的總集，正與儒者所作的單篇文字總集爲禮記一樣。因爲是許多人所做，故其中有極深的也有極淺的；時代也有較前的也有較後的。至『內』『外』『雜』之分法標準亦不甚鮮明，或者竟是漢人無聊的分別，如『正變風』『正變雅』之分別而已。此意未知先生以爲然否？

頡剛敬上。 十四，八，二十六。

附莊子外雜篇著錄考 （九年三月作）

漢代所定莊子五十二篇，今見郭象本三十三篇。外史記有畏累虛（按史記文云『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疑卽指庚桑楚篇所謂『有庚桑楚者，北居畏壘之山』，未必爲篇名）經典釋文

有闕奕，意修，危言，游鳧，子胥，北齊書杜弼傳有惠施篇，其餘十數，不可知矣。 司馬彪孟氏所注並五十二篇，蓋卽漢志所箸錄者。 至崔譔向秀，删去其半，有內外篇而無雜篇。 郭象本較崔向多六七篇而有雜篇；然雜篇多至十一而外篇視二家且少五六。 意者崔向之外篇，郭氏其有所删耶？抑删于外篇而入於雜篇耶？ 按司馬彪本外篇二十八，雜篇十四；抑三家之外篇撰錄於此而或多或少耶？郭氏之雜篇撰錄於此而遺其三耶？

陸氏釋文序錄云，「莊生宏才命世，辭趣華深，正言若反，故莫能暢其弘致。 後人增足，漸失其眞。故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閼奕，意修之首，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 其內篇衆家並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 可見淺人依託，其數不尠。 惟雜篇以十四篇爲完帙，而今郭本有十一篇遺者僅三；又可見閼奕意修之類不盡在雜篇也。 不盡在雜篇，則在外篇矣。 外篇亦有類似山海占夢者則外雜之並多僞作亦可知矣。

郭氏等本去其占夢山海所類而存其言道者，然讓王，說劍，盜跖，漁父四篇見疑於蘇軾，刻意，繕性兩篇見疑於羅勉道，胠篋等篇見疑於焦竑。 至王夫之則舉外篇而綜斷之曰「非莊子之書。」 其言曰，「外篇蓋爲莊子之學者欲引伸之而見之弗逮，求肖而不能也；故神理不鬯，蹐駁而不續，固執粗說，忿戾詛誹，徒輕薄以快其喙。 其可與內篇相發明者十之二三，而淺薄虛囂之說雜出而厭觀，蓋非一人之手，乃學莊者雜輯以成書。 其間若駢拇，馬蹄，胠篋，天道，繕性，至樂諸篇，尤爲悁劣。」 王氏之旨蓋尚右雜

篇，以爲含讓王以下四篇書雖不純而欲至之語較能發內篇未發之旨誠內篇之歸趣也。是則雜篇不盡僞，而崔向之本不取，不知其何所指矣。意者郭氏之雜篇卽彼之外篇耶？外雜之辨固不能區以別耶？夫以莊子高博之見發爲瑰瑋之辭，是固衆人之所樂學，而周秦之間游學論道之風盛，道家雜文輯而附於大師莊子之後爲外篇雜篇，猶儒家之說輯而爲禮記也。謂之爲不僞，則非莊子之書；謂之爲僞，則正古人「言公」之旨焉。太史公爲莊子作傳，已稱漁父，盜跖，胠篋；此章章然不相類者猶在於史遷之前，况求肖而與內篇相發明者安得非周末之書哉！至類似古夢山海者，當是秦漢風尚神仙好事者瀆以神仙家語附益之。至於晉代，不尙神仙而貴玄談；則其詭妄立顯，故崔向諸家並加刊落耳。夫以意去取，類例亦多。卽如禮記，諸家雜聚殆數百篇，戴德戴聖同受禮於后蒼，而德删爲八十五篇，聖删爲四十九篇。是則仁聖異見棄拾隨情，卽漢代而可徵矣。

頡剛案，此篇僅就前人成說略加詮次，毫無心得。莊子的眞僞要去考明白牠確是很難，因爲牠的文字太「諔詭」了，不容易摸出一個頭緒來。但是有許多地方終是可以指出的。例如列禦寇篇說莊子將死之語，天下篇又以莊子爲百家之一而評論之，足見都不是莊子自作。又如胠篋篇說「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世有齊國」，可見這篇是在秦滅齊後做的，如果莊子確與惠施同時，他必不能說這句話。其餘諸篇稱「莊子曰」或「夫子曰」的，卽使承認牠們確是莊子之言，也得說

是他的弟子所記。又如天地篇稱「夫子問於老聃曰，」下面接以「老聃曰，「丘，予告若，」」那麼，這夫子是孔子了，這也是很可疑的。又如天道篇和天運篇都有老子告孔子勿語仁義的話，意義是相同的，文章是不同的，可見這兩篇不是一個人所做，兩篇的作者各聽得這一種傳說，大家還着自己的意思去發揮，所以有這種似異而實同的話，有類於墨子的尚賢以下的上中下篇。以上都是就形式上說；若從思想上面看去，也有很顯著的不同。莊子之學，就內篇上觀察，他是統小大，忘生死，齊是非，不別物我，不知得失，隨變任化而無所容心的。所以他在人間世篇中託了顏淵的話說道「內直者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下面就借了仲尼的話來破他道，「雖固亦無罪，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可見他是要一切無所用心的。但是外雜篇中就很有許多是提倡復古的，攻擊孔子的，引伸老子的，執住的意味很重，作者的意思正要與天與人，與古爲徒。（固然裏邊的話也有許多酷似內篇的，但這原是牠們所以附在內篇之後的理由。）這似乎是道家已成立，要和儒家分庭抗禮時的出品。後來的道教中有老子化胡經，說釋迦是老子的徒弟；莊子外雜篇中再三說孔子好道，向老子及其他道家討敎，受盡他們的教誨和申斥，恐怕這些篇章竟是那時人心目中的「老子化儒經」呢？這些事情，哪裏是做逍遙齊物的莊子所願意做的！所以我對於蘇軾疑盜跖等篇的話也表一部分的同情，爲的是裏邊都罵孔子。但我的觀點與蘇軾的不同之處，他是說莊子不該罵孔子，我是說莊子不屑罵孔子，也想不到罵孔子，罵孔

子是後來道家對付儒家的事情。

十五，一，廿八記。

古史辨第一冊勘誤表

中編

頁數	行數	誤	正
八四	十一	西周宋人	西周時宋人
九一	十四	只說他們	只眞比他們
九二	六	並不天天	並不須天天
一六一	五	不能遂將反	不能遂將他拿來反
一六三	九	所言臆測	所言皆臆測